

國家圖書館



004057883

一九二七年底

回憶 朱其華著

上海新新出版社發行



一九二七年底回憶

朱其華著



04385

目 錄

序	1—3
從廣東到江西	1—56
在南昌	75—84
武漢印象記	85—120
河南之役	121—228
分家之前	229—276
九江與南昌	277—304
南征途中	305—348
逃亡雜記	349—398
香港與上海	399—430



序

我自從擺脫政治生涯，轉瞬已經六年了，六年前的故事，雖然有時也偶爾想起，但留下來的印象，已經稀薄得很。去年十一月間，在澳門一位朋友家裏，找到了幾年前寄存在他那裏的幾隻書箱，其中還有一些未發表的原稿，“一九二七年底回憶”即是其中之一，展卷閱讀，恍如隔世。在當時，我也沒有發表這些舊作的意思，其後經過朋友的慫恿，再加我個人生活上的需要，所以纔決定將這部稿子賣去，現在居然要出版了。

這部原稿本來一共是十三篇，四十六萬字，前面幾篇是一

九二七年冬天在上海寫的；一部分是一九二八年二月間在廣州及香港寫的；一部分是一九二八年六月在南昌寫的；最後兩篇是一九二八年八月在青島寫的。四個不同的區域，不同的環境，寫成了這部書，其內容之凌亂與草率，是不用說的。在拿去付印的時候，原想再改作一遍，但為保存當時的真相，而且我現在也沒有充分時間來改作，所以僅將原稿大大的刪去了一部分——簡直刪去了一半：本來是十三篇，現在僅剩九篇，本來是四十六萬字，現在僅剩二十四萬。這樣大量的刪去，對於本書的價值，當然是一個極大的打擊，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我沒有李季那樣的厚臉來寫“我的生平”，雖然在這裏發表的，也是我的生涯的一部分，但是親愛的讀者，你們在這裏所看到的，總不僅是我個人的生活吧。

因為經過了大大的刪改，特別是前幾篇，讀起來恐怕難有點不快之感；分家之前，九江與南昌，南征途中，逃亡雜記這四篇，刪改得比較少一點，或者要容易讀些。

邵力子周佛海諸先生都願意為本書作序，這是可感激的！不過因為預約關係，趕緊出書，他們的序文不及排入，等再版的時候，一定可以把這幾位先生的序文排進去的。

其華 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於揚子江的盡頭

從廣東到江西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六日的晚上，參加了南園一個盛大的歡送宴會出來，已經九點多鐘了。雖然在席上多喝了一點酒，但並沒有醉。這樣熱鬧的宴會，在理可以給我們以興奮，但我反而感覺到說不出的苦悶，因為這種完全官僚式的應酬，在我們都是不慣的；別人無謂地來恭維我們，作算在他們是好意，但在我們看來是太無聊了。所以他們儘管鬧得天翻地覆，而我

GENÈVE

只是悶悶地把一杯杯的葡萄美酒吞下肚去。

散了席以後，這些人都是匆匆忙忙地走散了，我一個人帶着無聊的情緒，沿着長堤走去。涼風吹在我被葡萄酒染紅的頰上，反而使我的精神興奮起來。因為在宴會上沒有玩得痛快，所以想到海珠公園去坐了遊艇在江面上玩玩，於是在南堤跳上了一部手車，到海珠公園去僱了一隻小艇，划到珠江的江心中去了。

時間將近十點鐘了，長堤馬路上還是車馬不斷地奔馳着，充滿了都市繁榮的氣象；珠江裏也擠滿了游艇，游艇裏大部分是和我自一樣的穿着軍服，掛着皮帶的軍官。不過他們大多是帶着女人，而我只是一條光棍。

明天早上五點鐘，就要集合出發，這可愛的革命策源地的廣州，至多只有七八小時的逗留了。雖然我在廣州沒有愛人，但我們究竟都是小布爾喬亞，想到了在七八小時以後就要離開這住居了一二年的廣州，總不免引起一種說不出的惆悵。我想起了我的前輩朋友高語罕君在今年三月間離開廣州時所作的那首“夜泊黃埔”的詩了。那首詩是：

釀罷離騷聽悲笳，

入夜江心走萬蛇；

曾住此間三月暮，

而今一水是天涯。

我不是詩人，我不配做詩人，而且也不想做詩人，但我此刻的確是充滿了詩人的惜別的情緒，使我回想起初到廣州時的那一幕喜劇。

我是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從上海動身到廣州來的。在上海參加了五卅運動，眼看着我的親愛的朋友何秉彝君在南京路上流血。本來那時的上海也是為濃厚的革命空氣包圍着，可是為了環境的關係，我在七月間就打算離開上海，最初預備到北京去，後來因為別種原因，不去北京而改到廣東來。

那時正當省港罷工的時候，廣州與香港間的交通已完全斷絕，所以從上海開來廣州的外國輪船已經絕跡；怡和，太古，日清的南華班都停止了，外國郵船本來只能到香港而不去廣州，中國輪船本來只有招商局有廣大廣利兩隻定期班，但那時廣大正在船塢裏修理，廣利在汕頭被陳炯明的部下扣留，其餘的中國輪船雖然有一二隻不定期的野雞船，但也因為怕扣留而不敢開去，所以從上海動身的時候，簡直找不到船。

從八月二十二日在黃浦灘頭找起，一直到了二十八日的下午，纔找到了一艘直駛廣州的野雞班“福康”，那隻載重不到二千噸的舊船。二十九日早上就上了船，但一直到了九月一日的下午纔啓旋出口。這艘野雞輪船的年齡，據我推測起來，

至少在四十年以上了，像那樣又小又老的輪船，其行動的遲慢是不待說了。照普通一般郵船的速率，從上海到廣州，只要五十小時就夠了（從上海到香港普通是四十五小時），即是普通怡和太古招商的客船，從上海到廣州，四天也夠了，但我們這隻野鷄輪船自上海出口，整整的走了七天，纔到了澳門口外。因為廣州與香港間的交通已經斷絕，所以輪船就不能不兜了一個圈子，從澳門進口。但船上既沒有裝無線電，而在上海開行時與澳門領港接洽的時間又不準確，所以到了澳門口外，領港還沒有來，不能不拋了錨等着。

在沒有到澳門的前一天，船上的水已經喝完了，因為據那個蹩腳船主原來的估計，只要五天就可以到澳門，加以輪船本身載重不多，而貨物又裝得滿滿的，所以水就裝得很少，只夠六天的食用。時間是九月初旬，南國海上的氣候還是像三伏炎天一樣地悶熱，水的需要正特別的大，沒有了水，這是多麼嚴重的問題！

當那天下午開晚飯的時候，我們發覺了飯的味道不同尋常，就去找賬房責問，那賬房先生苦着臉答覆我們：

“對不起了，船上沒有水了，所以不得不用海水來煮飯。”

用海水來煮成的飯，怎麼能夠下喉？但船上既沒有水，又怎麼辦呢？於是船上就起了一陣騷動，後來由船主宣佈了明天

上午無論如何可以到達澳門的消息，乘客稍為安心了一點。可是像這樣炎熱的天氣，沒有水喝真是要命！連一分鐘也難挨過去。在這缺乏水的恐怖的時候，船上那個賣汽水的小販於是大發其財了；本來他的劣牌汽水賣兩角小洋一瓶還沒有人光顧，所以賣了七八天，還剩了九瓶，此刻他立刻抬高價值，買兩個銀元一瓶，居然一搶而空，我還算是捷足先登，化了四塊錢，搶到了兩瓶。

就是這天晚上六七點鐘的時候，我們隔壁房裏的一個四川搭客病死在艙中了。天氣是這樣炎熱，船上死了一個人，真是不得了的事，而且正是我們貼隔壁的那個艙裏，所以我們聽到了這個消息的時候，不能不立刻離開了房間而跑到甲板上。

照例輪船在航海中死了人，就應該把屍身丟在海裏；所以船主知道房艙裏死了人，立刻就命水手動手把屍骸投到海裏去。爲了船上乘客及船員的安全起見，當然毫無疑義的應該這樣辦。可是，中國的事情真難辦！這位不幸的死者雖然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人物，但他們一起同來的五個人，二個是去黃埔投考軍官學校的，三個是去廣州找事情的，其中一個是死者的弟。死者是虎門要塞司令陳肇英的親戚。當船主宣布要把屍骸投入海中的時候，他們四人立刻表示反對，死者的弟甚至激烈

地說，如果船上一定要把屍骸丟到海裏去，則輪船進虎門口的時候，陳肇英司令一定要把輪船扣留，而且要把買辦捉到要塞砲台上去當火伕。這種恫嚇是很有效力的，那個飯桶買辦為怕輪船到虎門去真會被扣留，於是到船主那邊去說了許多話，彼此經過許久時間的磋商，最後船主也不得不取消了將屍骸丟入海中的原議。因為這是一艘中國輪船，船主又是一個失去了國家保護的白俄。這個蹩腳船主為要保持他的飯碗，祇得付之一嘆而回到自己艙中去了。

這具屍骸用一條薄單被裹着，停放在房艙外面的飯廳裏，於是這裏就成了‘戒嚴區域’而沒有一個人敢從這裏經過了。我們這房間裏本來有四個人，那時大家都不敢回房間去，只得擠在甲板上過了一夜。

這是我這次到廣東來第一個所感到的不良的印象。虎門不是在廣州革命政府的統轄之下嗎？為什麼牠敢任意扣留一隻商船？而且是全無理由，又無必要的扣留呢？僅僅是親戚做了司令官，而且是一個小小的要塞司令官，就可以在外面橫行，不顧航海定規，不顧船上百數十人的安全，這種有槍階級高於一切的現象，想起了真使我們憤慨！

第二天的上午起來，用海水來洗了臉，本來很需要喝點水，但什麼地方能夠去找一點清水呢？船在深藍色的海中航行

着，四面是海天相接，望不到一點邊際，甚至連海鷗也瞧不見一隻。天的顏色是和海水差不多的青，除了東面一輪紅日以外，天上找不出一點雲，正和海上找不出一點其他的物體一樣。我們這艘可憐的野鷄船，在這偉大的海與天的懷抱中，乃愈見其渺小了。

什麼時候纔能到澳門呀！——船上的乘客都這樣焦急的發問，連水手也顯出十分焦灼的神氣。

一陣嘈雜的聲音起來了。

房艙裏另一部分人堅決的主張非把屍骸立刻丟下海去不可，因為這可憐而又可怕的屍骸經過了一夜的休養，發出一種難聞的死人身上特有的臭味，所以引起了大部分人的憤慨。

那市僧式的買辦，像是一個過慣了軍閥鐵蹄之下的生活的人，雖然那時許多人很憤慨地要求立刻把屍首丟到海裏去，但他還是怕輪船到虎門會被那不幸的死者的威風的親戚所扣留而不敢下此決心。幸而在這一羣搭客中，有一位甯波奉化人，是黃埔軍官學校校長蔣介石的親戚，蔣介石的來頭當然比陳肇英更大，所以我們這位“阿拉同鄉”很有把握地說：

“立刻把這屍骸丟到海裏去！陳肇英，他算得什麼？在革命旗幟之下，他敢無法無天嗎？如果他敢扣留輪船，我去告訴蔣校長槍斃他！”

他說了這篇話以後，又向買辦拍胸負責。究竟蔣介石的親戚比陳肇英的親戚更來得威風，所以昨天他們是那樣神氣活現，而今天在阿拉同鄉的面前，不能不垂頭喪氣而表示屈服了。

却好那時在船上遠遠望見一羣荒島，於是那不幸的死者的同伴就要求買辦在輪船行近荒島時暫時拋錨，把這屍骸埋葬到荒島上去。這個請求立刻得到了買辦的同意。不久，船就在荒島附近拋了錨，放一隻舢板，三個水手和死的弟坐着舢板把屍骸載到荒島上去了。

這島的面積是非常之小，實際上是幾個小山，據說離澳門沒有多少路了。這幾個小山上沒有一枝樹木，連野草也沒有一根，顏色完全是火紅的。藍色的海水把這幾枝火紅的小山包圍着，形成一幅美艷絕倫的圖畫。可惜我不是美術家，否則像這樣幽美的景色，收入畫中時是多麼有價值的成就——其實即使我是一個美術家，此刻我也無心來描寫目前的景物了，因為那時我真喝得要命，唯一的希望是早點進澳門口，讓我弄一點清水來喝。

在澳門口外足足候了十二小時，領港纜珊瑚而來。這十二小時中，不僅是我，我們全船的人都焦急得像熱石頭上的螞蟻。

進了澳門口子不久，就到了虎門了。在虎門口外，我看到了一艘插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的船。這面旗幟在我的腦筋中是留了一個多麼深刻的印象呀！我們在東南和北方看慣了軍閥的五色旗，現在看到了這面新鮮的旗幟，彷彿這面旗幟告訴我們已經從黑暗之國到光明之國來了。雖然在以後，這面旗子不能引起了我絲毫的同情，但在當時，在虎門口外第一次看到這面旗子的時候，真是說不出的喜悅，說不出的興奮。我想，在辛亥革命以前，革命黨人怨恨黃龍旗，看到了這面新的五色旗，一定和我當時虎門口外看到的旗子一樣的歡悅；曾幾何時，光明的徽號的五色旗會變成殺人的恐怖的黑暗的標記，這真使人不勝今昔之慨！

我到了廣州了。

一向在軍閥鐵蹄之下生活着的我，如今到了這革命空氣濃厚的領帶，於是一切的一切，都覺得新鮮而有味。雖然此間的一切未必都使人滿意，但一般說來，這革命的新都並沒有使我失望。

自從一九二五年九月十日到廣州以後，這一年多來，差不多一步也沒有離開過廣州。這南國的都市是太可愛了，我這幾年來，飄流了十幾個省分，但我沒有遇到一個比廣州更可愛的地方。廣州，當然還不能稱為人類理想的樂園，但全國都在

軍閥蹂躪之下。只有廣州是一塊自由的領土，愛好自由和光明的我們青年，縱不能視這革命的新都為聖地，但至少，這是值得留戀的地方。現在我們要離開這可愛的地方了，從此天涯海角，重相逢，知在何時？這不能不使我感到深切的惆悵了。

二

小艇在沿長堤一帶的江心中蕩着。我依然是被惜別的情緒包圍着。廣州是多麼可愛的地方呀！

我愛好廣州，不僅因為牠是革命的新都，還有其他許多的原因。這些作為我愛好廣州的諸原因，嚴格的說來，是沒有政治的理由，不過是充分地表現了我的浪漫的小布爾喬亞的劣根性罷了。

我很愛廣州的氣候。我雖然不敢說全世界，但至少，我覺得全中國沒有一個地方的氣候比廣州更好。我沒有在南洋羣島過過火坑裏的生活，也不曾在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中居住過；但我可以知道，太寒與太熱的溫度都不是我所歡喜的，尤其是太低的溫度是我所害怕的。我到過北滿，鴨綠江畔的冬夜的

生活，每一想起，總覺得毛髮悚然。同樣，太高的溫度也是我所厭惡的。我們在西藏拉薩附近的小城中住過十七個月，雖然那時我還是一個什麼也不知道的只要吃奶的孩子，但家人談到西藏夏天的酷熱，回想起來就覺得非常可怕。再說吧，就是本部各地方，北京冬天的冷，武漢夏天的熱，乃至於南京上海杭州這些地方，也是我所不歡喜的。南京冬天的溫度，有時會低到攝氏零下二十三度或二十五度，至於在零下十度至十五度，那是時常可以遇到；上海夏天的溫度，有時會高到華氏一百〇五度以上，至於九十五度至一百度，也是常有的事；南京夏天的溫度往往比上海更高，至華氏一百一十度。但是廣州不同，廣州的氣候無論怎樣冷，總不會低過華氏四十度以下。這亞熱帶的氣候是多麼使我留戀呀！我去年在此地過了一個年，只穿着上海秋季穿的衣服，在這裏，幾乎永遠是像春天一樣的和暖。因為有海風調劑的緣故，就是在夏天，也不見得怎樣熱。

在這裏，特別使我感覺愉快的，就是廣東的民族性，比我們的故鄉浙江完全不同。

我的故鄉是在那山明水秀的江南，美麗絕倫的西子湖畔。但我沒有絲毫愛好鄉土的觀念。說一句不怕得罪我們同鄉的話，我真是恨極了我們下江人，特別是蘇杭一帶。虛偽殘忍，奸刁刻薄，是我們下江人特有的品性。可是在廣州，我所看到的

此地人民的民族性是率直，坦白，勇敢，忠誠。舉幾個很普通的例來說吧。在江浙各地，特別是上海或南京，住在旅館裏，茶房的假意的殷勤會使你生不快之感；他們之所以假意殷勤，爲的要使你能多給他們幾個酒錢。說到茶房的酒錢，他們纔真會敲竹槓呢！可是在廣州任何旅館裏，茶房是決不奴顏婢膝向你假獻殷勤，因而他們也不會來敲你竹槓；你如果給他們幾個酒錢，他們自然也不致拒絕，但你不給，他也決不向你“硬要”。他們是當茶房的，他們的職務當然是爲旅客服務，但是他們並不把人格拍賣給旅客，所以他們的職務在統治階級的人看來或未免是下賤，但他們的人格依然很高尚，他們的態度也總是很尊嚴的。他們那種把自己看得像紳士一樣高貴的自尊的態度，當然會使歡喜奉承，而且看慣了奴顏婢膝的茶房的紳士們覺得很討厭，但在我看來，這是多麼可寶貴的自尊的民族性呀！

廣州的文化水準也比別處高得多，舉例來說，上海的黃包車夫能識字的很少，而廣州的車夫幾乎無有不識字的。在廣州，你如果因爲言語不通而僱黃包車不容易，那是不成問題的，只要把地名寫給車夫看，車夫就會知道。

廣州婦女識字的程度也比別處高得多，甚至連那些女僕，也大都是識字的。在上海的那些女僕（娘姨），一千個中間很

難找到一個能認識自己的名字；但在廣州則不同；廣州的女僕（僕媽），大都是能識幾個字的，我在廣州這一年多中間，曾經用過三個僕媽，都能夠識字。

除了北京可以勉強比擬外，沒有一個地方能夠像廣州那樣一方面具備都市的物質文明，而另一方面又具備鄉村的自然景色。上海的物質享受是可以使我們滿足的，但是太枯澀了，鄉村的自然景色在上海是做夢也想不到的。杭州有美麗西子湖，可以調劑我們的精神生活；南京有玄武湖，莫愁湖，雨花台，清涼山，鷄鳴寺，紫金山，燕子磯等等地方，也可以使我消愁解悶，但是南京與杭州的物質生活太可憐了：這些地方簡直不成一個近代都市，自來水是沒有的，電燈是黑暗的，道路是狹窄而且不平，交通器具又極不完備。但廣州是能具備了這兩個條件。廣州是南部中國的第一個大都會。中國各大都會中除了外人經營的租界不算外，沒有一個地方的市政能及廣州。土敏土鋪成的馬路，總是那樣整潔而光滑。市內的公園很多——在中國各大都會中，廣州是公園最多的地方，而且廣州的公園各有各的妙處：中央公園是廣州最大的公園，但倒沒有什麼特色；海珠公園雖然是很小，但那是珠江中間的一座小島，到公園去必須划子擺渡，現在已經搭了浮橋；越秀公園是在山上的，即是有名的觀音山，現在全部築成公園；惠愛公園是從前

的法國領事府，面積雖不很大，他的特色是在於全部面積成爲一條狹長的街堂式，兩面都是高大的樹木，上面的樹葉枝互相擁抱着，使太陽照不到地上，而遊人於其間，也彷彿是在森林中旅行；東山公園是一個很小的公園，但正因其小，會使人感覺到別有風味。還有其他幾個公園正在規劃或開築中。

這些各有特殊風味的公園——有的在山中，有的在島上，有的像一座森林——都使我感到極大的趣味，而其中尤以東山公園爲尤甚。

這小小的公園種滿了熱帶地方的植物。木棉花和椰子樹是我所知道的，其餘有許多花木我連名目也叫不出來。因爲我的寓所是在東山，所以我常常到這公園來遊玩，特別是在傍晚的時候，這公園中時常有我的踪跡。我是多麼愛好這小小的公園呀！坐在這小小的公園裏，會使你忘記了是在國內，而以爲是在南洋羣島的一個海邊，因爲這裏是充滿了異國的情調。

單就公園這一點是不足以說明廣州的都市美。廣州的可愛的地方，就是一方面具備了近代都市的一切物質的條件，而另一方面又具備了鄉村的自然美。至於市內古蹟名勝之多，近郊風景之佳，除了北京以外，沒有一個地方能夠及得上廣州。

我是住在東山。慚愧得很，東山是被稱爲貴族區的，廣州

所有的要人幾乎全是住在東山的。此外，廣州及南洋華僑資本家也有許多在東山築有別墅。但並不因為要人官僚資本家住在東山而減少了東山的價值，倒正是藉了他們的力量，把東山裝飾得更其可愛了。

綠的樹木，紅的洋樓；或者是紅的鮮花，綠的洋樓；白的粉牆，各種顏色的玻璃，像這樣，把東山的每一條街裝飾得都像美麗的少女。

整潔的馬路，兩邊都是紅紅綠綠的洋房，寬大宏麗的花園，這在上海法租界西區是特別的多。但這是不能拿來比擬廣州東山的。在東山，沒有寬大的馬路，那都是一些靜僻狹窄的小道，道上都是沙，不是整潔的水門汀。正因為如此，而更覺得別有風味。我住在龜崗三馬路，其實這所謂馬路，是一條又短又小的斷頭街，可是我是非常之歡喜這條斷頭街的。每天晚飯後，我總是出來散散步，照例，首先到東山公園去小坐片刻，看着從加拿大汽車上下來的一羣羣紅男綠女。從公園裏出來，就在東山的各處小街閒走。各處小街上閒走這是我感覺到最有趣味的事。幾乎是在每一條小街上，都可以過見那迎面而來的三五成羣的妙齡少女。她們都是附近女校的學生。她們那種閒逸的情致，美麗的姿態，會給你一個極有力的誘惑，使你感覺到需要立刻把她們拉到你的懷抱裏來，這種需要幾乎是超一

切的，在這種需要面前，會使你忘記革命，忘記被壓迫者的痛苦。我常常自責我這種小布爾喬亞劣根性之不能根本剷除，其實正是這樣自責的時候，更是充分地發揮了這種劣根性；因為我每次自責以後，總又是替自己辯護，以為像我這樣一個將近二十歲的而且從未與女性接近的青年，當那被異性的“美目盼流”所誘惑的時候，人孰無情，能無動於中？其實這種辯護是非常錯誤的。我們的錯誤除非自己不知道，知道了就應該立刻改過；知過而不改，更是莫大的錯誤！我就是時常犯了這種更大的錯誤。

在那時，為了迷戀於一位不知姓氏的少女，不僅時常有這種錯誤的念頭，而且我是犯了罪了。

事情是這樣的：那是一九二六年九月間，我和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朱季恂君同住在東山龜崗三馬的那幢小洋房裏。朱君因為長期臥病，行動不便，所以住在二樓，我是住在三樓。朱君有一位姓范的小姐陪着，據說這位范小姐是他的高足，其實高足而兼為愛人的，本來很多，我也決不少見多怪。不過我這樣想：像這位朱老先生那樣四五十歲的年紀，尚且需要小姐來陪他，像我這樣一個未滿二十歲的青年，不待說是更其需要了。其實范小姐與朱君並不是同住了一個房間，朱君是住在前樓，而范小姐住在後門，不過我總有點疑心范小姐夜裏不住在自

己的房裏。所以當我有時一個人睡到半夜裏實在睡不着的時候，甚至會無聊到偷偷摸摸的走到二樓去竊聽動靜。我的意思並不在偵察他們是否同住一室，因為他們即使同在一室，也毋庸我來吃醋，而且我是希望他們同住一室，使我能在半夜裏從牆外面聽到一點張競生著作中時常提到的那種使人迷戀的聲音。因為實在慚愧得很，那時我雖然已經叫名頭二十歲了，可是男女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的事，除了在張競生的著作中知道一點以外，不僅本身未曾嚐過，而且未曾目見，未曾耳聞。其實我的希望是很蠢的，那麼厚的粉牆，那麼厚的房門，又是關得那樣緊緊的，即使裏面在做三本鐵公雞，也不會有一點聲音透到我耳管裏來。

我的手淫的毛病，也是這個時候犯得最厲害。

就在這非常需要異性的時候，我在東山街頭閒步中邂逅了一位妙齡少女。雖然一直到現在，我還是連她的姓名也不知道，可是我的確是熱烈地迷戀着她。我們差不多天天可以在街上遇見一次，時間那刻是在晚上六七點鐘，彷彿是彼此約好了一樣。見面的時候雖然沒有說話，但我知道這位不知姓名的小姐也是在注意我。但她出來時，總是有一二個同伴，所以我總是沒勇氣上去和她談話；其實她即使沒有同伴，我也是沒有這種勇氣。我每天在沒有見到她以前，總是想盡了許多方法，預

備今天遇見她時，無論如何要鼓足勇氣和她說話，至少要把她的姓名住址問個清楚，可是到遇見了她，口還沒有開，自己的臉上先紅起來。就是這樣差不多連續有一個月，幾乎天天見面，但總是默然過去——可是在這默默而過的時候，我已經感到一種神祕的愉快的情緒。爲了這種神祕的快感，我每天總是匆匆忙忙吃過夜飯，跑到東山公園去等候這位不知姓氏的小姐的降臨。雖然時常在這時間內有很重要的會議，我也往往託詞不去參加。這不僅是錯誤，簡直是很嚴重的犯罪的行爲。爲了這事，我受了不少的前輩的督責與朋友的勸告，但我總還是沉醉在這神祕的酒酌杯中，一天天這樣墮落下去。一直到十一月初，纔不見這位小姐，如今要離開廣州了，不知要何年何日，纔能重來東山街頭闊步，不知姓氏的小姐呀，我祝你幸福無量！

三

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到武漢去，是在十月初中央及各省區聯席會議時就有這種提議，但當時江西問題還沒有解決，

而且武昌初下，(武昌城是十月十日攻破的)，所以對於遷都問題並沒有具體決定。十月底，中央派孫科宋慶齡陳友仁等同了鮑羅庭出發到江西武漢去考察，這是實行遷都的初步。十一月二十日，始決定實行遷都，而且當時決定了十二月七日從廣州黃沙車站出發，由粵漢路北上，經韶關南雄入江西轉武漢。

關於遷都問題，在當時發生了主張與反對兩種意見。主張遷都的理由是：

第一：兩湖江西下後，革命勢力已由珠江流域發展到長江流域，而且將繼續向黃河流域發展。武漢在今後的革命形勢上，無疑將成爲一個主要的中心點，中央在廣州已有鞭長莫及之概，故亟須遷到武漢去，以適應革命勢力的發展。

第二：兩湖的工農運動已如雨後春筍般生長起來，江西的農民也已經起來，亟須有一個最高機關就近指揮統轄，

第三：江西問題雖已解決，工農運動雖已起來，但是兩湖江西——特別是武漢的人民還是很恐慌；漢口人民甚至一夕數驚，紛傳吳佩孚的軍隊反攻，已經佔領了孝感，不日可以佔領武漢；又說蔣介石在江西被孫傳芳打斷了一支腿，孫傳芳的軍隊已經由萍鄉包抄襲長沙，甚至傳說長沙已經被孫傳芳佔領。種種奇奇怪怪的謠傳，每天總有數起。這種情形證明中央必須立刻遷到武漢去。不僅可以就近指導一切，而且可以鎮懾

人心。

第四：廣東民衆運動已有相當基礎，換言之，革命基礎已相當鞏固，中央北遷，當不致影響革命基礎。

反對遷都者的意見是：

第一：正因武漢初下，人心未定，不適宜即行遷都，

第二：武漢地勢，易受敵人包圍，經濟封鎖危機尤爲嚴重。

第三：廣東革命基礎並無若何鞏固，中央北遷後，後方情形可慮。

第四：雖然政府遷武漢後將來仍可再遷別處，但一個豆腐店搬家，尙且要選好日子，中央政府究不宜隨便搬遷。

主張遷都與反對遷都的人都有理由，但主張遷都的人佔多數——蔣介石、孫科、鄧演達、唐生智、李濟深、張發奎等都是主張遷都的——而反對遷都的不過是少數人，而且是不重要的少數人，後來鮑羅庭來電也主遷都，所以遷都也就成了最後的決定。

在這裏我要說到我個人的主張。本來我是一個不足輕重的小職員，而且因爲我年紀比較輕了一點的原故，一班負責任的人差不多總是把我當作小孩子看待，其實對於於治上我也有我的主張，我也有我的見解。

我是反對遷都武漢的，並不是因爲我留戀着廣州，而是爲

了革命的利益。我覺得一個最高的革命領導機關，不能像一個軍隊的司令部那樣隨便隨着軍隊的進展而由後方搬到前方。最高領導機關不能離開廣州，與不適宜在武漢建都是同樣重要的理由。

我們的目的不在掠取地盤，而在解放民衆。但要怎樣纔能解放民衆呢？首先是要建立革命的政權，鞏固革命的基礎。我們基礎在什麼地方呢？當然是廣東。但廣東的革命基礎是否已經鞏固？顯然沒有。作爲廣東革命基礎的，實際上只是七八萬省港罷工的工人，以及八十萬有組織的農民。可是除了罷工工人比較有力量以外，農民的組織還是極其散漫。廣東全省的農民至少有三千萬，八十萬這個數目不過是百分之二強。廣東地主階級的力量比任何省分更大，農民不僅沒有握得農村政權，而且還在成批的被地主階級屠殺——在最近，中山，廣甯，花縣，普甯等縣，地主慘殺農民的慘案是日不絕書。

不僅鄉村政權在地主階級手中，即以廣東全省來說，省政府幾乎完全是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省政府的主席就是有名的地主階級的代表古應芬。各縣的縣長大都是古氏的門下。他們完全忘記了國民黨的政綱，而以全力幫助當地的地主階級來壓迫農民。他之所以還不敢公然封閉農民協會，公然屠殺農民領袖——有些縣分是已經公然實行了——爲的是廣州還有

一個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而當時的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還是左派的控制之下。

留守廣東的軍隊，大部分是地主階級利益的保衛者，李福林的第五軍是不待說了，就是其餘的部隊可嘗不是如此？中山，廣甯，花縣等處的慘案，完全是駐軍幫同地主階級來幹的。第四軍軍長李濟深，以總參謀長的資格代替行使總司令的職權。土敏土廠的總司令部實際上成了比中央黨部比國民政府更高的太上政府。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雖然時常一個決議，一個宣言，一個通電來表示“擁護工農利益”，而總司令部却以“後方治安”這一塊千金關來鎮壓了一切民衆運動。總司令部的煌煌佈告，從廣州一直貼到內地各縣，貼到鄉下。佈告上說：工人不准罷工，爲的是要鞏固後方治安；佈告上說：農民不准抗租抗稅，爲的是妨礙後方治安。但究竟因爲還有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擺在廣州，總司令部還不致把一批批的工人農民拿來當作“罪”而綁到東較場去“殺頭”。

總之，自從三月以來，廣東的革命基礎真是危機四伏。在這個時候，我認爲我們的主要任務應該是以全力來鞏固廣東的革命基礎，鎮壓一切反動勢力，特別是要給地主階級一個重大打擊。如果這個時候我們冒冒失失的把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搬到武漢前方去，不僅使黨部和政府將受前方軍事勢力的

挾制，而且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離開了廣州，廣東一切反動勢力從此可以跳樑無忌，這不啻是把廣東交給了反動派。

這樣，我們即使能在武漢建立一個革命的新根基地，但我已經失去了廣東。這是得不償失的。

這是中央黨部所國民政府不能離開廣州的理由。此外，同樣重要的理由是武漢不適於建都。

廣州是一個海口，可以得到外面接濟。縱使英帝國主義可以封鎖香港，但廣東的海口還很多。武漢就不同。武漢是腹地而不是海口。武漢的交通命脈是長江，從上海到漢口間的交通，是武漢經濟上的命脈。要是在長江下游封鎖武漢，同時京漢路又斷絕交通，那武漢簡直只有束手待斃。舉例來說，武漢每月需要四萬噸乃至五萬噸的煤，這些煤全是外面運來的——百分之八十五是由長江下游(上海為主)運來的，百分之十五是由京漢路運來的。如果長江下游被封鎖——這種封鎖是非常之容易的——而京漢路的交通又中斷——京漢路的交通是長年中斷着——則武漢的煤的恐慌必很嚴重，漢陽的兵工廠及許多工廠將無法開門，火車將無法開駛，人民的燃料將大感缺乏。又如煤油，武漢所需要的，全由長江下游運來，如果下游被封鎖，其情形將如何嚴重是不待說了。再就糧食說，武漢糧食不足自給，雖然湖南可以供給一部分，但主要還是依賴

長江下游運來(皖米及洋米)。

武漢的金融與上海的金融市場有密切不可分離的關係，與下游的交通關係尤為重要。中部諸省貨物的出口，以武漢為門戶，經下游至上海出口，如果下游被封鎖，貨物不能出口，則武漢金融上所感受的困難是不待說了。

像這樣，即使敵人不從四面八方來進攻我們，我們也只有束手待斃了。這是武漢不宜建都的理由。

為適應革命勢力的發展，為便利指導起見，可以在武漢設置一個高級的指導機關，為什麼一定要把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到武漢去呢？

這是我反對遷都武漢的理由，但是我對於政治沒有發言權，我的反對的意見只能擺在自己肚裏。

四

也好，到武漢去吧！轉換一個新的生活環境，在我們年青人總是高興的。

遷都武漢決定以後，中央黨部決定所有工作人員發一個

月薪水(作為預支),百元治裝費,百元路費(水路七十元——所謂水路是由上海轉漢口,而黨部是江西陸路赴漢口的),這倒可以使我們小闖一下了。

我本來是想走水路的,好回到上海去看看幾位老朋友,可是我不能。我不怕上海碼頭上孫傳芳的密探,我之所以不能由上海轉是因為我擔任了一點職務。我是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人部宣傳科的主任,遷都本來是一件大事,應該作一番廣大的宣傳,但那時中央宣傳部的部長某君,這位老先生在中央黨部是一位有名的“吃糧不管事”的部長。而且他的部下又個個和他一樣——他是五月十五日“整理黨務案”通過以後纔被推為中央宣傳部長的,原來的宣傳部長是汪精衛,而由毛澤東代理。那時汪君既已遠避法國,而整理黨務案中又規定跨黨黨員不能任中央部長,毛君却是跨黨黨員,所以不能坐這把交椅,而由某君來繼任了。某君到宣傳部來的時候還鬧了一點小小的笑話,因為他是在北京政府下生活慣了的,所以染滿了北京的官僚的習慣,他一到中央宣傳部,就把全部的人員都撤了職,而完全換上了他自己的一批人。這種辦法在北京政府之下原是司空見慣。可是在廣州,特別是在中央黨部,却是創見,所以當時曾引起了一點小小的糾紛。他所帶來的人,都是他的高足。這些人不知道幹了些什麼事,中央宣傳部簡直工作也沒有

做。其他各部，又沒有宣傳科的組織，所以我們不能不起來擔任遷都的宣傳工作。組織了一個宣傳隊，擔任北遷沿路的宣傳工作，無法避免的，我被推為隊長了，於是到上海去的夢是無法實現了。

在出發前的五天內，我們忙着準備工作，到十二月六日，一切的工作都已準備好，只待明天出發。今天是我们留在廣州的最後的一夜了，所以雖然因為連日的工作和應酬已經疲勞已極，還是不願意就去睡。在珠江裏混到了十二點鐘，纔回到中央黨部來，那時中央黨部裏已經有許多人把行李搬了來，準備出發，所以我也回寓去搬了行李，回到中央黨部來。天沒有亮，我們就從中央黨部出發到天字碼頭。

大南洋電船已經停泊在天字碼頭，這是預備送我們開往黃沙車站的。時光還早，距離開船的時間還有半個鐘頭。我們的一行有一部分已經上了船，我和毛君等數人還站在碼頭上閒眺。這時送行的人漸漸多起來了，歡送的團體都是打着旗幟，有的還帶了軍樂隊，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中央婦女運動講習所的那一羣小姐。她們雖然穿着粗布的制服，但因為她們的臉上都是用最上等的化粧品粧飾得白白的香香的，所以一望可知她們是養尊處優慣的小姐。她們打着一面大旗，旗上寫着“歡送何所長”（中央婦女運動講習所的所長是何香凝）。我

終究是有點小孩脾氣，看到這面旗覺得有點好笑，於是高聲的喊起來：

“喂！爲什麼你們祇歡送你們的所長而不歡送我們？豈有此理！”

於是這羣小姐們都笑起來了。

由她們的笑，又使我回想起前幾天的情形。在前個星期一，我到她們講習所去作了一個政治報告。這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踏進她們的課堂。當我一走進去，這些小姐們就格格的笑起來了，笑得我的臉上發紅。她他們的宿舍就是在中央黨部裏面，所以我們天天可以看到她們；她們行開學典禮那天，我還以來賓的資格參加了她們的盛會，至於在別的集會中，我和她們見面的機會也很多，但我每次遇見她們，她們總是臉紅紅的做出西廂記上所謂“羞答答不肯把頭抬”的表情。她們雖然是小姐（當然也有不少是已經做了奶奶），可是她們都是從各省選來的婦女界的先覺，照理應該是很解放的，但她們總還是那樣見了異性就要臉紅——見了別的異性是否臉紅我可不知道——男女界限之不易打破如此，這就可以使我們知道革命之不易完成了。

我們上了船，船也就開了。岸上的軍樂隊的歡送曲吹奏得很好聽。

到黃沙車站時，車站上已經擠滿了歡送的羣衆。

準備我們乘坐的兩列專車已經停在月台上，同行的人都上了車，我到車站的客廳裏去參加了歡送代表的一個集會。

在軍樂聲與爆竹聲中，我們的專車漸漸地離開了月台。

車子離開月台以後，開足了速力向前直駛。已經望不見車站了，已經聽不見車站上一切嘈雜的聲音了，我們是離開廣州了。這種別離的情致又使我想起高語罕君的那首“夜泊黃浦”的詩，我一再低吟着：

讀罷離騷聽悲笛，
入夜江心走萬蛇；
曾住此間三月暮，
而今一水是天涯。

雖然這是車上，這是陸上，不是江，不是水，但當這離別廣州的時候，一讀這首詩是使我們如何感動呀！

五

廣州韶關的粵漢線的途中，這是第三次了，所以一切都是

舊識的，源潭，英德，黎洞，琶江口，馬壩，一站一站過去，到了韶關了。

七月間曾到韶關來過一趟，那真是一幕滑稽的喜劇。

事情是這樣的：那時有人介紹我到第六軍（程潛部）政治部工作，我就跟六軍政治部到了韶關。六軍政治部主任林祖涵君，原是我的老朋友，但這次我到六軍去的時候，他對我的態度實在使我深感不快。他首先就問我為什麼要和毛澤東鬧？接着，他就以老長輩的資格教訓了我一頓，說我們年青的人，性情總是這樣燥，以後要和氣一點，不要太任性。本來，前輩來教訓我，我是非常誠意接受的，但如果抹煞了事實，這當然是使人難堪，所以林君雖然要我跟了他們出發，而我心裏實在老不高興。到了韶關之後，又看到他們那位姓李的秘書那樣神氣活現，擺足了官僚架子，這當然是我不能忍受的，所以我也就不別而行的跑回廣州來了。

現在我又到了韶關了。

韶關是廣東北江的門戶，無論在政治經濟上都很重要。韶關城是有名的堅城，與東江的惠州城同被稱為“銅牆鐵壁”。到過東江而沒有到過韶關的人，一定以為韶關也像東江的許多名城如油頭潮州那樣有很整潔的馬路，很繁華的市場；但到了韶關，就會使你驚異。這北江第一重鎮的韶關，是這樣一個狹

小的城市！馬路是沒有的，石板舖的街道狹得連一匹馬也不易牽過。而且因為城內的飲料全賴城外北江河道供給之故，從城外挑到城裏的水担，自晨至暮，絡繹不絕，而街道也就長年像落雨天一樣的潮濕，走起路來，一滑一跌的使人難受。電燈是沒有的，街道既狹，陽光就不充分，雖是在白天，也很黑暗，晚上過了八點鐘，商店就關了門，街上冷靜得不容易找出人跡。

本來，韶關是北江的首府，而且又有鐵道通廣州；湘南湘中及贛南贛東的商貨，大批的經此至廣州出海；由廣州進口的洋貨，也經此散佈於湘南湘中及贛南贛東各地，像這樣一個重要的地方，商務應該很發達。但是實際上，韶關的商業，凋零衰落，不及浙江一個三等縣城。在這裏沒有一家新式工廠，而舊式的手工業生產却還是佔主要的地位。雖然一部分的洋貨在此地也頗能銷售，但一般主要的日常用品，還是舊式手工業的產品。現在時常有人說，中國資本主義已有長足的發展，封建勢力已沒有多大作用。這種謬誤見解是完全與事實不符的。我們就以韶關來說吧，如前所說，這是廣東北江的首府。但就這個城市的經濟生活上考察，就可以知道完全還是農業手工業社會，找不出絲毫資本主義發展的痕跡。

如果我們進一步來考察韶關的經濟何以如此落後呢？那立刻就可以知道最大的原因是由於封建的剝削。

在此地，捐稅的名目，真是多得出奇！而稅率之重，也是重得出奇。這種奇奇怪怪的捐稅，就是一種典型的封建剝削。在繁重的捐稅壓制之下，工商業之不能發展，也就顯然了。

內地城市工商業的發展，全視附近鄉鎮人民購買力如何而定。韶關工商業之不能發展，是由於附近人民的購買力低弱到了極點。在我們到韶關的第二天，調查組（屬於宣傳隊的）到近郊四鄉調查回來所作的報告，證明了此間附近農民一般的生活水平是異常低下。他們日常的衣食住可憐到食不能充飢，衣不能蔽體，住不足以禦風雨，自然不能有多大的購買力了——簡直連化兩個銅子買一包火柴的力量也十分缺乏。農民的生活力量所以降低到這樣低下的程度，就因為封建的剝削太甚。這種剝削可以分兩方面來說，一種是地主藉名義上的土地所有權來剝削佃農，徵收極重的租米。農民要把每年所得的自百分之五十乃至百分之七十獻給地主。另一種是政治上的封建剝削，軍閥的剝削都是經過豪紳地主（鄉村政權）之手，而最被剝削的是農民。例如擬派公債，政府發給縣裏，縣裏又按各區各鄉分配；支配各區各鄉政權的是豪紳地主，他們當然不願自己吃虧，好在他們可以權力來強迫農民繳納。農民在這種種的剝削之下，其生活狀況自然要日趨惡劣了。

韶關的經濟雖然如此衰落，而韶關的風景却是很可愛的。

北江就在韶關城外；從火車站下來，進城就要渡江，城下河邊，就是韶關風景最好的地方。北江江面也有相當的闊，兩邊有四五尺的沙灘，沙灘上有不少的可愛的小石子。雖然這裏的小石子並不像南京雨花台上的那種小石子那樣有名，可是的確也是非常可愛。站在靠城門邊的沙灘上遙望對岸，那簡直是一幅絕妙的圖畫：右邊有幾座小土山，山頂上有一座古塔，山腰中有一座破廟。點綴在江邊的山，古塔，舊廟，愈顯得清幽絕麗。右邊是火車站和一條不熱鬧的小街。如果站在火車站這旁的沙灘上遙望對岸，那一座老氣橫秋的古城，也是可以收入圖畫的。尤其是城牒上那面迎風招展的旗，一看見就會使我們聯想到王石谷的那幅“荒城古戍”的山水畫。雖然這不是荒城，但那古城，那城牒上迎風招展的旗，那幾座土山，那山上的塔，山中的廟，都顯出荒涼的景色。最可愛的是那一羣羣的白鷗，從江面的沙灘飛到城牒上，又從城牒上飛到塔上，飛到廟頂上，這樣，很自然地把這江上的景色點綴成一幅絕妙的圖畫。

我很愛這清幽絕麗的江上的景色，我覺得這裏比我的故鄉西子湖畔更可愛得多，七月間到此地時，晚上却好有明月，又在此地遇到許多友人，這晚上曾與許多朋友在月下的沙灘上痛飲暢談，可惜這次來的時候沒有明月。

到韶關的第二天，和毛君二人整整的玩了一天，毛君是軍人部組織科的主任，我們幾個月來的同事，感情很好，他攜有一架攝影機，我們在各處照了很多的相。

在廣州出發時，本以為一到韶關就要步行，所以我們都完全行軍的裝束，穿着草鞋。行李大部分交給了兵站，各人自己身邊只帶了很少的一點。到韶關的第二天的晚上，纔知道已決定我們是坐船到江西，而且九日早上就要出發。

A large, circular, faded stamp from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s centered on the page. The outer ring contains the tex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n English. The inner circle contains the Chinese characters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n a stylized font. The number "六" (Six) is printed in the center of the stamp, overlapp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s.

六

舊式的帆船中的生活，已經五六年沒有過了，現在住在船裏，覺得別有風味。每隻船裏住了二三十個人，船身並不很大，住了這麼多人，自然是很擁擠；好在我們是“官長”，當然是佔據了比較舒服的地位，六七個人的鋪蓋鋪在一起，成了一隻彼此聯繫起來的大牀。勤務兵可就糟了，他們沒有一定的鋪位——簡直連站的地方也沒有，還要小心翼翼的服侍官長，官長發些脾氣來，就要隨便辱罵，有時還要動手打，官長的一切都是對的，勤務兵祇有無條件服從。官長每月的薪餉起碼是

幾十元，再就是幾百元，而勤務兵每月的薪餉是七八元，至多到十二元。同樣是一個人，而官長的生活如此，勤務兵的生活又如彼。我們的嘴上天天喊着革命的口號，我們的筆上天天寫着革命的文章，我們時常說為被壓迫人民謀利益，時常說解除被壓迫人民的痛苦，那勤務兵又是什麼人呢？我們這樣對待勤務兵又將怎樣解釋呢？

船在北江中慢慢地行着。坐慣了摩托卡，坐慣了電船，如今來坐這隻帆船，雖覺得別有風味，而因其緩慢，又覺得十分討厭。

由帆船而聯想到電船和摩托卡；由帆船與電船的分別而聯想到太戈爾，那個反對物質文明的老頭子。近來中國也有了不少的太戈爾的信徒，鼓吹所謂東方文化與精神文明而反對物質文明。這真是不知享樂的癡子！

坐摩托卡當然比坐諸葛亮所坐的四輪車好，住洋房當然比住茅屋好。為什麼我們有了洋房不住要住茅屋呢？為什麼我們有摩托卡不坐要坐四輪推車呢？——不錯，我們革命是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而一切物質文明正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但我們所反對的，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身，並不是反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物質文明。我們所反對的，是因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物質文明，只為統治階級所獨享；我們的目的是要使

社會上都能夠享得這種物質文明。革命決不是反對物質文明，革命決不是要破壞一切物質文明，却相反，革命正是要提高物質文明的享受，在革命勝利以後，我們將以更大的努力來建設物質文明。我們非常重視一切物質文明的優點，我們知道住在洋房裏無論如何比住在茅屋裏舒服；我們知道電燈的光線無論如何要比菜油燈充足；在大熱天氣，“精神文明”不能使我們身體上起一點涼快的感覺，但是電扇與人造冷氣可以使溫度減低到適合我們的需要；在溫度降低到零下二十幾度的嚴寒天氣，“精神文明”不能使我他身上得到一點暖氣，可是電爐與水汀可以使我們四週的空氣變成暮春時節那樣地溫和；“精神文明”不能將我們心裏所欲說的話立刻傳到遠在千里以外的朋友，可是無線電報紙要幾秒鐘就可以從倫敦傳到上海。像這樣，物質文明不僅不是我們所應該反對，而且是我們所應該崇拜的；我們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使人人能夠享到物質文明的優點：我們要做到人人能夠住洋房，做到每個鄉村裏都有電燈電話與一切都市中應有的設備，甚至要做到人人能夠長生不老，與神話中的神仙一樣。這並不是夢想。但也只有在無階級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裏，物質文明纔能發展到極端的高度。一般人以為革命只是破壞，這完全是表示他們對革命意義的充分的不瞭解而已。

在溫和的廣州住慣了的人，一離開廣州往北來，就會感覺到嚴寒之可怕了。韶關的氣候已和廣州大不相同，如今要離開了韶關向北進，氣候自然是更冷了，而况我們又是在船上，像刀割一樣的厲風從河上一陣陣吹到我面孔上來。這更使我想起了物質文明之可貴與廣州氣候之可愛了。

我們一起出發的，除了中央黨部各部處的職員以外，還有國民政府的職員，國民政府的代理主席譚延闓也是在一起出發。為我們警衛的，有國民政府的衛士隊，廣州憲兵司令部的兩排憲兵，駐韶關的教導師（師長陳嘉祐）也派了一個特務排護送我們，所以一起也有不少武裝。起初我們還以為在自己統治區域內行走，實在不需要這麼多武裝，這不過是擺擺樣子，表示我們是遷都而已，那裏知道這麼多的武裝，實際上還不夠保護我們。

從韶關開船的第三天的下午，開到一個不知地名的山脚下，這些船都停了下來。那時三點鐘剛打過不久，像這樣早就停了船，我們知道一定有什麼原故發生了，後來一問船戶，纔知道離前面一二十里路的地方，有土匪出沒，船不敢在那裏過夜，也不敢在那裏夜航，所以要到明天天明後纔敢走。北江土匪猖獗到如此地步，真不能不使我們驚嘆了。

因為船停得很早，我們都上岸來玩。這裏四面都是高山，

雄壯而又清秀的山景是非常可愛的。我們在山中到處亂跑。婦女部的三四位女同志也像我們一樣穿着草鞋，在亂山中居然健步如飛。

這幾位女同志是我們這次旅行中唯一的談話的資料。首先使我們感覺到趣味的，是她們的“睡”的問題、我們研究了好久，不知她們晚上是怎樣睡的？因為她們那隻船裏，不僅住她們四位女同志，還有農民部和秘書處的幾位男職員。她們男男女女雜處在一隻小船，是否像我們一樣的成一個“連牀大會”？爲了要知道究竟，在韶關出發的第二天的半夜裏，我們船上曾派了一員偵探到她們船上去偵察，這位偵探員回來的報告是這樣的：她們和他們也正和我們一樣，毫無區別的睡在一起，而且彷彿那位女秘書和一位男職員還是合一床被睡的。

雖然是在半夜裏，但我們船上的人都坐起來聽這有趣味的報告。聽了報告以後，立刻就開始研究她們和他們同睡在一起，是否如我們剛才所看的張競生的性史（這是我們從廣州帶來的，我們十一個人中有六個人帶有這種書）上小江平和董二嫂那樣睡法？這樣的問題研究起來會增加我們的煩惱，因為我們沒有他們那種“淫福”（當然並不是艷福，因為並沒有豔）。

第二個有趣味的問題是大小便問題。船上沒有廁所，也沒

有馬桶一類的東西。廣東的航船並不像我們浙江航船，關於大小便的設備是一點沒有的。如果要解大便，只有褪下褲子蹲在船邊上，但這樣，作算別人不能窺見你前方的妙處，而你那隻白白胖胖的大屁股就不得不公開展覽。老實說，這連我還覺得有點難為情，有一次船正在行走的時候，我在船頭等了很久的時間，看看左右前後沒有人影，纔解開袴襠小便。我們男子尚且如此困難，她們不知是怎樣解決的？

關於這幾位女同志的風流韻事是很多的，據說某女秘書有一位愛人是國民政府的秘書，正是我們出發的前幾天，廣州的某報上以“黨國之恥”的惹人注目的標題刊載了一條新聞，就是記載這位“黨”的女秘書與“國”的男秘書某天某時正在“白晝宣淫”的時候，男秘書的夫人忽然趕到，於是大鬧了一場。但奇怪的事還不只此，據我們船上那熟悉這位女秘書的人說——負責任的說，這位女秘書的情人，除了男秘書以外，還有兩位，這三位愛人來睡覺的時間是有分別的。男秘書因為他自己是“秘書”，所以能夠享優先權，白天是他來，因為他晚上回去還要報效他的夫人；第二位是黨部裏的一位錄事，他來睡覺的時間是晚上八點至十二點，因為他雖然也有夫人，但他的夫人是一個“土老婆”，他回去遲一點也不要緊；第三位是報館裏的校對員，時間是晚上一點到早上六點，他並沒有夫人，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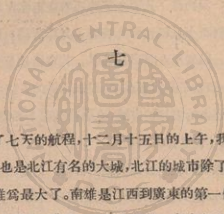
他的工作須到十二點半纔能完了，一點鐘來接錄事的班，正好是女秘書休息一小時以後。這位女秘書就是這樣的與男秘書，錄事，校對員，走馬燈般的無分晝夜的輪流交戰着，真是能者多勞！

我把這一段寫出來，並不是刻薄女秘書，也不是無聊的文字。那是很重要的，這決不是“黨國之恥”，而是“黨國之光”！我們應該自豪：我們有了比潘金蓮潘巧雲輩更偉大的英雄，這是表示了我們至少已經相當的戰勝了封建意識。別人——那些落伍份子，以為男女間事是醜事，其實這是最光榮偉大的事，我以為一個女子的姘頭愈多，就表示她的人格愈偉大，尤其是能不分晝夜的與異性肉搏。饒勇善戰而不顧輿論攻擊，如女秘書者，真不愧是偉大人物！

我主張性交的絕對公開與絕對自由，這並不是故意標新立異以眩人，而是只有絕對公開與絕對自由纔合乎自然。人們往往鄙薄別人對性交太隨便而咒為“與狗一樣”，其實人類的性的關係也必須與狗一樣，纔算得到真正的解放。現在一切因性的關係而引起的罪惡，例如姦殺與過度縱慾所引起身體上的損失，完全是現在不澈底的性的關係——所謂“貞操”所造成。如果能夠真正解放到像狗一樣的自由。一樣的公開，則偷偷摸摸可以不必，姦殺慘劇也不致發生；而人類既能隨時隨地

得到合理的性的滿足，則過度縱慾的弊病也不會有——過度縱慾是由於性的關係太神祕所引起的反響。

我們鼓吹性交的絕對公開與絕對自由，還有另一個重要意義，就是對封建意識作戰。我們要把一切的封建思想，舊道德與舊禮教觀念根本掃除，首先要從鼓吹性交的絕對公開與絕對自由着手。



經過了七天的航程，十二月十五日的上午，我們到了南雄城了。南雄也是北江有名的大城，北江的城市除了韶關以外，就要推南雄爲最大了。南雄是江西到廣東的第一個城市，江西的土貨，例如藥材，磁器，紙，夏布等等，每年經南雄至廣州出口，或分佈於廣東內地的，不亞數千萬兩。單就這一點上說，就可知南雄在經濟上的重要了。我們進城去觀光，最能夠引起我們注意的，就是那座巍巍的石碑，上面刻着“嶺南第一名城”六個大字。可是當我們觀光了這嶺南的“第一名城”以後，覺得很失望。

南雄的街道比韶關更狹，而且因為昨天下雨的緣故，滿街泥濘，走在路上，非常難過。商業比韶關還不如，我們想要找一家比較清爽一點的飲食店來吃一點東西，可是總找不到。此地店最多的是小客棧與小飯店，因為這是粵贛交通的孔道，如前所說，每年江西土貨經此入粵，及廣東土貨與由廣州進口的洋貨經此入贛南的，為數頗多；但因為交通不便，從韶關到南雄，從贛州到南安（大庾縣，大庾嶺下的一縣），都只有舊式的木航船，而從南雄到南安，這一百二十里內，因有大庾嶺阻隔着，連航船也沒有，只有用人工來挑担運輸，所以南安與南雄間的這種專事挑送貨物的腳夫，恐怕至少有萬餘人。既有這麼多的腳夫與商人來往，小客棧與小飯店也就需要很多了。有些人往往說中國資本主義已很發展，但這裏我們所看到的，不要說工業資本主義連影子也沒有，就是商業資本也還很落後。

新式工業在南雄不必說是沒有的，在此間活動的，只有小手工業——鞋匠，鐵匠，木匠，竹匠，成衣匠，理髮匠等，這都是幾千年以來就有了的。南雄與韶關都是重要的城市，經濟尚且如此衰落，農村中是更不待說了，我們這次由韶關到南雄，沿途調查所得，曲江（即韶關）始興南雄三縣的農村，有各下之共同情形：一，佃農佔農民之最多數；二，佃農對於地主，須

繳納收穫全數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五的租稅；三，佃農繳租，以米谷爲主，折算現銀者甚少，始興尤屬絕無；四，佃農對於地主除繳租外尚有種種額外貢獻，如繳租時須鷄鴨各一隻，過年及各時節均須送禮物，且有規定期間之徭役勞動；五，地主對於地方有絕對的支配權，農民協會頗受壓迫；六，農民生活異常困苦。

以上六點是三縣各農村中共同所有的情形，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農村中的經濟結構完全與數百年前乃至千年前沒有兩樣。有人說，中國農村資本主義化已經很有成績，這完全是抹煞實際的謊言。以上三縣農村中還有一個重要共同的現象，即農業生產還是完全人工的半自然的經濟，新式的農業機械絕對沒有。

我們到南雄的那天，正值國民黨南雄縣黨部開全縣代表大會，我以中央代表的資格出席了他們的大會，并向他們作了報告。這次大會給了我很好的印象。代表大會的構成份子，當然是以知識份子爲多，而也有不少農民及手工業代表。他們穿着短衣粗服，給了大會會場一種特殊的光輝。像這種短衣粗服的人來參加會議，只有在廣州東學大道（農民協會）是時常有的，至於參加黨部會議，這還是我第一次看到，那天晚上，我又以來賓資格參加了他們的聯歡會。他們對於我這位遠方

的來賓表示極誠摯與熱烈的歡迎。在聯歡會上，我還認識了一位非常活潑可愛的女同志，她的年齡大約和我相差不多，也不過二十歲罷。因為她會在北京住過四年，南京住過半年，所以普通話說得很好。我和她談了許多話，像飲了過量的葡萄酒般的，我有點沉醉了。可惜匆匆握別，從此天涯海角，怕永無再見的機會了。

我們在南雄繼續住了一天，上午到第六中學去作了一次講演，因為聽眾不很多，所以也提不起精神來。下午到各處去玩了一下，其實南雄也沒有什麼地方好玩，只有建築在城頭上的一座中山公園，倒很別緻。公園的面積很小，一進門，中間就擺着一座佛像，裏面還有一個中山亭，四面略有一點花木。這公園雖然很小，而在偏僻的小縣裏能有這樣一個公園，也算是不可多得了。

十七日的早上從南雄出發，今天是我們逗留廣東境內的最後一天，過了大庾嶺，就是江西省界了。

大庾嶺(梅嶺)是一個極著名的勝地，讀過“十月先開嶺上梅”的詩的人，都會想像到嶺上的風光是如何優美，尤其是當梅花盛開的時候。在江浙一帶，梅花開時總是在二月間(陰歷一月間)，但嶺上梅花，得春獨早，所以雖然還只是陰歷十月底，而我們在南雄已打聽得嶺上梅花已經盛開的消息，大家都

很興奮的準備上嶺去賞梅花。

從南雄到大庾嶺的路程約有一百華里，過了嶺到南安縣城（即大庾縣）只有十里路了，連翻嶺的路程計算在內，從南雄到南安，一共是一百二十里。因為不通航路，不能不捨舟而陸，在詔關臨行時本已打電到南雄來預先僱好了轎子，但因為我這幾天坐航船坐得厭了，很想走走路，雖然有轎子，也不願意坐了。

一路上都是平原，路也並不難走，不過幾十里路之內沒有經過一個市鎮，要想買一點東西吃也沒處買。荒涼的小村落經過了幾個，但這些村落除了三五間破草屋而外，沒有一點買賣。有兩個村落總算很難得，有賣白酒的小舖子，也兼帶着賣飯，可是沒有什麼菜，只賣一點花生米，白菜，豆腐；除了花生米以外，其餘的東西實在不能下喉。這使我覺得很慚愧，我們口頭上天天乾喊革命，乾喊到民間去，但實際上我們是成了革命的貴族；拿我們的生活來和一班貧苦人民——中國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是在水平線以下——來比較一下，那我們都是該被打倒的。

下午三四點鐘，我們到了一個不知名的鄉村，據說這裏離大庾嶺只有二十多里地。這個地方有一個農民協會，農民協會還辦了一個列甯小學——這個學校的名詞是很引起我們的注

意。

在農民協會的辦公室中，看到了一幅很有趣的諷刺畫：一面畫着一個“世界公園”，世界公園裏陳列了三個座位，中間是馬克思的像，左邊是列寧的像，右邊的座位空着。另一面畫着一個孔廟；在世界公園與孔廟的中間，一個穿着中山裝的男子背了孫中山的像往孔廟中走去。旁邊寫着“孫中山應該陳列於革命的世界公園中，但戴××一定要把他背到孔廟裏去”。嚴格的說起來，這幅畫的意義是錯誤的，因為誰應該陳列於世界公園，誰應該擺在孔廟裏，這只有他本人的行為纔能決定，決不是別人所能強姦。但無論如何，這是一幅值得一看的圖畫。

走到傍晚，已經到了大庾嶺下了。嶺下有幾家小飯店，我們喫過了飯，就開始上嶺了。

雖然已經走了一天的路，有點疲倦，可是“大庾嶺”這個可愛的名詞不啻是一個強有力的興奮劑。我們都是抖擻精神的走上嶺去。

上嶺去的路很寬大，像水門汀的扶梯一樣一點也不難走，兩旁都是高大的樹木。那時天色已夜，上弦後幾天的明月已經照臨到我們的頭上，月光下的山景纔可以當得起“清幽絕麗”四個字。且行且談，其愉快興奮的情緒，簡直不是事後所能描

寫。走了一陣，就坐在石階上休息一下，唱唱歌，喊喊口號，還沒有到半山中，一陣陣梅花的清香已經從寒風中送來，“淡裝濃抹總相宜”的紅白梅花已經呈露在我們的眼前了，這更加使我們狂歡，使我們雀躍！

明月照在梅嶺關的牆壁上，梅嶺關三個大字在月光之下特別顯得挺秀雄偉。到了關上，我們已經完成了上嶺的任務了。關上附近的梅樹尤多，大都是白梅，在明月之下特別覺得嫵媚可愛。進了關之後，就看到一座大的石碑，刻着“重來梅國”四個大字，但可惜旁邊的小字在月光之下看不清楚。關內還有一座涼亭，我們在涼亭上休息了一下。

關上是粵贛兩省的交界點，我站在中間，顧盼自雄，這真是我生命史中可紀念的佳話：我的左腳是站在廣東省界，而我的右腳却踏在江西省界，我的前面，過去不遠就是湖南，後面過去不遠就是福建；我是高臨於粵贛湘閩四省之上。當我俯視脚下萬山起伏的情形，彷彿自己真是成了一個君臨人間的天子，而腳下的羣山就是我的臣子了。我情不自禁的高呼起來。

在明月之下，梅花盛開的嶺上，此情此景是多麼使人沉醉！我高吟着“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句，又不禁聯想到渺茫的將來而爲之慨然！

因爲嶺上的景色太可愛了，我們都依依不捨地不忍下嶺，

但時候已經不早了，下了嶺還要走一二十里路纔能到大庾縣城，所以雖然留戀着嶺上風光而又不能不下嶺了。

到南安城的時候已經是在深夜了。我們仍舊住在船上，明天一天亮就開船，所以南安城裏的情形，簡直一點也不知道。

十八日清晨由南安城開船，沿貢水向贛州進發。

今天是我們入江西後的第一天的旅程。或許是心理的作用，我覺得江西省內的一切——人情風俗乃至自然景色，都和廣東境內不同。我們離開廣州已經十二天，但一向因為還在廣東省境內，所以倒並不怎樣思念廣州；如今到了江西，遙望南國。一天天的離得更遠了，每吟及“而今一水是天涯”句，為之神往！

貢江沿岸的風景是很可愛的，這裏和我們江南頗有近似的，可惜這次的行程太匆促，不能在每一個地方作一番考察。一個個的鄉村，一個個的市鎮，一個個的城市，只從我們的面前輕輕過去，甚至連一個稀薄的印象也沒有遺留下來。

我是宣傳隊的隊長；說起我們的宣傳隊，真是慚愧得很！在廣州出發時，我們本來領到了幾千的元臨時宣傳費，所以也印了不少的畫報，畫片，小冊子，傳單，宣傳大綱；而且準備了許多宣傳計劃。可是實際上，自從出發以來，除了每到一個地方分送些宣傳品，留聲機般的作些講演以外，什麼事也沒有做。而且我們那種講演，聽的人未必就能懂。自南安出發以後，對於宣傳工作更是隨隨便便，倒是大家在船上熱心的賭博起來，撲克牌九，無所不有，只是沒有麻將牌。這些賭具是從南雄買來的。沒有麻將牌，在我們覺得是一個憾事，但那是沒有辦法的事，在這小小的船上，又擠滿了那麼多的人，即使有牌，也不能賭。

賭博與女人，同樣是有很大的魔力的。我們在船上，竟卜晝卜夜的賭起來。歡喜賭的人，決不是簡單的爲了想贏錢，我自信是沒有一點私有財產觀念的，金錢之於我，簡直是不足輕重。但我必須承認，我也很歡喜賭，尤其是在寂寞無聊的旅程中。但既是賭了錢，自然是想贏而不願輸。最初我們是玩撲克，但後來覺得沒有牌九痛快，於是我們就在船上席地而坐推起牌九來。“天門五塊”，“下莊三塊”，“上莊只有一點，天門倒是一個九”，“哈哈！莊上一個鼻十！”。

尤其是到了夜間，船停着沒有動，我們的賭興更豪。不僅

我們這船上如此，別的船上也同樣的賭着，不過總以我們這船上為最熱鬧。這樣賭，本來是有點說不過去，但按諸情理，也有不無可以原諒的地方。我們年青人都是好動的，如今悶在船上，整天整夜的連散散步的機會也沒有，天又是那樣冷。從詔關到南雄這幾天，我們在船上的生活，以談女人與看性史為唯一的消遣。但是看性史談女人的結果，大家都感覺得有某種需要了。不待說，在這航船中，無論如何是無法滿足這種需要的，於是不能不作不正當的發洩——手淫就成了我們的通病。

本來因為在船上缺少運動之故。身體覺得很不暢快，不正當的消耗既多，身體乃益覺不支。因為如此，在未到南雄那天，我們已決意大家把性史丟棄在北江裏，而從此絕不談女人；但不談女人，不看性史，生活乃愈覺無聊，所以在南雄的時候決意買了賭具來賭博。

從南安出發，經過了四天的航程，二十一日傍晚到了贛州。天纔下過雨，停船的地方又是泥滑難走，但因為急於要上岸去玩玩，所以也就不顧一切的上了岸。

因為是晚上，所以不能仔細觀光。我們一上岸，就問清楚了路，跑到大街上去找一家館子吃東西。贛州是贛南的第一重鎮，也是贛南商業最發達的地方，可是實際上，還是可憐得很！我們在大街上找菜館，但是找來找去，總找不到一個像樣的地

方，不過一、二家小飯店而已。沒辦法，只得跑進了一家小飯店，好在這小飯店也有樓面，我們就上樓去坐了一桌。

房間裏的聒噪醜態是不待說了，幸而菜的味道還不壞，放懷大嚼，飽醉而歸。

第二天一早，就上岸去工作。調查組在昨天晚上，已經來了一個簡單的報告，我們已經知道這裏有四個中學，四個報館，所以上岸就到省立第四中學去，但學校已經放假了；轉到贛南中學及其他幾個學校，也都同樣碰了釘子。倒是有一個女子小學還沒有放假，我們就去參觀，而且作了講演。雖說這是小學，但這裏的學生，也頗有不少是妙齡年華，而且我想，也許有幾位已經是未嫁婦人了。

飯後參觀贛南日報及其他幾個報館，應贛南日報編輯者的要求，替他們寫了幾個字，以作紀念。

此間文化之相當的發達，實在出我們意外！一個內地的城市，而竟能有四個中學和四個報館，這在文化落後的中國，不能不說是比較進步的了。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在此都設有分銷處。還有其他兩家兼售新舊刊物的書鋪，尤其使我驚異的，嚮導週報和中國青年在此也有出售。我問了那店鋪的夥計，知道嚮導在此地每期也能銷到七、八十份，中國青年是五、六十份。在以前，嚮導和中國青年都是由上海寄來，自從江西戰

爭發動以後，都是改由廣州寄來。國民黨的刊物，在此間也有不少發售。

贛州的文化雖還相當發達，而商務却很蕭條，工業更不必說了，新式工業是絕對沒有的。全城只有兩條大街是贛州城的精華，但這兩條大街也不見怎樣熱鬧。鋪子比較像樣的，是洋貨店和藥店，其次是南北貨店。

在贛州所看到的一個特點，是手工業工人的活動。贛州總工會籌備處已經成立。我們去訪問了籌備處，籌備處的常務委員是一個姓蕭的木匠，一個強健的中年人。他雖然是一個木匠，但他的政治常識似乎很充分，談起來簡直是一位很能幹的普羅政治家，思想也很清晰；贛州工人能有這樣一位健全的導師，實在是一件可喜的事。蕭君把此地工人運動的狀況及其計劃，詳細的告訴了我：此地已經成立的工會是土木工會（泥水及木匠），理髮工會，飲食工會（茶樓飯店工人），挑水匠工會，鐵匠工會，以及幾個店員工會。他說，他沒有早點知道中央與國府要經過此地，否則總工會籌備處可以召集一個盛大的歡送會——前幾天補充師（師長嚴重）經過此地，已經召集過這樣一個大會。蕭君還問了我許多理論上的問題，這使我非常慚愧，因為我一向是輕視手工業工人的，而蕭君在我面前，簡直是我生平稀見的偉大人物，他所提出的問題，有許多簡直

使我無法答覆，例如他問國民黨與共產黨是否能夠永久合作？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究竟有多少分別？

從工會出來，我們的工作已算告一個段落而可以遊玩了。

贛州最著名的風景是八景台，縣黨部的同志伴我們到八景台去，其實那也不過是一所平常的建築而比較高一點。因為八景台是在城牆邊，所以在樓上遙望城外，風景很好。贛州城是兩面環水的，贛江江面也很闊，這邊是這座贛州古城，那邊是萬山重重，登樓遠望，頗有氣象萬千之概。在平原生長的我，而這幾年來又是在都市中生活慣了的，平常很難得見到山，見了山，總覺得異常可愛。但我也同樣的愛水，幼小時看熟了的富春江，到現在還時在念中。贛江的景色，在我看來，簡直比富春江還更可愛。古城與高山之間，贛江靜靜地着鰓；江上點點風帆，出沒眼簾，而白鷗往來飛翔，尤其是活潑可愛。像這樣可愛的自然景色，對於我是很有誘惑力的，我想，我如果能在此建築一座高樓，可以天天欣賞那可愛的風景，則革命對於我的興味，要大大的減弱——小布爾喬亞的劣根性又要表現出來了。

本來預備在贛州多留一天，但為要於年內趕到南昌之故，不得不於二十三日的清晨，離贛州向吉安進發了。

九

到吉安是二十五日的下午二點鐘。

吉安在前清是一個府治，民國後改為廬陵道道治，是贛南贛西的中樞。街道的整潔，店舖的宏麗，較贛州實勝一籌。吉安本是江西有名的富庶區域，從其外表，即可知其不謬。但文化方面，吉安似乎未必比贛州進步。基督教在此地有特殊的勢力，而我們到吉安那天，又適是聖誕節，我們就決定在這舉城若狂的時候，大大的做一番非基督教的宣傳，好在我們帶來的宣傳品中有專門關於反基督教的，於是宣傳隊的隊員就全體動員出去作街頭講演與種種宣傳。

補充師還在吉安，今天他們正召集了一個軍民聯歡大會，我們到時還沒有散，我就趕去參加了大會，在大會中會到了補充師政治部的宣傳科長鄺滌君，他是我在黃埔軍校政治部的同事。

參加了大會以後，就到縣黨部去。縣黨部的房子很寬大，組織似也還健全。我們參觀了各部分又與工作人員開了一個茶話會。在座的除了縣黨部的工作人員外，還有幾位是區黨部

及婦女協會的，一共有三十多人，其中有六位是女同志。

茶話會到了六點鐘以後纔散會。散會時，一種意外的榮幸降到我頭上來了。我正戴好帽子要走，三位女同志走到我面前來和我招呼了。事情是這樣的，她們都是婦女協會的，今天晚上召集了一個大會，這大會的意義有兩點：一是歡迎婦女部長何香凝；二是反基督教宣傳。她們要求我參加她們的大會，我立刻教受了她們的要求。

吉安的女人，也頗有我們下江女人的風味。大會有五六十個妙齡女子，而且不乏佳麗。鶯鶯燕燕，情形倒很熱鬧，這是二十天旅程中最愉快最興奮的一天。

從吉安出發是二十六號的早上。本來說可以坐小火輪，但結果還是因為冬天水淺而不能不仍坐航船。

二十七日的傍晚到了樟樹鎮，那是一個很熱鬧的所在，可惜我們到的時候已是晚上，不及暢玩，僅僅在酒樓上痛痛快快吃了一頓。就在當天晚上，換了小火輪直開南昌。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下午，我們到了南昌了。

本來我們的目的地是武漢，但到南昌時，因為時局的關係，決定暫時不去武漢，而我們的第一期行程，也就此結束了。

這次自十二月七日從廣州出發，至二十八日到南昌，沿途

共經二十二天。除了自廣州到韶關一段因坐火車，匆匆駛過，未及遊覽外，自韶關到南雄，及自南安到南昌，一路上凡是有市鎮經過，總是停了船上去遊覽一番。自南安到南昌一段，經過的縣城除吉安贛州之外，尚有泰和吉水等縣；至於經過的小市鎮，更是多不勝數。從所經過的地方，簡略考察的結果，可以得到如下的幾點：

第一：中國經濟還很落後，新式工業在內地完全沒有萌芽，即以商業來說，也還很幼稚，而且各地的商業狀況，一般的是衰落不振。

第二：交通之不發達，正與經濟之落後相同。自韶關到南昌一千幾百華里強，所經過的都是重要城市，而交通工具竟還是數千年前所遺傳下來的完全人工的手搖航船，所以僅僅一千餘里，不能不走二十一天。交通要道尚且如此，偏僻內地更不必說了。

第三：農村經濟狀況，與數世紀前無多大不同，到處都是完全人工灌溉的半自然的小農經濟，新式農業機械絕對沒有。

第四：因為經濟的落後，所以文化也極不發達，而封建意識却極濃厚。

第五：但因為商業農業之一般衰落，豪紳地主買辦階級之

殘酷的剝削，使各地的經濟狀況異常惡化，大多數人民被迫淪於破產失業的境地，客觀上引起了他們的革命需要。

這幾點就是我這次由廣東到江西所得到的結論。



在 南 昌



在沒有到南昌以前，我們都是被美妙的夢所欺騙着；理想中的南昌，是一個如何優美的名城，尤其使我們羨慕的就是那因王勃題詞而著名的滕王閣。從廣州出發時特地帶了一部古文觀止，在路上把他的“滕王閣序”讀得很熟，自“南昌故郡，洪都新府”起，讀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句，無不爲之神往！現在我們已經到了南昌，醜惡的現實戰勝了美妙的

幻夢；我們是失望了！

從樟樹來的小火輪是停泊在章江門外的，我們上了岸，前站（比我們先來的庶務人員）已經在章江門外的一個小旅館裏定下了幾個房間，據說城裏較大的旅館都已經客滿了，不能不委屈一下，在小客棧裏住幾天。後來一打聽，南昌根本就沒有什麼大旅館——僅有一個江西大旅社比較大一點，其實江西大旅社如果搬到上海去，也不過是一個三等旅館罷了。

旅館雖小，但比起南京中正街一帶的旅館來，還是比較好得多。因為是靠江邊的，在樓上可以望望江上的景色，雖然我們已經過了兩星期的江上生活，但如今捨舟而陸，覺得江上的景色還是可愛的。

到南昌後的第一個感覺，就是覺得這裏沒有我所期望的光明，似乎到處充滿了黑暗。

旅館的茶房看見我們穿着軍服，稱我們為“老總”，他們完全把我們看做是和孫大帥（傳芳）鄧大帥（如琢）部下的“老總”沒有兩樣。每逢有點事要差使他們去做，只要喊一聲茶房，茶房就很恭敬的跑到面前，行了一個七十度的鞠躬，諾諾連聲的“是！是！”。

“茶房：去泡一壺茶來。”

“是！是！老總。立刻就去泡來。”

“茶房：地上來掃掃甘淨：這麼骯髒爲什麼不來掃？”

“是！是！該死！該死！立刻來掃了，求老總原諒。”

茶房總是這樣恭恭敬敬的，開口老總，閉口老總，我實在聽不慣，所以吩咐茶房：

“我們不是什麼老總，下次不要這樣叫，叫我們先生好了。”——其實先生已經是尊稱了，但是茶房的回答是：

“不敢！不敢！老總好說，老總總是老總。”

在旅館稍爲休息了一下，秘書處的廣東同志就來邀我們出去“行街”。“行街”在廣東人似乎特別感覺興味。我也是歡喜行街的，在上海的時候，我每天總要出去散散步。那時我是住在西摩路，而報館又在望平街，從寓所到報館，本來可以在愛文義路口搭一路或二路電車到南京路拋球場下來，走到報館裏就沒有好多路了。但只要我稍有閒空的時候，總不願意坐車，而是“安步當車”。並不是捨不得幾個電車銅板——誠然有時窮得連電車銅板也沒有，但我是歡喜走路，尤其是靜安寺路與南京路——我覺得在上海散步最好的馬路是靜安寺路，南京路，霞飛路與北四川路——在靜安寺路上，那一座座偉大的洋房，宏麗的花園，還有那一輛輛如飛而過的漂亮的汽車。我慢慢兒走着，走着，看着那些洋房，花園，汽車，以及住在花園裏的，坐在汽車裏的那些漂亮的小姐姨太太，和那些肥肥胖胖的

資本家，於是許多有趣味的幻想就會在脈筋中盤旋：將來革命成功以後，我們怎樣來處置這些洋房，花園呢？感謝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偉大的努力，牠留給了我們這麼一份豐富的遺產。——這樣想時，彷彿覺得這些洋房與花園已經是屬於我們了，於是我很傲慢地看了看那些資本家，小姐，姨太太。怎樣來處置這些可惡而又可憐的俘虜呢？……這樣一個人胡思亂想，走路也就不覺辛苦，大華飯店過了，卡德路過了，斜橋總會過了，跑馬廳，先施公司……不知不覺就到了報館裏了。

但是，到南昌來行街實在有點難受。街道是這樣難走，是這樣潮濕，醜醜，黑暗，而且那樣不平，行人車輛又那樣擠。

進了章江門，在城內各處亂跑了一趟，又到了全城最繁華的洗馬池和佳山廟；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都設在這裏，隨便買了一點書。

南昌就是這麼樣嗎？——我們都感覺有點失望。

在街上亂跑了一趟覺得沒有什麼興趣，於是大家想到了滕王閣。其實滕王閣離我們旅館沒好多路，就是江邊。可是到了那裏，那更使我們失望了。就在這次北伐軍打南昌的時候，滕王閣已經做了砲火下的犧牲品，我們所看到的，只是一些斷垣殘瓦。想起了王勃詩的最後兩句：“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更有不勝今昔之感。

毛君說，滕王閣雖然燒掉了，但我們既來此，應該找點東西回去做紀念。楊君就說滕王閣是造於唐代，我們可以找一點唐磚唐瓦回去。於是大家都在斷磚殘瓦中間亂掘亂翻，

“呵！呵！一張唐瓦，一張唐瓦！”曾君首先掘到了一張，歡喜得高呼起來。我們都走攏來看，那是一張古銅式的大瓦，的確是古色古香，是別處沒有看過的。由於曾君的發現，更增加了我們發掘的興味，雖然天色已經漸漸黑起來了，大家還是努力發掘，結果毛君也掘得了一張，我却掘得了兩張。

這是可喜悅的事，掘得了兩張完好無損的唐瓦。我們像得勝將軍的凱旋一樣，很得意回到了旅館裏，把這張唐瓦包得好好的寶藏在箱子裏。

那是以後的事，我們從旅館裏搬到心遠大學去住，毛君的勤務兵一不小心，把毛君那張寶貴的唐瓦打破了，毛君恨得怒髮沖冠，把他的勤務兵惡狠狠罵了一頓。這當然是可惜的，唐瓦是多麼可寶貴的東西，尤其是我們要留作紀念的。但已經打破了——而且是打得粉碎的，又有什麼辦法呢？毛君簡直要把那勤務兵立刻開除，其實瓦已經打破了，就是把勤務兵開除了，也是破瓦不能重完。幸而我有兩張，所以很慷慨的贈了毛君一張。

過了兩天，我們正在樓上閒談，毛君的勤務兵興沖沖的跑

上來告訴我們：

“毛主任：那邊有很多唐瓦。”

“什麼地方？”

“茅廁屋頂上。”

“胡說！茅廁屋頂上會有唐瓦？”

“的確的，真有許多唐瓦。”

我們走出去看，果然看見茅廁頂上有許多瓦和我們檢來的唐瓦一個樣，就叫勤務兵去取下一張來和我們寶藏在箱子裏的唐瓦對比一下，也完全是一個樣。事情是顯然的，我們認為寶貝的東西並不是什麼唐瓦，否則茅廁上不會有這許多唐瓦，那真是一個金茅廁了。我們就喊勤務兵去把校役找來；一個誠實的老頭子，他很恭敬的聽我們的問話，他告訴我們這並不是什麼唐瓦，這是江西一種特產的瓦，比普通的小瓦貴一點，要五個銅子纔可以買一張。

這真是一幕滑稽劇！我們趕快把我們十餘日來當寶貝的唐瓦丟在垃圾堆裏了。

二

一月三日的晚上，總司令蔣介石氏來請我們宴會。晚上七點鐘，我們都到了總司令部去。

總司令部就在從前的督軍公署，在以前鄧大帥(如琢)方大帥(本仁)蔡大帥(成勳)等在這裏的時候，我們是不能進來的，現在我們要到這裏來做上賓了。這當然會使我們感想到“究竟現在是革命時代”。

到了裏面，那些參謀副官般般招待我們，據說總司令還在和唐總指揮(生智)李軍長(宗仁)等開軍事會議。我們就在西花廳隨便坐坐。

西花廳前面的那間招待室裏，貼滿了許多條子，都是寫着些“奉總座(抬頭)諭……”“奉總座(抬頭)面諭……”等等，這會使我們想像到“總座”的威嚴，正和以前的“大帥”是一個樣。我們之所以能夠到此地來做上賓，並不是現在的“總座”不比從前的“大帥”那樣威嚴，而是我們自己現在已做了統治階級，小百姓還是不能到此地來的。

招待我們的副官引我們到餐廳入席，我找了半天，纔找到了自己的座位，正是靠近主席的橫桌的那一頭。座中差不多已經坐滿了客，但是主席座上還是空無一人。總司令還在開軍事會議，那會議廳就是主席座的那邊，那是一間小小的房間，

門並沒有關，我們在座上可以望得見他們。

“坐在那邊的那個是唐生智。”

“那一個是李宗仁？”

“這是加倫將軍”。

“這是程潛。”

“.....”

大家指着裏面的要人議論紛紛。

軍事會議開完了，這些要人都從座位上站了起來，了他們都揮着手喊口號，這些口號可以使我們聽得清清楚楚。“打倒孫傳芳！”“國民革命成萬功歲！”之類，而最後大家還狂呼着：

“蔣總司令萬歲！”

口號喊完以後，總司令領導了一批要人出來了：總司令，加倫將軍，譚延闓，李宗仁，程潛，何香凝等，都在橫列的主席桌上坐下了，於是我們就開始嘆那代價很貴，而實在很沒有味的西餐。酒倒是不壞，白蘭地和葡萄酒都是最上等的。

總司令操着一口浙江官話致歡迎詞，最後他很興奮地說：

“各位同志：我還要報告你們一個很好的消息，就是今天早上，我們漢口的革命民衆已經自動地把英租界收回來了。這是總司令部剛纔接到漢口方面來的電報。……”

這誠然是一個很好的消息，革命民衆自動地收回了租界，

這是何等可喜的事！

在羣衆的歡呼鼓掌聲中，總司令繼續着說：

“我們革命的成功，必須完全打倒帝國主義，收回租界還不過是一個初步。本席（總司令自稱）敢負責的對各位說，我們在一千天以內（意思就是說不到三年），一定可以完全打倒帝國主義。如果在一千天以內，還不能打倒帝國主義，那來各位可以把我蔣中正頭割下來。”

總司令已經替我們負責了，一千天以內可以完成革命，這真是一件愉快的事！其實總司令的話未免有點可笑，革命決不是算命先生算得定的事；再說，如果一千天以後帝國主義還不能打倒，真的又有誰去把總司令的頭割下來？——即使有人願意去割總司令的頭，總司令又肯不肯實踐前言？這又使我想起在黃埔時總司令的訓話來了。一般人說，三國時代劉備的江山是哭成功來的，我說我們總司令的革命是立誓立成功來的。我每次聽總司令對他的學生說話，總要發誓，例如“我校長將來如果反革命，你們學生都可以來殺掉我。”“將來事實證明了我蔣中正是反革命的時候，即使你們不來打倒我，我一定在你們面前自殺！”，像這樣的話，我真不知聽過多少遍了。

在參加總司令會宴會的翌日，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去會了加倫將軍。加倫將軍的英語說得很好，但可惜我們兩個人都不

能直接和他談話而必須由翻譯傳達。他很和藹的和我們握手，對我們這兩位不速之客表示很大的喜悅。他和我們談中國的革命，蘇聯的現狀，以及世界革命的前途等等。

關於加倫將軍的出身，外面有種種傳說，而傳說最廣的一種，說他不是俄羅斯人，而是奧地利人；在歐戰中，是德國軍隊裏的參謀，被俄軍俘虜過來，留在俄國，十月革命後為革命効勞，遂成蘇聯紅軍中重要的一員。所以我們問他究竟是那一國的人？他微笑的答覆我們：

“我是俄羅斯人——道地的俄羅斯人！我沒有做過德國軍隊的參謀，我的出身是一個工廠勞動者。同志：你不相信嗎？其實那有什麼要緊？比方說，即使我是一個奧地利人，那還不是一樣？只要他是革命的，無論是奧地利人，波蘭人，美利堅人，印度人，日本人，我們都是很親愛的伙伴；如果是反革命的，即使是俄羅斯人，比方說，謝米諾夫，梅留柯夫，我們都要打倒他們，是不是？”

我們正在談得很有趣味的時候，侍者送上一盤蜜橘來，加倫將軍親自剖開來分給我們喫。他告訴我們：

“這裏橘子的味道很好，在我們俄羅斯也是很多，但是我們都捨不得喫，我們把牠裝在簍子裏，運到美國或西歐去售賣，我們國內的人民都很愛護他的祖國——勞苦羣衆的祖國

——他們知道我們國家在帝國主義包圍之中，不努力奮鬥就無法維持。他們把橘子偷到外國去，把金錢拿回來就可以幫助國家的經濟建設，所以他們不捨得吃。”

他這樣說時，我們在喫的時候覺得很慚愧，因為我們的國家也是很窮，而我們吃的橘子正是從外洋買來的。

總政治部的駐贛辦事處是在東湖邊上，這可說是南昌風景最優美的地方。在到南昌的第二天，就去訪問了總政治部。駐贛辦事處是由郭沫若負責的，但我去的時候，這位詩人政治家沒有在，會到了秘書李民治，社會股長袁文彬。袁君還是在廣州時候認識的，李君是初次見面。辦公廳燒着很旺的木炭，裏面的佈置也很貴族化。

我們去的時候，却好四川的二十軍（楊森部）黨代表朱德也在。那位朱君一向我不認識，聽說他是一位老資格，民元的時候在雲南做過警察廳長，也曾在蔡松坡部下當過旅長；據說他在德國留學多年，對於軍事學識有特殊的心得。但我的主觀

上對於過去的舊軍人總有點覺得格格不入，所以對於朱君的印象並不深，不過覺得他的面貌有點像魯迅。

在後方的時候，聽說在前方的總政治部是如何活動，但從駐贛辦事處看來，覺得與在後方所傳聞的不符，因為駐贛辦事處的空氣非常沉寂——簡直可說死氣沉沉，這些負責人都像公子少爺，他們很舒服的在圍爐清談，大有革命已經成功，我輩毋須努力之概。

不僅總政治部如此，整個的南昌為沉寂的空氣所籠罩着。

從總政治部駐贛辦事處出來，去訪晤第二軍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第三軍政治部主任朱克靖。李君和朱君現在都成了官僚了，那種十足的官僚神氣實在使人不快，而以朱君的官僚神氣更大。在李富春的寓所，還會到了總司令部的機要秘書蔣先雲，他穿着一件大毛皮袍子，簡直像一個小土豪。

訪問了總政治部駐贛辦事處及第二軍政治部主任與第三軍政治部主任之後，覺得所得到的印象很壞，簡單說一句，一切都是死氣沉沉！

革命後的南昌就是為此嗎？我的故人趙醒儂君死而有知，亦當痛哭！

趙醒儂就是趙幹，我認識他是在一九二五年的春天，正當五卅運動爆發的前夜，那時他在上海，我們是在一位朋友家裏

遇見的，真是所謂一見爲故。不久，他就回南昌去。他是國民黨江西省黨部的組織部長，也是江西工農運動之最有權威的指導者，在革命軍入江西的時候，他就被鄧如琢殺在南昌的德勝門外了。

下一天，與毛君同去訪問了第六軍政治部主任林祖涵。本來爲去年在韶關受了他的冷酷的待遇，我對於這位滿頭白髮的老先生已經失了相當的敬意，但我們這次去會他，却非常客氣，而且他對於目下政治狀況表示無限的感慨。

“在廣州出發的時候，我們軍隊只有八軍，現在差不多有四十軍了！”他說時，頻頻擺動他滿載白髮的腦袋；“軍隊本來是愈多愈好，但是現在新收編的軍隊……”他說到此地，搖頭無語了。

到總工會去訪問，總工會就在總政治部駐贛辦事處的右邊，負責的蕭勞鋒君對於江西的工運爲我們詳細說明，照他所說的，我們是相當滿意了。

省農民協會是百花洲，其地位從風景方面說來，比總政治部駐贛辦事處還更優越。我們會到了常務委員方志敏，一個瘦得像害肺病的青年，但他的精神似乎很好。他把江西農民運動的狀況爲我們作了一個詳細的說明。他對於江西的農民運動是很樂觀的。他說江西的農民運動不比工人運動，因爲江西沒

有產業工人，所以工人運動只能完全以手工業工人作基礎，其發展自然比較困難，農民運動則因為江西農民生活過於貧苦之故，他們有強烈的革命要求，只需要有很好的指導人材，則全省的農民都可以很好的組織起來，現在江西農民運動最困難的，就是指導工作人員太少。

這種困難其實不僅江西省農民協會如此，各處都是有同樣矛盾的現象：一方面缺乏能夠工作的人員，另一方面又到處充滿了不能做事的閒員。

學生聯合會也去了，負責的是鄒努，一位矮胖胖的青年。他似乎是一位很有能力的人，這是從他談話中可以知道的。我們談到南昌那種沉寂的現象，都覺得有點煩悶，而對於那造成沉寂空氣的原因不能不表示憤慨。

省黨部也去過了，但是沒有找到負責的人。省黨部的情形似乎很糟，從表面上觀察，覺得完全是一種無政府的狀態。

四

南昌的一切都是很沉寂，但一班青年女子是例外的。她們

的那種活潑的姿態，給了我們很大的興奮。

我們到德勝門外的葆靈女學去講演，這是我們到南昌後第一次和女子接觸的機會。

葆靈女學的校舍很好，這在內地總算是很難得的建築了。我們到了學校裏，首先去找她們的學生會，但很使我們失望的，她們學生會還沒有組織起來；找學生要接洽講演，但是這種頑固的教會學校，學生見了校長像老鼠見了貓一樣的害怕，因為校長對於學校有絕對的統治權，校長可以隨便開除學生，學生是不能反抗的，所以學生對於我們的要求不敢答覆，必須要經校長許可後，纔能講演。

我們找到了那位校長了，一個三十多歲的矮小的女人。她的相貌真醜得偉大！但她自己或許以為是很漂亮的，所以她的面上塗滿了白粉，正像泥水司務用石灰來塗成的粉牆一樣，據她自己說是湖北人，到美國去過兩趟——其實我們並沒有問她有沒有去過外國，但她自以為去過美國是無上的光榮，這種不要臉的基督徒，想起了使人惡心！

她自得其樂地講她在美國的情形，我不等她說完，就搶白了她幾句，並且向她說明了我們此來的目的——要來講演。她竟拒絕了我們的要求。她首先說，她這學校是外國人辦的，一向不歡迎外面人來講演。這可惡的基督婆竟想以「外國人辦

的”來壓倒我們，這真是使我們生氣！所以我很不客氣的說：

“正因為你們是外國人辦的，所以我們纔要來講演。北佬怕外國人，你們也把外國人當做是你們祖先一樣的尊敬，但我們就不同，我們首先要打倒帝國主義。”

她說打倒帝國主義她並不反對，但她們學校裏是決不能講演的，據她說“這是教會裏的規矩(?)”。外國人壓不倒我們，又要拿教會來壓我們。

因為她的態度那樣可惡，我也像一個無賴漢一樣一定要講。我說：

“無論怎樣，我們今天非講演不可。我們來講演的目的，是喚起學生來革命，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基督教。誰反對我們講演，誰就是反革命，我們就要請他到衛戍司令部去坐牢，再不然，我們有的是盒子嘍！”

我們究竟是青年人，說話未免太過火，但這可惡的基督婆竟為我們所屈服了，她不得不悻悻的說：

“你們一定要講，那也沒有辦法，你們去講就是了。”

於是我們自動的召集學生來講演。學生雖然都是穿紅著綠的小姐，但她們對於我們這批青年的異鄉人之到來，顯然是表示歡迎的。雖然我公然侮辱了她們的校長，但她們不僅不因此不快，而且似乎更其高興，可見她們一向被這基督婆壓迫得

很高害。

從葆靈女校出來，就到對面的豫章中學去講演。這也是教會辦的，不過這是一個男學校。教會裏總是把男女的界限分得那樣清楚。也不僅葆靈女學如此，一切的教會女學都是一樣，她們要檢查女生的信，如果查出有男子給她們講戀愛的情書，就要把這女學生開除，而且通知其他教會女學不得收容這被開除的女生。但她們把男女界限分得這樣清，也不過是表面的。耶穌自己就是一個私生子，這是不待說了，教會裏負責的人，淫蕩的人似乎特別的多。

豫章中學的校長是一個美國人，但他的中國話說得很好。

連日到許多學校去作了講演，女學校除了葆靈以外，還到了省立女子中學和女子職業學校。

我們從廣東出發時，目的地是武漢，南昌不過是一個經過地方(其實走湖南到武漢更方便些)，起初以為至多不過住三天五天，那知到了南昌以後，竟沒有去武漢的日子了。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雖然是一個最高機關，但是到了南昌，一切都得唯總司令之命是聽，我在廣州未出發前的預料，不幸而言中了。本來總司令是力主遷都武漢的人，但我們到了南昌，總司令又說武漢不宜建都，只有暫在南昌駐節，等打下了南京後再搬到南京去。這樣，我們的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就成了總司令部的

一翼附屬機關，不得不以總司令部的進退爲進退了。

當時武漢方面已有一部分中央委員，他們打電來反對中央政府暫駐南昌，主張立刻到武漢去，善於造謠挑撥的外國報紙上，用大字登載“×××將軍扣留中央政府於南昌”的消息；武漢與南昌儼然成了對峙的形勢。總司令爲鎮定人心起見，打了一個電報到武漢去，說中央政府在南昌是暫駐，如不去南京，當即來武漢。但那時候南京還是孫傳芳的天下，當然我們還不能去。

赴武漢既遙遙無期，住在旅館當然不是了局，所以我們中央黨部全體工作人員就遷到了心遠大學去暫住。

心遠大學不待說是江西的最高學府了，但是內容糟到一蹋糊塗，好在我們遷去時，早已停課，也沒有一個學生。校長是熊育錫，一個矮小的老頭子，南昌人叫他做熊猴子；這個綽號在他是非常適當的，因爲他的尊容真的活像一隻猴子；教務長是他的公子，所以又有人稱心遠大學爲父子大學。

校舍很小，但在南昌，這樣的房子已經是不易找到了，住在學校裏究竟比住在旅館裏好些。

在心遠大學住了不久，中央黨部在南昌已經正式找了房子，因爲總司令已經決心命中央黨部在南昌久駐了。

中央黨部的地址是在六眼井包公館。這包公館的主人本

是江西省銀行的行長，平日吸收平民的血已經吸得很肥了，孫傳芳出兵江西，他是一個最重要的籌款人物，所以在革命軍將到南昌時，他就不能不逃之夭夭了。他逃以後，他的住宅就被作為逆產沒收了。

這公館所占的面積很廣，但完全是舊式的建築，屋間裏面的光線都是黑漆一團，樓房本很少，而且是矮得很——矮得幾乎像上海的閣樓。

我和毛君，還有其他的幾位同事首先跑到包公館去看，裏面還沒有收拾好，不過把房屋已經大致分配，這是那一部，那是那一部。房子裏亂七八糟的堆滿一些東西，可見這位高貴的主人在臨走的時候是如何急促。我們到處巡視了一遍，查看了主人遺留下來的許多東西，我們還是以在滕王閣殘址找唐瓦的心思，想在這裏找到一點可紀念的東西。我們查到了許多信，信封上都是寫着“包大人 鈞啓”“包老爺 鈞啓”，使我們回想到平時這位大人老爺是如何威風。還找到了一些相片，大概都是這位包大人和那些督軍省長廳長們合攝的。最有趣的是在一間臥室裏找到許多女人的繡鞋，還有許多女人用的東西，這可以使我們斷定是小姐的閨房。

中央黨部遷到了包公館，我們的住宿就成了問題，因為像這樣矮得抬不起頭來的樓房，我實在不願住，而且那麼多人擠

在一間房裏，更是不妥，所以我和毛君決意另外找房子住。

召租的房子倒也很有幾處，但一間我們沒有家眷，就不肯租給我們，我們一連碰了幾個釘子。這是很明白的，我們沒有家眷，在這裏簡直找不到房子了。毛君很頹喪地問我：“那怎麼辦呢？”

我們又在包公館後面看了一間房子，房東問我們有沒有家眷，我說有的，於是我們的房子就租定了。等到我和毛君兩人搬進去，房東問我的太太呢？

“現在還在上海，過五六天就可以到了。”我撒謊答覆了她，也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但我對於這一間房子實在是不滿意，所以不久，我又另外和張，田，蔡幾位同事在東湖邊另找了幾間樓房。

黨部沒有辦公，大家都沒有一點事；飽暖思淫慾，這原是人之恆情，所以同事中大部分人都是終天在外面活動找異性，但我簡直沒有參加這種活動，我是正在向別一方面發展——和廣東的一位小姐作求愛式的通信。

南昌的空氣真是沉悶得使人難過！

在廣州，我們時常可以看到十萬二十萬以上的羣衆的集會，使我們可以看出羣衆的力量。但南昌完全是另外一個情形。一月二十一日那天，是列甯逝世的三週紀念日，往年在廣

州都有很盛大的集會，但是南昌那天的紀念會上，羣衆到的並不多。

大會的會場是在公共體育場，我去參加了大會。在主席台上，遇到了詩人郭沫若；我和郭君一向是不認識的，這還是初次會面，那是由袁文彬君介紹的。和郭君初次會面所得的印象並不很壞，我覺得他還有點書生氣，並不像一般人所說他的那樣驕傲，那樣搭官架子，這或許是他對我特別沒有搭官架子罷。

將要散會的時候，主席台上預備了十幾位妙齡女子唱國際歌。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的罪人！”

“……”

本來是很雄壯的歌調，在這些小姐們唱來覺得另有一種風致；但我總覺得像這樣的歌，還是由粗暴的工人農人來唱的好，這些小姐們還是去唱“毛毛雨，下個不停；”或是“太陽，太陽，太陽照起來”更爲適宜。

六

在南昌不僅過了一個陽曆年，而且過了一個陰曆年。

陰曆大除夕那天的晚上，我們同住的四個人上街去找館子吃東西，但是找來找去，許多館子都沒有開門，因為今天是大除夕，他們都不做生意。可是結果還是被我們找到了一家天津館子。

我們正在喫得起勁的時候，忽然聽到了一陣很刺耳的響聲。

“老張：那不是槍聲嗎？”我一面聽，一面問張君，張君正在很得意的吃他的神仙鴨，淡淡的答覆我：

“放爆竹。今天是大除夕，你忘記了嗎？”

“不像爆竹，那是槍聲，你再聽。”

“你不要神經過敏，那是放爆竹，什麼槍聲。”田君說，蔡君也附和他。

叫茶房來問，茶房也說是爆竹，所以我們大家還是安心大嚼，而且打算今天晚上怎樣消遣？

吃好了出去，走了幾條街，覺得有點異樣，人力車是一輛也沒有了，所有的店鋪都已經關門，街上異常冷靜。我們還是毫不介意的走着。忽然前面一陣嘈雜的人聲，我們站定來看

時，一羣兵士已經向我們衝來，而且還有些兵士拖着幾架機關槍。

這是什麼一回事呀！我們本來喝酒已經喝得有點醉意，至此已經被嚇醒了。幸而我們都是穿便衣的，兵士當我們是老百姓，有一個弟兄很客氣的對我們說：

“你們不要怕，我們決不來得罪你們老百姓，我們是去找總司令要餉的。他媽的，官長快快樂樂過年，我們的餉有二三個月沒有關了。”

一隊人衝過去後，遠遠的又有一隊人衝來了，我們看形勢不對，只得向旁邊一家煙店裏敲開門進去躲一下。煙店老闆是福建人，他們很客氣的招待我們。

我們已經知道這是第三軍的隊伍。在前幾天，第三軍就有關餉的消息，如今果然爆發了。拖了機關槍去問總司令要餉，這將進成一個什麼結果，想起來，真使人不寒而慄！

幸而風波立刻就平下去了，朱培德（第三軍軍長）答應關一個月餉，兵士也都歸了隊，我們纔能回到了寓所。但第二天早上到包公館時，包公館旁邊已有兩個老百姓的屍首躺著，那是昨晚被流彈所傷的。我們軍人部的那位姓蔣的同事，昨晚正在街上走，因為他是穿軍服的，也被變兵拉去打了一頓。如果我們昨天是穿軍服的，那當然也是不免要受點小小的損失

了。

由於這一個小小的變亂，更使我們明白現在的軍隊已經漸漸腐敗起來了。政府的財政雖說困難，但軍隊的餉還可勉強照發，爲什麼第三軍會二三個月沒有關餉呢？既說沒有錢，爲什麼一關就可以關一個月餉呢？聽說後來總司令部對於這件事的處置，槍斃了幾個爲首的兵士。

這件事情發生以後，南昌的情形更可悲觀。人民對於革命軍已似乎沒有從前那樣熱烈了。不久，新編第一師在贛州槍殺工人的消息也傳來了。

贛州慘案發生以後，贛州總工會及其他各界派了三個代表到南昌來請願。因爲對方是軍隊，省黨部不敢辦理此案，推到中央黨部來，中央黨部又因其屬於軍隊而要代表直接到總司令部去。這三位代表天天到總司令部去，但是去了十幾趟，沒有會到一個人，自然更沒有一點結果。這三位代表總算到省城裏來遊玩了一趟，一無所得的回贛州去了。

南昌的情形依然是這樣一天不如一天，我也煩悶得很，打算獨自離開南昌，但這個時候總司令忽然允許中央政府到武漢去，而他自己也要向安徽方面出發了。

七

那是二月底的一個早上，我們在包公館集合出發，到章江門去過江，因為牛行車站是在對江。

在南昌住了將近兩個月，厭棄得不得了，但如今要離開南昌了，又覺得有點依依不捨，晨光熹微中的江上，又別有一番景緻，這正像女人的臨去秋波，使我忽然感覺到南昌還是可愛的，但可惜我已經要離開南昌了。

牛行車站上的專車早已停好在那裏，我們上車不久，車就開行了。但這次離開南昌，淒慘得很；在廣州黃沙車站上送行的團體是多麼熱鬧，而牛行車站上簡直可說沒有一個人來歡送我們，我們好像是被押解出境的囚犯，悄悄地離開了南昌。

經過了涂家埠，專車在德安停了一下，在馬迴嶺也停了一刻，下午三四點鐘纔到九江。

一到九江，把行李交給了勤務兵，和毛張田諸君在江邊找一家旅館住下。旅館裏的茶房和南昌的一樣，口口聲聲叫我們“老總”，有時還叫我們“大人”。

中央黨部本備有一艘專輪運載職員與公文到武漢，但中

央黨部職員既如此多，而專輪又如此小，要我們從九江擠到漢口，實在有點不願意，所以我和毛君等幾個人決意另外搭商船，而且還可以在九江多玩一天。

九江地方實在小得很，不過因為有了租界，沿江又有了一條馬路，所以比南昌洋氣一點。

我們到蓬萊菜館去吃了一頓飯，飯菜的價錢真貴得出奇，四個人只喫了四個菜一個湯，而且都是很普通的菜，酒也只是紹興老酒，但結果開上賬來是大洋十八元七角六分。這樣貴的普通菜，實在是生平第一次吃到；在上海，這樣吃一頓至多五六塊錢就夠了。

九江什麼東西都是很貴，這些商人真是可惡到了極點！

第二天上午去遊了南門湖，南門湖又名甘棠湖，湖面並不廣闊，湖水也不清，就湖的本質說，還遠不及南昌的東湖，但因為正面着廬山，幽美的廬山的遠景更增加了湖的價值。

湖中有一個煙水亭，相傳是三國時代東吳周瑜的水軍都督府，我們去玩了一趟，這地方的確還不壞，尤其是那裏面的亭子，那小小的院子，都覺得清幽可愛，夏日在此讀書，那就再好沒有了。

遊了一回湖，就在九江總商會面前上了岸，順便進去玩了一下。總商會正對着廬山，甘棠湖就在面前，風景是很好的，房

屋的建築也不壞。資本家總是會享樂的，總商會說是資本家的集團，房屋造得好一點，也是自然而且必然的事了。我們本想找幾個負責的人來問問九江的商情，但商會裏除了一個不負責的書記員以外，就只有兩個聽差的。這位書記員完全是呆徒，問他一些話，他答非所問的和我們胡纏了一回。

據聞基督教在九江很有勢力，他們辦了幾個漂亮的學校，儒利女學即是其中之一。我們本來打算到儒利女學去講演，但時間已經來不及了。

市黨部倒去了一趟，負責的都是一些很有精神的青年。九江總工會還沒有成立，但總工會的籌備處已經很有力量，在不久以前，他們正領導九江的革命民衆做了一次偉大的工作——自動收回了九江的英租界——但可惜我們在九江逗留的時間太匆促，不及——去訪問這些可敬佩的革命領袖。在我們到九江的下一天的下午四點鐘，就附輪西上，到革命的新都武漢去了。

武漢印象記



溫和的春風終於把我們吹到了武漢。

在內地旅行和在內地城市居住，已有整整的三個月了。這三個月中，沒有看到光潔平坦的馬路，沒有看到宏偉壯麗的建築，甚至沒有看見汽車。這一切一切的都市的物質文明，重又在漢口相逢了。看見了這些馬路，看見了這些洋房，使我們的眼睛光明得多。但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橫掛在各處馬路

上的白布標語，和穿青布制服，全副武裝到處巡視的工人糾察隊。白布上的標語都是寫着斗大的字，固然也有些標語是我們已經看得太多了的什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殘餘軍閥之類，但此地特別多，而且特別引人注目的標語是：

“反對個人獨裁！”

“打倒老朽昏庸！”

“反對以軍治黨！”

這三個是武漢最流行的口號，在南昌苦悶了兩個月的我，這幾個口號總算是替我出了一口悶氣。尤其是打倒老朽昏庸這一句，我們在南昌受過了兩個月悶氣的人看來，更覺得有說不出的妙用。

下船以後，最初是到人民俱樂部去暫住。這原是一個上海大世界式的遊戲場，而且現在還在營業，但在這革命的新都，就是一個平常的遊戲場，也是充滿了濃厚的革命的空氣。上海大世界內各處懸掛着名伶的相片，但人民俱樂部內所懸掛的相片，已不是梅蘭芳程豔秋而是馬克思列甯了。各處都張掛着紅布白字的標語，寫着各樣的革命的口號，最觸目驚心的，例如“爪哇暴動起來了，我們要努力！”“飢寒交迫的奴隸們起來作最後的一戰！”等等，五光十色，無奇不有。數十萬羣衆大會的相片，也是到處張掛着。此外，到處還懸掛着各種各樣的統

計，例如湖南各縣農民協會組織統計表，武漢工人組織統計表等。如果你是新到武漢的人，初入人民俱樂部，你決不會想像到這是一個大世界式的遊戲場，而要以為這是一個世界革命博物館了。

遊戲場尙且如此，不用說其他了。

在人民俱樂部略爲休息以後，即與毛君出外遊玩，對於這革命新都的漢口，作一度的巡禮。

首先是到了後城馬路的長江書店，這是武漢出售革命書籍的總機關。書店裏擠滿了顧客，這種熱鬧的情形是上海四馬路各書店所沒有的，我們擠了半天纔找到一個店員，但當我們向他說明我們要買最近的嚮導週報時，他立刻就給了我們失望的答覆：

“對不起！已經買完了，這一期第五版明天早上就可以出版，你明天早上來買吧。”他一面對我們說，一面已在和別人做交易了。

“怎麼？這一期嚮導已經第五版了？生意這樣好？”毛君感慨地說。

因爲書店裏人實在太多了，不能不走了出來，再向各處亂走。

革命的漢口我們已經作了一度巡禮，雖然是走馬看花，但

厚濃的革命空氣已經給了我們一個很深的印象，使我們的興得幾乎忘記了疲倦。

二

在人民俱樂部只住了一夜，第二天的中午就遷到武昌去了，因為中央黨部的臨時部址是在武昌的省議會。

武昌城裏街道的窄狹，這是給了我一個不快的印象。但我們不是來賞玩風景的，武昌城裏的濃厚的革命空氣正同漢口一樣，單是這點，我已經很滿意了。

在漢陽門上岸以後，經過了許多難走的小街，到了閱馬廠省議會了。省議會現在作為省黨部的部址，我們來，原不過是暫住，但因為我們是上級機關，省黨部對於我們是特別客氣，讓了大部分的房屋給我們住，而我也就得一個人住了一間正對着蛇山的光線很好的大房間。

省議會的建築，在簡陋的武昌城中要算是很宏麗的了，尤其因為是在蛇山的腳下，大門前又有一片廣場，所以更覺得其地位十分可愛。中央黨部在廣州時，本也是以省議會作部址，

廣州市議會的面積是比武昌省議會大，但其建築已經很陳舊，遠不如武昌省議會精緻。我們在南昌住了兩個月鳥籠式的小房子，現在能住這比較好的房屋，覺得心境為之一寬。

到武昌以後，第一是在省黨部各部分參觀了一番。省黨部裏有許多職員是在廣東時候的老朋友，例如農民部的秘書韓陽初，婦女部的秘書葛季膺等；其他即是不認識的，也莫不一見如故。

省黨部各部分的工作都很緊張，這是很使我滿意的。在廣州的時候，時常聽見人罵市黨部的人都是些“老爺”，但我覺得湖北省黨部絕對沒有這種毛病。省黨部的辦事人大都是青年——即使有幾個中年人，而他們的精神也正和青年人一樣。我們去參觀的時候正是辦公時間，工作人員都是很有精神的做他們各人的工作。我們和幾個工作人員接談，他們將他們的工作情形詳細地告訴我們，充分地表現出他們對於工作之愉快與熱忱。那些官僚機關裏的職員，他們是爲了八十元一百元，或三百元一月的薪水而來，但是，這些黨部裏的職員，這些可欽佩的革命青年，他們並不是爲了拿薪水來的，他們是爲着一種偉大的任務，更切實的說，他們是爲了被壓迫者的痛苦，爲了革命，纔來此把的。看了他們那種工作的精神，覺得我們中央黨部實在很慚愧！

三

到武昌後的第二天去參觀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武漢分校的舊朋友更其多了，恽代英是此地的政治總教官，政治教官大都是熟識的老朋友，政治部裏的熟人也很多。

武漢分校的第一個特點，就是這個學校裏的女生隊。男女同學，雖然是在落後的中國，也不是為奇了，不過軍事學校裏兼收女生，不僅在中國是創舉，在世界上也是少見。關於武漢分校兼收女生的問題，在廣州後方曾經起過一番爭論，鄧演達是極力主張招女生的，但顧孟餘丁維芬輩却堅決反對，因為在他們看來，男女始終是有分別的，女子只配在閨房裏挑花刺繡，到講台上來講演，到會場上來參加會議，已經是非禮越分，如今要更進一步的穿草鞋背長槍，那更是極禮教之鉅變，簡直是丟中國的醜。但是，潮流如此，反對已經沒有力量，武漢分校終於招收女生了。

對於武漢分校的女生，我們應該無條件的欽佩她們的勇氣與決心。在數千年舊禮教壓迫之下，他們居然能夠從香閨中

逃到戰場上來。

就她們的出身說，都是受過相當教育的小姐，她們之所以能夠到分校來穿草鞋背長槍，不待說都是經過了相當的奮鬥。她們的歷史，都是可歌可泣的小說的或戲劇的材料。

其中有一位姓劉的女生，她是直隸豐潤縣人，曾在北京讀過書，她的父親是一個大地主，她在家裏本是過着很舒服的小姐生活，但她不滿意這種寄生生活。她的思想是很偉大的，她要打倒這種寄生的有閒階級，她以火一般的熱忱來同情於被榨取的人們。她的思想和她的家庭環境當然不相容的，但父母之愛子女是出於天性，她的父母還替她找了一位“門當戶對”的婿家。對方也是一個大地主的兒子——而且是個獨子；她父母對於這門親事是十分滿意的，但她却極力反對。在“父要子死，不得不死”，“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的舊禮教的壓迫之下，她的反抗當然沒有力量。於是，婚期一天一天近起來了，這個時候她不得不表示她最後的決心，走！

爲了舊式婚姻的壓迫，這固是她出走的一個原因，但即使沒有一層壓迫，她早就想走了。最初她是想到廣州，因爲那時的廣州是一般有志青年的理想的園地。但後來，她知道革命的中心已經移到武漢，所以決意到武漢去。但是不幸得很，她在家中動身時所帶的一點必要的路費在北京被竊賊偷去了。北

京雖有她的親戚和許多同學，但因為她是逃出來的，當然不便去見她們，所以她只得冒險偷上了京漢路的火車。沒有票，當然不行，被查出了，就驅逐下車；驅逐下車以後，自己走了一段路，見有車站，又偷偷摸摸的混上車去，結果還是同樣的驅逐下來。這樣走一段路，坐一段車，一直走六十一天，纔走到漢口。在路上既沒有一個錢，當然只有求乞，過了六十一天流浪的乞丐生活，到漢口的時候，憔悴得不像人樣子了。但她的鐵一般的意志終於戰勝了一切的困難而達到了她的目的了。她到武漢以後，不久就進了武漢分校的女生隊，現在很愉快的過她的丘八生活。

關於她的動聽的歷史，引起了我的無限的景慕，所以我特地託一位認識她的朋友介紹和她見面。在沒有和她見面時的想像中的她，是一個又黑又胖的健男子式的女人，其實她是很文弱的千金小姐。她的意志與她的身軀是很不相稱的，因為她的意志是鐵一般的堅，而她的身軀却是弱不勝衣；但據她說，她到武漢入伍以後，身體比從前好得多了，從前在家裏時，簡直是藥不離口，三日一小病，五日一大病。我問她入伍後的感想如何？

“我對於現在的生活非常滿意。”她這樣答覆我。

“那末你現在是不是還時常想着你的故鄉的父母？”我問

她。

“有時也忽然想到。”

“想到的時候不是很痛苦嗎？”

“不！一點也不見得痛苦。母女之間的愛是很自然的，離開了父母，一般說來，當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當我想到在這資本主義制度下，有成千成萬的兒女離開了她的父母這一件事，那末我們自己難過時，就應該替別人難過；但單是替別人難過有什麼用呢？因為單是同情是沒有用的，所以要革命；爲了革命而離開父母，爲了革命而毀家喪身，不僅不是痛苦的事，而且是很愉快了。”

這位女同志的見解這樣澈透，意志這樣堅決，真使我自愧形穢！

分校的女同志中，像劉小姐那樣可欽佩的人是很多的，從許多小的地方就可以看出。

一位姓黃的女同志，她本爲湖南攸縣一位千金小姐，在長沙一個中學裏唸書，革命的潮流把她捲入了漩渦。從下面這一段的小小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她對於被壓迫者的同情是如何熱烈。

去年（一九二六年）北伐軍在湖北作戰的時候，長沙設了幾個後方醫院。那是盛暑的一天，黃小姐同了她的一批同志到

一個後方醫院去慰勞傷兵。正是吃飯的時候，一個傷兵在鐵罐裏抓冷飯吃。他的背上的槍傷已經潰爛了，而且生了蛆，傷口並沒有衣服遮掩着，怪難聞的臭氣從他的傷口透出來，使走近他的人不能不掩鼻而過。但是，我們這位黃小姐對於這位不幸的重傷者充滿了更熱烈的同情。

“同志：你辛苦了，你是光榮的，你是偉大的；你的流血是爲了被壓迫人民，爲了革命。同志：你真是偉大！”她一面安慰他，一面遞給了他一隻蜜橘。

“同志：你好說了，這是我們應該盡的責任。”那傷兵也很客氣的向她說。“呵！這兩隻蜜橘真大，謝謝你！”

“我過幾天再來望你。”

“不敢！謝謝你！在我們這裏吃一口便飯去吧。”他說時，把他的鐵飯罐揚了一揚，一陣使人惡心的異味從鐵飯罐沖出來。

“謝謝你，我們剛才吃過飯了。”

“呀呀！我錯了。我們的臭飯你們小姐們怎麼能吃呢？”這位傷兵同志很抱歉似的說。但是，出乎他的意外的，她突然從他手中把鐵飯罐奪了過來：

“同志：你這樣說，我倒非吃不可了。我不是小姐，我是你們的同志，我當與你們吃同樣的東西；但是很抱歉，我今天實

在已經吃過飯了，所以不能多吃。”說時，她把鐵罐子裏的飯吃了兩口。

這位黃小姐在湖南曾經做了許多工作，後來考入了武漢分校。

分校裏還有一位姓譚的女生，她是廣東人，父親是南洋羣島的一個所謂體面商人，她在廣州讀書時就參加了革命工作。那也是去年六七月間的事，廣州的女學生組織了慰勞隊去慰問省港罷工的工友。這些罷工的工人是廣州革命政府的柱石，但他們的生活是非常艱苦，他們住的地方雖然是政府特撥的房子，但屋子裏面一點用具也沒有；他們的被服又不完全——平均是五個人共兩條毯子，都是趟在水門汀上，因而生病的人很多。有許多工友甚至因為沒有褲子，不能不以一隻麻袋繫在下體。這在高貴的資本家紳士們看來，簡直是一羣禽獸，一羣惡魔。譚小姐的父親是最恨這批工人的，據他的意思，這批工人如果再不好好兒回到香港去做工，應該立刻拿機關鎗來掃射一個乾淨。但是，這位“不孝之女”的意見却和這位體面商人相反，她以為這批工人為了革命而自己忍飢耐寒，實在是很可欽佩的，而可惡的是香港政府和香港的資本家，如果香港政府和香港的資本家不立刻答允罷工委員會所提出的條件，應該立刻用機關鎗把香港這些混蛋掃射一個乾淨。

這位體面商人在一九二六年春天就不許他的女兒在廣州讀書，因為廣州有一個“赤化政府”，女兒再在那裏讀讀書，自然也難免要“赤化”。但是我們這位譚小姐並不接受她父親的命令，而且，她做了大逆不道的罪人了。她不僅沒有如他命令離開廣州，而且要去慰勞他最厭惡的罷工工人了。

如果是普通的慰勞，倒還不必說，那知這些小姐們去慰勞工友時，竟抱了工友接起吻來了。這是因為這些小姐看見工友的生活太可憐了，她們的血液沸騰着，所以情不自禁的要和他們擁抱起來了。偶然的接吻還不算，後來竟專門組織了接吻隊去和罷工工友接吻，而譚小姐竟做了接吻隊的隊長。

體面商人知道了這個消息，自然赫然震怒，立刻否認其為女，申明脫離父女關係。

此外，女生隊裏還有許多人，都有她們的可歌可泣的歷史的。這真是值得欽敬的一羣！

四

湖北省農民協會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在武昌省黨部舉

行，正是我們遷到省黨部去的第三天，所以省黨部裏更是熱鬧。

出席大會的代表都是從各縣選派來的，有許多是短衣赤腳的農民。從前他們沒有機會到省城來的，更沒有機會到像省議會那種“大衙門”裏唐唐皇皇坐了開會議，但現在時代不同了，吳佩孚已經被趕跑了，鄉下的地主紳士已經逃走了，農民自己管理了地方上的事務，現在他們要更進一步的到省裏來開會商議大事了。

省城附近各縣的農民協會還派了三千名農民自衛軍到省城裏保護開會。農民自衛軍都是穿着藍布的制服，戴着大的斗笠，一部分背着毛瑟槍，一部分拿着梭標，威風凜凜的無怪地主紳士們要逃跑了。

代表大會的開幕禮是三月四日舉行的，我以來賓的資格參加了開幕禮。到會的代表是一百六十人，代表三十六個縣農民協會，此外還有三十個特別委員，很多的來賓——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第四軍副軍長張發奎，中央委員孫科等都來參加了，而且都作了講演。尤其是鄧演達的講演博得了很大的彩聲。

省黨部設了盛大的宴會招待出席大會的代表，我以來賓的參加去參加了這次盛會，席間有許多農民代表發揮意見。

農民運動在武漢真是盛極一時。在武漢農民運動的主要機關如下：

- 1、以毛澤東爲領袖的中國××黨中央農民部及農民運動委員會；
- 2、以鄧演達爲領袖的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部；
- 3、以毛澤東爲領袖的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
- 4、全國總農民協會籌備處；
- 5、總政治部農民問題討論委員會；
- 6、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農民部；
- 7、湖北省農民協會；
- 8、武昌縣農民協會；
- 9、中國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農民部；
- 10、漢陽縣農民協會。

至於個人研究農民問題的，更是多不勝數。還有許多外國專門研究農民問題的人被派到武漢來。

五

國民黨第二屆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是三月間在武漢舉行的，這次會議在歷史上是被稱為國民黨左傾的最高表現。這次會議最重要的決議，就是國民政府的改組，增設了勞工，農政，衛生等各部，而以共產黨員蘇兆徵為勞工部長，譚平山為農政部長。

中央黨部已經確定設在漢口，最初是設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樓上，後來搬到了華商總會，但我們的軍人部是被裁撤了；裁撤軍人部的理由，是說這是×××為擴張個人權力而設立的。軍人部裁撤以後，一部分職員到江西安徽去找總司令去了，另一部分人留在武漢。毛君與羅君等轉入了中央組織部，張君轉入了總政治部，田君轉入了中央軍校武漢分校，我到了第四軍政治部。

到第四軍政治部來，在我是覺得很愉快的，因為第四軍號為鐵軍，此次北伐中，建有特殊的功勳；我能夠和鐵軍將士在一起工作，這在我是很高興的。

政治部和軍部同在武昌公共體育場一所陳舊的洋房。我去會見了政治部主任廖乾吾君，一個年老而有滑稽氣味的陝西人，他就委我做宣傳科的科長。

我把我的行李從省議會搬到了公共體育場。我究竟還有點孩子氣，離開了中央黨部的許多同事到這陌生地方來，最初

幾天很覺得有點淒然。

無論什麼事，單是靠傳聞所知道的，都是靠不住的。在廣州後方的時候，我曾聽周恩來說過，這許多政治部，以第四軍政治部成績最好，但實際上，四軍政治部的工作，並沒有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樣緊張。以全力來整頓政治部的工作，特別是關於我專管部分的宣傳工作，這是我的責任了。

時局漸漸緊張起來了。報紙上用大號標題載着“×××一路打去”，因為安慶發生了慘案。在我進四軍政治部的那一天，革命軍克服上海的消息已經傳到武漢來了。

克服上海的消息傳到武漢以後，一方面使我們歡喜，因為長江以南的反動軍閥已經完全肅清了；但另一方面，我們很明白，上海南京相繼克服以後，時局的糾紛益將嚴重。

本來，在安慶慘案發生以後，武漢的空氣已經非常緊張，“打倒軍事獨裁”的標語貼得比以前更多。蔣總司令在南昌臨行時的反對武漢聯席會議的講演，由他的左右印成了小冊子，在武漢到處分送。這陡然增加了武漢的反×空氣。就在克服上海那一天，蔣總司令要求鮑羅廷歸國的電報也到了武漢。在長江下游，反共的空氣正與武漢方面的反×空氣同時發展，武漢方面的×系人物大都已經離武漢東下，與第四軍同系統的十一軍（軍長陳銘樞）的高級將領簡直都跑了。武漢方面不

僅有反×的空氣，而且有反×的運動——總政治部的密探團也成立了，反×運動委員會的組織也在醞釀之中，高語罕主持的武漢民國日報，已經刊出“反對與打倒”的論文，大致是說現在不僅是反對，而且要打倒了。

南京杭州上海相繼克復的消息，從前方傳到武漢時，已不能像克復武昌南昌時廣州後方那樣歡喜鼓舞了。

中央政治會議已決定對於南京將醞釀成功的新政權採取堅決的對策，第四軍已經奉了兼程東下的秘密動員令，政治部已經充分預備了反×的宣傳品，而且軍隊已經實行向下游開拔。

那是四月初的一天，政治部已經奉到了出發的命令。政治部的行動本是和軍部在一起的，四軍的副軍長張發奎已經奉令兼領第十一軍軍長，由十二師師長黃琪翔率領四軍軍部先出發。我們已經全部在徐家棚上了輪船，七十五團（二十五師）全團裝了一艘大輪船，我們政治部是一隻比較小的輪船，我和政治部主任廖吾乾等幾個人很舒服的坐在大餐間裏，商量前方的工作計劃。

行軍的第一個目的地是安慶下去的一個什麼地方，因為一直下去，九江與安慶都不成問題，不過蕪湖一部分南京的軍隊駐紮，所以在蕪湖附近免不了一戰；但只要我們一佔領蕪

湖，南京就沒有問題，因為南京那時有一部份第六軍的隊伍，本來是同情於武漢的；南京的部隊本就不多，而且大部分都在福建浙江一帶，在滬寧路一帶的，不過是白崇禧一部分隊伍。所以要佔領南京，簡直是不成問題。我們預計在武漢出發以後，至多第四天或第五天就可以到南京城裏。到了南京，奪取上海就不是難事了；南京上海佔領以後，杭州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我也可以便道回我的故鄉去了。

說起我的故鄉，其實我是一點也不留戀。雖然我的故鄉也是江南有名的勝地，但那裏只有黑暗，那裏充滿了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吸榨平民的血腥，我不僅不留戀這黑暗的、充滿了血腥的故鄉，而且，我是切齒地恨這故鄉！但帶着緊張的革命空氣回故鄉去，這是我所喜悅的，因為我要去改造故鄉！我要給光明於我故鄉的被壓迫者！

事情的變化是難以預測的，當我正做着回故鄉去革命的夢的時候，忽然奉到中止出發的命令，而我們也就不能不從徐家棚的輪船——已經過了兩個夜的輪船上，仍舊回到了公共體育場的故址。

事情是這樣的：汪精衛到了武漢，他主張暫緩東征之師。

汪精衛是我在廣州時候的老同事，他是國民政府的主席。三月二十號中山艦事變以後，他就遠避法國，從此以後，陳獨

秀簡直把他捧成一個天仙，而陳先生的黨徒，也一致喊着“歡迎汪主席復職”，彷彿只要汪主席一復職，中國革命就可以成功，陳獨秀領袖的共產黨就可以取銷，否則“斯人不出，如蒼生何？”所以汪精衛到武漢那一天，真是舉國若狂，才歡迎這位“革命聖人”，而汪精衛也以“舍我其誰”的氣概，一到武漢，就寫了“革命的到左邊來，不革命的滾開去！”像這樣的口號，武漢人民當然更其歡迎。於是，武陽夏三鎮立刻召集了一個迎汪大會，在武昌閱馬廐舉行了。

汪精衛在未到武漢以前，已經在上海與陳獨秀聯名發表了一個“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表示“國共兩黨，合作到底”。他到武漢的時候，還希望南京方面對武漢能夠讓步，但他的希望是失敗了，上海的四一二事變發生了，接着就是廣州的四一五事變；四一八那天，南京國民政府與中央黨部也成立了，急激地完成了清黨的任务，而寧漢的分裂，至此也不能掩飾了。

六

甯漢正式決裂以後，武漢的空氣是更其緊張了。湖北總工會的工人糾察隊執行了政治警察的任務，全副武裝，到處捉拿反革命派。總政治部的密探隊更其活動。反×運動委員會也正式設立了。此外還成立了許多特別機關，例如東南被壓迫同志招待所，政治工作人員招待所，江浙皖三省黨部辦事處等。

在這濃厚的反×空氣中，我竟被誤認為反革命而入獄了。事情是很滑稽的。那是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我過江到漢口去參加了從前軍人部同事羅君歡送我出發的宴會，因為那時我們已經奉到整裝待發的命令，所以在漢口的幾位朋友輪流設宴歡送我，那天是羅君在杏花樓請我，到了十餘位朋友，都是中央黨部的同事。我們很愉快的喝酒，預備在散席以後，回到黃埔同學會去打牌，因為羅君和毛君都住在同學會的樓上。散席以後，我第一個坐了黃包車往同學會街去。車子在同學會街堂口一停下來，我付了錢正踏進街堂門，那時街堂門半掩着，門內外擠滿了穿着青布制服的工人糾察隊。情形本已是很嚴重，但我絕對沒有想到嚴重的事變會臨到我的頭上。我剛纔踏進門，兩個糾察隊已經拿出手槍來對準我的胸膛，另外兩個糾察隊已經捉住了我的手，用鐵鏈子反縛起來。

“噲！你們不要弄錯，為什麼把我捉起來？”

“反革命！不要多開口！”一個青年糾察隊很兇惡的對我叱

嗎，同時我的背上已被他揮了一拳。

“我是四軍政治部的宣傳科長，是什麼反革命？你弄清楚一點”。我還要向他申辯，但我的申辯已沒有效力了。

“不管你做什麼官，現在是革命的時代，你反革命，就要捉你！”

申辯既沒有用，只有靜待着這幕滑稽劇的繼續開演。

工人糾察隊完成了“捉反革命”的工作，我們一起有四五個人做了他們的俘虜，其中四個人中，只有徐君是我認識的，他本是軍人部的職員，軍人部解散以後，也暫寓在同學會的樓上。

我們這五個人都是穿着很整理的軍裝，皮綁腿都是擦得亮晶晶的，新皮鞋在馬路上走起來都是谷谷嚕嚕的神氣十足，但可惜我們的一隻手已經失了自由，一羣穿青布制服的青年糾察隊押着我們走。

雖然是在黑夜，但我們被押解經過的地方，有不少民衆聚攏來看。

“噲！又捉了一批。”

“哦！都是軍官！”

“一共五個，你家。”

“……”

看熱鬧的人的談話很清楚的傳到我的耳朵裏來，我知道其中一定有許多人在咒我，以爲這樣做官的反革命拿到牢裏去關關也好；也或許還有人在同情我，擔憂我要吃苦了，但我真覺得有點好笑，因爲我知道關於我個人部分完全是誤會的。

“同志：你們要帶我們到什麼地方？”我帶有滑稽的神氣問一個押解我的糾察隊，那一個精神很充足的青年。

“那一個是你的同志？你的同志在南京，你這個反革命！”我真想不到他會這樣罵我，我仍舊以滑稽的態度問他：

“噲！你說我反革命嗎？我革命的時候你還在你母親的肚子裏呢！”

他默然無語了。

我們被解到總工會來了，但一到總工會，又被轉解到公安局去。

到了公安局，就被解到偵緝隊，將我們五個人一一問了姓名，就由一個官長發令：

“帶他們到拘留所去。”

“慢一點，我要找你們局長說話。”我說：“究竟是什麼理由，無緣無故把我押起來。”

“什麼理由？你們是南京派來的偵探，找局長也沒有用

的。”那員官長說。

“你們的局長是我的老朋友，我是一個什麼人他全知道，你問了你們的局長再把我押起來罷，做事不要這樣魯莽，朋友！”我以教訓的口吻對他說。

我們正在說話，他們的隊長來了。

“呀！老朱：你怎麼到這裏來？”他見我做了他們的階下囚，也覺得很奇怪。原來這位隊長就是我的朋友陳君，我一向還不曉得他已經在此地到了偵探隊長；其實他們的局長我並不認識，想不到隊長却是我的朋友。

“老陳：這是什麼一回事？把我這樣捆起來，我又沒有去搶錢，去綁票。”

經過了一番解釋以後，我是立刻被釋放了，這三個半小時：一幕滑稽劇，也就此閉幕了。

七

我做了這幕滑稽短劇的主角以後，更認識了武漢工人的力量。當我在總工會做了幾分鐘的階下囚以後的第二天，我正

式去訪問了湖北全省總工會。我現在已經不是階下因而是座上客了。

我們同去的是第四軍的幾位同事，我們是以來賓資格去參觀。政治部的廖乾吾主任還替我們寫了一封介紹信給總工會的委員長向忠發，因為廖君以前曾在武漢與向君同做秘密工作甚久，他們的私人感情也很好。我們到了總工會以後，向委員長親自殷殷招待我們，並引導我們，在各部分參觀，為我們詳細講解。

向君是湖北本省人，他是一個真正的工人——一個划船工人，因為他能夠堅忍刻苦的奮鬥，故頗得工人信仰。他的年紀大約有四十多歲了，穿着青布短衣，面孔瘦黑而像有鴉片煙癮，這大概是因為他勞苦過度的緣故罷。他是一個很精幹的人，講演也很好，張發奎很稱許他的才幹。

因為全國勞動代表大會將在武漢舉行，各地的代表已有陸續到武漢來的，所以總工會的工作是更其忙碌了。

一九二六年五一節在廣州中央黨部舉行的全國勞動大會，我曾以來賓資格參加了他們的開幕典禮；此次勞動大會又在武漢舉行，我很希望也能以來賓資格參加，但這種希望終於沒有實現，因為不久我就隨軍出發了。

在總工會，會到了許多由各地派來出席全國大會的代表，

上海代表鄭履他君，是我在上海工作時的朋友，此次舊地重逢，尤覺愉快！他是上海一個有力的工人領袖，他的年紀也還很輕，不過二十二三歲。現在擔任湖北總工會的組織科長，後來在全國勞動大會中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執行委員，又由執行委員會選舉為常務委員，後來回上海以後又做了上海總工會的委員長。我對於這些自為的朋友總覺得自愧不如，別後一二年來，他們是這樣進步，而我呢？一事無成，依然故我。

勞工部的部長蘇兆徵，也是和向忠發一樣的工人出身，而他的地位與他的成績是更超過向忠發了。他是省港罷工委員會的委員長，是省港罷工中最有力的領袖，我第一次認識他是在一九二六年的春天，那是在中山大學一個羣衆大會上，他帶了七八個拿盒子砲的衛兵，來參加大會。起初我還不知道這是一個什麼人，矮矮的身材，瘦瘦的面孔，穿着青布的工人短衣，真是所謂“貌不驚人”，為什麼這樣一個人却帶了這麼多的馬弁？最初我真還疑心他是七八個馬弁押解着的囚犯，後來纔知道他是名震全球的省港罷工委員會的委員長蘇兆徵。但那時我對於他帶這麼多的馬弁實在有點不滿，我以為一個工人領袖不應該搭官僚架子，帶這麼多的馬弁，後來纔知道因為香港政府出了十萬元賞格，要買兇手暗殺他，所以他非嚴為防範

不可。現在他做了國民政府的勞工部長了，這是每月可以拿一千二百元薪俸的特任官，我理想中他的馬弁一定帶得更多了，但我在漢口會到他的時候，他連一個馬弁也沒有。

在勞工部，我和他作了一次詳細的談話，他對於廣州事變與上海事變表示深切的憤恨。

國際工人代表團到武漢來了，武漢的工人與革命民衆舉國若狂的歡迎這友邦革命同志的臨到。

國際工人代表團的領袖代表是英國的湯姆，他是英國工人運動中少數派（左傾的，革命的一派）的領袖，一個已經七十一歲的老頭子，但這老頭子的精神是特別充足。代表團中除了湯姆以外，一個是法國的多越理（？），還有一個是美國的×××（忘記其姓名）。他們都是反對阿姆斯特丹國際（隸屬於第二國際的黃色職工國際）的左傾革命派，這次的行程本來是先到廣州，但到廣州的時候，不久就發生了四一五事變，所以在廣州與上海各地沒有做什麼工作，而且連行動的自由也完全喪失，但到了武漢以後，武漢羣衆的熱烈的歡迎，連湯姆裏老頭子也覺得是出乎意外了。

羣衆團體排日歡迎國際工人代表團，簡直沒有一日間斷。我們四軍政治部的全體人員是參加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的歡迎會。會場上革命空氣之濃厚是無法形容的，分校

的內外各處的牆壁上都貼滿了中英文的革命標語，還有許多插畫。我們到了會場不久，主席台上就宣布開會。主席鄧寅達致歡迎詞後，就是湯姆講演。這老頭子雖然有七十多歲了，但他的精神的興奮飽滿，真使我們青年人亦有愧色。他的講演首先申述他到武漢後所得的愉快的印象。他說：

“從前，在我們英國人的心目中，除了一部分革命的工人以外，對於中國人是充滿了輕蔑，侮辱，他們甚至以為中國人都是豬，可以由他們任意宰割來做下酒物。但是，自從偉大的革命爆發以後，他們由輕視中國人民改為畏懼中國人民。不錯，他們是應該畏懼的，如果鮑爾溫，張伯當，麥克唐納爾，漢德森，這些資產階級的走狗，到武漢來看到了這樣偉大的革命力量，他們真要嚇煞了。”

接着，他又把英國工人運動的情形作了詳細的說明。

他的講演博得了如雷的掌聲，最後他拿了一塊鮮豔的大紅手帕，舉手亂揚，大呼萬歲，萬歲！羣衆的革命情緒真是熱烈到了燃燒點。

講演完了以後，他在聽衆熱烈的鼓掌聲中離了講台，抱着一個在主席台上任招待的青年女同志接吻，害得這位東方的女同志面孔漲得和那老頭子手帕一樣的紅！

在熱烈的鼓掌聲中，夾着雄壯的國際歌；在主席台四週的

聽衆隊伍中，到處都是“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團結起來！到明天……”

湯姆講演以後，是法國工人代表多理越的講演，其次是美國工人代表的講演，最其次是第三國際代表印度人魯易的講演，以後是朝鮮代表，安南代表，台灣代表的講演，還有一位南非洲代表的講演，最後是俄顧問鮑羅庭的講演。

這天到會的人，如果以洲籍計算起來，則有：

亞洲人

歐洲人

美洲人

非洲人

如果以國籍來計算，則有：

中國人

俄國人

英國人

美國人

法國人

印度人

朝鮮人

日本人

台灣人

安南人

蒙古人

非洲人

所以這次盛大的集會，真是有歷史意義的國際革命家的集會。

八

我奉了第四軍特別黨部的委托，去慰問鮑羅庭顧問，因為鮑顧問的夫人在山東被張宗昌非法逮捕。

鮑顧問的公館是在武昌湖上園，我們——我和軍部裏的一位同事——去的時候，鮑顧問却好剛從漢口回來，他自己挺出了他的碩大無朋的肚子殷殷招待我們。我把我們特別黨部慰問他的公函遞給了他，並向他面致慰問之意。鮑顧問對於我們的慰問表示無上的愉快，但他說，他夫人之被捕，在他並不覺得是什麼了不得的事，因為一個革命黨員被捕，坐牢，甚至於槍斃，原是不算什麼一回事；每個革命黨員都應該把坐牢看

做是家常便飯，把槍斃看做是必然結果。他又告訴我們與他夫人從前在俄國，英國，土耳其等處參加革命的故事，坐牢在他是很有經驗的，在俄國和英國，他都曾坐過牢。

他又談到北京李大釗被張作霖慘殺的事，他稱許李大釗是中國很難得的領袖人材，所以他對於李大釗的犧牲表示深切的同情。本來是我們去慰問他，而在談話中，他倒反而來慰問我們了。

因為來慰問他的團體代表絡繹而至，所以我們也就告辭而出了。

在廣州與在黃埔的時候，原是時常有機會和鮑顯問見面，他的講演也聽過很多。在廣州時，他的公館就在大東路中央黨部的斜對面，那時我們幾乎天天可以見面。這位莽肚子的俄國毛子在我是很願意和他見面的，因為他對於革命的經驗當然是很豐富的，和他談話的時候他的態度也很誠懇。他的夫人也是和他一樣胖的一位俄國女人，英語也說得很流利。她雖然是一位女革命，但愛美的觀念不下於布爾喬亞的藝術家，她把她的房間修拾得非常精緻。在中央婦女運動講習所行開學禮那天（在廣州），她講演說一個女人應該保持女性美；但什麼是女性美，她並沒有說得清楚。我並不反對女子應該有女性美，但我總覺得男女之間的關係以愈隨便愈妙。在前面我已經

說過，如果人類兩性的關係能夠像貓狗一樣的自由隨便，那末現在男女關係神祕劃分之下的一切罪惡都可以免除了。

九

在某一個星期日的上午，同了幾位同事過江到漢陽去遊玩。

漢陽城裏的街道是這樣的狹窄，骯髒，比起武昌城裏來是更其不如了。

到漢陽去遊玩第一個目的是參觀兵工廠，首先找到了兵工廠特別黨部的委員王君，由他領我們到各部分去參觀。我對於這一方面完全是門外漢，所以也不覺得什麼興味，後來到工人俱樂部，工人夜學校等處去參觀，找兩個工人作了一次談話。

從兵工廠出來，本想去遊龜山，但在路上遇見了在廣東時候的朋友易君，他現在在漢陽縣農民協會負責，堅邀我們到漢陽去吃飯。吃飯在我們的確是很需要了，因為我們還是早上吃過一點東西，到此刻還沒有別的東西下過肚。

重新又進了城，在一條骯髒的小街上走上了一家骯髒的

酒樓。

隨便喊了幾樣菜，燙了最好的紹興酒。酒樓雖然是小，但味兒真不壞，何況酒逢知己千杯少——杯又一杯，一直喝到二三點鐘，纔盡興而散。

酒樓的老闆是天津人，一個四十多歲的胖子。這酒樓還是他父親手裏開辦的，在漢陽城裏可以說得是一塊老招牌。我們在他那裏喝酒，來了一斤又是一斤，菜也是來一盆又是一盆，這樣的大主顧，在這小店裏是很難達到的，所以特別殷殷招待我們，我向他問起在漢陽做生意的情形，他最初只是搖搖頭，很感慨地說：

“現在生意真是難做！”

我問他為什麼生意難做？他起初還不肯說，後來因為我們和他談了許多話，他覺得我們還和藹可親，所以向我們傾吐了他的苦衷：

“革命，我們老百姓當然是贊成，但工人實在也鬧得太兇了。我們小店有六個夥計，在革命軍來了以後，漢陽城裏有了一個什麼工會，他們都加入了工會；加入了工會，那可就糟了，今天要求加薪，明天要求改良待遇；今天工會裏派一個幹事來，明天工會裏送一封公函來。不答應加薪，那行？工會裏就說你是反革命，非送到公安局去辦不可，你想：我們此地有六個夥

計，個個要加起薪來，叫我怎樣辦？那末我想裁去兩個，但又不行，工會裏說我欺侮工人，壓迫工人運動，又要當我反革命辦。那末我只得索性不做生意了，關了門回家去吃老米飯，那又不行，工會裏說我是奸商，是摧殘工運的資本家，要打倒……”

這種情形，不僅漢陽這家酒樓如此，武漢三鎮到處都是一樣。在革命高潮澎湃的時候，工人及一切被壓迫者起來了；從前他們受了資本家的壓迫，現在反而要來威脅資本家了。

在武漢，店員運動發展得特別的快，店員總工會在武漢的勢力，比任何團體還更偉大。店員與學徒一致的團結，要求加薪，改良待遇；店主不允許嗎？那怎行？把店主扣留起來，橫豎店員總工會自己有武裝的糾察隊，他們可以把店主扣留到店員工會去審問；店員與學徒做了座上的主人，而店主反而做了階下囚了。時代真是不同了，一切都變了，奴隸們造反了，剝削者變成被剝削。

店主被扣留以後，如果事情不能迅速解決，就把商店交給店員與學徒管理。聽說工廠裏也有這種情形，工廠主與爲工廠主作走狗的工人與職員被趕跑了，工人管理了工廠。但可惜我沒有時間到工廠中去實地考察。

帝國主義的報紙及一切出版物上，把武漢描寫成一個恐怖之窟，描寫成一個混亂到不像樣子的世界。其實，我們住在武漢的人，就覺得武漢一切的現象，都是表示了人類前途的曙光。

在武漢，一切都是活潑的，向上的，積極的，樂觀的。他們正在企圖改造人類的運命，但在這艱鉅工作的進程中，當然免不了有不滿人意的現象。

我所認為不滿意的地方，正和別人所批評武漢的相反。其中最使我不滿意的是中央日報。

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的中央機關報，單就這意義上說，就可知其所負的使命是如何偉大了。但是，中央日報對於其所負的任務，簡直沒有完成其萬分之一。

中央日報是直轄於中央宣傳部，所以中央日報社的社長由宣傳部長顧孟餘兼領。總編輯是陳啓修，一個在共產黨內的不重要的“學者”。陳啓修君的學問如何是另一問題，但他當新聞記者是很不適宜的，第一，他的文字非常拙劣，他做的論文，嘈嘈囂囂使人不能卒讀。他做的論文只要看了他的標題就

可以知道如何笨拙，他的標題總是些“江西人民已經起來了”，“東南人民已經起來了”之類。至於報紙內容之簡陋，更是不用說了。

副刊是孫伏園編輯的，這是一位布爾喬亞文學家的典型，由他來編輯的副刊，其內容是不待說了。

從別處傳來的消息，知道他們宣傳武漢已完全沒有教育。其實這也不是事實，在武漢，從小學到大學，還是照常的上課，不過學生的精神比從前更活潑多了。他們已不以在課堂裏聽教師的講解為滿足，他們也起來參加實際工作了，這在主張讀死書的人看來，當然是不對的，但我們有什麼理由反對學生參加實際活動呢？

河南之役



在維多利亞花園看見了漸次凋謝的桃花，纔知道已經是落英繽紛的暮春時候了。

自從到武漢以來，已經一個多月了，終日為緊張的革命空氣所包圍着，簡直忘記了春之神已經臨到人間，更想不到桃花已經要凋謝了。在這和風醉人的暮春時節，人們是應該如何盡量地享受自然所給以的幸福呀！但我是完全辜負了這春天，一

天到晚，忙着開會，上辦公廳，連到郊外去踏青的機會也沒有，甚至整個的春天沒有看見一朵桃花或一枝杏花，除了這次在維多利亞花園看到那已經凋謝的桃花而外。有時想來，覺得未免是太辜負了韶光，其實呢，享樂原不是我們的權利，當大多數的人還不能解決其生活問題的時候，尤其不該存享樂的奢望。有閑階級的老爺少爺們挾着嬌妻美妾，今天去遊西湖，明天又到太湖，這種醉生夢死的生活，是我們應該羨慕的嗎？是我們應該仿效的嗎？當然不！我們應該記到，在黑暗的工廠裏，這些工人們不僅還一樣地終天在做工，沒有因為春之神之到來而減少了他們一分鐘的工作；而且，天氣這樣和暖，而他們還是穿着冬天的老棉襖，因為春衣押在當舖裏沒有錢去贖取，只得任其汗出如漿。拿我現在的生活來比他們，已經好多得了，我還不滿意嗎？我應該自愧，因而更應該自勉。再進一步想，還有更多的人，連想找一個工廠工人的位置也找不到，他們的生活不待說是更其惡劣了，而這些人正是佔着我們這社會的大羣，使這大羣的人民得到解放，正是我們所應負荷的任務；在這任務沒有達到以前，希望享樂不僅是一種錯誤，而且是一種墮落，一種罪惡。

爲了要實行這種神聖的任務，我沒有餘暇去欣賞那暮春時節的醉人的風光，而要穿着草鞋，背了乾糧袋，佩了左輪槍，

從軍北伐去了。

上次興高彩烈地準備東征，而東征不成；而此次出發北伐，又那樣倉促，僅僅是接到動員令後的第五天就出發了，戎馬生活，原是這樣幻變得出人意外。

在南京政府沒有成立，上海四一二事變沒有發生以前，武漢政府已經動員準備東征，倒是在南京政府成立以後，寧漢兩方已經公然取敵對形勢的時候，竟不東征而北伐，這在我個人，覺得實在是一個不可解的謎。

在出發的前兩天，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找我們政治部幾個負責的人去作了一次詳細的談話，關於到河南後的工作方針，他給了我們一個大概的指示。我就把何以移東征之師以北伐這一點問他，他的答覆是這樣：

武漢負責任方面對於東征與北伐的意見，原分兩種：一種意見，以爲我們現在應該乘南京的基礎還沒有鞏固以前，迅襲南京，則解決下游問題易似反掌；另一種意見，則以爲東征之師，未能必勝，而奉軍南下，節節進逼，在京漢路正面，已由鄭州長驅南下，越過漯河郟城，在豫東，不僅已佔領逍遙鎮，而且汝南上蔡，均已被佔領，如果武漢大軍東征，則奉軍直下武勝關而得武漢，簡直是絕不費力；南京之得既不可必，而武漢勢必失去，如此不僅不合算，抑且危險，好在此刻南京決無力西征，

武漢大軍北伐，可無後顧之慮。以武漢兵力與在河南之奉軍兵力比較，武漢方面實佔必勝。而且武漢北伐還有一個更大的意義，即是與馮玉祥的國民軍在河南會師，當時馮玉祥不僅反對奉軍，而且打電給武漢政府，痛斥南京為“非法組織”，指×××為新軍閥。所以這一派人主張應先北伐，可以與馮玉祥取得聯絡，當時唐生智張發奎輩主張屬於前者，而汪精衛鮑羅庭輩主張屬於後者，終以採取了後者的主張。

當時武漢方面的軍事佈置如下：

以唐生智及張發奎部為北伐軍之主力，由唐生智任總指揮（名義上是第四方面軍），統率三縱隊；張發奎為第一縱隊司令官，指揮第四第十一兩軍及賀龍之獨立第五師，任右翼。劉興為第二縱隊司令官，指揮第三十五三十六兩軍，任京漢路正面。第三縱隊是新收編的雜牌軍隊，田維勤，靳雲鶚，以及暫編第三軍梁壽愷，暫編第五軍龐炳勳，新編第十四師安俊才，新編第十六師張萬信等任左翼。但一般說來，雜牌軍隊的戰鬥力是非常單薄的。

後方留守隊伍如下：張發奎部（時張發奎任第四軍軍長及第十一軍軍長）留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葉挺所部一師人衛戍武漢，葉挺本人即兼武昌衛戍司令。朱培德所部第三軍及第九軍全部留守江西，對南京安徽方面警戒。第三十五軍何鍵之

一部分，第二軍魯滌平之一部分，及十四軍陳嘉佑全部留守湖南，對廣東方面警戒。獨立第十四師夏斗寅部留守宜昌，對四川方面警戒。

我們政治部是於四月二十二日隨同軍部自武昌出發的。因為此次出發時間過於匆促，而出發以前，我們的工作又集中於所謂黨權運動及對付南京方面，而於北伐工作的準備極不充分，所以出發的前幾天，工作之忙碌，簡直到了無以形容的程度。及至一切工作都準備好了，臨時出發的時候，想到此次北伐，要痛飲黃龍，又覺得十分痛快。腳上穿的草鞋，比平常穿皮鞋還要適意；皮綁腿換了布綁腿，當然更其舒服了。

從公共體育場出發，步行到了漢陽門；在漢陽門上了小火輪，又把我們載到徐家棚來了；因為要在徐家棚過江到江岸車站上京漢火車。

上次雖曾在徐家棚過了一天一夜，但因為整天整夜的下着雨，簡直沒有上岸去玩。這次到了徐家棚以後，因為火車沒有準備好，所以沒有立刻過江，而我們也就得在徐家棚玩了一個痛快。

徐家棚是武昌郊外的一個小市鎮，鄉間的偉大的自然景色而外，可以給我們久居都會的人一種愉快。

小火輪在徐家棚停泊以後，第一急待解決的是吃飯問題。管伙食的庶務幹事立刻指揮伙夫上岸去燒飯，但我實在肚飢得不能忍耐了，所以約了政治部的編輯股長張君，訓練股長范君，黨務股長陳君，上岸去找了一家小館子，痛痛快快吃了一頓。館子雖然是小，但味道的可口是武漢各大館子所沒有的。

說到武漢的酒館，聯想到我自己這兩個多月來的墮落生活。自到武漢以來，雖然天天在唱着革命的高調，而自己的生活，實在是很墮落，第一就是歡喜吃。因為政治部的飯太壞了，所以幾乎天天是在外面吃館子，武昌城裏與漢口市上的館子，我幾乎是吃遍了。在武昌，交易最多的館子是閘馬廠附近的那家什麼春，其次是斗級營的同興，長街上的一洞天，還有那些大大小小的館子，簡直沒有一家沒有我的踪跡；在漢口，交易最多的是交通路的味雅，其次如杏花樓，同華樓，普海春等。雖然我並沒有因為好喫妨害我的工作，但在全國絕大多數人沉淪在飢餓線下的時候，而我如此好吃，實在問心自愧！

吃過了飯，就去參觀武長路特別黨部，但我們是空跑了一趟，因為黨部裏沒有一個負責的人。黨部就在武長路管理局旁邊，那宏麗的洋房與花園，使人聯想到前幾天社會上喧傳武長路破產的消息，似乎有點矛盾。

此次到武漢來，已經二三個月了，我絕對想不到武昌城外會有這麼一個絕妙的去處。馬路是這麼平坦可愛，雖然不是柏油路，也不是土敏土，但在這鋪着黃沙的路上開步，比在上海靜安寺路的行人道上還舒服得多。馬路固然是很可愛，而特別可愛的，還是馬路兩旁的高大的楊柳。我們四個人沿着這條江邊的馬路信步走去，兩旁高高的楊柳替我們遮住了日光。暮春時節特有的醉人的和風，一陣陣向臉上吹來，白色的柳絮隨風飛舞，紛紛向身上撲來，這真是一個妙絕人寰的仙境！但當我想起了賈至那首“春思”七絕時，又覺得有點說不出情由的惆悵，我只是反覆的低吟着：

花色青青柳色黃，
桃花歷亂李花香；
東風不為吹愁卻，
春日偏能惹恨長。

由於賈至的詩，又聯想到王昌齡的那首“閨怨”：

閨中少婦不知愁，
春日凝粧上翠樓；
驀見陌頭楊柳色，
悔教夫婿覓封侯。

這首詩使我們四個人都引起了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的感

慨。我們雖然都不是閩中少婦，而且都是沒有閩中少婦等着的光棍；但正因為沒有閩中少婦，所以我們萬里長征的生活中，也不會有人來想念我們。這不免引起我們的孤獨的悲哀。其實呢？如果有了閩中少婦，那事情是更其壞了。爲了掛念着閩中的少婦，會減少我們奮鬥的勇氣，尤其是當讀了“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的那種淒豔欲絕的作品時，更其會使鬥爭的勇氣完全消失。……一些不正確的幻想總是常會在我腦筋中作祟。我們決不能以詩人的哲學家的態度去觀察一切，我們只有向前奮鬥！

又在徐家棚輪船過了一天，但這次總算沒有開倒車回公共體育場去，第二天早上，我們的輪船就開到對江去了。

在附近江岸車站的地方上了岸，那派到車站上去預備車位的副官回來報告，備我們乘坐的專車要等武勝關方面開來，上午是不能到的，所以我們下午能不能走成功，還是一個問題。車站上又是擠得滿滿的，我們既不能在車站上去等車，送

我們來的小火輪又要回軍部去應差，而且我們的大行李已經搬上了岸，再搬下輪船去，也夠麻煩。商議的結果，還是在附近車站的樹林間暫時休息一下，這樣，只要等專車一到，就可以上車了。

週圍都是高大的柳樹，夾着一二枝開着鮮豔的紅花的連名詞也不知道的小樹。景色是非常可愛的，暮春的和風，經過樹林吹到我們面上，柳絮飛了一身，彩色的小蝴蝶與黃蜂四處飛舞，尤其是黃鶯唱出使人聞而神往的好聽的歌聲，這裏的一切，勝過暮春的江南的原野，真想不到在戎馬倉忙中，會遇到這樣一個勝地，可惜我們是在行軍中，不是來遊春。

江岸車站——這在中國革命史上成了一個可紀念的名詞，京漢路的二七大屠殺，江岸車站是一個很重要的刑場。京漢鐵路總工會江岸分會委員長林祥謙就是在這裏被砍頭的。事情過去已經六年了，林祥謙及其他犧牲者的骨頭早都爛完了。但這六年之內，我們做了些什麼呢？我們已經趕跑了吳佩孚，——二七屠殺的第一個兇首。我們也趕跑了他的大小走狗，這是比較可以告慰我們的犧牲者的。我們現在還在繼續努力，我們要到河南去，我們要奪取鄭州和洛陽，那是從前京漢鐵路總工會的所在地及吳佩孚的大本營所在地。我們還要奪取北京，最後，我們的目的是要使全世界的被壓迫得到真正

的解放！

因為江岸車站在中國革命史上演了這麼一幕悲壯的慘劇，所以我在武昌時，就很想到江岸來巡禮一番，但事實上，因為忙於工作，終於沒有來過，今天到了江岸，自然急於要去車站看看。

小小的車站上，擠滿了兵士和許多難民式的老百姓。車站的門口掛滿了某某軍某某師辦事處的漆布招牌，甚至一個團部也在車站上設起辦事處來了，無怪車站辦公室內擠滿了掛斜皮帶的軍官。

費了許多力氣，纔算擠進了車站的辦公室，在樓上一間屋子裏，遇到了我們軍部裏的羅副官。他告訴我，我們的專車十二點鐘準可到站，所以下午三點鐘一定可以北開。這是一個使我喜悅的消息，因為我是急於到北方去看看究竟怎樣的情形。

辦公室的人都是忙着他們的公務，我不僅連坐的地方也沒有，而且簡直連立的地方也沒有。於是我下了樓，走到月台上去觀光。兩旁的月台上都堆滿了商貨與軍用品。這些商貨在月台上顯然是已經經過了很長的時間了，這從牠的外表上可以看出，堆在底下的，簡直有許多是已經腐爛了。

從車站上一個年老的脚夫的口中，知道了這些貨物有的

竟已經在此堆積了一年多，天天盼望有貨車能夠運到北方去，但貨車已經停頓了很久了，現在戰事又發生了，這些貨物更不知要那一天纔能運到北方。

許多衣衫襤褸的老百姓在車站上等車。

“怎麼？今天還有客車嗎？”我問脚夫。

“哼！客車？已經半年沒有通了。前一個月，有時或者還有一班車開到信陽州，但現在連到武勝關的車子也沒有了。火車龍頭給吳佩孚帶去了，現在所有的給軍隊開專車還不夠。”

“那末，他們在此做什麼呢？”

“他們？當然是想搭車，沒有客車，碰到有軍事專車，能混上去，就混了上去，你們革命軍是優待老百姓的，所以他們不怕你們。”

老脚夫被一個站上的職員喊去了，我就找老百姓來說話。

“哈！老鄉：你是上那兒去的？”我問一個中年農民。

“上信陽州去的，老總：你佬幫對我的忙，專車來的時候，讓我爬上去，真是感謝你佬！”

“我也不曉得專車上有沒有空地方。”

“我們不要到車子裏去坐，只要能夠爬到車頂上去躺就是了。”

“怎麼車頂上可以躺呢？”

“沒辦法，我們還有許多同鄉都是這樣的：還是去年下來的，後來大兵來了，火車不通了，我們天天在這裏候車，但總候不到，有時有一列車到了，大家就往車頂上擠。即使老總待我們好，不趕我們下車，但只要一會兒，車頂上已經擠滿了，我擠了幾次都擠不上去。”

我又和他談了些關於河南的情形，他只有搖頭嘆氣。

車站上的空氣實在使人難受，不僅是因為人太多了，而且因為月台上堆着的貨物有的已經腐爛了，發出一種難聞的臭味。我離開了車站，到附近的工人子弟學校去參觀，但却好今天是放假，校裏沒有一個人。

在樹林中喫了一頓午飯。還沒有出發，就開始野餐，這是很有趣的事。我們幾個人一個小小的涼亭休息，靜聽那黃鶯兒的歌唱。

天氣真是好，沒有一點雲，也不覺得悶熱。在大自然陶醉中，我竟睡着了。醒來的時候已經將近三點鐘，週圍的一羣還是沒有一點動靜，伙子陪着行李担在樹林中打睡，這光景顯然是專車還沒有到。

“今天又走不成了，真討厭！”大家都發出這樣的嘆息。

我同了組織科的葉科長又到車站去打聽，剛好在車站門口碰到了羅副官。

“羅副官：你說專車十二點鐘準可到，現在已經三點鐘了，爲什麼還不到呢？”我問。

“快了快了，五點鐘——至遲六點鐘準可以到了，今晚一定可以走。”羅副官很有把握地說。

“今晚一定可以走？明天這個時候還不得走呢！火車頭這個時候還在駐馬店。”軍部裏一位參謀說。但我不相信那參謀的話，因爲羅副官是管理車輛交通的，他的話當然比較可靠。

回到涼亭裏和廖主任乾吾閒談了一回，他邀我去喝酒，又邀了軍部的參謀李人一。我們三個人踏進了車站附近的小酒店——沒有招牌的天津館子，這個小酒館在平時是專做鐵路工人和附近鄉間農民的生意的，我們三位帶了佩手榴彈的馬弁的貴賓到這小酒店裏來，使店主人驚異起來了。他很恭敬的迎我們進去揀了一隻比較的清潔的桌子，和善而帶有敬意的問我們吃什麼菜。

廖主任的兩個馬弁和我的那個年青的勤務兵，都站在酒店的門口等我們，他們都佩着駁壳槍和手榴彈，威風凜凜地使這小酒店的一般老主顧過門而不敢入內，我覺得這太不像樣子，就叫他們到車站上去等着。

三個人慢慢兒喝着烈性的白乾，炒的幾樣小菜也很可口，

不像樣的小酒店裏弄出來的菜，味道往往比小酒館好得多，由此可見無論什麼是不能以外觀與虛名作標準的。

喝酒一直喝到了五點半，火車頭的消息依然如石沉大海。事情是很顯然的，今天無論如何是走不成了。

載我們來的小火輪已經開回武昌去了，火車又沒有到，車站上連站腳的空地也沒有，附近又沒有公共地方可以住宿，今晚叫我們到什麼地方宿營去？

在樹林中吃過了一頓夜飯，宿營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天時已經不早了，夜神漸漸臨到了人間。沒有辦法，大家只有露營——還沒有出發就要露營，這真是笑話！

我們幾個高級職員總算是有優先權，幾個人擠在涼亭裏睡，其餘的官兵伙都露宿在樹林中。

白天雖然很暖和，晚上却頗有些涼意，因為這裏沒有門窗板壁，四面都是風，所以更覺得冷了。

一灣新月懸在當空，月下的野景更是清幽絕俗，我們索性把馬燈吹滅了，一時睡不着，大家東西南北的閒談着。廖主任是陝西人，組織科長葉君是廣東人，總務科長劉君是湖南人，我是浙江人，我們四個人的籍貫代表四個不同的區域，廖主任是代表北方，葉君是代表南方，劉君是代表長江中部，我是代表東南。我們最初的談話是以各地的地方情形為資料，這倒是

很有趣味的。後來又談到革命。因為我們露營的地方是江岸車站附近，所以二七屠殺成了我們主要談話資料之一。廖君當時是親身參加了這一運動的，失敗以後，因為軍閥的殘暴的壓迫，空前的恐怖，使他幾乎繼施洋林祥謙之後而犧牲。最初他躲在漢口的一個小鴉片烟館裏，後來又跟向忠發躲在漢水一隻小划子上，最後，他還是不能不逃到廣東去。他講述當時躲避的情形，嚴肅而帶有滑稽的意味。

許多青年在一起閒談，總要談到女人問題。但我們涼亭裏還四個人，廖主任是一個年近花甲的老翁，劉君是將近四十的中年人，葉君也有三十多歲了，年青的只有我一人。而且軍隊究竟要講點階級，勤務兵與馬弁又就站在我們旁邊，所以我們的談話就不能太隨便，因此談了差不多兩個鐘頭的話，竟絕沒有提及女人問題。我終於忍不住了，就問廖主任：

“喂！廖主任：我們政治部裏應該用幾位女同志，總務科與組織科倒可以不用，我們宣傳科是非用女同志不可的。”

我的提議立刻引起了葉科長的反對，他說：朱科長真豈有此理，想一個人揩油，我們組織科倒是非用女同志不可的。

於是劉科長也說總務科的財務股與文書股都有用女同志的必要，因為女人細心些，管理財務與文書當比男同志更為週到可靠。

其實我們知道這些爭論是全無意義的，因為廖主任絕對不會同意我們的提議，這五十多歲的老頭子有一種古怪的脾氣，就是憎惡一切異性，尤其是年輕的異性，簡直把她們當作毒蛇猛獸，他在每一個女人背後總要罵幾聲“這隻怪東西”，“這隻壞東西”，甚至會罵“這隻爛屎”。他始終是一個獨身者。他不僅終始沒有娶過妻，而且據說五十多歲了，還始終沒有和女性發生過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的關係。據他自己說，女人是天然妨礙革命的怪東西，一和這種怪東西發生關係，就非反革命不可；他之所以不接近女性，就是爲了革命。這種說法雖然似乎是冠冕堂皇，但實際非常可笑，因爲如果人人像他這樣永遠與異性隔絕，人類社會就要消滅了。他之所以厭惡女性，當然另有其原因在。這種原因，有兩種推測，一種是說他在年青時代失戀過，所以他就成了女性的反動者了。另一種意見，則以爲這是由於他的生理上的缺陷，他的陽具永遠硬不起來，不能與女人性交；因爲這種生理上的缺陷，以致視女人如仇敵。這兩種說法，自以後者的理由更爲充分。

我們這樣隨便閒談，到很夜深纔睡着。

三

備我們乘坐的專車，一直到翌日——四月二十四日——正午十二點以後，纔由武勝關開到江岸車站。

專車一共掛了二三十節。但頭二等車是一輛也沒有，三等車也僅僅只有二節，其餘的都是四等車與裝牲口的蓬車。

中國鐵路的破產，在我們這列專車上可以看出。這二十多節三四等車與蓬車，從車箱外所標出的路名上，可以知道拉拉雜雜是把各路的車輛拖攏來的，京漢路的只有兩輛，其餘是津浦，京奉，京綏，隴海，膠濟，道清，汴洛各路的。在山海關以西，長江以南，所有鐵路上的車輛都集中在我們這列專車上了，真是洋洋乎大觀！

火車龍頭據說是隴海路的，開動起來緩慢得像一隻笨牛。

火車是下午五點鐘從江岸車站開出的，這次的出征，匆匆忙忙地簡直像是逃難，車站上也沒有歡送的羣衆，火車靜悄悄地離開了江岸車站，向北奔馳。

在樹林中等車的時候，恨不能立刻跳上火車，立刻開到了駐馬店。但現在火車是在開動了，對於一步步遠離的武漢，又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留戀的情致。這次的北伐，比第一次的北伐更是危險而沒有把握。第一，北方的民衆沒有組織，不能像

第一次北伐時得到民衆的援助；第二：奉系軍閥的力量也比殘餘的直系軍閥強固得多；第三，因為寧漢的分裂，我們的地位十分孤立，不像第一次北伐的一致。奉軍的迫擊砲是很厲害的，也許這次我在河南要變成砲灰。其實這也一點不足使我恐懼，而且我想，能夠爽爽快快的變了砲灰也好，所以我在出發前寫給漢口一位女同志的信上說：“我希望我這次到前方能變成砲灰，這樣，革命與戀愛，一切都解決了。”真的，要解決問題，最澈底的只有死，活着，問題總不會澈底解決的。

我們軍政治部一共佔據了一輛三等車和兩輛篷車，兵士與大行李伙食担都堆在篷車裏，我們擠在一輛三等車裏，實在有點不爽快，因為在未出發前，據說出發時可以坐花車，現在不僅花車沒有，連三等車也只有一輛；但想到了許多兵士與伙子擠在裝牲口的篷車裏，還有許多人民連篷車裏也不能去擠一擠而爬在車箱底下的鐵條上，車箱頂上也是擠滿了人，這樣，我們能夠坐三等車——而且我一個人佔據了兩個座位，可以勉強睡下來，這已經是了不起的享受了。

我的座位的週圍是幾位青年同志，我們很放肆地談到各種問題，由革命問題到女人問題，無所不談。

廖君帶來的啤酒與乾牛肉，我們借油大吃了一頓。

火車不停地向北駛去，夜神漸漸臨到了，於是我們大家都

感覺到一種深刻的痛苦，就是火車裏沒有電燈，馬燈的光線實在感覺得不夠。

今天一天沒有看報，在火車中，文書股一位同事不知從什麼地方弄到了一份中央日報，但當翻開來一看到陳啓修的不通的論文的時候，連報上的新聞也不想看了，因為他的論文會使我作嘔。報上載了他的論文，就覺得這份報紙也是奇臭薰天。這真是武漢政府最大的恥辱！在陳啓修主持之下，我們的中央日報完全成了一個無聊的機關了。這並不是我感情用事，而是陳啓修主持的中央日報實在太不像樣了，武漢的朋友沒有一個不是與我有同樣的感覺的，而且，我與陳啓修並不認識，連見面的機會也不曾有過，所以我之反對他，深信沒有絲毫主觀的偏見。我覺得現在武漢政府第一要做的工作，就是到美孚油行去買兩噸煤油，把中央日報館浸在煤油裏，放把火燒一個痛快。甚至我這樣想，如果鮑羅庭汪精衛不能來做這工作，等北京的“張大帥”來做，也是好的。

火車繼續向北奔馳，我們大家都漸漸的睡熟了。第二天早上醒來，車子已經停在李家寨車站。

在車站上散散步，吸點新鮮空氣，覺得非常爽快。

火車龍頭加過了水，又繼續北開，不久到了武勝關，經過了深長的隧道，車子又停下來。

在車站上可以望到鷄公山，這是一個著名的避暑的地方。鷄公山似乎沒有廬山那麼高，但從牠的外表看，比廬山雄壯得多。半山裏有不少紅紅綠綠的洋房，這都是中國軍閥與外國資本家的別墅，吳佩孚在沒有倒台的時候，是時常到這山上來的。可惜車子停一停就開了，使我們沒有上山遊玩的機會。

我們現在已到了河南省界了。在我們每個人的主觀上都起了這樣一個感覺：河南究竟與湖北有點不同。

火車過武勝關隧道時發生了一幕慘劇，一個爬在車箱底下鐵條上的老百姓，不知怎樣跌了下去被車輪將他的身體軋得粉碎，而我們舒舒服服躺在三等車裏，還怨恨沒有花車坐。

本來預計下午五點鐘可以到達信陽州，但三點多鐘將近四點鐘的時候，車子突然在一個小站上停了下來。最初還以為是已經到了信陽，但等到從窗中探首前望車站的時候，立刻就意識到這不是信陽，而且，不幸的事件已經臨到我們頭上了，因為車站上擠滿了羣衆——不是兵士，不是學生，也不是普通的民衆。

“這是紅槍會！”我的那個年青的勤務兵首先尖銳地叫起來了。的確，這是紅槍會。這一批都是年壯力富的農民，他們全都武裝着，但他們手裏拿的不是步槍，也不是盒子砲，而是紅纓的長槍。的確，這是紅槍會了；以前我們只在報紙上及各

種報告中知道紅槍會的一點情形，現在我們親自看到紅槍會了。

這真是鉅觀！車站上人頭擠擠，但最引人注意的，是他們手中紅纓的長槍，槍桿似乎都是木材的，槍尖是鐵的，這樣子活像是舞台上在演長板坡。

在未到河南來以前，我們所知道的紅槍會的情形是十分野蠻和十分殘暴的，特別是見了軍人就要殺，見了軍器就要奪，我們都想這算是糟了，他們是來繳我們的槍來了，因為我們這一系列車的武裝兵士很少——僅僅軍部特務營的一部分，如果他們真的要與我們動起手來，這倒是一件夠麻煩的事。因此，我們都本能地看了看自佩的武器，我意識地問了問我的勤務兵：“你的駁殼槍上了子彈沒有？”他很爽快的回答我“早已上好了。”“把手榴彈帶在身邊。”我對他發了這樣一道命令後，立刻檢查自己所佩的左輪手槍，六顆子彈都好好地嵌在鏢子裏。

我首先帶了勤務兵和幾個青年同事下了車去探聽消息，我們都是武裝，十分小心地向人叢中走去。情形顯然沒有我們預料那樣嚴重，從這羣紅槍會的面部表情上看，他們不是來和我們作戰，也不是來搶我們的軍火來的。軍部參謀處的人正在與他們接洽，事情是這樣的：他們要趕到信陽州去參加紅槍會

的大會，要求搭我們的車去。

這要求在他們原似乎是很平常的，決不能算是一個酷刻的要求，但對於我們，實在是一個難題；因為我們的車上本來已經擠得很，如果再加上這批紅槍會，那更是不堪了。但我們又不能拒絕，因為我們實在是不願得罪紅槍會——不，我們處處地方要求他們能了解我們所負的任務，我們要引他們上光明之路。為要取得他們的同情與諒解，不能不處處地方對他們委曲求全，何況他們的要求原不是酷刻的要求，從東雙河——這一小車站的名詞——到信陽，也不過幾十里路。

協議的結果，我們完全允諾了他們的要求，讓他們趕我們的火車到信陽。

有十幾個人分配在我們這一節車上，有一位是和我同座。那是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年農民。他的身體很結實，但顯然的，他是長期生活於悲衰憂患的環境中，這是從他的憔悴的面色可以看出的。

我和他作了如下簡單的問答：

“老鄉貴姓名？”

“我叫王(或黃)阿增(或阿珍)。”

“就是東雙河人嗎？”

“我家裏是東雙河的東面，王莊兒。”

“入紅槍會有幾多時候了？”

“……”他屈指計算了一下“入紅槍會已經一年了”。

“紅槍會很好，我也想加入。”

“你佬是笑話。”

“真的，我很歡喜紅槍會，不過我不明白，加入紅槍會以後做點什麼事？”

“第一是打老陝。”（按老陝指陝軍，因當時陝軍岳維竣部駐河南，軍紀極壞，人民紛起組織紅槍會以抗。紅槍會最恨陝軍，其餘任何壞軍隊，亦都被指為“老陝”）

“要不要打我們革命軍？”

“你們南軍聽說不壞。”

“我們不是南軍，我們是革命軍；我們的軍隊裏固然有南方人，但也有北方人，陝西人也有，不過我們決不欺侮老百姓，我們是為老百姓打抱不平的。”

“好說。”

“老鄉你贊不贊成革命軍？”

“我們？……”他遲疑了一忽，纔慨然說“真命天子不出世，總弄不好。”

“真命天子是不會有的，那是騙人的話，我們自己就是真命天子。”

“怎麼？你佬說錯了”。他搖搖了頭，又欣然自得地說：“不過，現在天下快太平了，因為真命天子已經出世了。”

“你怎樣知道？”

“關老爺（指關雲長）說的，紫薇星已經下凡了，在山東濟南府。”

“這是笑話。”

“怎麼？”他睜出了兩隻眼睛，幾乎像要和我決鬥了。

紅槍會就是這樣的嗎？我這樣想。另外我又與別的幾個紅槍會作了幾次談話，他們的程度都是差不多，我覺得這些被壓迫的奴隸們真是可憐，但因此更覺得我們這次到河南來的任務是尤其重大了。

大約將近六點鐘的時候，我們的專車停在信陽車站上了。因為機車要在此地加煤，伙夫要在此地煮飯，所以車子需要相當時期的停留，使我們有到信陽城裏稍為遊玩一下的機會。

在暮色蒼茫中，我和幾位青年同事下了車，先在車站上散了一回步。賣糖糰與賣茶的攤子擺滿在車站外面的石子路上，幾個面無人色的小販在那裏叫賣；還有一個是牛肉攤，一個年老的小販在那裏一邊切牛肉，一邊嘴裏叫着，但他的話實在有點聽不清楚，大約當是替他的牛肉宣傳。我們站在他的牛肉担前，覺得的確有點使胃腸歡迎的香味，就買了一點來喫；味兒

“入紅槍會有幾多時候了？”

“……”他屈指計算了一下“入紅槍會已經一年了”。

“紅槍會很好，我也想加入。”

“你佬是笑話。”

“真的，我很歡喜紅槍會；不過我不明白，加入紅槍會以後做點什麼事？”

“第一是打老陝。”（按老陝指陝軍，因當時陝軍岳維峻部駐河南，軍紀極壞，人民紛起組織紅槍會以抗。紅槍會最恨陝軍，其餘任何壞軍隊，亦都被指為“老陝”）

“要不要打我們革命軍？”

“你們南軍聽說不壞。”

“我們不是南軍，我們是革命軍；我們的軍隊裏固然有南方人，但也有北方人，陝西人也有，不過我們決不欺侮老百姓，我們是為老百姓打抱不平的。”

“好說。”

“老鄉你贊不贊成革命軍？”

“我們？……”他遲疑了一忽，纔慨然說“真命天子不出世，總弄不好。”

“真命天子是不會有的，那是騙人的話，我們自己就是真命天子。”

的大會，要求搭我們的車去。

這要求在他們原似乎是很平常的，決不能算是一個酷刻的要求，但對於我們，實在是一個難題；因為我們的車上本來已經擠得很，如果再加上這批紅槍會，那更是不堪了。但我們又不能拒絕，因為我們實在是不願得罪紅槍會——不，我們處處地方要求他們能了解我們所負的任務，我們要引他們上光明之路。為要取得他們的同情與諒解，不能不處處地方對他們委曲求全，何況他們的要求原不是酷刻的要求，從東雙河——這一小車站的名詞——到信陽，也不過幾十里路。

協議的結果，我們完全允諾了他們的要求，讓他們趕我們的火車到信陽。

有十幾個人分配在我們這一節車上，有一位是和我同座。那是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年農民。他的身體很結實，但顯然的，他是長期生活於悲哀憂患的環境中，這是從他的憔悴的面色可以看出的。

我和他作了如下簡單的問答：

“老鄉貴姓名？”

“我叫王（或黃）阿增（或阿珍）。”

“就是東雙河人嗎？”

“我家裏是東雙河的東面，王莊兒。”

“入紅槍會有幾多時候了？”

“……”他屈指計算了一下“入紅槍會已經一年了”。

“紅槍會很好，我也想加入。”

“你佬是笑話。”

“真的，我很歡喜紅槍會，不過我不明白，加入紅槍會以後做點什麼事？”

“第一是打老陝。”（按老陝指陝軍，因當時陝軍岳維竣部駐河南，軍紀極壞，人民紛起組織紅槍會以抗。紅槍會最恨陝軍，其餘任何壞軍隊，亦都被指為“老陝”）

“要不要打我們革命軍？”

“你們南軍聽說不壞。”

“我們不是南軍，我們是革命軍；我們的軍隊裏固然有南方人，但也有北方人，陝西人也有，不過我們決不欺侮老百姓，我們是為老百姓打抱不平的。”

“好說。”

“老鄉你贊不贊成革命軍？”

“我們？……”他遲疑了一忽，纔慨然說“真命天子不出世，總弄不好。”

“真命天子是不會有的，那是騙人的話，我們自己就是真命天子。”

“怎麼？你佬說錯了”。他搖搖了頭，又欣然自得地說：“不過，現在天下快太平了，因為真命天子已經出世了。”

“你怎樣知道？”

“關老爺（指關雲長）說的，紫薇星已經下凡了，在山東濟南府。”

“這是笑話。”

“怎麼？”他睜出了兩隻眼睛，幾乎像要和我決鬥了。

紅槍會就是這樣的嗎？我這樣想。另外我又與別的幾個紅槍會作了幾次談話，他們的程度都是差不多，我覺得這些被壓迫的奴隸們真是可憐，但因此更覺得我們這次到河南來的任務是尤其重大了。

大約將近六點鐘的時候，我們的專車停在信陽車站上了。因為機車要在此地加煤，伙夫要在此地煮飯，所以車子需要相當時期的停留，使我們有到信陽城裏稍為遊玩一下的機會。

在暮色蒼茫中，我和幾位青年同事下了車，先在車站上散了一回步。賣糖糰與賣茶的攤子擺滿在車站外面的石子路上，幾個面無人色的小販在那裏叫賣；還有一個是牛肉攤，一個年老的小販在那裏一邊切牛肉，一邊嘴裏叫着，但他的話實在有點聽不清楚，大約當是替他的牛肉宣傳。我們站在他的牛肉担前，覺得的確有點使胃腸歡迎的香味，就買了一點來喫；味兒

真不錯。肚子也有點餓了，又在饅饅攤上買了一個饅饅，也是很可口的東西，但因為準備到城裏去痛痛快快地吃一頓，所以饅饅與牛肉都不敢多吃。

幾個憔悴不堪的黃包車夫拖着車子向我們兜生意，但我們只能使他們失望了。

走出車站不遠就是城門——從方向說，這是東門吧。城牆是十分堅固，外觀也極其雄壯，真不失為中原的古城。

進了城，城裏的荒涼情形實在出我們意外。我們想找一個館子來吃一點東西，但連小飯店也找不着。無意中，走到了省立第二女子師範的門口，第八軍的一部隊伍在這裏駐紮，進去會到了幾位在廣東時認識的青年同志。他們也是前幾天纔由武漢開拔到此地來的。異鄉逢故舊，實在是一件快事，於是我們暢談了好一回。

魏益三也駐紮在信陽城中，我們本想去和這位從北洋舊軍閥那裏倒戈出來的將軍談談，但時間已不許可了。車站上似乎已在吹集合號，但又有點聽不真。為免誤事，所以不敢再在城裏流連，其實這荒涼的城裏也沒有什麼好玩。

第八軍的同志送我們回車站，車上的人們剛剛吃過飯，但我們的肚子還是空空的，因為在城裏始終沒有找到館子，於是作成了那個賣牛肉的與賣饅饅的販子，在車站

不久，車子繼續北開，古樸雄壯的信陽州在黑暗中消失了，這使我微微感覺得有點惆悵，因為我雖生長在山明水秀的江南，但我一向愛好北方的樸實的古城，可是和信陽僅僅只有兩小時的邂逅，不知何年何日，纔得來此重遊？

火車從信陽開出後，行駛得似乎更慢了，但情形是很顯然，明天，無論如何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地——駐馬店了。

從信陽州開車的時候，已經不很早了，但因為精神過於興奮，一時睡不熟，閱讀郭沫若翻譯的新時代。

翌日清晨醒來，車子停住沒有開動，我起初以為已經到了駐馬店，後來纔知道這是一個小站。至於火車要在這裏停的原因，是等駐馬店下來的一列車子。這一系列下行車是載田維勤靳雲鶚等到武漢去的，我們都很想見見這兩位的舊軍閥，但是等了好久，這列車子纔從我們面前駛過，竟沒有停下來。

下行車過後，我們的專車又繼續北開，經過了礦山縣城，經過了幾個小站，我們到了駐馬店了。

四

我們的十二師政治部已經於前幾天開來駐馬店，所以在我們到達駐馬店的時候，他們在車站上歡迎我們。我們先到十二師政治部去休息了一下。

十二師政治部是在一個天主教堂裏。在這荒涼的土城裏，這也是座了不起的建築了。

軍政治部是和軍部一起在駐馬店南首的一個教會醫院裏，據說是駐馬店最好的建築，那兒離駐馬店有二三里路。我們沒有到那兒去以前，先在駐馬店全鎮作了一次巡禮。

駐馬店是豫南的一個重鎮，是兵家必爭之地，年來頗受戰爭的蹂躪，以致地方的情形也是憔悴不堪。原先本有一個土城，但在幾年前已被毀去了，現在僅剩了一個殘址。鎮的面積很小，只有三四條街。像這種市鎮在我們浙江，那簡直是一個毫不足論的鄉鎮，但在此地，不僅是一個軍事重鎮，而且也算是一個商業的中心了。河南經濟之落後，單就這一點上已可看出。

鎮上的商店並不多——雜貨店，藥店，南北貨店，小飯店，茶館等等，新式的商店是沒有的，工廠是更其不用說了。

我們首先到一個小酒樓上去飲酒。北方的菜味總是很可口的，我覺得北方菜實在比四川菜與廣東菜更好——廣東的二三百元一碗的貴族菜當然是例外。

同座是軍政治部的，十二師政治部的，二十五師政治部的幾個負責的人，一共有十一位。我們在火車裏苦悶了兩天，這兩天中也沒有好東西吃，所以這一頓吃得很痛快。

飯後到政治部——卽是到那個教會醫院來。這裏真不愧是駐馬店最好的建築了。這些帝國主義的辯護士到中國內地來，口頭上口口聲聲是天國，樂園，慈悲，好善，而事實上，他們自己仗着帝國主義的奧援，生活過得很舒服，無論到什麼地方，尤其是內地，教堂與教會的附屬機關總是最好的建築。這些帝國主義的辯護士——更客氣點說，這些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自己賣身投靠去替資本家宣傳“福音”，欺騙民衆去做資本家的順奴，而自己却過着很舒適的生活，真是該一排排捆起來用機關槍掃射纔對！

但現在，我們革命軍來了，這些辯護士顯然是倒霉了。以前，這些辯護士仗狗勢般不僅欺侮普通人民，而且因為軍閥懼怕洋大人之故，對於這些辯護士也不敢得罪。軍閥軍隊到一個地方總是佔據許多民房，備極騷擾，但對於教會的一切產業是例外的，因為他們曉得無論基督教或是天主教，都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打狗看主家面”，何況帝國主義也就是軍閥自己的主人，所以他們對於教會是不敢侵犯的，教堂裏向來是不准紮兵的。但我們却不這樣做；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首先要佔據

教堂及一切教會的產業，因為我們不怕得罪帝國主義——不！我們處處地方要和帝國主義奮鬥！我們不僅要佔據教堂，而且我們要把這些無恥的辯護士——無論是基督教或天主教——趕走，我們要在民衆面前宣佈他們的罪惡。這些辯護士究竟是很聰明的，在我們沒有到以前，已經跑一個精光，我們雖然白住了他們的優美的建築，但我們的心裏並不感謝他們；而且，因為這些狗都偷跑了，我們沒有捉到一隻吊起來玩玩，這是一件掃興的事。

軍政治部召集十二師政治部與二十五師政治部開了一個聯席會議，決定把駐馬店鎮上的工作交給十二師政治部，四鄉間的工作由軍政治部來擔任，二十五師政治部因為立刻就要向豫東開拔，所以已不能參加駐馬店的工作。

我把我們的宣傳隊分成了七隊，每隊是四個人，我天天同了這二十八位年青的宣傳隊同志在駐馬店四鄉跑。

我們把附近二十里內的鄉村都跑到了，農民最初對於我們是很懷疑的，但經過努力的宣傳，我們與農民中間的隔膜漸漸除掉了。

前方的軍事情形漸漸緊張起來，敵人——奉軍的前鋒已經過了鄆城，進西駐平。我們的最前線是在駐馬店北去三十里地的界牌，那是十二師三十五團的隊伍。遂平城裏駐有新編十

六師張萬信的部隊，這本是陝西軍隊（岳維峻的舊部），後來由吳佩孚收編，吳佩孚失敗後，又由武漢政府收編，但情形是顯然的，他們對武漢政府是不忠實的，所以嚴格的說來，他們還不能算是我們的軍隊。駐在遂平車站的有暫編第三軍梁壽世部，也是新由武漢政府收編的雜牌軍隊。從駐馬店車站到遂平車站，有四十華里，在駐馬店與遂平之間，還有一個大劉莊車站，駐有新編第十四師安俊才部。但這些雜牌軍隊都是不可靠的。

我們立刻感覺到這樣一種神聖的任務：以決死的精神，組織先遣隊到前方去——到我們防線以外的前線去，擔任宣傳民衆，組織民衆，以及刺探敵情等間諜情報工作。廖主任對於我所提出的組織先遣隊的計劃是極端贊成，但軍部當局以爲這種工作過於冒險，因爲我們的計劃第一步先到遂平，將來再相機北進；但遂平已沒有我們自己的軍隊，是些土匪式的靠不住的雜牌軍隊——不！與其說靠不住，不如說靠得住的要叛變的。而且遂平離西平只有四十里路，西平已經爲奉軍佔領，遂平北上十餘里路就有奉軍的哨兵。我們深信只要奉軍砲聲一響，這些雜牌軍隊立刻就會換旗幟叛變。但我們只要認爲這工作是有意義的，就應該去做，革命本是最危險的事，決不能因危險而不去幹。因此，我們決定組織先遣隊出發。由我擔任

了隊長，同了二十一位年青勇敢的同志，帶了十個勤護兵和四個伙子，於四月二十九日的早上，由駐馬店軍部出發。

我們全體都是武裝，一共有十九支駁壳，三支左輪，還有兩隻馬槍，也有幾顆手榴彈。沿鐵路北進，因為沿途工作之故，到下午三點鐘纔到了大劉莊車站。今晚到遼平是來不及了，而且大劉莊的工作顯然也是重要的，所以我們臨時決定在大劉莊住宿一夜。

新編十四師的師部是設於車上。我去訪問安俊才師長，却好他今早到駐馬店去了。與幾個參謀談了一回，這些雜牌軍隊的痛苦，我也相當地瞭解了。在我們革命軍裏，一個營部已經裝飾得很漂亮了，師部簡直像皇宮。但是這落魄在列車上的師部，簡直褻褻得像廟階沿前的叫化窟。

那是一節鐵蓬車，以前怕是裝牛裝豬的，現在做了這高貴的師長的臥室而兼辦公室了。說他是臥室，其實也沒有床，不過是兩塊板攔成的一隻舖，這就是師長睡的。舖上一條毯子，那真是骯髒得怕已經生了蛆，但事情不難明白，這是師長天天拿來蓋在身上的被。此外，蓬車裏還有一隻小的而且有一隻腳已經損壞了的板桌，那就是師長的辦公桌了。沙發與安樂椅不待說是沒有的，連一隻木頭凳也沒有，堆着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就拿來當椅子坐。

一個參謀很殷勤的招待我，他向一個勤務兵發出“倒茶來”的命令，但勤務兵奉上來的，不是一杯茶而是一杯顯然不沸的濁水，如果不瞭解他們的實際生活，一定要憤他們之慢客了，但我很能諒解這不是他們有意慢客，而是實際逼迫他們無可奈何。

那參謀——穿着舊破的粗杜布夾短衫袴的中年人，從他的服裝看，像一個剛從監獄裏釋出來的窮犯人，我之所以知道他是參謀，還是那護兵說的。他的臉瘦黃而發黑，顯然是受了營養不良的影響。我和他談了很久，他詳細地傾訴他們的痛苦，據他說，已經整整的兩年了，他們軍隊裏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開餉，連伙食費也沒有開發，他們官長與兵士一樣，經常地沒有麵條吃，時常以黃豆餅來充飢，這種黃豆餅在我們浙江是餵豬吃的，而且是下等豬食，但是他們有時連黃豆餅也沒得吃。最初是向地方上籌款，但地方上窮，地方人士自己沒得飯吃。沒辦法，把地方上的牲口拉來養食，後來甚至連地方上的狗都吃盡了。想開到富足一點的地方去，又不可能，因那些地方早已被強有力者佔據去了，他們的力量又不能和他們爭勝。這樣，他們就不能不天天在飢餓中掙扎。安師長今天上駐馬店去，就是想懇求政府裏發一點款子給他們，使他們能夠暫時活命。

到大劉莊後的第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就是找一個宿住地方來休息一下。我們今天早上五點鐘起來以後，一刻到此刻簡直沒有休息過一下。但要在劉莊找地方住，真是一件難事。在我們沒有到劉莊以前，以為劉莊既有車站，至少是一個小市鎮；但事實上，除車站一幢小房子以外，連鄉村也沒有一個。沒辦法，只得在鐵路旁邊的一所無人住的民房中住了下來。

這是兩間矮小的茅屋，大門早已不知去向，大約早已被老陝弄去當柴燒了。河南鄉村間的茅屋，照例是沒有窗的。屋子裏是什麼東西也沒有的——床鋪，桌椅，凳子，爐子，飯鍋，這一切一切都是沒有的，所有的僅僅是一束已經腐爛的稻草。因為沒有窗，屋子裏暗得很，四壁是灰黑色的，長滿了塵埃。是泥地，雖然近來沒有下雨，但潮濕得很。跨進屋子去，草鞋踏在潮濕的泥地上怪難過的；尤其使人難堪的，是一種異樣的臭味，這種臭味不僅使鼻官不歡迎，而且更要引起胃腸的反感，幸而我午飯沒有吃——僅僅吃了一點麵餅，否則會全部嘔出來。

這屋主人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大概都已經死完了吧，我們都這樣想，因此，我們感覺我們實在來得太遲了，早三年來，這屋子裏一定不僅還是有主人，而且一定還很熱鬧吧，現在，怕這可憐的屋主人的骨頭已經腐爛了。

實在沒有地方住，只得在此暫時住下。勤務兵將屋內打掃了一下，把我們帶來的油布和雨衣都鋪在地上，就勉強可坐了，但一種難聞的氣息，依然是時常襲擊我們的鼻官。

雖然是疲倦得很，但時光還只四點鐘，不能不再出去做一點工作。

在附近五六里路之內跑了一轉。此地農村已經全部破產，比駐馬店附近更甚十倍。我們也走了幾個鄉村，但情形都是和我們所住的那幢屋子一樣。小小的茅屋都是沒有門，“夜不閉戶，”倒是此間的特色。屋子裏也照例是沒有一點東西的，大部分的屋主人已經不知去向——大約多數已經不生在人間了。少數——那是絕少數的，雖住有一二個人，但都是去死不遠的半生人。五十歲以下的人是絕對沒有的，年青的女人更不待說是沒有了，因為這正是軍隊裏的野獸們最需要的洩慾器。甚至四十多歲的老婦人，這些野獸們也要揩一揩油。至於男子，自十五六歲到五十歲的，都被拉夫拉去。即沒有拉夫，也遠遠躲避了不敢出來。因為如果不躲避，即使不被拉夫，也無法生活，絕糧是普遍的現象——糧食都被這些野獸們搶去了。

留下來的幾個人，年紀都不小了。實際上，他們與死人的差異，不過在乎他們還有一口微弱的氣而已。他們都是切身受着家破人亡的慘痛，而現在又為飢寒交迫着。糧食幾乎完全被

搜去了，他們現在賴以生存的，最好的是一點黃豆渣，其次就是一些南瓜之類的東西，但這些都還是不容易得到的，所以大部分的食料不能不是樹皮與草根。他們的情形，與其說他們是生活於人世，不如說他們是在地獄裏受罪。

他們的生活情形既然如此，因此每個人的神氣都是和擱在棺材蓋上的久病的癆病鬼一樣，使人見了生怖。我實在沒有方法來描寫他們的非人生活的萬一。

在這樣一個半死人之間，我們除了殘酷的同情以外，還能做什麼呢？我們唯一可做的工作，就是把身邊帶來的乾糧送一點給他們。我們不是來宣傳，成了散賑的慈善家了。

回到大劉莊那兩間破屋子時，已是傍晚時候了。胡亂弄一點飯來吃了，就計劃明天的工作。本來打算明天一早就上遂平去，但因為打聽得附近有一個大寨子——柴家堡，紅槍會很有勢力，而且附近還有許多別的重要的寨子，所以決定明天再留在此地做一天工作。

二十多人擠在這兩間小屋子裏，其擁擠是不用說了，我們把各人的油布與雨衣聯接起來，鋪成一個大床，大家擠在一起睡。

一種難聞的氣息依然時時襲來，而身體睡在潮濕的泥地上，尤其是有一種說不出的不舒服。我忽然這樣很奇怪的思想，

我們為什麼要來這等於不毛之地受苦呢？在武漢不是很舒服嗎？但立刻，我就糾正了這種忘念。“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自己不能吃一點苦而高喊革命，那是騙鬼！

因為沒有大門，所以門外有什麼動靜是隱約可見。最初我們毫不疑慮的大家躺在地上，但忽然發覺門外似乎有人影憧憧。這是一個可驚駭的發現。宣傳隊一位同志忽然想起了白天一個老百姓告訴他的話，他把這老百姓的話報告我，據說此間的雜牌軍隊，實際上就是土匪，他們看見了我們這一批斯文縉縉的人，帶了這許多盒子砲，難免不來打我們主意，何況我們除了盒子砲以外，還有現洋和幾袋麵粉，所以那個老百姓忠告我們須要提防他們來搶劫。特別是夜間，因為他們都是無法無天的東西。這忠告是很重要的，我們都意識到這批等於乞丐的軍人，的確對我們懷有惡意。另一個勤務兵又向我們報告，說那是一個乞丐式的兵士說的，附近的紅槍會很壞，他們最歡喜的是槍，今晚怕要來搶槍。這當然也是一匪值得重視的報告，因為紅槍會繳官兵的槍，在河南是常有的事。於是我深責自己剛才太疎忽了。立刻對全體下了一個命令：

“同志們：我們大家起來把服裝整理好。”

我們全體的動作是很一致的。這二十一位同志都是年青而很勇敢的，他們對於我的意見都很尊重。連我二十二個人，

我們的年紀平均只有二十一二歲，最大的一位不過二十四歲，最幼的是十七歲，我自己是二十一歲（這是照下江算法，實際上還不滿二十歲）了。我們都是有着犧牲不惜的精神，任何危險臨到我們面前都是不足畏的。我們立刻起來穿好了衣服，把各人所佩的武器準備在身邊，一時這破屋內充滿了殺氣。

我們來商議防禦的辦法。

兩種危險都是可能的：十四師的兵士和紅槍會來搶我們的槍。如果十四師的兵士真的來搶我們的槍，我們應該怎樣辦呢？無抵抗地屈服，還是和他們對抗？對於這一問題，有一位同志提出了如下的意見：無論如何，十四師在名義上總還是我們的友軍，如果他們趁他們師長不在的時候來搶我們的槍，那我們只好退讓，因為第一：現在前方即將接戰，如果內部先打起來——雖然是一個小小的衝突，也是在客觀上幫助了敵人；第二：雖然是一個小小的衝突，也是以引起一切雜牌軍隊的懷疑與恐慌，這對於整個軍事計劃上也是不利；第三：大劉莊附近的十四師部隊至少七八百人，他們果真來搶，實際上我們也決不能抵抗，因為只有二十多人，這樣的犧牲是沒有價值的。

他的週密的顧慮很使我們欽佩，但我們立刻全體一致地否決了他的意見。我們全體一致主張如果十四師部隊果然要來搶我們的槍，我們一定要誓死抵抗，我們的理由如下：第一：

革命軍到北方來，這還是第一次，我們做了第一次的先鋒。而且，革命軍之所以異於普通舊式軍隊，就在革命軍有政治工作；政治工作人員到北方來，這是第一次。如果我們無抵抗地為暴力所屈服，這簡直是為革命軍人丟醜；我們決心的抵抗，即使我們二十餘人完全犧牲，但這種犧牲是非常之有價值的，這可以表示革命軍人——特別是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人員的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可以使我們的敵人聞而胆寒；第二：我們承認這些雜牌軍隊是靠不住的，但我們的退讓只有更使他們輕視，堅決的抵抗可以使他們為我們的犧牲精神所懾服；第三：我們在駐馬店出發時，原是抱了決死的精神，事到臨頭而退讓，不僅在我們是一件終身恥辱，而且給以後政治工作人員一個不良的影響。

在這樣意見之下，我們一致地決定抵抗。先前主張退讓的同志，也同情於我們的主張，我們也十分深信這位同志之所以主張退讓，並不是由於他的胆怯，而是他顧慮太週密。這是一位很忠實勇敢的同志，我們對於他是絕沒有絲毫懷疑的。

在這樣決定之下，我們立刻全體動員準備流血，而且派了兩位同志到門外去放哨。

“或許我們在數小時內要全體在此流血。”年纔十八歲的那位同志說，我天真地笑起來。在我的心目中，流血不是悲劇

而是可喜的奇遇。我們全體的精神都極度緊起來。

對於紅槍會怎麼辦呢？紅槍會與雜牌軍隊又有不同，因為第一：紅槍會是民衆；第二：紅槍會沒有雜牌軍隊那樣銳利的武器。因此我們對於紅槍會的策略又須另有決定。如果紅槍會來搶槍，我們定了如下的對策：第一：在原則上不能退讓；但同時，第二：不能對紅槍會取敵對行爲。

這是比較困難的事，因為兩面都要顧到。紅槍會究竟是民衆，如果他們來搶我們的槍，我們究竟不能施以無情的迎頭痛擊，因為在整個政治路線上，我們必須取得紅槍會的同情與援助。無論如何，我們決不能屠殺紅槍會。但我們又不能絕無抵抗地把我們槍交給他們，因為此風一長，我們革命軍人在河南農村中將無法存在，他們都要把我們當作好戶頭而任意搶劫了。因此紅槍會如果來搶劫，一方面我們要取正當防衛，但在儘可能範圍不亂開槍傷人，最好把他們俘虜過來加以教導，再放他們回去。

破屋子裏充滿了殺氣，但事實上，我們的準備都成了無事忙，十四師的兵士和紅槍會都沒有光顧到我們這破屋子來，倒累得我們和衣假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把我們的先遣隊分成四隊，兩隊分赴附近兩個重要的市集去，兩隊由我同了到柴家堡。

田裏長滿了綠油油的麥子，今年的麥很熟，如果沒有戰事，農民的生活倒可以相當的安定一下，但事實上，將熟的麥子只有任戰馬去蹂躪，農民怕拉夫，連麥子也不敢出來刈。

約摸走了十多里路，在前面的大路旁，發現了有紅槍會在那裏放哨。人數大約是三四人，他們望見了我們，似乎有一二人立刻向後跑，但還有一二人在那裏瞭望。

爲避免誤會起見，我們先派了一位同志去向他們解釋，我們隨後跟去。先派去的人交涉似乎是沒有效的，我們到時還在解釋。

兩個壯年的農民，每人都提着一把大刀，但沒有紅櫻的長槍。道旁還豎着一面旗，是××縣××區聯莊會第××隊等字。據他告訴我們，柴家堡今天不是逢期——柴家堡是逢二五八集市的——所以寨門關着，不能進去。我們再三要求進去看看，他們總是婉詞拒絕。經過了再三再四的要求，而且詳細向他們解釋我們的立場，但他們總是不能允諾我們的要求，最後只說讓我們自己到寨上去商量，能不能進寨去，他們不能負責。

我們又向前進，走了二三里路，纔望見那個土寨子。走近了寨子旁邊，寨門關閉着，雖然是一座土城，其外觀也十分雄壯。城門雖然關着，城頭上却站滿了人，旗幟與紅櫻的長

槍濟濟如林。環繞土城還有一條護城河，吊橋已經扯起了，使我們無法過去。這情形是很好看的，這座關着大門的土城，這土城邊的護城河，這曳起的吊橋，這城頭上的旗幟與槍刀劍戟，都像是歷史小說中的圖畫，我們也成了戲劇中的角色了。在經過歐洲大戰的十年後，即在戰爭完全應用化學的今日，想不到中國還有這樣的武器與這樣的防禦設備，這真使我們不相信現在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因為這明明是中世紀的封建城堡與中世紀武裝設備。

我們站在城外和城上的人交涉了半小時，他們去問過了寨長，纔准我們進城，因為他們大約也了解我們並不懷有惡意。

放下了吊橋，開了寨門，由寨長，及其他地方領袖接我們進去。寨內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圍攏來看我們，我趁這機會向他們作了一番懇切的演說，但可是我的不純粹的普通話使他們不能完全了解，而由我們宣傳隊的同志楊士穎爲我翻譯。羣衆對於我們的懇切的態度，顯然是能夠了解而予我們同情的。我們總算不虛此行了。

我們一面講演，一面又分些畫報傳單之類給他們，他們都欣然領受。

講演完了之後，寨長約我們到一個什麼堂（忘記了堂名）

去叙談，這是柴家堡的一個公共議事的地方。寨長和另外幾個地方領袖陪着我們，不必說，這是土豪劣紳的一羣。我們實在有點不願和他們多談，但這種談話顯然是有意義的。

寨長向我們訴說地方上的痛苦情形，還拿了一大疊票紙給我們看，這都是縣知事或募餉委員下的條諭，這些條諭都是寫着奉××司令部諭奉大帥（指吳佩孚）條諭，着某縣派餉（或糧或草或車或牲口）若干，毋稍遲誤等云奉此……着某某鄉限於某日內解餉（或糧或草或車或牲口）若干來縣……等等。我們把革命的意義，革命軍的任務，這次北伐的原因，淺顯地詳細地解釋給他們聽。又詳細問了他們關於紅槍會的情形。談了約摸一小時，打算走了，但他們苦苦留住我們，因為他們為我們準備了一點菜，一定要我們飲酒，却之不恭，我們只得接受了。

擺了兩桌，我被他們很客氣地推在首席。每桌上是五盆菜，但這些菜實在使我不能下喉，這五盆，一盆是兩塊生豆腐，面上稍放着一點粗黑的鹽；一盆是黃豆芽；一盆是半生不熟的青菜；一盆是一點蘿蔔乾；還有一盆要算是最貴重的了，四個煎雞蛋。酒倒是白乾。這幾盆菜，在我實在一點也不能吃，但在他們無疑已是竭盡了他們的力量，罕見的盛筵了。寨長很抱歉地解釋待客不恭的苦衷：

“這實在是該死該死，很冒犯大人們的——他們總是稱我們爲大人，雖然我們曾拒絕過這個肉麻的稱號，仍不改口——但要求大人們寬恕，實在我們這裏覺得太不像樣了。平時我們能有一點粗麵兒吃，已經是不容易了，至於菜，那是經年沒有的……”

一位紅槍會的團總向我們解釋：

“上次吳大帥退走的時候，我們這裏什麼都被帶走了，牲口幾乎完全沒有，這裏現在一共只剩了兩隻雞，今天本想煮來請大人們，但恐時間來不及……”

這些我們都相信是實情。

從柴家堡出來已經將近兩點鐘，又到別的村莊去跑了一遭，到傍晚纔回到大劉莊，又在破屋子裏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來，就向遂平車站進發。

五

這兩天實在很疲倦，但我們的精神依然都是很愉快的。我們穿着草鞋，背着槍，在這初夏的早上。沿着鐵路走，一面賞玩

着偉大的自然景色，一面唱着“走上前去呀！曙光在前，同志們奮鬥！”

太陽漸漸晒到我們身上：我們都把背上背着的大斗笠戴在頭上，依然是唱着歌前進。太陽的威力雖然能夠從我們身上榨出汗來，但絲毫也不能稍挫我們前進的勇氣。我們都感覺到有一樣一點：在拿破崙的字典中沒有難字，在我們的腦筋中沒有怕字。

因為沿途尚須工作之故，到正午纔趕到遂平車站。

我去會了駐在車站附近的暫編第三軍軍長梁壽愷。在第三軍軍部，又遇見了我們軍部的李參謀。梁軍長穿着一件舊得發黑（本來是灰色的）的粗布夾袍，頭髮長得嚇人。這活像是上海馬路旁的落魄的測字先生，不知道的人，誰也不會相信一位統率萬餘雄師的軍長是這樣落魄。

除了梁軍長以外，軍部還有參謀長耿幼麟和秘書長某君。梁軍長對人的態度很和藹，與我們想像中的舊軍閥不同，是不是因為他對我特別客氣，那所就不得而知了。耿參謀長年記還不很大，大約三十一二歲吧，似乎是一個很朝氣的軍人。秘書長是一位老先生，他見了我很不好意思地應酬一下，就像怕難為情似的躲到後房去了。

梁軍長與耿參謀長和我談了好一回，他們的談話全部是

在訴他們的窮苦。這也都是事實，就他們的軍部的外表來看就可以知道。這軍部和安俊才在車上的師部是差不多一樣的狼狽。這本是一所矮小的民房，一共只有兩隻舊爛的白木桌，幾張條凳。軍長的臥室是在辦公室的後一間，軍長，參謀長，秘書長三個亂擺在一起，都是用木板——舊的木板，或在是兩扇舊門，所以高低不平，長短不一——和條凳攔起來，舖上的被褥都是壞得像叫化窟裏拖出來的。他請我吃了一頓午飯——河南是沒有大米飯的，都是吃麵條和饅頭，倒也有三盆菜，這是我們昨天在柴家堡已經吃過了，但這些比柴家堡還壞一點。

遂平車站附近的居民並不多，不是我們工作的地方，所以我們決定到遂平城去。從遂平車站到遂平城裏，還有八里路。梁軍長很熱心的囑咐參謀長替我們打了一個電話（軍用電話）到駐在遂平城內的新編十六師張萬信師長，要他為我們在城內準備一個臨時駐紮的地方。梁軍長還囑他的秘書長寫了一封信給張師長，請他妥為招待我們。我就拿了他的介紹信，同了我們的同志到遂平城去。

在路上，有許多地方已經掘好了戰壕，戰爭的空氣在此地顯然是更其緊張了。

離車站二三里路，就到了沙河邊，我們沿着河邊的大路

走。沙河兩岸長滿了蘆葦，幾乎看不見河中的水。烏鴉成羣的從地上飛到樹上，從樹上飛到蘆葦邊。烏鴉竟是這樣的多，這是我沒有看見過的；我不是生物學家，我沒有研究過烏鴉在什麼地方是因了什麼原因而特別的多，只覺得有點奇怪。

路上遇得三三五五的像乞丐一樣的軍人，這大約是十六師的兵士。他們對我們投出驚異的目光，我覺得他們的目光是含有毒恨的意味，所以我每次遇見這些乞丐般的軍人，總覺得有點不快。

遠遠的可以望見遼平城了，愈走愈近，我們已經到了城邊了。

沙河靜靜地躺在遼平城的腳下，一條很長的石橋架在沙河上，把人們從河的這邊渡到河的那邊，一走過橋，就是城門口。這風景是值得讚美的，沙河流到遼平城腳下，似乎愈見其闊了，兩邊很闊的沙灘，蘆葦也短了許多，沙河的水是清可見底的。遼平城的外觀是很雄壯的，尤其是城碟上的那一桿迎風飄蕩的大旗，愈顯得英氣勃勃。烏鴉依然是多得出奇，漫天飛舞，把這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古城外的景色裝飾得更使人留戀了。城門外還有一座石碑，但已記不起石碑上刻什麼字了。

在城門口，經過了兵士嚴格的盤問以後，纔放我們進城。

另由一個兵士陪這我們到縣公署去，因為十六師的師部是在縣公署。

走過了幾條街，店舖大多是關着門，到處充滿了荒涼的景象，但城內的居民似乎很多——不！乞丐似乎是特別的多，因為來來往往的這些人，幾乎都像乞丐。

我們到了縣公署了，一座廟堂式的舊式建築，正對着大門是一座照牆，照牆上畫着一隻烏龍。

那個領路的兵士先進去通告去了，我們正在傳達室看掛在牆壁間的各種字條，突然聽見裏面猛喝一聲“請！”我們被邀進大堂上去了。

啊啊！那真是奇觀！我們像是到了舞台上來客串歷史劇了。

大堂的正中擺着一張公案，案前繫着一條大紅桌圍，桌上擺着一個插滿令旗的令旗架，一個插滿令箭的令箭架，一個大得嚇人的筆架，兩個筆筒，一支大的硃紅筆，一方大硯，一方戒尺。桌子後面一座太師椅。兩邊是陣列着許多“行牌”，上面刻着“肅靜”“迴避”等類的大字。最足使人發笑的，是兩旁的武器架，架上插滿了大刀，宣化斧，丈八蛇矛，方天畫戟，自然還有三尖兩刃力和趙子龍用的長槍，真是十八件武藝，件件俱全。此外還有個大鼓，大約是老爺上堂和退堂的時候敲的。像這樣

的陳設，我們只有在舞台上和圖畫中見過，想不到民國的縣衙門還是如此！

張師長和趙知事很恭敬的站在大堂上迎送我們。張師長穿着一件灰色的布大衣，也是陳舊得像叫化子穿的一般。趙知事穿着長袍馬褂，比較張師長整齊得多。張師長的面孔很瘦而黑，顴角突出，眼睛凹進，活像吳佩孚——其實吳佩孚的尊容，我也只在相片上看過——趙知事的面色倒是很豐潤，在此人人臉有菜色的地方，獨有這縣知事吃得白白胖胖，可見貪官污吏總不會吃虧。

張師長邀我到他的臥室去談話，趙知事在陪着。他的臥室比梁壽慳軍部和安俊才的師部要好一點，但也僅僅比較好一點而已。張師長的談話，也是集中於伸訴他們的窮苦，而且他請求我替他向武漢政府方面去說項，總要發一點現款給他們纔好。這種請求，我當然是無法效勞，但我對於他們的窮苦極點的境遇深表同情。

張師長又談到前方的情形，據說在離遂平城七八里路的地方，就時常有奉軍的騎兵出沒。奉軍的飛機時常在遂平城天空出現，散下傳單來，但沒有拋炸彈。

趙知事又將縣政的情形詳細地告訴了我，因為我對他提出了許多的問案。

他們本要留我們在縣署住，但我立刻婉詞辭絕了他們，因為如果留住在縣署，我們的行動就不自由了。與民衆更其無法接近了。所以結果還是在一條街上找到了藥店的後院來住下了。

這藥店是兩開間的，但現在並沒有正式開門營業，後院雖不廣大，但在這什麼都落後的河南，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清幽可喜的地方了。一個小小的院子，兩枝石榴樹正開着如火一般紅的花，還有一枝不很大的槐樹，樹上有一個鳥巢，小鳥在樹上唱着很幽美的歌曲。這地方是很使我歡喜的，雖然屋子裏比較暗一點。屋子是三間，正中一間掛着關帝的神像，一隻八仙桌，兩個屋子裏擺着幾張炕榻，這本是藥店主人自己住的，現在讓給我們。我們在大劉莊的破屋子住了兩天，如今到這裏來，真不啻出地獄而登天堂。

藥店主人是一個壯年的和氣商人，頗有些書卷氣而沒有市賸的惡氣味。我們一搬到這屋子裏，我就和他作了一個詳細的談話，那時我們的同志全體動員到城內各處去調查宣傳去了，僅我一人留在屋內。店主人對於我們最初是露出恐怖的神氣，經過我的懇切的解釋，他似乎能夠瞭解我們了。他告訴了我許多關於地方上的情形。這趙知事原是張萬信的軍法官，真是一個壞蛋——店主人最初不敢說，後來因為似乎瞭解我的

確是痛恨貪官污吏的，纔把趙知事貪贓枉法的地方一樁樁一件件告訴我，這是很使我感激的。他又把地方上的紳土的劣跡也大約對我說了。

出去調查的同志陸續回來報告，把這些報告總匯起來，我們已經知道遂平城內政治經濟的大概情形如下：

(一)遂平城駐軍新編第十六師——師部駐城內，城內共駐有該部部隊約五六百人，城內四鄉約駐有一千四五百人，共二千餘人，槍枝有七成，在城內的全部有槍。他們在表面上雖依附武漢政府，而實際上，野心難馴，與奉軍暗送秋波，確已蓄志叛變，絕對不可靠。該師有騎兵兩連，一連現駐城內，城內有大砲多門，戰鬥力亦不可十分忽視。

(二)敵軍先頭部隊，駐在離此四十里之西平縣，但前哨離此最近者僅十五里；敵軍騎兵，時至遂平城附近偵察，與十六師兵士相遇，雙方均不開槍，其有默契可知。敵軍飛機，時來城上天空偵察，散下傳單兩種，這兩種傳單，亦由我們宣傳隊搜羅得到，其中一種題為“告北軍官兵”其措詞如下：

“咱們都是北方人，南軍是專來打我們北方弟兄的，咱們北方弟兄應該一致聯合起來打南軍，繳南軍的槍，殺他們一個精光。

“咱們大帥對弟兄再好沒有，月月關餉，從不拖欠，到咱們隊伍來，有大洋使，有肉吃，有衣穿，大家享樂……”

這種傳單在雜牌軍隊中顯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一種傳單沒有地名，文字也沒有系統，雜亂寫些：

“南軍是專來殺北方老鄉的。”

“南軍一到，就要共產公妻。”

“×××討十七個小老婆，發了一萬萬大財。”

這種宣傳在表面上似乎是笨拙，例如他們還以為×××與武漢政府在一起，但這種宣傳實際上也是起了相當作用，因而：

(三)民衆對於武漢政府及革命軍仍抱着懷疑的態度。

(四)一般的社會經濟已經破產，城內居民甚多之故，係因鄉村不靖；大都避來城裏，城裏糧食，大約還能支持幾二三個月。

(五)城內全無革命羣衆的組織，甚至沒有覺悟的革命份子。但大部分人民顯然有革命的要求，尤其是少數智識分子，他們同情於革命。

(六)相反，土豪劣紳却很有勢力，他們把持了一切地方機關，與軍閥官僚互相結納，魚肉人民。

我們當時立刻開了一個全體會議討論工作方法。我們認為情形異常緊張，因而我們的任務異常重要，我們當前的任務不僅是宣傳，而是各方面的。為適應為目前的需要起見，全體一致通過了我的工作大綱的提案。工作大綱如下：

(一)立刻組織間諜隊，指定熟悉前方情形之某同志負責，雇用地方可靠民衆，派赴西平等處敵軍陣地偵察。

(二)指定某某數同志專任十六師兵士宣傳工作，主要的向他們解釋革命軍無南北之分。此數同志所負的責任，不僅是宣傳，而且負有監視偵察該師態度傾向之責。

(三)以最大力量，發動民衆，其具體方針如下：

- 1、於一二日內召集羣衆大會，鼓動羣衆革命情緒；
- 2、立刻召集城內學生一切智識分子一切同情革命的分子開會，成立遂平革命青年會；
- 3、於最短期內組織商民協會，農民協會，及各種工會；
- 4、公開徵求黨員(國民黨)，期於最短期內成立臨潁縣黨部；
- 5、積極的組織紅槍會。

(四)為準備萬一，應付非常事變起見——因為十六師態度不穩，叛變在即，敵軍又將臨到，不幸之事變隨時可以發生

— 應努力於如下各點：

1、暗中留意忠實可靠的民衆，在城內建立秘密機關，以備萬一發生事變時可以躲藏。此點應指定數同志負責進行；

2、在縣城附近之鄉村，建立同樣秘密機關；

3、立刻派定同志，去車站與鐵路工會接洽。務須經常準備搖車兩輛，備我輩隨時乘坐；此種搖車，非本隊官長，任何人不能動用。萬一遂平車站無此項搖車，則立刻派人赴駐馬店由軍部命令鐵路方面準備，開來遂平車站候用；

4、宣傳隊各同志每人應準備便衣一套，可用公款購置，但購置時必須秘密，以免引起友軍誤會；

5、編暫第三軍梁壽愷部較可靠，應派專門聯絡員長駐該軍軍部。

(五)立刻派員歸駐馬店向政治部報告一切，并接給一切機密。

(六)對十六師態度應與敷衍，但對土豪劣紳決嚴懲，因非如此不足以引起民衆信仰。

這個工作提案通過以後，我們立刻分頭去做。

六

當天我就召集了地方各機關領袖——商會會長、農會（舊式農會）會長、教育會會長、團防局長、水利局長、慈善會會長、自治會會長、公益社主任，還有其他一些土豪劣紳，一共有十七八人。這些土豪劣紳對於我口口聲聲是大人長大人短，土豪劣紳的勾結手段，我實在是很佩服，但是他們的高妙的技藝在我面前就沒有絲毫用處，即使他們都跪在我面前叫我老子，我也決不能給他們絲毫的同情。

我聽取了他們的報告——這些報告雖然是他們一面之詞，但無疑也提供了我們許多材料。我以嚴厲的教訓的態度，對他們作了一番演說，他們都是滿口“是！是！”

第二天一早，又召集城內一些比較進步的青年，一共到了三十一人，其中一部分是縣立高小的教員和高級學生，一部分是初等小學教員，另一部分是留學外縣回來的學生，總之，幾乎可說全是智識份子。他們對於我們的宣傳是熱烈的接受，立刻通過了成立遂平革命青年聯合會籌備會，籌備大規模的進行。同時以革命青年聯合會份子為基礎，成立了臨時縣黨部籌

備處，開始公開徵求黨員。

臨時縣黨部籌備處與革命青年聯合會籌備處的招牌立刻在一個縣立小學校門口懸掛起來，由我們的特別費裏撥一點給他們做活動費，這些一向在死氣沉沉壓迫下的青年都興高彩烈地幹起來。

我立刻又感覺到一種必要的任務，就是辦一個報。遼平文化的落後，簡直到了極點，不待說，城內一向沒有刊物。在這革命開始發動之際，一個定期刊物實在是不可少的，但要辦鉛印的報，勢不可能，好在城內石印店到有兩家，我就指定了兩位同志去負責專辦此事，發行與鈔寫的工作，由革命青年聯合會去擔任，於我們到遼平的第二天出創刊號，一共印了六百張，一散即完。報的名稱即是革命日報，內容是簡短通俗的解釋革命的文章，以及關於遼平及縣外省外的革命消息。

另一種工作的進行也很順利，就是我們將可成立一個馬車夫工會，因為遼平城趕馬趕驢趕車的工人也不少。此外，木匠工會與理髮工會的組織進行也很順利。店員工會的組織，我們曾經化了很大的力量，唯進行不很順利。但一般說來，我們到遼平後的工作進行是很順利的。我們到遼平不過三天，遼平城內到處瀰漫着革命的空氣，把平常死氣沉沉的遼平，居然造

成了一個朝氣勃勃的遼平。革命青年聯合會在我們領導之下，也成立了他們自己的宣傳隊，在街上和四鄉宣傳。他們的宣傳以我連夜作成的適合於遼平特殊情形的宣傳大綱為主要根據，而我們從武漢從帶來的宣傳品，當然也是很有用的。

宣傳品中最發生效力的是畫報，但可惜我們的畫報實在太少了。關於這一問題，我曾與總政治部的當局發生過一點不同的意見。總政治部曾以很大的代價，印了許多革命領袖的相片，這些相片是汪精衛，孫科，唐生智，張發奎，鄧演達五種。我對於這種相片的發行表示極端的反對，我總覺得除了已經死了蓋棺論定的人之外，凡是生着的人，誰都是一不定的，他們今天固是革命，但是誰也不能保障他明天還是革命的。因為我們是唯物論者，我們深信人的意志是由環境決定的，革命者的環境決不能肯定他永遠是革命的。因此，對於坐落着的人，我們決不能來替他們造偶像。我們的宣傳是要民衆認識我們的主張，決不是要民衆崇拜我們的領袖。但總政治部負宣傳責任的同志，絕沒有顧到這一點而印了大批的相片。我反對，反對不生效力，我就主張我們第四軍不用這些相片，但廖主任反對我的意見，他也以為這些相片在宣傳工作上也是必要的。我沒有辦法，只得在從武昌出發那一天把十幾大包相片統統命勤務兵佚子沉在長江中了。我們宣傳隊的同志是全體同情我的舉

動的，雖然爲此事我犯了“個性太強，作事固執”的罪名，但我們第四軍絕沒有一張相片發給民衆，這在我實在覺得是一件快事。

在農村中的工作，革命青年聯合會顯然給了我們甚大的輔助，使我們在農村中的工作進行很順利。

在遂平農村中的經驗，使我們相信紅槍會是可以作我們的友軍的，但這必須有正確的方法去領導他們，我們深信如果能夠在河南久住，那我們一定可以把河南的紅槍會組織得很好，領導他們走上光明之路。

在農村工作中，我們遇到了這樣一個困難問題，即是紅槍會在對我們相當了解以後，向我們要槍。我們當然不能發槍給他們，但不發給他們，又使他們失望。於是我們只能這樣向他們解釋：我們如果有槍，當然可以發給你們，但現在只夠自己用；你們要槍，就要幫我們去繳奉軍的槍。

在農村工作中最困難的是調查工作。如果要問他們有多少田，家裏有多少人，那簡直不行，因爲你問他家裏有多少人，他就以爲你要抽人口稅；你問他有多少田，他以爲立刻就要實行共產了；如果你要進一步問他家裏有幾個男人幾個女人，那更是不得了，因爲這是要來公妻了。因此，即使你問他，他也不會有一句真話對你說。調查工作之困難，對於整個農村工作的

進行當然是一個阻礙。但這阻礙並不是絕對的，我們在農村中的工作並不因調查工作困難而絕無發展。相反，我們的工作進行也很順利。我們正在着手組織各鄉各區的農民協會。

遂平城裏的革命空氣驟然緊張起來，於是引起了軍閥官僚土豪劣紳的恐慌，土豪劣紳奈何我們不得，只得到張萬信那裏去請求他干涉我們，張萬信果然派趙知事來見我，很婉轉地勸我們工作不要“過火”，否則難免激起變化。這是在勸告之中含有恐嚇的意義。我當即很堅決的答覆他：民衆要求革命是環境造成的，革命高潮起來，是任何力量所不能壓迫的，吳佩孚要壓迫革命，所以他只有崩潰；現在民衆自覺地起來參加革命，這正是一個極好的現象，我們只有以全力來輔助其發展，決不能加以壓迫；至於說，怕激起什麼變故，那全是土豪劣紳造謠。即使真有什麼不幸，我們當代表武漢政府絕對負責。

一方面雖然這樣答覆他們，另一方面我們自己不能不戒備，因為近來的形勢顯然是愈緊張了，武漢政府的軍隊向駐馬店集中的任務已經完畢，唐生智張發奎都已經到了駐馬店，所以前方的形勢驟然緊張起來，奉軍的飛機不僅時常飛到遂平來，簡直飛到駐馬店去了。遂平城裏充滿了恐怖空氣。張萬信的態度也愈見不穩了。廖主任從駐馬店來的通報，也要我們立刻離開遂平，以免不測，但我們非至完全不能工作時，決不

離開遂平，因為遂平的工作正在開始，基礎並沒有建築起來，我們如果在遂平繼續領導，則這種運動的發展無疑有一個偉大的前途；如果我們一走，則這剛才出土的革命的嫩芽，決不堪土豪劣紳的摧殘，遂平的革命空氣亦將因我們之一走而消滅，而我們這幾天來晝夜不息地努力的結果亦將前功盡棄。

五月四日的上午，我們在遂平東門外召集了一個羣衆大會。這羣衆大會之所以決定在城外召集的理由，第一，因為城內戒嚴，西南北三門都是關着，僅開東門，城外的人進城不便，而我們的預計，城外有許多民衆要來參加我們這個大會；第二：城內開會有被十六師兵士搗亂的危險；第三：萬一發生意外，城外較有辦法；第四：城內無適當地址。

在上午十點鐘剛敲過，羣衆已到了不少，大約總有一千多人。我們的熱烈的講演，頗能得到聽衆的同情。

在開會的時候，我們預先並沒有通知張師長和趙知事，也沒有邀請土豪劣紳來參加，所以在大會對於城內的土豪劣紳，以及趙知事張師長，都痛下攻擊。這天上午的形勢，似乎比往日更其緊張，一方面因為昨天唐總指揮已到遂平車站來視察過，駐在遂平車站的梁壽愷的暫編第三軍已經向別處開拔，遂平的防軍陷於孤立地位；另一方面因為奉軍的進逼顯然已更深入了一步，所以張萬信反叛的態度也愈加明顯，據早上從西平

回來的偵探——我們派去的——的報告，張萬信的確有代表在奉軍處，所以我們對於張萬信也是處處嚴防。

我們的大會正在熱烈進行的時候，派在張萬信那裏秘密偵察的某君急急來報告我們，據說張萬信聞知我們在城外開會，就召集趙知事及土豪劣紳籌議對付方法，趙知事堅決主張將我們先遣隊的人全體扣留起來，秘密槍殺；張萬信也主張將我們扣留起來。這顯然已到了最後五分鐘的時期了，好在我們的大會將要散會。那時張萬信也打發人來請我去議事，我知道這明明是要將我扣留，所以我當時就在一張名片上批了幾個字：

“刻在開羣衆大會，無暇拜謁，俟暇時當即趨前領教。”

張萬信差來的人走了以後，將大會交給革命青年聯合會同人去主持，我們自己全體立刻離了大會，而且恐怕大路上有障礙，由兩個紅槍會帶我們走小路到達平車站，因為達平車站沒有張萬信的駐軍。

因為走小路要多五六里路，而且路又不好走，所以差不多走了兩個鐘頭，纔走到車站，那時車站上已有一位革命青年聯合會的人在等候我們，據他說，在我們剛走不久，張萬信就派隊伍來捉我們，因知道我們已經走了，又派隊往通車站

的大路追捕，那知我們是抄小路的。同時又立刻關城門搜索。這位革命青年聯合會的同志因為他對於工作很努力，遭了土豪劣紳的忌恨，無法在遂平立足，只得亡命出來跟了我們走。

鐵路工會的同志對於我們的幫助，是很可感激的，他們完全接受了我們上次的請求，為我們留下了兩輛搖車，所以我們一到車站，就得坐上了搖車回駐馬店。搖車的速度，實在比火車相差無幾，不到一小時，我們已經回到了駐馬店了。如果鐵路工會沒有給我們留下搖車，我們也許還要遭張萬信的毒手，因為張萬信雖沒有軍隊駐在車站，但車站上並無別的軍隊，張萬信的軍隊如果沿鐵路追來，我們只有束手待縛了。

在遂平回駐馬店的歸途中，我們遇見了一件很痛心的事，就是總政治部的所謂宣傳列車，浩浩蕩蕩的由駐馬店開來。這所謂宣傳列車裝飾得簡直像皇宮一樣的富麗，宣傳列車上的職員，他們是決不敢像我們這樣冒險到遂平城去工作的，他們

只是在鐵路上開來開去，把宣傳品整箱整篋地從車上丟下來，他們也不管這些地方有沒有民衆，也不管這一箱一篋的宣傳品價值幾何？至於即使這些地方有民衆，但是像這樣整箱整篋的宣傳品丟下來，他們是不是能夠消化？這些他們更是不管的。他們只知道從財務股領了餉，穿了漂亮的嘩嘩的或法蘭絨的軍服，皮鞋與皮綁腿擦得雪亮，把一箱一篋的宣傳品丟在無人的原野，丟完了，任務就算完了。這樣，他們就是頂出風頭的革命家了。這種現象是最可痛心的，“宣傳列車”所謂的工作，好的效果是一點也沒有，而壞的影響却是傳播得很多，像他們這樣把貴重的宣傳品整箱整篋的丟下來，如果沒有百姓看見，倒還好，讓風吹雨打去消化了這些宣傳品吧，如果給民衆看見了，他們只有歎一氣：“唉！我們連麵條兒也吃不起，你們革命軍是這麼闊綽，把這樣貴的東西大件大件的丟在草地上。天老爺真是沒有眼嗎？”——這是我們在駐馬店鄉間工作親自遇到許多農民這樣說的，因為宣傳列車在駐馬店附近沿路也丟得很多。

說起總政治部，真是一件可痛心的事。在二月以前，總政治部倒還有一批比較能夠做事的人，但二月改組以後，總政治部是弄得糟到一場糊塗！章伯鈞主特的宣傳科，尤其不像樣子。他們的工作，都是非常之表面的，而他們的生活享受，完全

是腐化了，我可以說，在武漢政府之下，沒有一個機關比總政治部還更腐敗，還更墮落！

總政治部的主任是鄧演達，副主任是郭沫若。前者我又承認他有相當能幹，雖並不很精明，但我也覺得他是一個可注意的人物，我認爲他是將來的中國的克倫斯基——這是我個人的觀察，正不正確，我不管——在人材缺乏的武漢政府，像他，當然也不能不算是一個人才——所謂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他是一個很肯負責的人，但我總覺得他所負的責任，超過了他的才能。總政治部是沒有辦得好，那是毋庸諱言的。本來在我們沒有出發到河南來以前，我曾發表過一個意見，主張武漢政府應該成立一個警衛軍，即特任鄧演達做軍長。我認爲他是一個很好的帶兵官。但是人微言輕的我，發表的意見並不能引起負責方面的注意。

至於我們的詩人郭沫若，他僅僅是一個浪漫詩人而已，寫些‘我愛蘭也愛梅花’‘我便賤往那西子湖邊，汲取了清麗的湖水一瓶’的所謂“詩”，和“哥哥，摯愛的哥哥”的情書式的小說，倒可以麻醉一部分墮落青年，至於要他來談政治，那至多只能看看人家的“裸體跳舞”。他過去所主持的“總政治部駐贛辦事處”，完全成了一個半死不活的官僚機關。

宣傳科長章伯鈞，據說是一個留德學生，在我們出發之

前，我因為工作關係，曾去請教他過一次，我覺得他是一個書生，他最好是去辦教育，做總政治部的宣傳科長，實在這很不適宜的。

總政治部的職員，那怕他是下級職員，也打着雪亮的皮綁腿，提着皮條，挾着皮包，在路上橫衝直撞，其驕傲墮落，真是達於極點！所以在未出發前在武昌時我就說，像這樣腐化的機關不澈底改組，武漢政存的運命至多不過一年就要崩潰了。

再來看看我們自己，我覺得至少，我們是沒有虧欠。我們在遂平城的工作，雖然結果還是沒有多少成績，但至少，我們已經發動了遂平一般民衆的革命情緒，如果很早就來前方的宣傳列車能夠就像我們這樣到遂平去工作，那一定是很有成績了。

回到了駐馬店政治部，纔知道我們回來得正好，明天一早就要隨軍部出發豫東了，廖主任正要派人來催我們回來。

五月五日的早上，我們從駐馬店出發，至水屯鎮宿營。

從駐馬店到水屯，原只有二十里路，但因為我們宣傳隊要沿途工作之故，到下午纔到。

水屯是一個土寨，寨門上寫着“水屯鎮”三個很大的字。河南像這樣的土寨子是到處都有的，但在我們南方人看來，總覺得別有風味。

寨內有幾條小巷子，但並沒有街市——僅有一爿藥舖，一個茶館。藥舖裏不僅賣藥，也賣雜物。我們政治部就駐藥店內，軍部是駐在天主堂內。

因為明天就要開拔，所以除了宣傳隊的同志去宣傳調查以外，並沒有什麼工作表現，而我們政治部的內部却起了一個風潮。

政治部的職員，雖然沒有政治派別，但從工作及日常生活上，可以分成兩派：我們宣傳科組織科及宣傳隊的同志，一般都很積極，都是很有朝氣的，但總務科却是暮氣沉沉，各種事務工作做得都不能使我們滿意。例如我們出了每月十二元的伙食費，但伙食壞得簡直不能下喉；我們原不一定要吃很好的東西，但既然出了錢，當然就不能太壞，讓管伙食的庶務及伙頭措我們的油，實在不願意。在行軍時候，庶務工作更其重要，如果庶務工作辦得不好，不僅使我們在生活上感受痛苦，而且工作上也要受極大的阻礙，我們宣傳隊的同志就特別感受到這種痛苦。他們都在我面前攻擊總務科；宣傳科與組織科的同志，也幾乎全體對總務科不滿。在駐馬店的時候，我就堅決主張改組總務科，但我們這位廖主任真是一位好好先生，他是主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要他毅然來改組總務科，實在是不可能的事。到了水屯，我覺得這種情形實在再不能長此下去，

否則我們一切工作都無從進行了，所以我決心非立刻驅逐總務科長不可。總務科長劉君原也是一位好好先生，他本人實在是很忠厚，但因為太忠厚了，以致反而處處被部下操縱，不把他趕跑，總務科的工作就無法改善。於是就聯絡了組織科科長葉君，及宣傳組織兩科所屬的各股股長，在政治部的部務會議上，由我首先發動，對總務科劉科長痛下攻擊。於是一趕就把他趕跑了，並由我提議使組織科的葉科長兼任總務科長；我的提議也得了廖主任的同意，我們的“部內革命”總算相當地完成了一部分。

五月六日從水屯鎮向東出發，到楚莊鋪宿營。楚莊鋪也是一個土寨子，地方比水屯更小一點。我們依然是住在一個藥鋪裏，因為沒有床鋪，晚上大家都睡在地上。

楚莊鋪是逢舊曆一四七集市的，我們到楚莊鋪的下一天，正逢着集市，四鄉的農民都挑担到寨上來做買賣，情形倒也有點熱鬧，一共總有二三十副担子，賣的東西是杜布，舊衣服——舊得簡直不能穿的衣服——粗豆腐，粗豆腐干，豈芽菜，青菜，蘿蔔乾，菜油，糖糜，櫻桃等等，魚與肉是絕對沒有的，賣雞蛋的也只有一個，那還是他知道我們軍隊到了，纔拿來買的，平常連買雞蛋的也絕無僅有。

在市場情形及一般人民生活中，發現了如下的幾個特點：

一、物物交換的方式還是存在，我親看一個人以舊衣服去易饅頭，還有一個人以豆腐去易青菜；二、不用鈔票，任何紙幣都不能用，現洋與銀角子也完全沒有，所用的都是當二十的大銅元及小制錢，據說此地鄉人往往有幾十年不曾見過銀元鈔票的；三、地方上沒有火柴，一般都是用舊式方法取火，以火刀火絨火石打出火來；四、燃點煤油的亦絕無僅有，大都以菜油豆油等類的植物油燃點取光。

如果我們以一個經濟學家的眼光來觀察楚莊鋪的經濟狀況，則完全還是中世紀的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形態。這自然不僅楚莊鋪如此，河南最大部分的地方是與楚莊鋪一樣——甚至更落後些，因為楚莊鋪還是附近鐵路（京漢綫）的地方，其餘偏僻地方，自然是更加落後了。

自從武昌出發以來，還沒有吃過一點水菓，在楚莊鋪看見了鮮紅的櫻桃，覺得比什麼還可愛，買了一大籃，立刻被大家一搶而光。那個賣櫻桃的老鄉找到了我這位主顧，簡直歡喜得像接到了財神菩薩，因為我給了他一塊雪亮的洋鈔，簡直是來袋裏素來沒有過的寶貝。他知道我們這大批人吃一籃櫻桃實在是不夠，所以他預約我們立刻再回鄉去採來賣給我們，這在我們當然也是需要的。晚上，他又攜兩大籃來，吃得我們有的人簡直流出鼻紅來了。

此地沒有郵政局。我們住的藥店就是楚莊鋪的郵政代辦所，有一隻郵箱，每隔一天，由駐馬店派人來收一次信，我趁此機會寫了許多信寄出去。

前方軍事行動已經開始，我們在楚莊鋪住了兩夜。

在到楚莊鋪的第二天，我同了我們宣傳科與宣傳隊的幾位同志，去拜訪住在我們駐紮的藥店斜對面的紅槍會領袖趙猛虎——猛虎！一看這個名字就有點嚇人，何況他又是上蔡西華等五縣二三十萬紅槍會的總領袖，當然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我們想。

楚莊鋪的屋子全都是土屋，但趙猛虎的住宅是例外的，這是一所建築得很堅固的磚牆房子，面積也很大，似乎裏面有廳有樓，還有花園。楚莊鋪所有的民房全給我們隊伍住滿了，獨有趙猛虎的住宅門前貼有張發奎的條子，寫着“無論何項軍隊，不得在此駐紮”，所以房屋雖大，而丘八却是一個也不敢上門，猛虎之威，一至於斯，真令人凜然！

大門是緊閉着，敲了好久，纔有一個鄉人來開了門，我們說明了要會趙猛虎的意思，但這位老鄉却很不客氣的答覆我們：“我們老爺沒有起來，請你們等一下來。”宰相家人七品官，這句話真是不錯，猛虎之威既如此，其家人自然也非庸流可比了，但我看了一看表，已經十點四十五分。“你們的老爺

怎麼到這個時候還不起來？你去告訴他，外面有幾位大人要見他。”我命令似地對他說。因為他太慢客了，使我覺得這個土豪劣紳——河南紅槍會的領袖，大部分是土豪劣紳——實在太可惡了。他的僕人把老爺兩個字說特別響，我也故意把大人兩個字說得特別響；自稱大人，這在我還是生平第一次，我自己想想，也好笑起來了，我總是不脫孩子氣。

給我一喝，這老鄉的態度倒反溫和了許多，他以懇求的態度請我原諒，因為他主人睡的時候，無論如何他是不敢去通報的，所以我們也只得下午再來拜訪了。

因為我們要去瞻仰這位偉大的領袖——連名字也偉大得嚇人的趙猛虎，——所以雖然上午碰了一次釘子，下午還是去訪問他。

一敲開門，仍是那個老鄉招待我們進了書齋，他去通報他主人去了，據說他主人正在吸鴉片，還沒有過足癮，所以又要勞我們相待一下了。“怎麼猛虎也要抽大烟？”我們想想覺得好笑起來了。

這書齋裏倒也放着幾部書，我翻來看了一看，一部是不完全的三國志，還有一本是說唐演義——是薛仁貴征東的故事，一部殘缺的岳傳，還有幾本是麻姑相術一類我們所不能了解的書，只有一部水滸傳是完全的。

猛虎終於出現在我們眼前了。在我們沒有見過他面的時候，總以為他是一位魁梧奇偉的大丈夫，和說唐演義上的蓋蘇文差不多，一定也是“身長一丈，腰大十圍，頭如巴斗，眼似銅鈴。”那知竟是一個身短不滿五尺，而且身體瘦小得怪可憐的，面孔臘黃，像是一個癆病鬼，牙齒和嘴唇被鴉片薰得墨黑，眼淚與鼻涕交流着，那是什麼猛虎？簡直是一匹垂死的癩狗！

但是，我們還存着不可以貌取人的古訓，所以很莊重地與他接談，但是他的談話實在使我失望。我纔知道他之能做五省紅槍會的總領袖，並不是他有什麼驚人的本領，不過因為他的土地多。像這種可惡的土豪劣紳，簡直可以立刻拿出去槍斃！

五月八日自楚莊鋪出發，從此以後，我們完全在過着作戰時期的行軍的生活。

我們第一縱隊是擔任右翼，唐生智自己在京漢路正面指揮。正面和左翼的消息我們不很知道，但遼平城裏張萬信公然

反叛，在遂平城上開砲轟擊遂平車站的事，我們在楚莊鋪已經知道了。

我們的二十五師包圍了上蔡城，奉軍富雙英在上蔡城閉門堅守，不易攻破。我們軍隊在十里鋪，在臥龍岡，在東洪橋與西洪橋等處作戰，節節勝利。在這幾次戰爭中，我們宣傳科和宣傳隊的同志天天在火線上和作戰的兵士在一起。我們的工作不僅是宣傳，而且偵察敵情，救護傷兵，凡是參謀處軍醫處副官處的工作，我們也統統代做。尤其是對於鼓勵士氣這一點上，政治工作人員盡了極大的努力，也得了極大的效果。

在別的軍隊，政治工作人員被兵士罵為“賣膏藥”“吹大砲”“無聊”，但我們四軍政治部的職員，却能夠得到士兵與下級官長的信仰，因為我們那種堅忍刻苦努力奮鬥的精神，深信就是最頑固的人也要被我們感化。

東西洪橋之役，戰事非常劇烈，我們整天整夜的奔走於火線與後方之間，一時，我們跑到火線上的戰壕中和士兵說說笑笑，鼓勵他們作戰的勇氣，一時又退下來去幫同救護受傷的官兵。因為受傷的人太多了，軍醫處的担架隊不夠應用，於是我們全體動員到農村去請老百姓幫我們的忙，我們的宣傳使最頑固的農民農婦也為我們所感動，我們不必拉夫，自有成羣的農民自願為我揹抬傷兵，農婦自動地為我們烹茶煮粥；我們不

必拉車拉牛，農民自願將他的牛車小車以及板門索子之類的東西借給我們槓運傷兵，受傷的官兵因為我們救護迅速而減少了許多痛苦，軍醫處原有的救護隊與担架隊反而成了我們的不重要的副手，聽我們的指揮。同時，我們還在陣地捕獲了許多敵探，另一方面我們也派了許多偵探到敵方去。我們在這一方面的努力，使參謀處的偵探反而極不重要，反而處處要來請教我們。副官處與隊伍中的特務長遇到了什麼困難——例如他們在農村裏買不到柴，找不到快子，也要來找我們宣傳隊幫忙。副官處與特務長在這個農村裏買不到柴，但我們宣傳隊一到，農民就很踴躍地把柴拿出來了。農民只要看見了我們宣傳隊的白旗子，都歡喜圍攏來聽我們“講道”。軍部的各部處都把我們宣傳隊看做是萬能的機關，他們有什麼困難事都要找我們幫忙。因為兵士和民衆都信仰我們，所以我們在軍隊與民衆之上建立了極大的權威。

這些兵士是非常可愛的，他們在戰壕中還要翻閱我們發給他們的小冊子。受傷的兵士被擔架隊抬回來，在半路上遇見了我們政治部的官長，就不顧他們的肉體疼痛，舉手喊着“敬禮！”。這都是表示他們是受過長期訓練的良好的士兵。

東西洪橋戰事結束以後，縱隊司令官張發奎召集四軍及十一軍的高級將官開軍事會議，張發奎對於我們的工作表示

極度的滿意，他說我們是在墾荒田；本來是不能生產的荒田，經過我們不辭辛勞的努力以後，居然獲得了很好的收穫。

在西華縣屬的華坡鎮，我們還做了一件極痛快的事。

當我們軍隊過華坡鎮的時候，鎮上的警察所長馮國壁設盛宴來招待我們的高級長官，黃琪翔也稱讚他很能幹。後來我們秘密調查，纔知道馮國壁是一個最壞的傢伙，平時魚肉人民，無惡不作，華坡鎮上的人，都是恨之刻骨，但因為他有十幾枝槍，而且與地方防軍又勾結得很好——當時駐華坡鎮的是奉軍一個姓趙的團長，他把他的兒子過繼給趙團長，於是他的地位更其鞏固了。

我們召集鎮上的人民談話，他們的唯一的要求就是撤換馮國壁，但黃琪翔對於這事不表同意，因為他吃了馮國壁一餐魚翅，就上了他的當了。我知道這事體非斷然處置不可。我們決不能忽視民衆的要求，但自己又無權撤換馮國壁；如果不理民衆的要求。則我們以前對民衆所發表的一切言論都成了不兌現的支票，都成了欺騙；但如果自動趕跑了馮國壁，又違反了命令。

第二天，軍部離華坡繼續前進，因為今天的宿營地——楊河——離華坡很近，所以我們宣傳隊決意留在華坡開過了民衆大會後再走。

羣衆大會開會了，我特意拉了馮國壁也去參加這次大會，他雖然不願去，但又不能不去。我另外又派了幾位同志監視警察所的警察，因為他們是馮國壁的心腹，而且各人都有武器，如果事情做得不好，真是畫虎不成反類乎犬。

我們到了大會場上，羣衆已有四百多，因為在事前我早已給了他們一種暗示，所以大會場上的空氣很緊張。馮國壁也是一個老奸巨滑的人，自然也不是毫無準備，他不僅自己帶着手槍，而且會場上有兩個持槍的警察暗中衛護。

我一面要馮國壁站在台下羣衆中，一面又暗示我們宣傳隊的同志監視他及他的警察。我自己第一個跑上台去講演，大意說我們革命軍是為民衆解除痛苦而來的，誰給民衆以痛苦，我們就要打倒誰，民衆也應該自動來打倒這種壓迫你們的人。我的富於煽動性的講演立刻引起了巨大的騷動；講演還沒有完了，台下一聲喝打，馮國壁已被幾個壯漢扭倒在地下了。持槍的警察想上前來救護，我立刻命令宣傳隊同志繳了他們的槍，一面把馮國壁所佩的手槍也繳了下來，喝住了民衆，但馮國壁已被羣衆打得鼻破眼腫，滿面流血，在地下呻吟，爬不起來。

事情應該怎樣結束的呢？民衆要求立刻槍斃馮國壁，我並不是沒有這種勇氣，但環境是不容許我這樣做的。我只能允許

羣衆把馮國壁趕跑，護送他出境，但有一個條件，要他把槍及所中公款立刻繳出來。槍是已經被我們繳出來了，這點不成問題，但他不允許繳款。後來在他的臥室中抄出了三千五百七十餘元。我們就把這筆款子當衆分給了地方上窮苦的人。把十二支步槍交給了紅槍會，將地方警察的任務也交給紅槍會負責——我之所以把槍械交給紅槍會，這是到會四百餘羣衆一致的要求；不過馮國壁自己佩帶的那支德國手槍，被我揩了油，因為我自己的左輪實在嫌大，而馮國壁這支曲尺，倒是一支上等的德國貨。

這幾個警察，願意跟我們走的，就跟了我們走；不願跟我們走的，每人發了五元遣散費。

這樣。我們總算爲地方上除了一個大害。民衆對於我們這樣的處置，表示熱烈的同情，就在歡呼慶祝聲中，我們離了華坡鎮了。

九

我們預料在逍遙鎮當有一番劇戰，但是出乎意外的，我們

的軍隊還沒有到逍遙鎮，駐守逍遙鎮的奉軍軍長趙恩臻就向後跑了，所以僅僅是一次小小的接觸，我們就很快地佔據了逍遙鎮了。

我們進逍遙鎮是在夜間，因為謠傳逍遙鎮附近還埋伏有敵人，所以十分小心地緩緩前進。天空塞滿了黑雲，一灣新月有時從黑雲中探出來，但立刻又躲到黑雲裏去，宇宙依然充滿了黑暗；我們為怕被敵人窺見，不敢點馬燈，也不敢用電炬來照，在黑暗中摸索着。路是沿河邊的，很狹，又是高低不平，真是難走！稍為不小心，就會跌到左邊河裏，或是跌在右邊的泥溝裏去。

走走，停停，在黑暗中經過了兩小時的掙扎，終於到了逍遙鎮的城外了。在將進城的時候，忽然傳說奉軍於退走時在城外埋有地雷，於是隊伍又停止前進了，又經過了一小時的紛擾，纔進了城，並沒有發見地雷，也沒有遇到危險。

進城的時候已有十二點鐘了，在黑暗中約略可以看出逍遙鎮的城垣是很宏偉的，街道也很寬闊，但很荒涼，兩旁屋簷上掛着的馬燈發出黯淡的微光，可以照見這荒涼的街道上東倒西歪的躺着的屍骸，我們經過的那條街，這種屍骸大約有十幾具，因為賀龍的獨立第五師在這裏與奉軍作了巷戰。

我們實在奔走得疲勞到了極點，一進城，總務科為我們找

到了宿營的地方——一所古廟，我們一跑進去，就倒在地上睡熟了。第二天醒來，纔知道我的身邊躺着一具屍骸，他的創口是在胸脯，大約是負傷後逃到這廟裏來纔死的。那一雙眼睛睜開了，實在有點嚇人。這不幸的死者，本是我們的敵人，但這時竟引起了我的同情之感，我望他胸前那已經凝結了的赭色的血，幾乎淌下淚來了。

一起來就開始工作，首先找到了一個藥鋪作部址——自從出發以來，往往是住在藥鋪裏，在遂平，在水屯，在楚莊鋪，都是如此，藥鋪竟和我們結了不解之緣。

把地方上的領袖——當然是些土豪劣紳——找來，鎮長，寨長，保衛團總之類，一共到了八九人，開了一個會，把地方上的善後責任交代了他們。這些土豪劣紳們都是穿着粗布大褂，恭恭敬敬地對於我們開口大人，閉口大人，真是肉麻得很，

我們宣傳隊裏得到了地方人士的密報，說那姓趙的保衛團長家裏私藏有大批槍械，並且還訴說了他平時的許多劣跡，我們得了這消息，立刻全體動員去搜查。到了他家裏，他很恭敬的迎我們進去，我向他說明了我們是來搜查軍火的來意，他似乎很驚慌地否認他家裏私藏軍火，並且對天設誓。這當然不能阻止我們搜索的進行，我指定了兩位宣傳隊同志把他監視之後，就開始搜索，屋裏房間很多，也有一二處擱樓，還有一個

地坑。我們十多個人，從正午十二時搜起，一直搜到下午五時，把所有的房間，閣樓，地坑都搜過了，但是還沒有一點影子。這位被監視的團總見我們勞而無功，露出齷齪的勝利的微笑。但我們並不因而就停止的搜索，因為我們深信老百姓們告訴我們的是千真萬確。

地面上的搜索既無所獲，乃轉而注意於地下。楊上穎君在廚房裏搜索的時候，發現廚房地面上的土不結實，似乎底下掘有洞，我們拿槍托子在土上敲幾下，殼殼有聲，顯然土下還有一層板，板下當然更有東西。於是，我們立刻覺得秘密已被我們發現，槍械一定是藏在地下了。十幾位青年同志經過了五小時的搜索竟一無所獲，未免有點不快之感，一旦發現了秘密，當然都是興高彩烈，如哥倫布發了新大陸一樣。但我們實在不善於掘地開洞，所以又寫條子到軍部工兵營去要了五六個工兵來幫我們開掘。那團總的母親，這老婆子堅決反對我們開掘，但我們當然是非開掘不可了。工兵一動手，立刻發現了土下的一層木板，把木板一掘開，原來裏面却是一具棺材。

● 已經是太陽下山的黃昏時候了，廚房裏異乎尋常的黑暗，我們雖然有十幾支電炬，但總還是陰森森地如入地獄。當一具棺材出現在我們目前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毛髮悚然。本來我們在戰場上已經看慣了屍首，並不覺得什麼恐怖，不知道為什麼

這具棺材是這麼的可怖。這意外的發現對於我們幾個年青人是一種極大的打擊，在那那間，我們都看呆了。

那老婆子忽然大哭起來。她的哭聲倒是覺醒了我們的精神，我們把她喝住以後，就命工兵把棺材起了起來。這棺材顯然還藏埋得不久，據老婆子說，裏面裝的是她男人的屍骸，但我們却斷定裏面裝着軍火，在經過了片刻間的協商以後，決定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棺材打開來看個究竟。工兵在我們的命令之下把棺材開了，天哪！這是多麼難聞的臭味啊！

我們大家不約而同的跑到了院子裏，工兵又從新把這的確裝有死人的棺材蓋蓋上，我們的檢查至此可說是完全失敗了。本來還想再繼續搜索，但料來也是無用；而且因為鄧演達到了逍遙鎮，廖君派人來找我去見他，於是只得就此結束了這一工作。白辛苦了半天，結果是一無所獲，想起來實在有點不值得，但這種勞而無功的搜索，對於那個當團總的土豪顯然是一個極大的打擊，不知道他怎樣處置那被我們打開的他的老子的棺材。“無罪開棺當斬”的律例，對於我們當然是不生效力的，這保衛團總平日魚肉人民，無惡不出，如今被我們打開了他老子的棺材，但對我們又沒辦法，在他當然是憤恨，傷心，在我們看來却是一件快事。民衆知道我們搜索了團總的家，而且知道我們掘開了團總老太爺的棺材，都表示出幸災樂禍的神

氣，也可知道這土豪平日之無惡不作了。可惜我們還不能過分的處置土豪，照我們的心裏，簡直不管他有沒有私藏軍火，處分了他再說，但我們沒有這權力。

跟了廖君去見鄧演達，縱隊司令官張發奎也在座，鄧君纔從武漢後方趕來，他告訴我們武漢平安的消息，這使我們十分愉快，因為前幾天從後方傳來了許多不利的消息：據說長沙有一個小小的團長（後來纔知是許克祥）反了水，居然把長沙城裏鬧得天翻地覆。夏斗寅也反水了，而且將近打到武昌，中央獨立師去迎擊，打了一個大敗仗，葉挺坐了飛機去指揮，又從飛機上跌了下來，受了重傷。楊森也反水了，從宜昌打了下來。朱培德在江西也有反水的消息。甚至信陽的紅槍會也和我們搗蛋，掘斷了京漢路，幾次包圍信陽城，使我們與後方交通隔斷。這些不幸的消息是同時傳到的，而且是由負責任方面傳來的，當然不是謠言。鄧演達帶來的消息是這樣：一、長沙許克祥叛變，問題甚小，已經解決；唐總指揮（生智）對許之異動決嚴辦，長沙現在安靜如常。二、夏斗寅反水，確已打到距武昌城只四十里之紙坊，但經葉挺之二十四師及侯連瀛之中央獨立師（即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學生組成）擊敗，葉師長（挺）墮機受傷的消息，全然無稽，現在武漢安如泰山。三、楊森叛變，亦係事實，但楊部烏合之衆，實力甚微，不足為患。四、朱培

德反水消息不確，因朱主席(培德)近與共產黨發生一點誤會，外間卽有此誤傳。五、信陽問題已經解決，京漢路通行無阻，後方給養，源源接濟，絕無問題。關於紅槍會問題，中央已決定編爲“人民自衛義勇軍”，並派唐總指揮生智爲人民自衛義勇軍總指揮，于委員樹德爲黨代表。六、關於前方情報，因1、馮總司令(玉祥)已出潼關，所部已包圍洛陽，卽將佔領；2、河北天門會暴動；故奉軍或將退至黃河以北，我們與第二集團軍(馮玉祥部)會師鄭州開封，不成問題。七、中央計劃，在佔領鄭州開封以後，以第二集團軍全部渡河北伐。第一步目的在佔領順德，第二步佔領保定，第三步佔領北京。以第四方面軍(卽武漢北伐軍全部)沿隴海路東進，第一步佔開封，第二步佔徐州；另由武漢方面編東征軍沿江東下，會同攻克南京，再與第二集團軍會合取北京天津。

在談到前方政治工作的情形時，郭演達對於我們四軍政治工作同志表示極大的敬意，他說像我們這樣不辭勞瘁的努力，雖蘇聯紅軍政治工作亦不多讓。張發奎也說我們的精神極可佩服，不過他以爲我們的手段未免太嫌激烈一點，這就是說我們太得罪土豪劣紳了。他對於我們今天搜查那保衛團總家裏的情形，尤其是開棺檢查一節，表示未免過分，非必要而引起反感。郭氏對此事不表示意見，但我聲明在政治部同人對於

這種工作，不僅認為是有意義而且是必要的，因為我們的最大任務是在取得民衆，民衆的要求是懲辦土豪劣紳，所以我們不如此就不能取得民衆的同情與擁護；我們要取得民衆的同情與擁護，必須無情地打擊土豪劣紳。如果我們怕得土豪劣紳，因而與之妥協，則民衆必然會離開我們。我們如果要民衆，就非與土豪劣紳奮鬥不可；如果要與土豪劣紳妥協，只有與民衆爲敵。民衆與土豪劣紳兩者，只能取得其一，如果一面要與土豪劣紳妥協，一面又要利用民衆，結果是兩者不得其一。要民衆呢？還是要土豪劣紳呢？當然我們是要民衆的，因此我們就要打擊土豪劣紳。這就是我的決不遷就的主張。鄂氏對於我的意見以爲大體是對的，但張氏却以爲在行軍期間，與土豪劣紳太爲難了也是危險。

第三天，我們的隊伍還沒有開動的消息，我們又在逍遙鎮做了許多宣傳與組織的工作。

如果以一個有閒階級的遊歷家的眼光來看，那末，在這枯澀的河南，逍遙鎮的風景是值得讚美的。尤其是北門外，那一條清可見底的河水，在河南實在是少有的。古老雄偉的土城映在水中，這已經是一幅絕妙的圖畫了，何況對岸還有一座小小的土山，雖然小得簡直不能稱之爲山，但在這一望平原的豫東，這小小的山已經是罕有的寶貝了。山土旁邊還有一座古

塔，與逍遙鎮古城遙遙相對，成羣的烏鴉由塔尖上飛到城碟上，又由城碟上飛到土山的樹木上。這樣，景緻是更其可觀了。但煞風景的是河裏躺着許多浮屍，這是奉軍在退出時渡河被擊斃，或自行落水死的，經過二天的浸淹，屍體大得嚇人，臭氣從風裏一陣陣吹來，有點使人惡心。烏鴉成羣的集中到浮屍身上，啄食那不能時常嘗到的異味。這種情形，我實在有點不忍看，不敢看，可是我們愛好游水的南國健兒，他們成羣地在這浮屍極多的河中戲水游泳。大約因為他們從軍甚久，轉戰十餘省，所以屍骸看得太多，也不以為意了。

我們是五月二十三號晚上進逍遙鎮的，二十四二十五兩天，都在逍遙鎮休息。二十五日晚上，軍部發來了奉命西進的通報。本來我們第一縱隊的任務是擔任右翼，即東路方面，我們初意以為將由逍遙鎮直搗開封，但因為敵軍集中京漢路正面，唐生智直轄部隊在正面劇戰數日，不能取勝，故撤調我們至正面參加作戰。二十六日清晨，由逍遙鎮出發，向臨潁前進：

路經宋莊的時候，獲敵人遺械甚多；這天下午，到達臨潁縣屬的某村，因為前面已有敵人，軍部即在樹林中逗留不進。下午六點鐘，雙方即在瓦店十里頭一帶開始接觸了。

在瓦店及十里頭的敵人，是本軍的精銳十一軍，在本軍中也有鐵軍的榮譽；還有張學良一部分軍隊，人數在五萬以上，河南奉軍，已全部集中於此。在敵人的初意，原擬一舉而擊破我們正面，由漯河鄆城長驅直下，佔領駐馬店，下信陽出武勝關，直迫武漢。所以這次的戰爭，實是我們到河南以來的最劇烈的決死戰。從二十六日下午六時開始接觸，當夜劇戰了一夜，二十七日又整整的劇戰了一日。我們所有的部隊都調來增援上去，但形勢還不很順利。七十七團團長蔣先雲在陣地上受了傷，救護下來，本打算送到黃埔後方醫院去，但剛離開瓦店，就死在路上了。他之死，實在這次北伐中的最大的損失。

他的名字，我在初到黃埔的時候就知道了，但我和他第一次見面，是一九二七年一月間在南昌的時候，後來我和他先後來了武漢，在武漢也見過幾次面。在出發以前，在武昌中山大學的山上最後看見了他一次，這次我們談話談得特別多，那時他的夫人剛纔去世，他對我說，他現在一無掛累，這次到河南，或許是不能回來了。果然，他現在死了，在他，當然是沒有什麼遺憾，每個革命戰士都應該是視死如歸的。

他是湖南人，沒有受過充分的教育，大約在中學還沒有畢業就離開了學校。他在學校中，是年齡最小的一個，但他是全校學生的領袖。他的確有特賦的天才，無論在一個什麼羣衆中間，他總可必做他們的核心。一九二二年就加了SY，後來在安源礦山裏做工，也做了礦山工人的領袖。一九二四年到黃埔軍官學校肄業，第一期畢業，是黃埔生中最有聲譽與最有天才的一位，校長蔣介石特別器重他，視他如弟，所以在廣州時，一班朋友都戲呼他爲蔣少帥。廖仲凱也很器重他，說他是黃埔生中最可造就的人才。一九二五年秋二次東征的時候，他被任爲連長，這連人是這一團中最壞的一連，而且他是在陣地受命去做連長的，在別人，到這連上都要感覺棘手，但是蔣先雲去了不久，就把這連人整理得非常之好，在打惠州的時候，作戰很勇敢，他也受了傷。一九二六年中山艦事變後，回黃埔軍校任政治部秘書，後來隨蔣北伐，任蔣的機要秘書。當時一班人對蔣的觀察已經很壞，以致說先雲甘心做蔣的走狗，先雲自己也極不願意跟了校長走，但他在校長左右做事是CP派去的，所以他向CP請求調工作，CP不准，他只得任勞任怨地做下去，直至寧漢分裂時止。曾一度在武漢訓練糾察隊，在北伐軍出發河南前不久，纔被任爲七十七團團長。七十七團是隸屬於十一軍二十六師的，可說是張發奎系統下的最壞的部隊，但經過先雲的

短期的訓練以後，很有成績。這次在十里頭作戰，七十七團擔任正面，支持三十小時以上，三個營長死了兩個，一個帶了花（受傷）；九個連長死了六個，參謀長也帶了花，但先雲還要支持着，以待二十五師援軍的到來。七十七團的任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七十七團一退，則我們軍隊無疑地只有完全潰敗，所以先雲總是支持着。二十七日中午的時候，他帶花了，傷口是在左臂，不很重，所以他還是帶傷指揮。四點過後，第二次帶花，傷在腿上，團附請他避往後方休養，他不肯，仍在指揮抵抗，夜裏九點鐘的時候，第三次帶花，這次傷得很重，因為是傷在胸口，仆地不能起立，把他從陣地上拖出來時，已不省人事。張發奎知道先雲受了重傷，立刻異常驚惶地找軍醫處長親自妥為看護，抬往黃埔後方醫院，死在路上了。張發奎知道了他的死耗，為之揮淚不止。

二十五師增加上來以後，陣容轉變，又經過了一夜的劇戰，終於在二十八號早上把敵軍全部擊潰了。但這次我們的損失非常之大，單是十二師一師，官兵死傷的總數在八千以上。張發奎黃琪翔損失了這許多實力，流了許多悼惜之淚。我們政治工作人員也是整整的兩天兩夜沒有睡覺，而且沒有好好兒吃一頓飯。時而跑到戰壕裏去鼓勵士氣，時而又跑到後方去找大車找担架來抬傷兵，可以說比在戰壕的官兵更辛苦百倍。

二十八號的午刻，我們進了臨穎城，沿途的屍首，多到不可計數，真是可謂屍積如山，血流成河了。

十一

政治部住在臨穎城裏的一個女學校裏，但這校裏從門房到校長，教職員與學生，逃得影子也沒有了。

雖然我們已經兩天兩夜沒有睡眠，但臨穎城裏的新環境使我們興奮，尤其是各種工作使我們的精神緊張起來。宣傳隊立刻開了一個會，決定了如下的工作綱領：一、立刻派遣一部分同志在城內各處作精密的調查工作；二、大部分同志出發講演分散宣傳品；三、臨穎民衆對於我們沒有深切認識，除加緊宣傳外，並決定發行日報一種，決定明日（五月廿九日）創刊；四、後日爲五卅兩週年紀念，決定召集羣衆紀念大會，立刻籌備，作擴大宣傳；五、因爲我們在臨穎有相當時期停留，所以決定除努力擴大宣傳外，並努力於下列組織工作：1、限於五日內成立臨時臨穎縣黨部籌備處；2、限於三日內成立臨穎革命青年聯合會籌備處；3、於最短期內，成立各種工會及商民協會；

六、爲擴大宣傳，特別是擴大後方宣傳起見，擴大四軍通信社組織，請廖主任徵調各師政治部派員來軍政治部協辦；七、我們雖然自信很努力，但在工作上還發現許多缺點，特別是各軍各師的政治工作人自爲戰，總政治部因領導不得其人，工作完全失了作用，爲增加工作效率起見，請求廖主任與十一軍政治部徐主任協商（在出發前，總政治部鄧主任指定十一軍政治部及獨立第五師政治部在前方的工作，由廖主任指導），召集第一縱隊全體政治工作大會，協議一切。

在這樣的決議之下，我們全體動員去分頭工作。

在臨潁城裏的政治部，除了我們四軍政治部及四軍所屬的各師政治部而外，還有十一軍政治部及其所屬各師政治部；三十五軍政治部，第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政治部一部分，總政治部一部分。但是真正能夠實切進行工作的，只有我們四軍政治工作同志。

我們各種工作的進行都很順利，臨潁城裏的十幾個進步的青年立刻就團集在我們的週圍了，他們平時受了軍閥統治的壓迫，所以對於我們是十分熱烈的同情。我們立刻就成立了臨潁革命青年聯合會籌備處。這些青年同志在工作上給了我們極大的幫助，他們幫助我們去分散宣傳品，幫我們去號召羣衆來參加五卅慘案兩週年紀念大會，幫我們繕寫標語，幫我們

印刷日報。而且又由這十幾位青年找了許多店員，手工工人（此地無機器工業），小學教員等，參加我們的工作，我們的週圍立刻團集了五六十個極努力工作的臨穎人。

十一軍政治部和三十五軍政治部都願意來和我們合作，進行一切工作，所以我們在人才方面倒不感缺乏，不過在指揮方面總有點不能一致，所以一切工作還是以我們四軍宣傳隊作主幹。

到了五卅那天，我們的工作已略有成績：日報已經發行了二天；革命青年聯合會籌備處已經成立了；商民協會籌備處已決定在六月一日成立；縣黨部籌備處亦定六月一日成立；縣農民協會籌備處在六月五日前成立。臨穎羣衆對於我們革命軍顯然已有相當認識，他們已不害怕我們而歡迎我們了。我們號召的五卅兩週年紀念大會，顯然得了偉大的成功。會場在火神廟，原定十二點鐘開會，但到十點鐘，已有不少羣衆參加，到十一點鐘，會場差不多已經被羣衆塞滿了，只得提早宣佈開會。散會以後，又舉行遊行。

最使我們痛心的，是總政治部在臨穎的工作同志對於我們工作的破壞。他們不僅不來參加我們一切工作，而且用了種種造謠的方法來侮蔑我們。他們所加以我們的唯一的罪名，是“好出風頭，目無上級機關”。在他們的意思，好像臨穎的工

作應該由他們來領導，我們只有盲目的服從，否則就是“目無上級機關”，而我們的一切不辭勞瘁的努力也就成了“好出風頭”了。

世界上還有比這更荒謬的事情嗎？

不錯！總政治部應該來領導我們。但是總政治部太不行了，尤其是到前方來的總政治部的工作同志，他們纔真是來出風頭，而不是來做工作的。他們自己不做工作，而硬不准我們工作。像這樣的總政治部，簡直是該打倒的。總政治部到前方來的同志，都是驕傲得很，遇見了我們宣傳隊的同志，總露出鄙視的神氣，所以我們宣傳隊同志對於總政治部的印象，壞到了極點。

五月卅一日的下午，第一縱隊的全體政治工作大會開會，我們宣傳隊同志全體參加了，人數幾乎佔了大會的一半，因為我們現在差不多有二十多個工作人員了。總政治部人員沒有來參加，僅僅來了一位代表秘書某君。在廖主任致開會辭以後，這位總政治部的代表某秘書站起來訓話了。本來我們宣傳隊同志對於總政治部的印象非常惡劣，所以當某秘書像煞有介事般站起來“訓話”的時候，就有嚶嚶的聲音從我們宣傳隊同志座中發出，我為維持會場的尊嚴起見，暗示制止了這種舉動。但是這位某秘書真不識相，他竟將我們全體政治工作人員

毫無理由地批評了一頓。他的批評本來是沒有根據的，所以以空洞得很，例如他說我們工作不落實際，但又舉不出證據來；說我們宣傳方法有待改良，但又說不出宣傳方法不良的地方。這樣，我們實在忍無可忍了。宣傳隊同志的目光都注意着我，我不能不站起來說幾句了：

“……我們剛才聽到了我們的上級機關，總政治部同志的‘訓詞’（我把這兩個字讀得特別響），覺得十分慚愧。總政治部的同志，說我們工作做得不切實，這是的確的，張軍長說我們是在墾荒田，的確，我們只做了墾荒田的工作，我們把我們的全副精力，用在羣衆中間，用在軍隊裏面，所以我們忘記了我們自身的裝飾，你們看，總政治部的同志是多麼漂亮！他們個個都打着雪亮的皮綁腿，人人的面上都用雪花膏塗得比梅蘭芳更香，更白，更漂亮（會場大笑），我們呢？我們穿着破草鞋，我們的頭髮長得像監獄的犯人，當然，我們是應該受總政治部批評的。總政治部的同志，說我們的宣傳方法不好，的確的，總政治部先遣隊是怎樣宣傳的呢？他們把整篋整包的宣傳品，在田野間亂丟。這樣，他們的工作報告上可以寫‘散傳單幾十萬，散畫報幾十萬，貼標語幾十萬’，這種宣傳方法自然比我們好得多了。總政治部的同志，不僅宣傳方法比我們好，而且他們一切都比我們聰明，當我們在前方作戰的時候，總政治部的同

志躲在後方，在後方的民衆面前做他的老爺。但是，當我們把敵人打退以後，總政治部的同志就來前方照相，演說，向我們‘訓詞’了。我們在戰壕裏把受傷的官兵從火線裏拯救出來，我們自己損傷兵，這在總政治部同志看來，是有損政治工作人員的尊嚴，因為高貴的總政治部的同志，他們看慣了穿着高跟鞋的美貌的女郎，所以他們看見了傷兵就要作嘔。我們在民衆中與他們同甘苦，在遂平，在大劉莊，在其他許多地方，我們整天的只以黃豆餅充飢，在總政治部同志看來，這又是侮辱了政治工作。你們看吧，總政治部同志帶來了一大羣的驢子，這些可憐的畜生的背上，不僅滿負着總政治部同志的漂亮的行李，雪花膏，香水；而且還裝滿了罐頭牛奶，罐頭食品，香烟等。他們不是來工作，他們是來遊玩，來享樂的……。”

我正想把我的滿腹牢騷說下去，但廖主任停止了我的發言，因為這已經使這位某秘書夠難受了，所以他在我們會議尚未終了之際，就逃席而去了。散會以後，廖主任責我的態度太過分了，但我們宣傳隊同志都覺得這是一件很痛快的事。

在第二天，我就接到報告，說這位某秘書已經報告了鄧演達主任，說我侮辱上級機關，要求嚴辦我。我對於這消息只是付之一笑。我自信鄧主任不會像他們這樣糊塗，果然這事也就此沒有下文了。

我們以最大的努力在臨穎從事民衆工作，一切的進行都非常順利。在工作中，使我有機會認識了周仿溪先生。我雖然一向不認識他，但我曾在小說月報上讀過他的詩，也曾聽別的朋友談起過他，他是臨穎本地人，現在三十六軍政治部工作。他的誠懇的態度，給我了一個極好的印象。他的年齡比我們大得多，但他又還有青年人的熱忱，所以在工作中，他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



六月二日的下午，接到後方辦事處轉來廣州某小姐給我的信和照片，這意外的安慰使我喜悅，我忽然起了一個妄念，想回廣州去看看她。這種反革命的妄想會使我對於現實工作怠工，至少，要減少我工作的精神。我不敢想，但又不能不想。革命與戀愛終究是矛盾的嗎？別人對這問題懷疑，甚至有人肯定並不矛盾，但我始終認為戀愛必然地要妨礙革命，這，我在廣州民國日報副刊上發表的論文已經博得多數革命青年的同情了，但我現在自身又陷於這革命與戀愛的矛盾的網中。

某小姐的信上寫着：“琳：你快點回廣州來呀！這時候的荔
芝灣的風景真是可愛呀！你歡喜喫的洋桃，現在正是最肥美的
時候。東山的光景，比你在這裏的時候更好得多了。東山酒樓
的對面新開了一個咖啡店，一個精美的非常有趣的小咖啡店。
東山公園新從南洋羣島運來熱帶區域的奇花異草，把這小小
的公園點綴得更其美麗幽雅了，但是，琳：可惜此地已好久沒
有你的遊踪了。琳：快點回廣州來呀！”

我在因工作極度緊張而致使精神不濟的時候，這來信使
我愛不釋手，但我不敢讀下去，因為這簡直可以動搖我的前進
的勇氣。但我深信我能夠克服這種動搖，我決不讓第二種力來
戰勝我對革命的信念！

在接到某小姐的信的五小時後，那已經是夜裏了，從別的
機關傳來的惡耗，我的最敬愛的朋友——安體誠先生，於五月
一日在上海犧牲了。

我知道安君的名字，是由於讀嚮導週報，那時嚮導週報上
印的通信處是“杭州馬坡巷法政專門學校安存真轉”，就因為
讀報的關係，與安君通信，那是一九二四年春天的事。在這年
秋天，我又在上海書店出版的“社會科學講義”中讀了他的“現
代經濟學”。十一月裏，我到杭州去和他作了初次的會面。初次
的會晤，是在馬坡巷法政學校的他的寢室中，他給我的印象是

很好的。一個三十左右的青年，穿着一件絲綿的長袍，北方人穿的皮靴，戴着程度極深的近視眼，用極誠懇的也似乎是極喜悅的態度和我握了握手。兩個初次會晤的人就開始暢談了。從他的寢室——也就是書房中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寢室的面積很大，但因為堆滿了書，又擺了兩隻桌子——一隻寫字檯和一隻的方桌——一隻床，就沒有多少空隙的地方了。書籍以日文的經濟學書籍為最多，一本本都是厚厚的洋裝，可以顯出這室中的主人，是留日出身的經濟學教授；報紙與革命的刊物也很多，日文的，中文的，英文的，由地板上堆到天花板上。寫字檯上堆滿了文件——我來的時候他正在工作，雖然已經是深夜了（我是從上海坐夜車來杭州的，一到就去找他）。床上鋪着一條樸素的棉被。全房間除了書籍文具以外，沒有一點裝飾品，和普通大學教授把房間裏裝飾得像小姐閨房一樣華麗，那真有天淵之別了。

我們一見如故地開始暢談，他將他的身世告訴我：他是直隸豐潤人，這年是二十九歲了，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系畢業以後，在天津法政專門學校教了一年書，就去奉天哈爾濱一帶工作，去年到杭州法專來，同時還在上海大學擔任了功課，僕僕於滬杭之間，後來因為他在杭州的事太多，只得辭了上海大學的教職，專在杭州服務。他在法政學校每星期的功課

是十八小時，但他最大部分的時間，還是消磨在實際的活動——他是國民黨浙江省黨部的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又是青年協進會（杭州革命青年的集團）的常務委員，“協進”的編輯。杭州的各種社團，幾乎都有他參加活動的，所以他就忙得不堪了。據他說，他每天只能睡四五小時，其餘的時間，都消磨在編講義，上講堂，以及實際活動中了。我們的談話的範圍很廣，真是無所不談。這夜我就寄宿在他那裏——與他合鋪。從此以後，我們就成了最知己的朋友了。一九二五年元旦日，青年協進會在西湖西冷印社開了一個新年同樂會，我和他同去參加了以後，就回上海來了。三月間，他同了他的女同志黃文霞到上海來看我，那時他和黃女士受了浙江國民會議促成會的推派，到北京去出席全國國民會議促成會，路過上海，只耽擱了一晚，就搭新華輪北上了。六月間，正當五卅運動的高潮剛才掀起的時候，他又到上海來了，那天我正在民國日報的營業部裏閒談，他來買報，無意之中會見。他這次南下，事前我並不知道，而我在上海的新居，他也不知道，所以無意中的邂逅，彼此覺得很欣慰。但就在我們會晤的第二天，他就到蘇州無錫許墅關一帶講學去了。不久，我就去廣東，他回北方去了，從此天涯海角，連音訊也無從知道。這年十二月間，我在黃埔軍校會到他的族弟安體仁君，纔知道他在西安國民二軍

中工作，但我從廣州寫去的信，到陝西後又退了回來，因為他已經離開陝西了。一九二六年二月間，我彷彿聽說他在天津，但我寫信給天津的朋友打聽他的消息，也是不知道。四月某日，我照例早上到中央黨部去辦公，看到民國日報上載他與邵力子譚平山于樹德輩同由北京經內外蒙古西伯利亞至海參威，由水道到廣州，與陳啓修君同寓財政廳前的南越旅店的消息，立刻趕到南越旅店去找他的時候，可惜他已他已經出去了。我回到中央黨部不久，他就到中央黨部來看我。七八個月沒有見面，他蒼老得多了，比從前瘦了很多，但精神還是很好。他把到西安去的情形詳細地告訴了我，在三一八慘案（段祺瑞屠殺北京民衆）的時候，他是羣衆請願代表之一，所以也幾乎做了犧牲，皮包被奪去了，眼鏡被打掉了，手上和足上都受了傷，但沒有死。不過因為段祺瑞很注意他，所以不能不離了北京到廣州來。這次來的路線是橫斷內外蒙古經西伯利亞海參威來的。他又講到路過內外蒙古及西伯利亞時的所見所聞，在在都使我發生極大的興味。這天晚上，我陪他到大新公司的酒樓上吃飯，盡一日之歡而散。他到廣州不久，就去黃埔軍校當政治教官，但還是住宿在廣州，與于樹德江浩兩君同寓於惠愛東路，我們時常來往暢談。那時陳啓修繼任主編廣州民國日報，央他作了一篇“內外蒙古橫斷記”，這篇文章，

作應該由他們來領導，我們只有盲目的服從，否則就是“目無上級機關”，而我們的一切不辭勞瘁的努力也就成了“好出風頭”了。

世界上還有比這更荒謬的事情嗎？

不錯！總政治部應該來領導我們。但是總政治部太不行了，尤其是到前方來的總政治部的工作同志，他們纔真是來出風頭，而不是來做工作的。他們自己不做工作，而硬不准我們工作。像這樣的總政治部，簡直是該打倒的。總政治部到前方來的同志，都是驕傲得很，遇見了我們宣傳隊的同志，總露出鄙視的神氣，所以我們宣傳隊同志對於總政治部的印象，壞到了極點。

五月卅一日的下午，第一縱隊的全體政治工作大會開會，我們宣傳隊同志全體參加了，人數幾乎佔了大會的一半，因為我們現在差不多有二十多個工作人員了。總政治部人員沒有來參加，僅僅來了一位代表秘書某君。在廖主任致開會辭以後，這位總政治部的代表某秘書站起來訓話了。本來我們宣傳隊同志對於總政治部的印象非常惡劣，所以當某秘書像煞有介事般站起來“訓話”的時候，就有嚙嘶的聲音從我們宣傳隊同志座中發出，我為維持會場的尊嚴起見，暗示制止了這種舉動。但是這位某秘書真不識相，他竟將我們全體政治工作人員

破齋的字典中沒有難字，步體誠的字典中沒有退字。

現在，我們的存齋已經沒有了。哭嗎？我們只有血，沒有淚！

十三

初接到存齋噩耗的時候，因為我們的過深的友誼，使我抑止不住悲哀，但悲憤只有使我更加努力。在臨穎，我們的努力真是可告無愧的，但可惜我們是在軍旅之中，行蹤飄忽，在臨穎只住了三四天，就奉命令開拔赴開封。

原來臨穎十里頭一役，敵軍主力，已被我方擊潰，同時西北馮玉祥的國民軍，出潼關東下，在洛陽大捷，所以黃河以南的敵人，完全渡河北逃，鄭州開封許昌洛陽，已無敵踪，此次北伐的第一個目的“會師鄭汴”，已可到達。唐生智總指揮直轄的部隊，由臨穎沿京漢線直赴鄭州，我們第一縱隊則仍舊開往豫東，逕入開封。

六月四日的清晨，由臨穎出發，向開封前進。沿途經過鄆陵扶溝西華郟川尉氏等許多縣分，但因為我們一心想到開封，

沿途也沒有情緒去瀏覽景物了。

六月九日的上午經過了有名的朱仙鎮，下午五點鐘就到達開封了。

在將到開封的時候，遙望宏偉的城牆，已使我們對初次會面的開封生出一種很好的印象。經過隴海鐵道，就到了開封城下了。由南門進城，街道和一切舊式內地城市一樣，狹窄醜陋。兩旁的建築，也僅是矮小的樓房，店舖的裝璜，也表現出蕭條不振的像子。我們也無暇觀光，就到高等審判廳去休息，這是我們政治部的駐紮之所。

據說高審廳的房屋，是開封最好的建築。我們在將近兩個月的軍旅生活中，一路所住的，都是些矮小的茅屋，就是在臨潁城裏，所住的房子也很小。河南一般的建築都差不多如此，宏偉的房屋簡直是絕無僅有。高審廳的房屋是洋式的，不僅外觀很美麗，而且內部尤其考究。一切的用具也都是上等的來路貨，幾個月沒有看到這樣好的傢貨。躺在新沙發上，那種舒適的情形，幾乎形容不出。

在未到開封以前，我們的注意力已經集中在開封。尤其是開封有什麼名勝古蹟，更打聽得清清楚楚。但是到了開封，又沒有時間去遊玩了。無論到什麼地方，工作總是多得使我們無法應付，開封是一個省城，革命軍又是初次到這地方來，我們

之忙，是可想而知了。

我們一面努力地工作着，一面預計什麼時候可以打下順德，什麼時候可以打下保定，什麼時候可以打下北京；打下北京以後，我們怎樣工作？當然我們也懷念着我們的後方——武漢，但誰也不會想到這個時候應該回武漢去。“不到黃河心不死”，這是我們一路來口頭上常唱着玩的一句，現在我們已經到了黃河邊了，但我們不能以此為滿足，我們要打到北京去！

世界上的事情，真是不容易預料的，當我們正在做着到北京去的夢的時候，突然接到了班師武漢的命令。

那是我們到開封的第三天下午二三點鐘的時候，軍部來了一個要我們明天早上出發開赴許昌的通告。這無異是晴天的霹靂！想不到我們在開封竟住不上三天，更想不到我們的方向，不是繼續向北，而是轉身向南。

十四

從開封到許昌，本來可以由隴海路至鄭州，轉京漢路直抵許昌。因為隴海路還沒有修理好，而京漢路由鄭州到許昌一

段，也還不能直接通車，所以不搭火車而步行。從開封到許昌，陸路是一百八十里，決分三天走，每天走六十里。但其中九十里是沙地，極其難走，我因為連日工作疲勞，身體不大好，所以雇了一輛黃包車，用以代步。別處的黃包車，都是拉本地的，而河南的黃包車，是拉外埠的多。以開封來說，開封的黃包車，有十分之五六是拉外埠生意的。從開封到許昌，一百八十里路，車資一共是三塊錢，這實在可說是極廉的代價了。

從開封出發，是走南門的。車子拉出南門，回頭看開封城垣，頗覺雄壯，真愧歷史上有名的汴梁古城。城外有一條高低不平的石子馬路，那邊是齊魯公園，隴海鐵道就橫臥在南門外。越過鐵路，就是郊外了，郊外的地方，愈走遠，沙愈多，走到回頭看不見開封城垣的時候，地下簡直完全是沙漠了。車夫拖着車子跑，走一步，腳就陷在沙裏了。這裏與大戈壁不同的地方，就在此地還有樹木，還有泉水，還有來來往往的不絕的芸芸衆生。

六月炎天，本已很熱，在沙漠上旅行，一陣風起，黃沙撲面吹來，更使人難受。但我坐在洋車上，憑良心說，是十分舒服。開封的洋車不像滬粵京津等處的，車子大都為車夫所有，修飾得很漂亮，尤其車上有一張蓬，不僅可以避日光，禦風沙，而且十分美觀，車子拖動時，遠遠望去，簡直像一隻小艇在水中搖

擺。我坐在這船艇式的洋車裏，極目四眺，萬里無雲，意頗自得。

從開封南行，走了四十五里路，到了歷史上有名的朱仙鎮了。

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地方，除了長安咸陽許昌洛陽這些古都以外，還有所謂天下四大鎮。古人目光不出中國，所謂天下四大鎮，實際上是指中國四大鎮，那四大鎮就是現在的河南朱仙鎮，湖北夏口鎮（漢口），江西景德鎮，廣東佛山鎮。朱仙鎮居四大鎮之首，昔時盛況，可想而知，可惜而今是式微了。朱仙鎮之所以能成爲天下四大鎮之首，因爲這裏是中州的交通要道，從前從楚越等處到汴梁，必須要經過朱仙鎮，所以當時人說朱仙鎮是天下的中心，其在交通上的重要可知。至於朱仙鎮在政治史上之所以著名，因爲宋朝的岳飛，曾駐軍於此，與金兵大戰，所謂“八鎗大鬧朱仙鎮”，是歷史上最著名的一齣武劇，岳飛既成爲封建意識所崇拜的英雄，而朱仙鎮之名，亦因岳飛的故事而大著。現在朱仙鎮有岳王廟，相傳卽昔時岳飛的元帥府。

朱仙鎮是範圍在一座很大的土城內，這土城內面積的確是不小，城牆也很宏大雄壯，但是種種荒涼淒慘的景像，實在是出我們的意外。走進城門以後，街道都很寬，但簡直像是沒

有人居的荒城。兩旁的房屋都是緊緊關着門，而且像是永久地這樣關閉着，因為門板上積塵盈寸。街道是被塵灰與沙石掩埋着，使你不僅可以知道這條街上不知有幾年幾月沒有人來掃過，而且還可知道已久無人行。

但這城裏也不是絕無居民的，在將近南門的時候，我們看見了幾個人，而且還看見一個茶店開着，二三個面無人色的老農在吸茗。從他們口裏，使我們知道許多關於朱仙鎮的故事，這些故事當然大部份是關於岳飛的。

朱仙鎮現在之所以如此落後，其原因是很容易明白的，因為從前的朱仙鎮是中原交通的中心點，而現在呢？京漢路與隴海路都沒有經過朱仙鎮，從西面到東面，或從東面到西面的，都從隴海路去了；由南而北，或由北而南，都從京漢路去了，朱仙鎮已被劃出交通綫以外，這樣，朱仙鎮自然就要沒落了。

遊朱仙鎮的人不遊岳王廟，正和游杭州的人不游西湖一樣的可笑。岳王廟是在朱仙鎮的北街，廟的面積很大，正殿是五大開間，共是七進。因為這裏本是岳飛的大元帥府，所以更是為岳王廟生色。在岳飛的一生中，朱仙鎮之戰是最有名的，他大敗金兀朮即在此。在岳王廟中，所供的神像是很多的，除了岳飛及其夫人外，還有他部下的諸多健將，如楊再興，余化龍，王貴，張顯，牛皋，馬前張保，馬後王橫，以及公子岳雲，女

公子銀瓶小姐等。也有秦檜夫婦的鐵像，跪在岳王面前，但與西湖岳墳前不同，岳墳前的鐵像有人便溺，而岳王殿裏的鐵像，無人便溺而有人毆擊。

前院裏的大柏樹很多，還有許多碑石，刻有岳飛親筆詩文甚多。岳飛真不愧是一個能人！也不僅善於將兵，精於戰略，而且詩文書畫都很不壞。良才難得，我們固不崇拜偶像，但對此種人材，自不能不表示欽佩。

殿後有風雨樓，登樓遠眺，頗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想縈繞在我的心頭；廣東是在那邊吧，浙江呢？

本來我們的行程是每天六十里，但第一天只走四十五里，即在朱仙鎮過夜，宿於風雨樓，談至半夜，忽一陣大風吹來，把我們全身都吹滿了灰沙，真是難受！

由朱仙鎮南行，再四十五里，到了尉氏縣。城外有一條護城河，河上有一座吊橋，兩條粗的鐵練由橋的這頭與城樓上聯繫起來，因為這裏每晚八點鐘就關城門，關城門後就把吊橋扯起，斷絕往來——所謂扯起吊橋，我們只在舊的傳奇小說上看到，想不到實有其事。尉氏城是建造於春秋戰國時代，真不愧是一個典型的古城。當時之所以要建造這些古城，是為封建諸侯的保壘，現在站在工商業的見地上看來，這城是有害而無益的，尤其四面的護城河，八點鐘以後就斷絕交通，更是非常不

便。城內的蕭條，自在意中，但比起朱仙鎮來，倒是好得多了。街道是碎石子做的，走起來高低不平。兩旁的房屋都是矮矮的土屋，店鋪極少，但機關倒是很多。什麼局什麼會的招牌，滿街都是。

自尉氏南行，又四十五里，就是歌馬營。歌馬營雖不如朱仙鎮之著名，但在中國歷史上也是極占重要地位的，因為牠是宋朝的發祥地，宋太祖趙匡胤，即生於此；但歌馬營而今只是一個三五家蕭條冷落的荒村而已，撫今追昔，不禁令人起滄海桑田之慨！

在離開許昌三十里的地方，有一個許田鎮，那是一個小小的土寨，但這個土寨也是歷史上有名的。三國時代的漢獻帝在此圍獵，射鹿不中，曹操討御箭射之，一箭而中，百官向獻帝稱賀，曹操攔御前受賀，關公怒欲殺之，而劉備以目止之乃罷。這一段故事，由三國志傳誦人口而為衆所知曉。我們在許田與老農閒談，老農都知道這故事，津津樂道，彷彿許田能出此故事而十分光榮。

在開封出發的第三天的下午，我們到了許昌了。

許昌，這歷史上有名的古城，在我們想像中，以為一定是一個銅牆鐵壁般雄偉的城池，一定也是很熱鬧的場所，因為牠是沿着京漢路的大站，當不致如朱仙鎮那般衰落蕭條。但事實

上，我們的想像完全與事實不符，我們已經到許昌了，許昌城裏與開封比起來，自然要落後得多，就是與信陽比較，也遠不及；城區的面積也很小。

我們從東門進城；城垣雖不雄壯，但是蒼然古色，使人回想曹孟德在此時的那種威武不可一世的氣概，而今安在？

從東門進去，由西門出來，穿過一條直街，這就是許昌的精華所在，但實在也很不像樣。街道是狹狹的，且大部分只有泥土而沒有磚石，幸而我們來時是晴天，如果天下起雨來，那末泥濘滿街，一定很難走了。店舖並不多，像樣子的更是絕無僅有。許昌，如此而已！

在許昌城裏，除了天主堂福音堂這有所比較可觀的建築外，其餘都是些矮小的土屋。河南人的“住”的問題總是這樣馬虎，使我們旅行者不能不感到困難了。但是許昌城外却有兩處極考究的歐化的建築，那就是兩個香烟工廠。

我們政治部是住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許昌分廠。在許昌有這樣貴族式的建築，真不能不使我們驚異了。那完全是洋式的，有寬敞的辦公室，有精雅的花園；辦公室裏的用具，如寫字檯，如鋼椅，都是極新式極貴族的。這些不僅在河南內地，就是在開封，也是極少見的。

南洋烟草公司固已足使我們驚異，而英美烟公司建築之

宏偉富麗，比南洋煙草公司更勝數倍！我們遊了南洋公司再去遊英美煙公司的花園，彷彿置身南歐，絕不會想到這是貧瘠荒涼的河南呀。

十五

在許昌住上了三天，吃了許多黃熟的杏梅，直到六月十七日，鄭州纔有火車下來，我們就在十七日的下午上了火車，離許昌回武漢來了。

火車走得特別的慢，直到十九日早上，纔出武勝關。親愛的河南的民衆，我們要暫別了，兩個月來的努力，我們究竟給了你們些什麼好處呀！慚愧！慚愧！

分家之前



那輛本來是裝牛馬的蓬車，把我們從許昌裝到了漢口。

車到劉家廟的時候，已經是在深夜了，而且下着雨，使我們不能趕到漢口去，只得在車站上過了一夜。車站上本已被別的部隊擠得滿滿的了，所以不但要找睡覺的地位沒有，就是要找一個蹲的地方也很難了，但這也是沒法的事。車子爲什麼不直開到大智門呢？如果車子走快一點，早一點到劉家廟，我

們今天也不致在這裏受罪了。再退一步說，天如果不下雨，也還是有方法可以趕到漢口去舒舒服服睡一覺，偏偏又下着這樣大的雨！……大家就這樣怨聲載道的混過了一個夜。

小別兩月的武漢，情形似乎是有點異樣了。雖然斗方大字的白布標語還是到處懸掛着，可是內容和從前不同了。最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下面三個口號：“打倒背叛黨國的許克祥”，“反對朱培德驅逐政治工作人員”，“國共兩黨合作到底”。這三個標語都是湖北總工會的，而且貼得很多。但許克祥是誰？我們都不知道。既然值得大呼打倒，當然不是一個無名之輩；可是，許克祥？這名字實在太生疎了。為什麼我們要打倒一個名不見於經傳於小人物呢？這是我們初回武漢時的第一個疑問。其次，朱培德驅逐政治工作人員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我們全然不知。離開武漢還不到兩個月，而武漢竟出了這些新花樣，世事如白雲蒼狗，真使人感慨不已！

政治部一早就跟着軍部從劉家廟回武昌去了，我爲了要會會漢口方面幾位小別兩月的朋友，所以一個人留在漢口，首先就去拜望了中央組織部的那些舊同事——毛，羅，劉，曾等。新出花樣，現在已經全部明白了，所謂背叛黨國的許克祥，就是長沙馬夜事變的發動者。他自在長沙發動了馬夜事變以後，在中國的政治史上，居然有了他的紀錄了，原來他本是唐生智

部下的一員小小的團長，在以前是絕不爲人所注意的。那時長沙正是在××黨領導之下，赤色運動異常發展的時候，保守階級恐慌到了極點，他們無時無刻不在設法想把××黨打下去，爲保守階級覓一條出路。終於，他們找到機會了，於是許克祥成了他們的工具，馬夜事變發生了。原來當武漢北伐之際，長沙雖屬後方重地，但因武漢部隊不多，故留守長沙的，僅僅許克祥的那一團人，外加公安局的保安隊，總工會的糾察隊等共同維持長沙省城的治安。許克祥是一個沒有政治頭腦的舊式軍官，本來只知道服從上級，此外別無所知。但意外的事發生了，他的父親——這位土豪劣紳的典型的許老太爺，因爲平時對於農民未免太過分了一點，農民對於他，本已是恨之刺骨，但一向是無可如何。一朝農民協會成立了，農民居然抬起頭來了，城裏又派人來鼓勵他們，於是他們更起了勁。不僅有了農民協會，而且還有了農民自衛軍，居然與平時專爲地主階級保鏢的保衛團等對抗起來，而且居然是佔優勢了。於是，原來在地方上作威作福的老爺們，至此也不能不溜之大吉，由鄉裏逃到城裏，由城裏逃到省裏，甚至有逃到漢口洋街上去的。許老太爺的同道者也都溜了，但許老太爺自己仗着他少君在“革命軍”裏做團長，所以不僅沒有溜，而且依然還是一樣的輕視農民。於是事情就弄糟了，有朝一日，許老太爺的府上來了一大批赤腳

短衣的大漢，把大廳上的東西乒乒乓乓的打個稀爛。這還了得？簡直是造反了。許老太爺究竟是有骨頭的人，怎肯罷休？竟然跑出來對這批造反的人大罵。這更糟了，許老太爺吃了眼前虧，被打得頭破血流，而且被逼得不能不逃走了，因為再不逃，許老太爺的腦袋就難保了。許老太爺一逃就逃到省城，向他的做“革命軍”團長的少君告訴。這還了得？連團長的老太爺也竟被打。這事給了我們團長一個極深的刺激。許團長頗知道些“親辱子死”的古訓，所以聽了他老太爺報告以後，即有與××黨一拚的決心。加以那時長沙城裏由各縣逃來的紳士很多，他們無意中有了了一種組織，而許老太爺當然也參加了的。他們聯絡了省城裏的紳士，聯合起來向許團長包圍。於是，當武漢大軍在河南開始與奉軍激戰的時候，許團長就於五月二十一日之夜間發動對於××黨大施壓迫了。這就是所謂馬夜事變。馬夜事變發生以後，許克祥就成了紳士們口中的萬家生佛。但在××黨一方面，自然視為仇敵；所以武漢方面要高揚打倒許克祥的標語了。

關於馬夜事變的事情，後來我們還聽到很多。當時許克祥派兵圍攻湖南省總工會及湖南省農民協會，將工人糾察隊與農民自衛軍全部繳械，工會與農會的領袖幾乎全部入獄，被殺死的有三百餘人。那時除了總工會及農民協會外，還有許多其

他的羣衆被摧殘。於是全長沙城就由工農活動的世界，變爲紳士資本家活動的世界了。事情發生以後，××黨湖南省會立刻就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決定對於許克祥這種行動來一個反攻。那時總工會及農民協會等一切民衆團體概被許克祥佔據了，所以××黨決定召集長沙近郊的農民，聯合城內的工人，組織十萬工農軍進攻長沙。並且已經決定了五月三十一日，作爲進攻長沙的日子。緊急會議以後，立刻派人到四鄉去糾集羣衆。成績很不壞，據當時的估計，以工農羣衆的力量進攻長沙，其勝利可操左券。所以那時長沙的情形，陷於極度恐慌與混亂之中。可是十萬工農軍五月三十一日進攻長沙的計劃，終沒有實現，因爲當時陳獨秀主持的××黨中央，極力反對湖南省委的計劃。陳獨秀自始至終是主張“國共合作”的。當時××黨的湖南省委書記李維漢報告陳獨秀說：“我們同志及羣衆，被許克祥殘殺的很多，爲什麼我們不來一個反攻？”，陳獨秀立刻答覆他說：“我寧願犧牲一千萬羣衆，不能與××黨翻臉，只有與××黨合作到底，革命纔有希望。”在這樣反覆爭辯之後，陳獨秀的主張當然是佔了勝利，於是已經集合的起來的準備進攻長沙的羣衆，離時通告解散。這樣，羣衆對於××黨不能不懷疑了：“這不是和我們開玩笑嗎？昨天說要我們來打省城，今天又要我們回家，這是什麼一回事？”

至於朱培德的問題，是這樣的：朱培德在革命軍克復江西以後，就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寧漢分裂以後，朱培德是站在武漢方面的。當武漢大軍北伐之際，朱培德率部留守江西，並沒有出發。五月十七日夏斗寅反水以後，接着又有五月二十一日許克祥的長沙事變，楊森也乘機向武漢方面進攻，武漢成了四面楚歌，於是朱培德的態度也變更起來。本來他的部下政治工作人員中，有不少××黨員，至此，他以“歡送政治工作人員出境”的美名，將這批政治工作人員全部押解出江西而送到武漢。江西的許多民衆團體也被封了，領袖份子都被驅逐。但這種“歡送”的辦法，實際上是與許克祥的事變，是同種的意義，所以武漢方面的×黨機關，對他也要反對了。

二

政治部已不在公共體育場而改在中和里了。那是一所臨時部址，幾間普通的衙堂房子，但因為房間還多，我佔據了一個光線很好的房間。兩個月來的戎馬奔馳的生活，使我感覺到了疲倦，現在有一個安定的地方供我居住，明窗淨几，覺另

有一番風味。決定以後要多讀一點書，使自己的學識，有所進步，這實在是很必要的，我自從離廣州到武漢以來，書讀得很少，長此下去，是很危險的。讀書，我總覺得無論如何是有益的事，何況現在新出的理論書籍很多。要使自己不落後，要使自己將來可以為革命盡一點力，那就非多讀書不可。固然，為了革命的必要，我們可以拋棄書本，應該拋棄書本，但如果僅僅藉口革命，不肯讀書，無論如何是一種錯誤。

可是事實往往理想不能符合，雖然想安心讀一點書，而事實上，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又怎麼能夠安心讀書呢？當我們入河南的時候，武漢還彷彿是一座活的火山，而今這座火山的火也快要熄了，雖然僅僅是兩個月的小別，而一切的光明、希望，似乎已經在這兩個月中漸漸失去了。政治上的黑暗與混亂，已經把武漢政府的運命注定了。我們將怎樣辦呢？——無出路的悲哀佔據了我的心，使我再也沒有讀書的情緒了。

回到武漢的第三天的晚上，廖主任從軍部回來，他很不愉快的問我：

“為什麼我們貼出打倒許克祥的標語呢？”

“怎麼我們不該貼這標語嗎？”——廖主任的責問實在出我的意外，我不能不這樣反問。

“剛才軍長（指張發奎）說，這標語要引起唐總指揮一方面

的誤會，所以趕快去撕了牠。恩來也說我們軍隊的立場與黨部民衆團體不同，他們可以這樣貼，我們不能。恩來還要我來警告你呢。”

警告？這真是笑話！爲什麼黨部可以貼這標語，而我們不能貼？難道我們和黨部不是站在一個立場嗎？難道我們不是受黨部領導嗎？黨部要打倒的人，難道我們要去擁護？黨部要打倒的人，我們跟着喊打倒，而我們要受警告，這算什麼一回事？我真有點氣憤了。

下一天的下午，恩來在漢口請我們吃飯，團團的坐了一桌：恩來，乾吾，我之外，還有二十五師政治部主任李陶（碩勳），二十五師七十三師指導員俞增生，總政治部組織科長關舜，二十四師師長葉挺，另外還有一位不相識的女客。葉挺又談到張發奎關於打倒許克祥標語不滿意的事，恩來就問這標語究竟是誰主張寫的？本來這個標語，是二十五師政治部先貼出來，因爲二十五師比我們軍部先幾天回到武漢，他們沒有到開封。在我們回武漢的時候，二十五師這一張標語已經貼了幾天了，我們軍政治部因爲看見二十五師政治部也有這種標語，所以也寫了幾張。假定說，這標語的確是錯誤的，那末這責任問題也該由二十五師政治部來負，李陶君是二十五師政治部的負責人，他應該負責；可是他却推說是軍政治部先貼，他們是看到

了軍政治部的標語，纔也寫來貼的。這樣，這責任落到我頭上了。本來我可以承認我主張寫這標語，但我覺得李陶君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是不光明的。我們做了事，尤其是做錯了事，應該挺身出來承認，爲什麼要把責任推在別人身上呢？

在這些很小的地方，都使我失望！

在恩來那裏吃飯出來，找中央黨部幾位同事打了一夜牌。

一個人心裏有點煩惱，就想找點刺激來消遣一下，於是打牌就成了我回武漢後的日常功課了，橫豎政治部裏這幾天工作很清閒，我時常在一下辦公廳以後，就跑到漢口去打牌。漢口的天氣是奇怪的熱，就是在晚上，溫度也總是在百度左右，好在旅館裏有的電扇，冰淇淋。我們幾乎在旅館天天開了房間，統夜的打牌。打牌還不夠刺激，於是喝酒。啤酒和汽水是整打的喝，香煙是接連了抽。墮落生活就是這樣繼續下去。

有時，偶然的例外，找不到麻將搭子，牌打不成，就喝酒，在房間裏不打牌，就覺得悶熱，儘喝酒又沒有味，於是出去逛。江邊的馬路上，維多利亞花園的草地上，時常有我們的踪跡。我們就在江邊馬路上的長凳上，或花園裏的草地上躺着，仰天長談，光陰就是這樣的過去。有時也這樣想想：這樣的生活有什麼意義呢？——但這樣想的時候，就要引起許多煩惱，所以我是極力避免這些問題在我腦筋中作起用，我極力麻醉我自

己的神經。

三

張發奎發起籌備追悼第一縱隊的陣亡將士，我是籌備會的宣傳部長，追悼大會上用的“第一縱隊北伐陣亡將士追悼大會宣傳大綱”是我做的。在這年頭，說話真不容易，動不動就犯了錯誤，所以我爲慎重起來，把我做的宣傳大綱，請恩來替我校正一下，以免再有過失。恩來把我的原作一字不改地着人送了回來，說這樣可以了，於是我很放心的拿去付印了。

追悼會很熱鬧地在閱馬廠舉行了，我們政治部的同事忙了一天。

晚上，廖乾吾主任到張軍長公館裏去，那時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汪精衛，副軍長黃琪翔等均入座。在談話中，汪委員很嚴重的提出來問：

“張軍長：這次追悼會的宣傳大綱是誰做的？”

“政治部朱科長做的。”張軍長答覆了他。

“這些CP份子，實在太幼稚了。”汪委員很憤慨的說：“你

看，在這宣傳大綱的許多口號中，只有‘擁護三大政策’，沒有‘擁護三民主義’；他們只知道三大政策，不知道三民主義；其實沒有三民主義，如何有三大政策？這些CP份子，幼稚到忘記了根本，事情如何弄得好？……”接着，他還發了一大遍的牢騷。他不知道是根據什麼理由，把我加上“CP份子”的頭銜。

“這宣傳大綱雖然沒有擁護三民主義的口號，但全篇的精神是擁護三民主義的。”廖主任婉為解釋，但汪委員依然是義憤填胸般嚴厲的責備CP：

“簡直鬧得不像樣子，有了工人糾察隊，又有什麼勞動童子隊，童子知道些什麼？利用了青年還不夠，還要利用童子，還要利用婦女，嚶！……再說，這些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隊，胡鬧到天翻地覆，他們眼目中是沒有政府，沒有國民黨的，他們只知道馬克思，列寧，共產黨，其實如果沒有國民政府。沒有國民黨，他們又如何能夠存在？……”

汪精衛的態度，不僅是有點變動，簡直大變了。他以前是一個最熱中的××的擁護者。他這次初到武漢的時候，所謂“到武漢後的第一筆”，就是寫“革命的到左邊來，不革命的滾開去！”，以前，他還說過“反××就是反革命”的名言，但現在呢？他已經公開的反對××黨了。其實我做的宣傳大綱，十足是擁護三民主義的，但在汪先生看來，因為沒有“擁護三民主義”的

口號，就成了大逆不道的文件了。他當夜把這份宣傳大綱好好的摺放在洋服袋裏，帶回漢口去，第二天一早就跑去找恩來，當然的，又是大罵其 CP 的幼稚。當時恩來對他解釋：這宣傳大綱的精神，十足是三民主義的，決不是什麼宣傳共產主義的，俄國共產黨的傳單或宣傳大綱上，並不都是擁護共產黨的口號。但是恩來的解釋，汪先生不能認為滿意，又拿了這張宣傳大綱，在國共兩黨聯席會議上提出來責問陳獨秀。我真意想不到這小小的宣傳大綱，會成了這樣嚴重的政治問題。真是欲加人罪，何患無詞？

汪精衛既然把這宣傳大綱的問題看得這樣嚴重，於是恩來又來教訓我了，他說在時局這樣嚴重的時候，說話是得非常小心纔好。天哪！這纔冤枉！我總算再小心也沒有了，自己仔細看過還不算數，拿去請恩來看過，恩來看過以後，當然責任是應該他負了，現在他却把責任往我身上推；負重要責任的人，做事這樣不光明，實在是太不對了。

爲了這事情，張發奎竟寫了一個條子下來，說以後政治部發表任何宣傳文件，先要經他看過，本來政治工作在軍隊中是獨立的，不受軍事長官的節制，但最近中央政治會議通過汪精衛的提議，說政治部及政治工作人員要聽軍事長官的命令，這樣一來，政治工作人員完全成了軍事長官的附屬品，所以張發

奎也公然來命令我們政治部了。我是堅決的反對這種使政治工作變成姨太太工作的辦法，但是陳獨秀說，我們應該忍耐，爲了革命的利益，爲了“鞏固革命的聯合戰線”（這是陳獨秀革命的生命線！），就是做姨太太也是光榮的。

獨秀還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我們在各軍政治部負責的人，他大意是說，現在最要緊的是鞏固革命的聯合戰線，尤其是要與軍事長官聯絡感情。因此之故，在軍隊裏“切忌”宣傳階級鬥爭，“切忌”引起軍事長官的惡感，就是一個營長連長，也要與他維持好感。明明是軍事長官錯了，譬如部隊長官侵吞了士兵的餉，或者有不法的行爲，我們也不必管。儘可使軍隊弄成土匪樣的隊伍，但不可和軍事長官翻了臉。

這樣，政治工作還有什麼意義？我真想不幹了，但事實上又不能由你不幹。無聊的事而硬要幹着，真是痛苦！

減少痛苦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打牌與喝酒。武昌的朋友都是軍隊裏的，在武昌都沒有家，武昌旅館又不行，所以打牌得上漢口去。不過要喝酒，在武昌倒很方便，武昌這幾家菜館——斗級營的同興樓，長街的一洞天，中山菜館，閱馬廠的什麼春，在初到武昌時就吃遍了，現在成了察院坡的民生川菜館的老顧主，至少隔一天要來一趟。政治部拿來的餉，幾乎全都化在打牌與菜館裏了。

在這樣環境之下，苦悶的當然不是我一個，所有的朋友幾乎全和我一樣。我是以打牌喝酒來刺激，別的朋友也是一樣。我們不約而同的漸漸墮落下去。本來在武漢政府之下，我們自信是最純潔，勇敢，邁進的份子，但現在呢？我們自己也不否認我們墮落。我們尚且如此，其餘的更不待說了。武漢政府也就是這樣的一天天走向墳墓裏去！

四

一將功成萬骨枯，在河南犧牲了無數的將士，結果是指揮官都陸了官。唐生智升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張發奎升為第二方面總指揮，在張發奎的系統之下，又有了一點變動，變動的結果，高級官長的姓名如下：總指揮張發奎，總參謀長謝墨白，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郭沫若，總指揮部秘書長高語罕，第四軍軍長黃琪翔，政治部主任廖乾吾，第十一軍軍長朱暉日，政治部主任徐名鴻，第二十軍軍長賀龍，政治部主任周逸羣，第四軍十二師師長繆培南，二十一師師長富雙英，二十五師師長李漢魂，第十一軍十師師長蔡廷鍇，二十四師師長葉挺，二十六

師師長許志銳，第二十軍第一師師長賀錦齋，第二師師長秦光遠。

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及第四軍十一軍的兩個軍部，都設在舊督軍公署內，於是我們四軍政治部也由中和里搬到了督軍公署的後花園。我獨自一個佔據了後花園的一個很精美的樓房，據說蕭耀南在湖北做督軍的時候，我這房間是蕭耀南的最寵愛的美麗年輕的姨太太的寢室，這話當然不是無因的，這房間的確很精緻，很適宜做小姐的閨房，可惜人去樓空，我現在來佔據了這個房間，不知曾做過這間房裏的主人的美麗年輕的太太漂流到什麼地方去了？

初到第四軍時，我對於張發奎有相當的好感，因為我認為他不僅是一員勇將，而且也有相當的政治頭腦。但自從河南凱旋以後，我對於張發奎的印象是一天天壞起來了。他自從河南凱旋回來，自以為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俯視一切，武漢除了汪精衛以外，所有的人他全都不在眼。以前他很信仰鄧演達，開口鄧主任，閉口鄧主任，現在他自己偉大了，鄧主任已不在他眼中了。自從政府發表升他為第二方面軍總指揮以後，他更是興高彩烈的準備就職。雖然那時武漢政府的運命已到了病入膏肓，而張發奎自己是非常高興的，因為他以為自己有一個錦繡的萬里前程。他這種好虛榮不知大勢的態度，引起我對

他的鄙視。

他很高興的準備就職，事前由各部處籌備就職典禮，七月上旬的那天，就在武昌總指揮部（督軍公署）內舉行盛大的就職典禮。

所有總指揮部，四軍，十一軍，二十軍以及各師的官佐，全都參加了這就職典禮，此外，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的全體員生也來參加了，所以督軍署內的大操場上擠滿了人，後來實在擠不下了，中校以上的官佐祇得都站到主席台上去。

爲了追悼會宣傳大綱的教訓，在今天會場四週的標語口號中，絕對沒有擁護三大政策的口號，而擁護三民主義及三民主義萬歲的標語，却張貼得特別多。

在經過宗教式的初步儀式以後，首先是汪精衛代表中央黨部致訓詞。他穿着全新的淡黃色的巴辣呢洋服，領帶打得很裝整，頭髮是往後梳的，司丹康在他的頭髮發出一種使人迷醉的光彩。他的態度很像一個時髦的大學教授。但他今天面孔上似乎充滿了殺氣，那種義形於色的表情，使人想起他從前在北京行刺攝政王的情形。

他一走到台前，很有禮貌的向台下行了一個鞠躬禮，就開始他的善於詞令的訓詞了。他首先把四面的標語看了一下，就說：

“今天我很高興，我們的四週，都貼着擁護國民黨，三民主義萬歲的口號，這是證明今日之城中，還是國民黨的天下。但是前幾天，我們發現了一件很痛心的事，那就是第一縱隊開追悼大會那天，宣傳大綱上的口號……”他說到這裏，從洋服口袋裏把那張摺成方形的我做的宣傳大綱取了出來，把這些口號唸了一遍：“你們看，這裏只有擁護三大政策，沒有擁護三民主義。在共產黨的人（他一向稱爲“共產黨的同志”，現在改稱爲“共產黨的人”了）看來，三民主義原可以不要，但三大政策却非擁護不可……”

他以異常憤激的態度發揮了一番指斥共產黨的理論以後，接着又宣布第三國際的陰謀：

“自從五月以來，我們和共產黨方面，天天開着聯席會議，我們是很有誠意（他做出很誠懇的樣子）來和共產黨合作，希望兩黨間的糾紛，由聯席會議來解決，所以在天熱天氣，不辭辛苦，化了很多的時間，來和他們開聯席會議，無論什麼事，我們都很誠懇很坦白的提出來討論。但是他們（當然是指共產黨，汪先生說到這裏，做出很憤恨的樣子），却是沒有誠意的。他們一方面來和我們開聯席會議，敷衍我們，一方面却在進行着一種陰謀。……”

汪先生說到這裏，稍爲停頓了一下，這時台上台下的空氣

緊張到了極點。大家都想知道共產黨“正在進行着一種陰謀”究竟是什麼。那時我是站在台上的，我望了望台上要人們的臉：汪先生滿頭是汗，一種義憤填胸的神態，正和三個月前閱馬廠迎汪大會上罵×××時候一樣。孫科(他是國民政府的代表)站在一邊，面部的表情也是很緊張的。第四集團軍的總司令唐生智，很自然地在吸着青重的紙煙，而且臉上還是堆滿了笑容。張發奎——我們的總指揮，他的臉漲得像一隻豬肚子……再望望台下，武漢分校的學生。個個都是以憤怒的表情緊張地注視着正在台上“宣布共產黨陰謀”的汪先生。汪先生繼續着說：

“那一天晚上，第三國際的代表魯易(他是一個印度人)來找我，交給了我一個俄文的電稿。他說，這是第三國際給中國共產黨的一個訓令，本來鮑羅廷和陳獨秀等大多數人的意見，這個訓令是不能給國民黨人知道的，但是我(魯易自稱)覺得我的責任是應該把這電稿——第三國際給中國共產黨的訓令，拿交你(指汪君)看。至於這個電稿的內容，你們自己可以去看。”汪君說到這裏，又停頓了一下，好像書場裏說書先生賣關子般的，在桌上取一杯冰檸檬來喝了幾口，又繼續着說：

“如果電稿是英文的或是日文的，中央方面有許多人都可以看得懂；如果是法文的，兄弟(他把兄弟兩個字的音讀做“松

弟”)也可以明白；就是德文的，中央方面也有同志能夠看得懂，但又偏偏是俄文的，我們都不認識，不能不找翻譯。及至翻譯出來一看，纔曉得情形非常嚴重，原來第三國際給共產黨的訓令，就是要消滅國民黨的！（汪先生說到這幾個字，聲音特別沉重，本來態度很和柔的汪先生，這時候充滿了殺父之仇誓不兩立的緊張情態）……”

形勢緊張到極點了，台上台下沒有一點聲息，連咳嗽的聲音也沒有。

“這個訓令裏說，共產黨應該領導中國的革命，共產黨決不能把這個領導權讓給國民黨（汪先生說到這裏，站在旁邊的孫科惡狠狠的咳嗽了一下）。因此，共產黨應該實行如下的決議：第一：改組國民黨的中央幹部，淘汰右傾老朽的份子，提拔新進的左傾領袖，使這個中央幹部，可以適應共產黨的領導。第二：淘汰國民黨內右傾的軍事領袖，澈底改造這些軍隊。第三：武裝兩萬（最低數目）共產黨員，作為改造軍隊的基礎。第四：選拔五萬工農急進份子，加入國民黨軍隊，來改變這些軍隊的質量。第五：組織革命法庭，來裁判反革命派；這個革命法庭的領袖，要選擇國民黨內左傾的領袖來擔任。這就是這個訓令的內容。……”

汪先生說到這裏又停頓了片刻，然後用憤恨的態度逐條

解釋：

“我們看看這不是很明白的要消滅國民黨嗎？說國民黨不能夠領導革命，要由共產黨來領導。共產黨怎樣去領導呢？就是要消滅國民黨。他們說，現在中央幹部不好，要由他們來淘汰，來改造，使成爲他們的一個附屬機關。他們說，現在的軍隊不好，現在的軍事領袖要淘汰（汪先生說到這裏，孫科偷望唐生智的臉，彷彿是警告他：‘共產黨要來淘汰你了’，但唐生智依然很自然地吸着他的高貴的外國香煙，汪先生的話他彷彿沒有聽到），所以要武裝二萬OP黨員，要訓練五萬工農積極份子，來改造軍隊，使國民黨的軍隊都變成共產黨的軍隊，這樣，國民黨就可以消滅了。他們以前把持民衆團體，不許國民黨來參加，現在他們不僅不許國民黨參加民衆團體，連軍隊也不許參加了，連自己的中央幹部也不許參加了，你看他們的用意惡毒不惡毒？但最惡毒的還是最後一條，組織革命法庭來裁判反革命，所謂反革命，當然是指國民黨了，但是這個法庭的領袖還要以國民黨來擔任，就是說，要以國民黨來殺國民黨！……”

大約是汪先生今天他太悲憤了的緣故，所以每講一段，要停頓一刻，因爲他氣憤得上氣不接下氣。

“後來，我們到前方去慰勞前敵的將士，但從鄭州回來的

時候，第三國際的代表魯易已經不見了，後來問了一問，纔知道共產黨因為他把電報給我看了，認為是洩漏了他們的秘密，所以把他趕跑了。因為共產黨不僅對於國民黨很殘酷，就是對於他們的同志，也是很殘忍的。他們要消滅國民黨，所以要把電報祕密起來，魯易洩漏了這電報，自然也要被趕跑了，或者他們會把他殺死了也不一定（但後來證明了魯易那時並沒有被殺死）……”

接着，他又把共產黨罵了一頓，在憤恨的情緒中結束了他的訓詞。

本來他今天是代表中央黨部參加張發奎的就職典禮的，但是他的訓詞完全成了反對共產黨的宣言。這真是大會上意想不到的事。每個人的面部表情上都顯出極端緊張的情緒，無論反對共產黨或同情共產黨的人都是一樣。武漢分校的學生，CP及同情CP的份子佔大多數，所以在他們這一羣中，情形是尤其緊張了。女生隊的女生，有幾個在低聲的罵，甚至有的在哭泣了。

“完啦！”——似乎每個人都這樣想，會場上充滿了無出路的悲憤。

在以前，武漢每次羣衆大會或重要會議上總少不了兩個人：一個是挺着罕有其匹的大肚子的鮑羅廷，一個是總是像尋

人來打架那般的充滿了鬥爭精神的鄧演達；而且這兩個人都是很歡喜講演的，所以每次大會都有他們的講演。鮑羅廷雖然不會說中國話，但這俄國毛子能夠說一口流利的英國話，他的善於詞令的嘴，使他每次的講演總可以博得聽衆的狂熱的喝采。鄧演達的講演天才實在不及鮑羅廷，不過他另外有一種熱力，可以引起聽衆的注意與同情。在以前，如果羣衆大會上沒有這兩個人，那簡直是一件怪事，可是今天他們都沒有參加。

在汪精衛的演說完了以後，接着是孫科代表國民政府的訓詞。

孫先生似乎等要訓詞已經等得有點不耐煩了，在汪先生尙未完畢其罵共產黨的訓詞的時候，孫先生就已經躍躍欲試了，他那種飢渴的態度，會使人聯想到急色兒等天暗去赴幽會的情形。所以當司儀員高喊着“國民政府代表致訓詞”這一句話還沒有喊完的時候，孫先生已經站在講台前向羣衆鞠躬爲禮，開始他的偉大的訓詞了。

孫先生的腦袋始終是圓圓的，充分表現了那種有福氣的豪華公子脂肪吃得太多的特徵。他也穿着很整齊的乃至是很漂亮的洋服。他的年齡大約至少要比汪先生小十幾歲，但在女人的眼目中看來，他不及汪先生漂亮。他的講演也不及汪先

生，不及他的尊大人，甚至不及鄧演達。

這位曾被陳獨秀在嚮導週報上譽為與鄧演達同為“真正的革命領袖”的孫先生，今天也和汪先生一樣，名義上是代表國民政府來對新就職的官長訓話，而實際上是專罵共產黨。

他首先說明國民黨的“容共”的起源。本來國民黨的所謂改組的三大政策，原是聯俄，聯共，擁護工農。近來汪先生覺得“聯共”這兩個字有點不妥當，特別發明了“容共”這個名詞來代替“聯共”。因為據汪先生說，“聯共”是國民黨聯合共產黨，這就是兩黨並行的意思了。這樣是要不得的，因為太把共產黨看重了。“容共”的意義就不同，“聯共”，是聯合共產黨，“容共”是容納共產黨，表示共產黨比國民黨低下。孫先生以前有一個時期是擁護聯共政策的，現在也跟着汪先生把聯共改為容共。但“聯共”這兩個字，已成了一個熟讀的專門名詞，而“容共”這個新名詞，是很生疏的，所以孫先生雖然下了決心把聯共改為容共，然而不知不覺之間，容共又順口講為聯共了。習慣上的名詞改過來是很難的，所以今天孫先生時常講錯——容共講成了聯共。幸而孫先生很聰明，聯共兩個字一出口，就知道講錯了，立刻改為容共。再說，又是聯共；再改。這樣，不知改了好幾次，因為孫先生今天講演中用得着容共這個名詞的地方特別多。

孫先生講演中最精彩的一段，就是替國民黨——武漢的國民黨——開闢了一條道路——既不向左，又不向右的“向前進”的道路。他說：

“南京的×××，他們是往右邊走的，現在共產黨是往左邊走的，這都不是真正革命的道路，不是國民黨的道路，不是三民主義的道路。真正革命的，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道路，不是向右邊，也不是向左邊，而應該向前走！（孫先生說這句話，聲音特別沉重，而且頓了一頓。意思彷彿是等聽衆的掌聲，但台上台下竟沒有一個人鼓掌。這使孫先生感覺到一點悽慘，因為當他被陳獨秀在嚮導週報上譽爲“真正革命領袖”的時候，他的反南京方面的演說，每一句話都可以博得聽衆很大的鼓掌。今天孫先生特別發現了一條新道路，但竟引不起聽衆熱烈的歡迎。）所以我們現在不應該向右邊，也不應該向左邊（孫先生說到這裏，回頭來望了望正在喝冰汽水的汪先生，大約孫先生想起了汪先生“到武漢後的第一筆”：“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滾開去！”這句名言，但汪先生顯然沒有反響，依然在喝他的冰汽水），而應該向前走！（他又特別沉重的頓了一頓，可是台上台下依然寂然如故）。

孫先生的訓詞完了以後，接着是唐總司令的訓詞。唐總司令，他是我們總指揮的頂頭上司。我們聽了汪孫兩先生的反共

妙論，以為唐先生也要來這麼一手，把共產黨大罵一頓，或者他比汪孫兩先生罵得更兇哩！但是出乎意外的，他一句話也沒有提到共產黨，只是軍紀風紀的亂說了一回，不到五分鐘，就完畢了他的訓詞。本來汪孫兩位的訓詞，把我們的精神提高到緊張的極點，唐先生像唱催眠歌一樣的，使我們的精神鬆懈起來。

張發奎——我們的總指揮，他很莊嚴地致了答辭，但也和唐生智一樣，一句也沒有提到共產黨。二十四師師長葉挺（他是共產黨員），在台上很留心地傾聽張發奎的說話。汪先生偷望了一望葉挺的臉，但葉挺並沒有望他。

二十軍軍長，那個矮矮胖胖的賀龍，他自始至終是很鎮定的站在台上，當汪先生宣布共產黨陰謀至最緊張的時候，他曾做過一個鬼臉，唐生智和張發奎都看到的。張發奎在致答詞的時候，唐生智望了望賀龍。

高語罕——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秘書長，他的臉完全變成了赭紅色，活像舞台戲上的魏延。他以一種不可遏止的憤怒的神態望着汪精衛的背影。

郭沫若一個人很瀟灑地在讀壁上的標語，由這個到那個，往返重讀着，他似乎並不留心在聽別人的訓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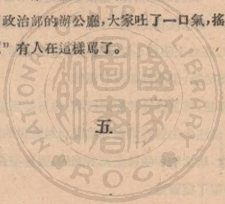
張發奎致答辭以後，是黃琪翔代表新就職的軍長致答辭。

在他走上講台前的時候，廖乾吾望望他的臉。

他的演說簡單到簡直不到三分鐘，就完畢了。當然的，他也沒有提到共產黨的話。政治領袖雖然很起勁的罵共產黨，但軍事領袖只當作沒有這麼一回事，這使汪先生和孫先生都覺得有點出乎意外而不免感覺到有點失望了。

就是在這樣不愉快的空氣中散了會。雖然在散會以前也呼着口號，但大家都似乎沒有精神，所以連口號也喊不響。

回到了政治部的辦公廳，大家吐了一口氣，搖搖頭，“他媽的，這鬼子！”有人在這樣罵了。



武漢的形勢一天比一天更惡劣起來了，主要的原因是馮玉祥的電報。

我們到河南去打張作霖的最大的目的，倒不是在得河南的地盤，而是想與馮玉祥的西北軍取得聯絡。那時我們對於馮玉祥有極大的奢望。從莫斯科來的電報，說馮玉祥對於革命的態度是怎樣熱烈，怎樣真摯，因為馮先生在莫斯科的表示，簡

直比康敏尼斯特還要激烈——簡直比列寧還要革命，比托洛斯基還要左傾。他在莫斯科說，世界上只有布爾塞維克是對的，從前他沒有覺悟，所以他只相信耶穌；現在他覺悟了，他相信宇宙間唯一的救主，不是耶穌而是列寧。莫斯科的人也相信了他的話，覺得他是可靠的，不僅把一批批的軍火和大量的金羅布送給他，而且打電報到中國來爲他吹噓。於是武漢的人全都相信馮總司令是可靠的，如果能夠與馮總司令取得聯絡，武漢就不愁孤立了。

在河南，我們終於打了勝仗，與馮玉祥的西北軍會師鄭汴的目的也終於達到了，這是多麼可喜的事！有了馮總司令，我們還怕革命不成功嗎？

在鄭州，武漢方面的要人都來會馮總司令了。在款宴會上，馮總司令的演說詞中，有一段是關於×××，他很慎重的說：

“兄弟現在要來宣布×××的陰謀。當兄弟在克復西安的時候，×××來了一個電報，他要兄弟在潼關附近，按兵不動，坐視武漢軍隊與奉軍肉搏，等到兩敗俱傷的時候，他出兵取武漢，要兄弟領兵對付奉軍。他的用意是非常惡毒的，就是要消滅武漢軍隊。但兄弟決不上他的當，他要我們按兵不動，我們進攻得愈是激急，所以能夠得到現在的勝利。我現在來宣布他的陰謀，可以證明他實在是反革命，我們應該打倒他！”

他在這樣慷慨激昂的演說以後，就對武漢方面的要人說，武漢的軍隊現在都可以開回武漢去，向下游進攻，河南可以交給他，由他來完成北伐的大業。武漢東征，西北軍北伐，彼此分工合作。於是，河南就被他穩穩的拿到手了。

我們很放心的回到武漢來了，以為河南有我們馮大哥把守，而且北伐大業由他來完成，我們還愁什麼？但是事情真是意想不到的。當我們正回到武漢的時候，馮先生一部專車開到徐州去了。到徐州去當然不是完成北伐大業，而是與×××開會去了。在兩天之前，他還在鄭州會議上慷慨激昂的宣布×××的罪狀，高喊打倒×××的口號，而兩天之後，馮先生在徐州會議不僅與曾在兩天前要打倒的人握手言歡，而且焚香立誓，效桃園之結義，成為異姓兄弟了。

馮先生由徐州回到開封以後，就打了一個電報到武漢來，要求武漢方面對南京妥協，共同肅清共產黨。這在武漢方面，真不啻是一個晴天的霹靂。那時武漢的形勢本來已經非常惡劣。因為長江下游經濟封鎖的緣故，武漢方面煤也沒有了，我在廣州出發前的預料完全證實了；因為煤的缺乏的原故，漢陽兵工廠首先受到影響，幾乎弄到無法開工。京漢路與武長路的行車也就非常困難。在許多地方，只能以柴來代替煤。煤油也沒有了，特別是內地的燃料很感缺乏的危機。鹽也缺乏了，湘

西與鄂西鬧着很嚴重的“鹽荒”，時常因爭食鹽而打死許多人。糧食缺乏的危機也漸漸顯著起來。而最嚴重的，是金融問題。現金的缺乏，幾乎使兩湖經濟有總破產的趨勢。武漢政府以發金庫券與紙幣（中央銀行的）來維持，以致紙幣的價值低落到實際還不到三成。武漢政府集中現金的計劃，絲毫不能減輕這種經濟上的危機。

另一方面，由工農運動的發展，引起了地主資本家的反攻。地主從農村裏被趕到城裏來，立刻與城裏的資本家取得了密切的聯絡，成立了反革命的聯合戰線，因為城裏的工廠主，商店主人，他們受了工人運動的威脅，正和地主受了農民運動的威脅一樣。他們故意怠工，於是生產力不免減低起來，這更增加了社會經濟的恐慌。他們把這責任歸之於工農運動上，於是政府諸公——甚至連陳獨秀譚平山在內，他們也覺得工農運動太過火了，以致弄得這樣。汪先生更明白如果不是共產黨這樣鬧，帝國主義也不致這樣封鎖武漢。

在這種極度恐慌與極度紊亂的時候，武漢的要人全都煩惱，正在這個時候，馮先生又來了這麼一條催命符。

武漢政府接到馮先生的第一個電報後不到二小時，馮先生的第二個電報又來了。這個電報內，馮先生堅決的要求武漢政府在四十八小時之內，把鮑羅廷及所有各軍隊各機關的俄

顧問趕出境去，因為他說這些俄顧問，都是第三國際派來赤化中國，消滅國民黨的——馮先生的態度，完全與在莫斯科時候不同了，在莫斯科的時候，馮先生還以為鮑羅廷是中國革命的祖父哩！

第二個電報到武漢以後，再過三個鐘頭，第三個電報又來了。在這個電報裏，除了重申前議，限鮑羅廷在四十八小時內離境以外，又要求武漢政府驅逐鄧演達，因為鄧演達做了共產黨的工具。

此後，大約每隔三五小時，必又來一個電報，除了重述上述這些要求以外，不是要求拘捕陳獨秀譚平山，就是要求張發奎出洋。像這樣的早一個電報，晚一個電報，一方面促成了汪先生反共的決心，另一方面也使武漢政府更快的走向墳墓裏去了。

武漢的中央日報與武漢民國日報，那時還全在共產黨手中，所以對於馮玉祥來電要挾的一切，一個字也沒有登出來。但是事實總是無法掩飾的，武陽夏三鎮幾乎全都知道了這件事，於是謠言就愈傳愈多，有的說馮玉祥已經正式反水，由河南派兵來取武漢了。甚至有的傳說馮玉祥的軍隊已經進了武勝關，快到武漢來了。其實明眼人都知道馮玉祥雖有這種野心而沒有這種力量。

六

武漢發生了一件嚴重的事變，就是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宋慶齡女士突然出走了。我從負責方面接到了孫夫人臨行時的留別書。這留別書雖然是很簡單，但牠有一種使人感動的力。留別書中僅僅是說武漢的國民黨當局已經忘記了孫中山先生的遺教，與國民黨的敵人妥協而與革命爲敵了。她自己因爲沒挽回這種反動的局勢的能力，只能出於一走。

在這留別書中，我們可以看出孫夫人對於革命的一種熱忱，而字裏行間，對於從前倡言“反共產就是反革命”，而現在努力反共產的領袖，表示深切的不滿。並且我還從負責方面得來的消息，知道孫夫人在臨離武漢的時候，除了這封留別書以外，還有兩封信，一封是致國民黨中央黨部的，一封是致汪先生個人的，這兩書信的措辭，都是十分沈痛，十分悲憤。

讀了她的留別書，誰都要被她的對於革命的熱忱所感動的，想不到一向被我們蔑視爲貴族夫人的她，竟能有這麼一回事做出來。

我最初看見孫夫人，是一九二四年的冬天，那時孫先生從廣東到北京，路經上海，我們一羣青年到碼頭上去迎接他，這位身材魁梧的老革命家，同了位年齡不很相稱的夫人上岸的時候。那時孫夫人在我腦筋裏所留下的印象，是非常虛薄的，我不過把她看做一位普通的貴族夫人而已。後來——一九二五年的冬天，鄒魯謝持輩在北京開西山會議的時候，孫夫人發了一封通電來反對西山會議。在這個時候，我開始在政治意義上認識了孫夫人，“不錯，倒底是孫中山的夫人”我那時就這樣想。我們還在南昌的時候，孫夫人在武漢也有電報來，反對中央留在南昌，主張立刻遷到武漢去。那時武漢方面的聯席會議，孫夫人是很重要的一員。在這個時候，孫夫人已經很積極的參加了政治活動。三月間在武漢舉行國民黨的第二屆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時，孫夫人也是參加了的，而且發表了很積極的主張。她很堅決的反對去年五月間在廣州舉行的第二次中央全體會議上所通過的“整理黨務決議案”，提出了提高黨權，裁制個人獨裁的種種具體辦法。她雖然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了中央委員，但她一向沒有在黨內擔任過實際工作。在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上，她被推為中央婦女部長了。在婦女部，她雖然沒有什麼驚人的成績，但在整個的“武漢時期”，她始終是很堅決的站在左傾一方面。在長沙馬夜事變發生時，她堅決

主張嚴辦許克祥，她的態度甚至比陳獨秀譚平山還要激烈得多。當汪精衛等從鄭州回到武漢時，反共的空氣已逐漸濃厚起來，汪先生等的反共態度，也漸趨堅決。聽說這個時候，孫夫人曾與汪先生力爭，在華商總會（中央黨部）的會議室，有一次孫夫曾痛斥×先生背違了孫先生的遺教。當馮玉祥來電要求武漢政府反共驅逐鮑羅廷的時候，孫夫人很憤慨的說：“鮑顯問是總理所聘請來的，你馮玉祥沒有資格來驅逐他。”當時孫夫人還堅決的主張由中央宣布馮玉祥的罪狀，明令討伐。在這種情形之下，孫夫人這種提議當然是不容易實現的，所以這一個月來，孫夫人的態度始終是很憤慨的。有一天晚上，她的公館（漢口）竟被三十五軍軍長何鍵派兵來搜索了一下。這當然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總理夫人的公館，竟敢有人去搜索，這不僅是侮辱總理夫人，而且是侮辱長眠地下的總理，侮辱整個的國民黨。孫夫人爲了這事更氣得要命。但她知道事情決不是簡單發生的，所以她爲了這事寫了一封很嚴重的信去責問在黨內負最高責任的汪先生，但是汪先生沒有答覆。由此，可見孫夫人之堅決出走，不是偶然的。

由於孫夫人之出走，使我對於武漢的前途更加悲觀起來。我想不是事情到了無可挽回的時候，孫夫人是決不致出於消極的一走的。

嚴重的事變是繼續是發生，鄧演達也突然出走了。鄧演達在武漢政府的地位，實在比孫夫人更爲重要，所以他之出走，其影響之大，自然也比孫夫人之出走更爲嚴重。

在武漢政府之下，除了共產黨以外，就單純的國民黨來說，鄧演達實在是最重要的一員。武漢政府下的純粹國民黨要人，是鄧演達，汪精衛，孫科，徐謙，譚延闓，唐生智，張發奎，宋慶齡。汪精衛是武漢新政權形成以後，纔到武漢來的。如果沒有黨權運動，就決沒有武漢的新政權，也決不致有寧漢對立。所以要說到武漢政府，首先要提到黨權運動，但汪精衛並沒有參加黨權運動，所以汪精衛雖然是武漢方面國民黨的領袖，而實際上，他與武漢政府的關係是比較淺薄。孫科在黨權運動中，雖然也很出力，但一般說來，還不爲鄧演達之堅決積極。在寧漢對立以後，以地位而論，孫科也不及鄧演達。徐謙在黨權運動中的活動，固不如鄧演達之積極，而在武漢政府中的作用，尤遠不如鄧演達。河南討奉勝利之後，他就離開了武漢，追隨馮玉祥到徐州去參加南京方面的會議去了，所以實際上，他已經背叛了武漢政府而成爲南京統治下之一員了。譚延闓雖然是國民政府的代理主席，但他實在是一位無所謂的好好先生，黨權運動他並沒有參加，他之所以成爲武漢政府的一員，與其說是他政治主張的傾向，不如說是他的環境所造成，所以嚴格

說來，他是武漢政府一員配角而已，說不到作用。唐生智是武漢方面的軍事領袖，在某種意義上說，他當然是武漢方面的要員。但他之參加武漢政府，自有他的個人的作用，所以他決不是武漢政府的一個政治中心。在政治意義上說，張發奎在武漢政府的地位，實在比唐生智更為重要，但他在這裏多少是受了鄧演達的影響。在汪精衛沒有到武漢的時候，張發奎在政治上是完全跟鄧演達走的，所以我們可以說，鄧演達是武漢政府的政治中心，他之突然拋棄了武漢政府而出走，可說是武漢政府解體的表徵。

鄧演達出走的時候，也和孫夫人出走時一樣，留下了一封給武漢民衆的留別書。不過他的留別書，寫得比孫夫人的留別書更為沈痛，充滿了悲憤的情緒。他眼看他手創的武漢政府之瀕於死亡，悲憤之情，自不能免。

鄧演達在出走以前，爲了反共與聯共的問題，曾與汪先生起過幾次爭執。汪先生是主張反共的，而鄧先生却主張仍與共產黨合作。他對於汪先生那種突然趨向反共的態度，表示不滿。當馮玉祥來電要求鄧演達出洋的時候，汪精衛拿了這個電報給鄧演達看，但這個時候，鄧演達對於武漢政府還有一線的希望，所以沒有辭職，後來到各方面的形勢已至無法挽回的時候，纔不得不出於一走。

鄧演達是首倡黨權運動的人，是武漢政府的重心，他尚且走了，武漢還有什麼希望？

七

武漢的經濟狀況與政治形勢是一天天惡化起來，一個大的變動正在醞釀，這是誰都可以看得出來的。

鮑羅廷也走了，在武漢方面的俄顧問，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幾乎全都走了。

共產黨退出國民政府的宣言，在武漢公開散發着。農政部長譚平山，勞工部長蘇北徵，都辭了職。時局之益趨嚴重，是不待說了。CY中央指斥國民黨領袖摧殘工農運動的宣言，也繼續在市街發現了。

共產黨雖然宣言退出國民政府，但很矛盾的，他們宣言說他們僅僅是退出國民政府而不退出國民黨。共產黨的領袖陳獨秀，依然還做着國共兩黨合作的夢，所以武漢的形勢雖然已到了無可挽回的程度，而陳獨秀還是命令他的黨徒到處張貼“國共兩黨合作到底”的標語。陳獨秀爲了要維持“國共兩黨合

到底”的政策，真是煞費苦心！汪精衛責武漢的店員工會鬧得作太不像樣了，陳獨秀立刻體順汪先生的意旨，自動下命令來解散了武漢的店員工會。汪精衛說工人武裝糾察隊足以增加時局的嚴重性，於是陳獨秀立刻下命令解散了總工會的武裝糾察隊，將工人糾察隊的槍枝繳到武漢衛戍司令部去了（武漢衛戍司令是唐生智部下的第八軍軍長李品仙）。汪精衛說，各縣的農民協會鬧得太不成話；於是陳獨秀立刻下令告戒負農民運動責任的黨員，責其不可過火。汪精衛說，農民自衛軍足以引起地方的恐慌；於是陳獨秀就解散了農民自衛軍，將槍枝交給了地方駐軍。汪精衛說，CP在軍隊中做政治工作的宣傳階級鬥爭，引起部隊官長的反感；於是陳獨秀就命周恩來禁止CP在軍隊中宣傳階級鬥爭。總之，只要汪精衛這麼說，陳獨秀無不奉命唯勳。但是陳獨秀這樣馴良的服從，並不足以減輕時局的糾紛，時局的危機顯然是更其緊張了。

汪精衛孫科唐生智輩之反共，已下了決心，武漢之所以還沒有像南京那樣殺戮共產黨，就是因為張發奎還有一點問題。

我自從到第四軍來，已經三個多月了，張發奎的為人及其思想傾向，我已經有了相當的了解。在作戰的時候，他不愧是一員勇將，但他也只是一個軍事人材而不是政治家，他的政治認

諷實際是淺薄的。他同情於工農勞苦羣衆的解放，這是一個事實；但他同時把他個人的爵位功名看得比工農羣衆的利益更爲重要。在一般軍人中，他的頭腦當然是比較清晰，但他的封建軍人的傳統觀念並沒有完全掃除。總之，在一般軍官中，他僅僅是比較進步而已，但他的頭腦還是很簡單。CP 的理論原則，他是不了解的；但他同情CP那種奮鬥的精神。在部隊中，他常以葉挺蔣先雲那種勇敢善戰的精神來訓勉部下。因爲他的思想是比較一般軍人稍爲清楚，所以他的部隊裏的CP分子也比別處多。又因爲他的部隊裏CP分子較多，所以他對於CP的態度，也就與唐生智輩不同。在他個人的初意，是不願與共產黨分家的，因爲他部下共產黨既多，一分家，自不免有所損失，而且共產黨的政策，在當時與他並沒有利益上的衝突。但他本人的政治頭腦非常簡單，在那時候，汪精衛就成了他的靈魂。他雖然不願反共，而汪精衛却堅決反共，於是他動搖起來了。

與共產黨繼續合作嗎？汪先生不這樣幹，我怎麼能這樣做呢？與共產黨分家嗎？我的部下CP分子有師長（葉挺），有團長（盧德銘，周士第，許繼慎，范蒸，劉鳴震，周逸羣（第二十軍教導團長），梁秉樞），還有絕對同情於P的軍長（二十軍軍長賀龍），至於團長以下的軍官，CP分子更多。反共嗎？至少要分股我一半的勢力，怎麼行？——於是我們的總指揮張向華徬徨起

來了。

時局雖然已到了岌岌無可挽回的嚴重的局勢，但陳獨秀的“國共兩黨合作到底”的迷夢依然還沒有醒。他一方面極力服從汪精衛的意旨，一方面又極力拉攏張發奎。在汪精衛方面要反共，自然非將張發奎拉進去不可。於是張發奎的左手被陳獨秀周恩來牽着，而右手又被汪精衛孫科拉着。究竟是傾向到那一方面去呢？在自己的方向沒有決定以前，只有以一種滑頭的手段來對付各方面。對於周恩來高語罕廖乾吾葉挺輩，則表示第二方面軍無論如何決不反對共產黨，不與共產黨分家，甚至痛哭流淚的表示他的決心。但對於汪精衛唐生智孫科輩，則表示堅決反共。實際上，他也的確是在進行反共的佈置了。

陳獨秀得了周恩來高語罕廖乾吾葉挺輩的報告，對於張發奎是深信不疑的，但這時候，張發奎的真實態度，已逐漸傾向於反共了。

陳獨秀當時有一種計劃，想把張發奎拉在手裏，就把張發奎的軍隊，以及武漢方面其他同情共產黨的軍隊，拖到廣東去，在廣東再建立革命的根據地。在七月上旬，陳獨秀周恩來輩是以全力來做這一工作。當時武漢方面，除了張發奎的軍隊以外，中央獨立師（即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是全部可由共產黨指揮的，湖北省政府的兩個警備團，也是可以利用的。

陳獨秀就想把這一部勢力拖到廣東去。但他又沒有決心，因為他同時對於汪精衛還存有相當的希望，以為汪精衛或有萬分之一的可能跟了他走。所以那時本有一個計劃，藉打野操的名義，將武漢分校的全部學生（即中央獨立師），全副武裝的拖出去，打野操一打就不回來了。可是因為陳獨秀沒有決心，所以武漢分校的學生，雖然已經全副武裝的拖出了武昌城，而後來還是因陳獨秀命令，他們仍舊回到武昌兩湖書院校裏來。

陳獨秀的計劃，是將張發奎部隊拖到廣東去；可是他有這種計劃而沒有這種決心。同時汪精衛則企圖將張發奎的軍隊帶出去東征——進攻南京。回廣東，還是打南京？張發奎本人是徘徊於兩者之間，而他的軍隊在這時候已開始向江西方面移動了。

八

武漢的夏天，真是熱得可以！時局是這樣惡劣，而天氣又這樣悶熱，這種生活，實在不是我所願過的。這樣下去，有什麼意義？我開始懷疑起來了。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實際上已等

於取消。我的宣傳科長也弄得無工可做，雖然金庫券的薪餉還是可以領到，但這樣的生活，又有什麼意義呢？

離開武漢吧！我這樣想。但到什麼地方去呢？南京？當然我是不能去的。上海？杭州？我不能去，也不想去。還是回廣東去！廣東雖然已經變了一個樣子，但廣州究竟還是可留戀的地方。東山的景色，想必依然如故；那位不知姓氏的而又實在使人思戀的小姐，是否還在東山？這樣想時，我恨不能立刻飛到了廣東，飛到了東山的我的故居。軍隊裏是充滿了回廣東的空氣，我之所以還沒有決心離開軍隊，就是在此。因為如果跟了軍隊回廣州，當然比個人單獨回去，更方便而有意義。

第二方面軍的情形，一般說來，比其他的軍隊要好得多，這時候我們雖然爲了政治上的惡劣的形勢而煩惱。但個人的生活問題，總算還沒有發生。可是在唐生智系統下，無論是八軍，三十五軍，三十六軍，以及其他軍隊方面，做政治工作的幾乎全都失了業，結果是成羣的擁到第二方面軍來，甚至有許多人以個人的關係來找到我，要我安插位置，這對於我，實在是非常痛苦的。不爲他們設法嗎？太對不起他們了；爲他們安插嗎？事實上又做不到。不僅是原來在武漢方面做工作的失了業來找到我，甚至有許多從浙江來的青年，雖然是我素不認識的，也要找我爲他們找生活上的出路。這樣，我更陷於痛苦的深

淵中了。

武漢分校的色彩，始終是很濃厚的，一般人都把分校看做是清一色的 CP。在時局這樣嚴重的時候，分校的運命尤其是可悲觀的，於是——一般學生都不能不設法找個人的出路。男生總還好，實在沒有辦法，還可以當兵，女生隊的女同志們可糟了。這一批年輕的小姐，本來都是從舊禮教壓迫之下叛變出來的。在他們的宗族，親戚，家鄉的一般人看來，她們都是禮教的罪人，都是道德的叛徒，都是大逆不道的“墮落”(?)者，要她們仍回故鄉去，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都是不可能的，因為作算家庭仍舊收容了，而她的週圍的環境也決不容許她安居。她們雖然措了幾個月的槍，雖然天天上操場，可是娘子軍還沒有組織起來，以致她們連要投軍也無處收容。

這幾天來，分校的女同志會到的特別的多，彼此談到黑暗的前途，都為之淒然！

爲了想解除痛苦，所以要找點刺激。星期日那天，同了分校的四位女同志和總政治部的張君，同上漢陽門的黃鶴樓上去痛飲一醉。

黃鶴樓是武昌最著名的勝地，初到武漢時曾偕友來游，現在舊地重遊，風景依舊，而時局全非，環顧大江東流，不勝白雲蒼狗之嘆！

黃鶴樓上賣茶而兼賣酒的地方，已經坐滿了人，我們找了很久，纔找到一個靠江邊窗口的座位。燙了兩斤遠年的紹興酒，喊了幾樣精致的小菜，我們就在這面臨大江的座上開始暢飲了。

“我們今天在這黃鶴樓上很痛快的喝酒，再過幾時，就要彼此分散了，盛會難逢，想起了真使人傷心！”陳小姐很感慨地說，

“今朝有酒今朝醉……”張小姐自言自語地說，一面拿起酒杯來喝了一口。

“陳同志是不是準備回家去？”我看了陳小姐那種過於悲哀的神態，很想找點話來安慰她，但是又想不出什麼話來。

“不！我是無家可歸的人。”陳小姐說時，眼睛上起了一個紅圈。

“張同志呢？你就要回家去嗎？”我不忍再看陳小姐那種過於悲楚的臉色，回轉頭來問張小姐。

“我嗎？我是有家歸不得。”張小姐很悲壯地說。

我們大家默默地喝着紹興酒。

在這時候，另外兩位分校的女同志從外面進來，她們正在到處找座位，我們一起的劉小姐先發現了她們，就把她們拉到我們這一桌上來了，我們本來是六個人，現在變成了八個。我

不認識這兩位新加入的客人，陳小姐爲我們介紹，但劉小姐傷冬烘先生吟詩經般的吟着：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新加入的來賓並不能使我們的精神興奮起來，彼此同樣的都感覺到無家可歸的悲哀，增加了兩個人，情形似乎更淒慘了。“用酒澆愁愁更多”，單是喝酒是不能解愁的，張小姐站起來靠着欄桿唱英文的國際歌，一種悲壯的聲調掃除了我們的小資產階級的離別的悲哀。我們算清了酒錢下了樓。

八個人誰都不願意一個人先走，在黃鶴樓下的照相館裏拍了一個照，因爲餘興未盡，又到首義公園裏去遊玩了一回。公園西側的牆上題着許多遊人的詩詞，我們八個人都在這裏寫了幾個字，我一時想不到適當的詞句，只得胡亂寫了“請看今日之城中，竟是誰家之天下？雅林”這幾個字。

夕陽已經西下，彼此很熱烈的握了握手，在斗級營的街頭悵然告別了。

我一個人很淒慘的回到了督軍署。下午經過勤務兵的精細的收拾，我的房間裏更顯得精緻可愛了，但可惜我要繼蕭耀南姨太太之後，與這個房間分別了，不知以後是誰來住了這個房間？這樣一想，我更覺得捨不得離開這個房子了。我無意識地站起來看看房間的四週，無意中，在模糊得很精美的牆壁上

發現了鉛筆寫的小字，筆跡模糊得有點看不清楚了，我竭盡了目力，纔看到所寫的是紅樓夢中林黛玉葬花詞中的一段：

“樑間燕子太無情；明年花發雖可啄，却不道人去樓空巢亦傾。”

這更增加了我的愁思。我在這房子裏住了將近一月，何以到今天纔發有這幾字？從字體看來，可知這是女子寫的，不知是不是從前這屋裏的主人——蕭督軍的年輕的姨太太所寫的？我初進屋子時候，同情這位現在不知漂流到什麼地方去了的年輕的太太，現在我將和這位太太同病相憐了，以後來住這屋子的人，不知是否還同情我們？我在感慨之餘，提起筆來也想在旁邊寫幾個字以留紀念，就寫了崔魯的華清宮：

草遮回磴絕鳴鑾，
雲樹深深碧殿寒；
明月自來還自去，
更無人倚玉欄干。

我覺得我今天完全變了一個人了，我已不是有殉道精神的革命戰士，而成了一個多愁善感的文弱書生了。這樣的情形是不行的，今晚上怕要患失眠症了，還是到漢口去打牌吧。

九

離別武漢的日子終於到了。

那天晚上過江去打牌，一打打到了第二天的早上九點，精神疲倦到不能回武昌去辦公了，也沒有請假，就在漢口的旅館睡到了下午四點鐘，纔回武昌。漢口究竟比武昌熱鬧得多，一半是我近來的心理作用，我近來特別厭棄武昌，彷彿武昌城裏寂寞得出鬼，要不是還留戀着那間精美的寢室，我就要天天到漢口來過夜了。

回到了政治部，就接到廖乾吾主任的秘密通知：

“明晚七點鐘，我要跟軍長到九江去，請你也同去，並請轉告羅股長毛股員，一同出發，秘密。乾吾”

好了，相處兩月的武昌，我要離開你了，這次到九江去，會變出一個什麼花樣來，那是很難說的。軍長出發，尚且要守秘密，這是什麼一回事，只有天曉得！他媽的，也不要管牠，橫豎只有一個頭顱，由牠漂流到什麼地方去吧！

因為明天就要離開武漢了，所以今天晚上還是到漢口去過夜，再痛痛快快的打一場牌也是好的。可是當我正準備過江的時候，廖主任又來喊我去開會去了，終於想最後到漢口去一

趨，也不可能。

黃琪翔——我們的軍長——明天出發，但軍部並不全部隨行，所以政治部也只有一部分出發。

七點鐘在平湖門集合，他們都上了船，但我爲了要等揮代英，在平湖門外候到了九點鐘，因代英跟了我們出發，但他自己又找不到我們的船，所以我必須在這裏候他。

一艘很小的輪船，沒有靠碼頭，我們由划船渡到了江心，費了很大的力氣，纔在黑暗中爬上了輪船。黃琪翔還沒有上船，我和代英乾吾幾個人在大棗間裏閒談。事情已到了這步田地，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所以我們簡直沒有談到政治。大棗間裏的空氣很悶熱，我們走出來在甲板上站了一回，望望對岸漢口市場的繁華的燈火，彼此都有點悵然。

“他媽的，我們辛苦經營的武漢，現在完了。”乾吾一面吸香煙，一面用陝西土話來罵人。

“天氣爲什麼還這麼熱？”代英把談鋒轉到別方面去了。“西望夏口，東望武昌……”他一個人無聊地吟着曹操在赤壁所賦的詩。的確，談到政治問題，只有增加我們的煩惱，還是不談的好。

“應該是北望夏口，南望武昌，爲什麼說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呢？”乾吾用手來指着這邊的漢口與那邊的武昌。

“曹操詩中的武昌是指鄂城，不是這武昌。”我爲他解釋。
“我初從南昌到武漢時，武漢像一座活的火山。現在呢？武陽夏三鎮都浸沉在黑暗中了。”我不禁爲之嘆息。

一灣新月從雲圍裏銜出來，月光的影子在江心中蕩動着，也像是無數的小蛇在輾轉遊着。這，使我斗然想起高語罕的那首夜泊黃埔的詩來了：

讀罷離騷聲悲笳，

入夜江心走黃蛇；

曾住此間三月暮，

而今一水是天涯。

我把這首詩誦給乾吾代英聽，他們也感覺到有點惜別的情緒。

輪船在深夜十二點以後纔開。別了，武漢！別了，武漢的民衆！

九江與南昌



七月二十三日的下午，我們從漢口到了九江，軍部特務營的一排兵士在碼頭上迎接我們，我們跟黃琪翔到了儒利女學，但儒利女學不能做我們軍部的駐紮地，副官處的人出去找地方了，我們在樹陰下休息了一回。天氣真熱得要命，九江似乎比武漢還要熱些。

因為是暑假期內，學生都不在校裏，各處的門都鎖着，不

能進去參觀，只能在院子裏坐坐，這房子建築得很好，比南昌的葆靈女學還要好些。

二十四師師長葉挺到儒利女學來看黃琪翔。他比我們先兩天到了九江，他的部隊已在向南昌開拔。

葉挺——那個年輕的共產黨員的軍官，頭髮剃得精光，穿一套淡黃色的呢嘜軍服，皮綁腿是深黃色的，在儒利女學的院子裏很神氣的踱來踱去，與黃琪翔說着閒話。黃琪翔也還年輕，比葉挺稍為大一點，身材也稍為高一點，他們都是廣東人，說着廣東普通話。

找房子的副官回來報告，已經找定在九江總商會內。上次由南昌到武漢路過九江時，曾和毛君到總商會去玩過，就是那個面對匡廬，前臨甘棠湖的風景很優美的地位，軍部設在這裏是很好的。

到了總商會，但黃琪翔要住到甘棠湖中的煙水亭去，於是我們也同住在甘棠湖中了。

據說這就是三國時代周瑜練水兵的地方，煙水亭就是他的都督府。這傳說是有幾分可靠的，九江縣志上也有這樣的記載。黃琪翔住了正面的那幾間屋子，我和乾吾代英住在右邊的那一塊，其實右邊一塊是煙水亭中最好的地方，這裏有一座小小的亭子，一個稍種花木的院子，兩間很寬敞的屋。代英和乾

住在亭子裏了，我在河南露宿慣了，所以晚上就把行軍床鋪在小院子裏露宿。

天氣雖然是很熱，但住在這裏，頗為清幽可愛。

煙水亭是九江的名勝，尤其是夏日縮暑的勝地，所以平常的遊人極多，而牆壁間亦題詠殆遍。當然也有可誦的佳作，而使人惡心的濫文，實在更多。我本來很歡喜讀前人的詩詞，自從武漢政變以來，由於政治上的煩惱，使我更歡喜讀這些東西了，而且歡喜把這些東西到處塗鴉，以留紀念，所以在煙水亭內的一小亭子（煙水亭是這一座島上的建築的總稱）的牆壁上，寫了杜牧的赤壁懷古：

折戟沈沙鐵未銷，
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
銅雀春深鎖二喬。

在幼年時候讀三國演義，對於這位顯曲周郎，表示深切的同情。他的少年英才，他的功名事業，他的風流豔福，都是我所羨慕的，現在我住在他生前的住所，尤其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我覺得像他這樣雖然英年夭折，但也不虛此一生了。

在以前，我們每到一個地方，就要做工作，而現在簡直無工可做了，可以很舒服的玩，就和政治部的同事羅君和毛

君同出去行街。煙水亭是甘棠湖中的一個島，從這裏到街上，是要擺渡的，好在軍部僱有差船。

到了大街上，覺得非常悶熱，第一個需要是想喝點冰汽水。就在甘棠湖到大街上去的那個街口，有一家廣東潮州人開的飲冰室。此地的東西真是貴得出奇！正廣和汽水要賣七角大洋一瓶，在上海只要一角三分就夠了。但如果拿現大洋來買，一元大洋也可以買到四瓶。因為商人對於漢口紙幣和金庫券表面上不敢拒用，只得抬高物價來減低這些紙幣的價值。


七角大洋一瓶，三個人喝了三瓶就得兩元一角，這種代價之高，是世所罕聞的。

上館子去吃東西，比上次來九江時更貴得多了。

因為沒有事做，而天氣又這樣酷熱，只是在煙水亭裏睡覺和看書。這兩年來，我這在廣州南昌上海武漢等處，所買的書籍，也頗不少了，數年飄泊，沒有別的東西，只有八大箱子書籍，就是一生的財產。在漢口臨行時，因為不便攜帶，把這八口箱子，全部交給了政治部的同事杜祥書君代為收藏，因為杜君家在湖北黃陂，離漢口沒有好多路，較便寄藏。不過此次離武漢以後，不知何日纔能再來這裏取書，這是誰也不能預測的。我的唯一的財產就是這八箱子書，而又不許我帶在身邊，一個革命者的生活，就是如此！書既都沒有帶來，以致要看書也

沒有書看了。毛加翼君的行囊中帶有幾本小說，我問他借了張資平的“飛絮”看了一了遍，這部變愛小說很使我感動。

在河南及回武漢後曾讀過郭沫若翻譯的屠格涅夫的“新時代”，但沒有讀完，所以到商務印書館去買一本，從頭至尾，重讀了一遍。我覺得我自己有點像涅暑大拉夫。郭沫若在這部書的序文中說，他也覺得有點像涅暑大拉夫，但後來他把他心目中的涅暑大拉夫槍斃了。這是郭沫若說的。我不知要到什麼時候，纔槍斃我心目中的涅暑大拉夫？

A circular stamp from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s centered on the page. The outer ring contains the tex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n English. The inner circle contains the Chinese characters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n a stylized font, with a smaller character "二" (2) in the center.

高語罕也到九江來了，而且他也來煙水亭和我們一起住了。這老頭子我並不討厭他，談談，也怪有味的。他送了我一部書，這是他的近作“公民常識”。他看見我的勤務兵在看七俠五義一類的舊小說，就把他的“公民常識”送了一本給他，勸他不要看這些無益的舊小說，而讀讀這部公民常識。

許多CP了方面的要人到了九江。除了代英語罕住在我們一起外，譚平山，吳玉章，林祖涵，李立三，張國燾，彭湃等等都

來了，於是九江的空氣也緊張起來了。

九江有一種新出的日報“國民新聞”，載有罵汪精衛孫科的文章，購讀的人很多。這報上有一部份論文是高語罕做的。

在我們到九江後的下一天，黃琪翔在煙水亭宴請第五路總指揮朱培德，第九軍軍長金漢鼎。朱培德帶了很多的馬奔來，煙水亭這小小的地方幾乎擠不下了。

這天晚上，乾吾，語罕，代英等在小院子中閒談。談到安徽賀耀組有反南京的傾向，黃琪翔的意思，急需要派一個偵探去偵察一下，但一時苦於沒有適當的人可去。

這幾天，我正覺得生活太無聊了，久靜思動，當時聽了語罕等的談話，就自告奮勇，願意到安慶去跑一趟。語罕也認為我到安慶是很適當的，因為我是下江人，而且還可以化裝成一個學生，別人就很難看出是一個軍事偵探了。第二天，語罕乾吾去對黃琪翔說了，黃琪翔也認為我去很好，立刻就發了三百元公費，要我就動身去。因為我身邊沒有便服，想去買一套現成洋服，而九江洋服舖一共只有兩家，合我身材的現成衣服又沒有，於是我決意先到漢口，再由漢口直赴安慶，因為在漢口買洋服，當然是方便得多。政治部的大多數人還在武昌，我到漢口還可以望望他們。我的計劃得了乾吾與語罕

的同情，我就在七月二十六日的下午，搭輪西上，重到武漢來了。

那天晚上離開漢口的時候，總以為不知要什麼時候，纔能再來，那知只隔了三四天，又來武漢了。

武漢的形勢顯然又有點不同了，CP 的重要人物全都跑了，湖北總工會與湖北省農民協會都無聲無息地等於已經沒有。各機關的職員，CP 色彩濃一點的，也都跑了。汪精衛孫科唐生睿等正在進行大規模的反共計劃。

在漢口一上岸，就到中央黨部去找朋友，在中央黨部又會到了吳文祺，他說他將要往浙江去。

許多朋友都搬得找不到了，大約他們已在準備過地下生活了。到甯波同鄉會去找孔令俊，也不知去向了。

當夜趕到武昌去，以為政治部還在武漢，那知已於今天上午開拔到九江去了。這意外的消息給了我一個打擊，因為我還想到政治部來拿一點錢，想不到他們已經走了。

洋服雖然買好了，但我看形勢已有點不對，據武漢方面的傳說，第二方面軍即日就要從九江開拔到廣東。這樣，如果我們一個人深入虎口到安徽去，那不是很危險嗎？這不能不使我躊躇，所以我又決定在武漢再逗留一天，如形勢不佳，還是回九江去的好，如果有到安徽的必要，到了九江還是可以去

的。

回到漢口去同了幾位老朋友在同華樓吃夜飯，因為菜還沒有來，我獨自倚在欄桿上望樓下街上來來往往的人羣。天氣依然還是很熱，街頭沒有一點涼風。我正在閒眺，忽然望見那邊來了一輛人力車，從前軍人部的同事田汝勤穿着兵士的服裝，坐在車上。我把他喊住了，上樓來一同吃夜飯。他自從軍人部解散以後，就到了武漢分校政治部去工作，現在因為看見在分校裏是沒有辦法了，所以丟了皮帶，到總政治部的教導營入伍去了。他把分校的最近情形詳細地告訴了我。分校現在差不多已經完全解體了。分校的重心，本是鄧演達，候連瀛，譚代英三個人，現在這三個人全都跑了。次要一點的人物，是楊樹松，施存統輩；楊樹松是一個糊塗蟲，施存統則好久沒有到校裏來了。色彩稍多重一點的人，幾乎全都跑了。最慘的是女生隊的女生，她們都是舊禮教的叛徒，大多是無家可歸或是有家不得的人，分校解體以後，她們都成了失林之鳥，真是備極慘酷。那天在黃鶴樓與我一起喝酒的那六位小姐，不知漂流到什麼地方去了？革命，革命，革命的結果，原來是這樣的！

三

我決定不去安慶了。因為我知道汪精衛孫科唐生智張發奎等在今天——七月二十九日——由漢口到九江去了，九江不知又將鬧出一點什麼新花樣來，讓我到九江去看看吧。

二十九日的中午從漢口動身，三十日就到了九江。

我們政治部的全體都早已到九江來了，他們駐在一個已經停歇了的洗澡堂裏，屋小人多，簡直像一隻蒸饅頭的蒸籠，我只立了一刻，汗已經濕透我的襯衫。廖主任仍舊住在煙水亭，我也還是到煙水亭去住，這裏涼快得多。代英已經到南昌去了，語罕還住在這裏。

許多OP的要人都往南昌跑，李立三，張國燾，彭湃，林祖涵，吳玉章，譚平山等，全都到南昌去了。

據廖主任說，我們不久出發到廣東，所以安徽也可以不必去了。我可以不必冒險，而三百塊錢已經領來用了，這是很“衛生”的事！

安慶既可以不去，廣東又不立刻出發，在九江又沒有事。在武漢還可以打牌，在此地連打牌的機會也沒有了——因為此地沒有較大的旅館。大東旅館雖然比較大一點，但又不准打牌，在此間又沒有住家的朋友。太無聊了，所以我就想上廬山

去玩。

南潯路車站對面的大東旅館，在九江總算是最體面的旅館了。許多朋友在這裏住着，我從漢口回來後，在洗澡堂與煙水亭轉了一轉，就到大東旅館去訪友。

靖大康——武漢分校的活動份子——帶了幾位女同志在這裏住着。他已經被派在二十四師政治部工作，今天就要趕到南昌，因為二十四師師部已經進駐南昌了。沈雁冰也住在此地，今天就要上廬山去。雁冰是我在廣州中央宣傳部的同事，他是宣傳部的秘書，但三月二十號中山艦事變發生過後，他就回上海去了。我初從南昌到武漢時，在武昌會到過他，那時我還住在省議會，軍人部還沒有取消。雁冰就住在閱馬廠附近，他是與李達同住的。一個春寒的晚上，我同了他的妻弟孔令俊去拜訪他，很愉快的閒談了兩個鐘頭。此後雖同在武漢，而沒有會面的機會。他們究竟是會享樂的，在革命高潮的時候，他們就以“革命名士”的資格，到處受人歡迎；在高潮低落的時候，就不管一切的上廬山去玩。他的夫人與小孩已經先回上海去了。這次與他同由漢口來九江，將同上廬山的，還有他的武漢民國日報的同事宋雲彬，也是我的老朋友。我在他房間裏談了一刻。眼看他們上廬山去玩，於是我也決定明天動身去玩幾天。

李碩勳的夫人趙君衡，歐陽繼修的夫人唐隸華，她們也都住在這裏。這大東旅館住着我的朋友真多。她們今天就要往南昌去了。

決定明天上廬山去玩，但總須邀幾個同伴纔行，一個人是乏味得很。我拉不到女同志，祇能找臭男子同去了。政治部的編纂股長羅承烈，十二師政治部主任梅電龍，這兩個人是已經約好了的，連我是三個人，也行。

爲了明天一早就上廬山，所以今晚睡覺得特別早，明天可以早點起身。但事情的發生，往往是出乎意外的。睡到半夜裏，有人把我推醒了。我擦擦眼睛起來一看，是廖乾吾與高語罕。

“不要作聲，你快點起來，我對你說。”乾吾輕輕的告訴我，情形似乎是十分嚴重。

我起來了，跟了乾吾語罕到後面的一間小房子裏，那時郭沫若還在外面房間的兩張並着的八仙桌上躺着，睡得正熟。

“不好了，我們得立刻就走。”乾吾告訴我。

“什麼事？這樣嚴重，”我本來還沒有睡醒，被他這樣一嚇，神志也清醒了。

“汪精衛唐生智等開廬山會議的決定，我們四個人——代英，語罕，我和你，都被密令緝拿，再不走，就要糟了。”乾吾向

我解釋。

“你爲什麼能知道？”我問。

“參謀長(葉劍英)連夜派人下山來通知我的。”乾吾說。

“你們被密令緝拿，是因爲你們有地位，爲什麼連我也被密令緝拿呢？”我問。這真是我夢想不到的。我在第二方面軍，歷史固然是很短，而地位尤其是卑小——僅僅是一個軍政治部的宣傳科長，你們要緝拿重要的人物，爲什麼把我這小職員也牽進去呢？我不僅是一個地位很低，毫無歷史的小職員，而且我實在是一個很浪漫的，毫無作用的人，爲什麼他們要這樣對付我呢？我固然是無用，他們是更其糊塗！

“誰曉得？要緝拿的還不只我四個。”

“還有誰？”

“九江市黨部，國民新聞，九江書店這些地方的負責人，都在緝拿之列，通緝的命令已經交給九江警備司令金漢鼎了，明天就要來執行，所以我們得連夜就走。”

“往那裏走呢？”我問。

“只有到南昌去。”語罕說。

“到南昌去幹什麼？我不想去了。”我說。

“不到南昌還能到什麼地方去呢？現在已經沒有別的路了，還是到了南昌再說。”乾吾說。

我現在也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浪子了，的確，我也沒有地方走了。除了跟了他們到南昌以外，還有什麼辦法？

於是我們就來商量到南昌去的辦法。代英早已走了自不成問題，現在我們三個人決定同走。但到南昌的火車，總要等到天明纔有。住在煙水亭，恐怕有意外發生，所以決定半夜裏就搬出來，搬到火車站對面的大東旅館去暫住，天明後上火車，也方便得多。

在武昌臨出發時，在總政治部領了二十六枝駁壳，因為總政治部原有五十餘枝駁壳，那時總政治部實際上已等於瓦解，這些槍枝，落掉了可惜，所以張發奎要我們去把五十餘支槍領來，與十一軍政治部瓜分。我們現在要走了，這些槍丟了可惜，所以我決意把牠帶走，就命勤務兵裝了兩口箱子，一起帶到大東旅館來了。

在大東旅館開了兩個房間，我和乾吾住了一個，這個正是白天雁冰和雲彬住的，他們現在早已在牯嶺安睡了，我本也打算上廬山去，想不到半夜裏還要逃到此間來。早上——現在說起來是昨天的早上了，與雁冰雲彬在這房間裏談天，那裏料得到我也會在半夜到這房間裏來？事情竟是這樣奇怪呀！

四

火車好容易到了八點半纔開，那是七月三十一日的上午。我們又要離開九江了。人生敘散無常，而戎馬生活，尤其是不可預測，此去南昌，前途的險惡當然是更多了。

火車飛一般的向前奔馳。火車！你儘管不停止的奔馳吧，最好把我載到天的盡頭，那人跡罕到的地方，讓我像魯濱孫一樣的過着野人生活吧！——我這樣無價值的幻想着。

從火車上可以望見廬山，漸漸的，漸漸的，向後面消逝了。雁冰和雲彬，此刻想還在山上睡覺吧，如果不發生這意外的事變，我此刻也該快到牯嶺了。

因為晚上沒有睡足，所以在火車裏竟睡着了，醒來時，火車已停在黃老門車站了。

到了黃老門車站，總算脫離了虎口，因為黃老門的駐軍，是二十五師七十三團，雖然也是張發奎的部隊，但七十三團本來是葉挺的基本部隊獨立團改編，團長周士第，是和廖乾吾高語罕一起的人物。沒有到黃老門以前，我們三個人都是逃亡的逋客，但是到了黃老門，彷彿是到了自己的老家，不僅不怕人來管束我們，而且我們自己可以管束別人了。本來火車在這裏

只停留五分鐘，但為適應我們的需要，利用盒子砲的權威，命令站長將火車暫時扣留在黃老門車站，乾吾與語罕，到七十三團團部去和周士第團長開會去了。

在七十三團的團部吃了一頓午飯。因為早上沒有進早餐，這頓午飯特別好吃，所以特別吃得多。飯後還吃了一隻大西瓜，在將近一點鐘的時候，纔開車南下。

車過馬迴嶺，也稍為停了一刻，此地為賀龍的一部分軍隊駐紮，但已在準備往南昌開去了。

在德安車站又停了一刻鐘，到涂家埠，火車龍頭竟出了毛病，經過了長時間的修理，所以趕到南昌牛行車站的時候，已是晚上九點鐘了。

牛行車站與南昌城之間，有一條遼闊的贛江隔離着，從車站上下來要進城是必須渡過贛江。車站上原本備有渡江的專輪，但因為今天火車一被我們扣留於黃老門，再在涂家埠出了毛病，路局方面以為今天火車不會再到了，所以渡輪還在南昌城這邊。我們下了車，一時竟找不到渡船。乾吾和語罕都沒有來過南昌，勤務兵也都沒有來過，他們甚至還不知道從火車站到城裏要渡河的，及至到了江邊，找不到渡船，望江興嘆，十分焦急，雖然在黃老門飽餐了一頓，但到九點多鐘還沒有吃晚飯，餓得不得了，又飢又急，不知如何是好。

終於被我找到了一隻擺渡船，在船夫的重價苛索之下，把我們載到了章江門。謝謝天地！我們總算到了南昌了。

到章江門時差不多已經十點鐘了。第二個問題又發生了，碼頭上沒有伙子，甚至連黃包車也沒有，我們的行李又有十多件（其中有兩箱是駁壳槍）。又找了好久，纔找到了幾個伙子，但第三個問題接着發生了，就是找不到旅館。最初是到江西大旅社，但此地已被賀龍做了二十軍的司令部，沒有一個空房間了。因為大軍雲集南昌之故，大大小小的旅館全都住滿了客。費了許多的精力，許多的時間，纔算找到了一個南昌新旅社，開了三個房間，已經十一點半了。肚子真是餓得要命，所以一到旅館，就命茶房弄飯來吃。有雞也有肉，飽餐了一頓，歸房安歇，已經將近一點鐘了。因為昨晚沒有睡好，今天又奔波了一天，所以辛苦得很，吃飽了飯，倒頭就睡。

大約沒有睡了好久，就被槍聲所驚醒了。醒來時，聽見外面的槍聲很密，顯然是南昌城裏發生了劇烈的巷戰。這是什麼一回事呀！我完全還睡在鼓裏。這幾天來，我由漢口而九江，由九江而漢口，再由漢口而九江，而南昌，馬不停蹄，對於時局完全是隔膜的，所以為什麼南昌要發生戰事，完全莫明其妙；驚魂甫定，又逢此變，真使我有滿目荊棘，何處覓桃源之慨！

想起來到主任房間裏去問個清楚，但他與高語罕都不

知去向了。因為天熱，我房間裏的窗並沒關閉，睡在床上，可以望見對面房子的屋頂，此時雖然是在暗夜，但從慘淡的街燈中可以看出屋頂上人影幢幢，仔細一看，原來都是武裝的兵士，他們正在屋頂上瞭望，而我在房子裏的一舉一動，也都被他們看得清清楚楚。我因為對於南昌的政局完全莫明其妙，也不曉得這些兵是那一軍那一師的，所以睡在床上，連動也不敢稍動。

巷戰繼續了半小時，似乎已經解決了，到處都起了歸隊的軍號。槍聲已經停止了，我纔敢起來，但苦於語罕和乾吾不知去向了，又不好跑出去找他們。問問旅館主人，據旅館主人說，是第四軍起事，繳了朱培德部下的槍（王均的第三軍及金漢鼎之第九軍各一部），朱培德現在已經失敗，第四軍完全勝利了。但我知道南昌沒有第四軍的部隊，除了原來的王均的第三軍，金漢鼎的第九軍各一部外，新從武漢開來的，只是賀龍的二十軍，葉挺的二十四師（十一軍的）。不過二十四師與二十軍，向來是屬於第四軍系統的，旅館主人之所謂第四軍，當然是指賀龍與葉挺的軍隊了。

那時我還穿着軍服，而且還佩着第四軍政治部宣傳科科長的符號，與“4A”的第四軍的徽章，旅館主人疑視了一下，以驚異的目光向我拱拱手：

“恭喜！恭喜！你們勝利了。”

但我只有望着他苦笑。

這已經是八月一日早上，天已經大明了。

五

九點鐘的時候，乾吾回來了。

“嘿！巴里公社式的政府組織起來了，成立了一個革命委員會。”他一進門就這樣告訴我。

關於這次的政變，他詳細地告訴了我。賀龍與葉挺的部隊，前幾天就集中在南昌，賀龍的態度表示得很堅決，他對葉挺說：

“他媽的，武漢方面要投降帝國主義，我們就來革他們的命，我有二萬多槍呢！”

譚平山，林祖涵，吳玉章，張國燾，彭湃，韓麟符，惲代英，周恩來這一批星宿，在這一二天都集中到南昌來了，因為他們在武漢已不能立足。七月三十一日的上午，正當我們從九江出來的時候，賀龍葉挺同時接到了張發奎汪精衛的命令，限他

們立刻將部隊開回九江去，以便東征（汪精衛還在想東征！）。賀龍葉挺接到這個命令，知道事情已到了最後一著了，所以他們與譚平山等決定，在晚上繳南昌城內朱培德部下的槍。朱培德在南昌的部隊本來不多，第九軍的副軍長朱德，又與賀龍葉挺一致，所以只要半個鐘頭，就把問題解決了。早上，代替武漢政府的新的政權機關——革命委員會，也成立起來了。

革命委員會的委員有一大批，都是我們熟知的人物，屬於（P一方面的，有譚平山，張國燾，李立三，彭湃，惲代英，葉挺，韓麟符，吳玉章，高語罕，林祖涵，周恩來，方維夏，徐特立等數十人；屬於純粹國民黨的，有宋慶齡，鄧演達，賀龍，郭沫若（賀郭兩人，此時均未加入CP），張曙時，甚至還有張發奎，黃琪翔，蔡廷鍇。革命委員會主席團是賀龍，譚平山，惲代英，郭沫若，張發奎，宋慶齡，鄧演達。還成立了許多機關：秘書長是吳玉章，農工委員會主席張國燾，財政委員會主席林祖涵，宣傳委員會主席郭沫若，總政治部主任郭沫若，黨務委員會主席張曙時，政治保衛處處長李立三，參謀團主任劉伯承。乾吾做了宣傳委員會的委員，繼政治部的秘書長。

革命委員會還是用國民黨的名義，但最奇怪的，還是把張發奎黃琪翔拉進去。

我對於這次的政變，表示很懷疑，我覺得這有什麼意義？

又有什麼出路？

一切機關的名稱雖然有了，而實際都沒有成立，我們由南昌新旅社搬到了二十四師司令部內去暫住。

二十四師司令部設在百花洲畔的心遠大學，就是上次我們住過的地方，想不到現在又到這裏來了。

住在這裏，我感覺到很不自由，葉挺這傢伙，我實在很討厭他。

我現在成了一個失業的流浪者了。張發奎的名字雖然還被拉在革命委員會內，但實際上，他現在已經顯然和這裏站在相反的一方面了，我的四軍政治部宣傳科長的頭銜，當然不能再用了。

無聊得很！還是出去玩玩吧。

南昌是我舊遊之地，我的朋友毛君，前幾天從武漢到了此地，我就去找他談談，他與葆靈女學學生彭濟戀愛已經成熟了。

南昌經過了這次政變，情形又有點不同了。八月一日那天，街上的商店大多沒有開門，賀龍與葉挺的兵士在各處放了步哨。從前做總司令部行營的督軍公署，現在做了革命委員會的會址了。

第十一軍第十師師長蔡廷鍇，帶了一師人到南昌來。他是七月三十一日的晚上，纔開到南昌來的，比我們早兩個鐘頭到

達。他到南昌的時候，賀龍葉挺在已經準備發動了，要他表示態度，他很興奮的說：

“你們幹的真好，丟那翅！我早就想這樣幹的。”

於是，蔡師長也就成了革命委員會的委員、參謀團的參謀了（參謀是劉伯承（主任），周恩來，葉挺，朱德，蔡廷鍇）。八月一日的下午，我從毛君處出來，恩來就派人來把我找去。他往在砲兵營，我去見了他，他說要委我做第十師的政治部主任。我經過了五分鐘的考慮，拒絕了這個任命，因為我近來的精神非常衰弱，要我做那種很負責任的工作，實在不能擔任；而且我的能力也很不夠，要我做政治部主任，雖說是一個師政治部，自顧不能勝任。況且我深知第十師的工作是最難做的，沒有一個人能夠和蔡廷鍇在一起工作的，前任的幾個政治部主任，個個和他鬧翻了，我的個性又特別強，和他在一起，一定是弄不好的，所以雖然恩來再三敦促我去，結果還是被我堅決拒絕了。

這個時候，我實在不想再在軍隊做工作了，做了兩年的革命之官，也做得厭了，所以我很想有機會再到上海過浪流生活去。

從恩來那裏出來，回到二十四師司令部，乾吾問起與恩來談話的結果，我告訴了他，但他說既然要我去做工作，實在不

該拒絕，不過他的意思，既不去第十師也好，他想請我到總政治部去。

我又去找毛君。他還是想回武漢去，武漢我當然是不能去了，我還是想回上海去，但毛君勸我還是到第十師去的好，不過我既堅決的拒絕了恩來的任命，當然是不去了。

這天晚上，我感覺得很煩惱，我將怎樣辦呢？

我終於被任命為總政治部宣傳處處長，雖然我對於這使命也表示過拒絕，但恩來不許我再辭了。

“你從前批評總政治部的宣傳科工作不好，現在宣傳科改為宣傳處，範圍擴充了，你可以好好的做出一點成績來看看。”恩來說。

我沒有辦法，結果還是接受了這次任命。

總政治部主任是郭沫若，但這位詩人現在還在南昌，我放心他是不能來了。

恩來又把我喊去。他仍住在砲兵營，到這地方去，真使我

頭痛！他住在樓上，同在一起的還有許多人，男的，女的，大多是很年輕，很驕傲的，這種人我實在有點看不慣，而最使我討厭的是聶榮臻，這真是一隻大飯桶！但是這飯桶的神氣真大，我見了他，心裏就要作惡！

我不知道恩來找我做什麼事，但又不能不來，來了他又很忙，我只得靜靜等着。

××黨江西省委的一個人也在等恩來，也是恩來找他來的，他比我還先來，等得不耐煩了，據他說，已經在這裏等了兩個鐘頭。

“喂！你究竟什麼時候有空呀？我不能再等你了。”這個人從隔壁屋裏喊過去，顯然是不耐煩了。但恩來的答覆是：

“再等一刻。”

再等一刻，這四個字說得很沉重，好像是下命令一般。那個人顯出不高興的神氣，低聲的罵：

“官僚！”

再過了約摸一刻鐘，恩來還是沒有空，會客室裏又多了幾個會他的人，江西省委的那個人實在再忍不住了。

“究竟怎麼樣呀？我要走了。喂！”他大聲的喊着。恩來從隔壁房子裏走了出來，滿面怒容地叱道：

“你忙什麼？人家有事，你催得這樣緊！”

那個人被恩來喝得滿面通紅，恩來又走向隔壁房裏去了。他望着他的背影，又罵了一聲：

“這個官僚！”

這次罵得重一點，恩來聽得很清楚，立刻又回轉身來，用了尋人打架的神氣，大聲的喝：

“什麼叫做官僚？去問問你們省委看！”

“我說你是個官僚！”那個人也不示弱，充滿了憤怒，答覆恩來。

“你這個人不行！”恩來更怒起來了，“我同你去問問你們省委。”

兩個人像要打架了，旁的人都出來勸，江西省委的那個人悻悻地去了，終於沒有和恩來談話。

恩來還是餘怒未息地罵：“這個人不行！”

我覺得剛才那個人說得不錯，恩來，他真是一個官僚！一個十足的官僚主義者！但他也有他的長處，他做事是很負責的。

恩來找我到隔壁房裏去，他要我以總政治部的名義，做一個關於這次政變的宣傳大綱。我是總政治部的宣傳處長，這是我的責任範圍內的事，是無可推托的了。

關於宣傳大綱的內容，他詳細的指示給我，要我將他的

話，一句句錄下來，作為綱領。他的大意是這樣的：中國國民黨自從孫中山逝世於後，由廖仲凱繼承中山成了國民黨的重心，廖仲凱死了以後，國民黨就失了重心，所以前有南京的清黨，後有武漢之反共，他們都是離開了國民黨。現在我們革命委員會是繼承國民黨的正統。我依照了他的話，寫了一個“八一革命宣傳大綱”，他認為是滿意了，但我自己很不滿意這一宣傳大綱，因為我對於這次政變的解釋，和恩來的見解不同。不過他是負責的人，不能不照他的意思寫——這當然也不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是譚平山等全體負責人的意見。

我在砲兵營寫好了這宣傳大綱出來，已經是深夜了。一個人無聊得很，在東湖裏坐了一回划子，到百花洲圖書館二十四師政治部去玩了一回。主任陳興霖是我在武漢時候的老朋友，他帶了一個並不漂亮而很風騷的女人，正在政治部吃西瓜；我也吃了一塊。靖大康已經在二十四師政治部做了組織科長，從前軍人部的同事蔡任光，也在此地工作。

這樣的一次革命，應該是鬧得轟轟烈烈，但南昌城裏簡直是像死一樣的沉默，沒有羣衆運動，更說不到革命空氣。

從八月一日起，南昌所有的報館全都停版了，本說要恢復民國日報，但始終沒有出版，所以我的宣傳大綱也沒有發表出來。商店大多還是閉門停止營業，街上除了軍人以外，很少行

人。

南昌不像是經過一次革命，像是經過一次土匪的洗劫。

所謂八一革命，就是如此！我嘆了一口氣。

七

到八月三日，情形已經很明顯了，希望張發奎黃琪翔會到革命委員會這一方面來的夢是不能實現了，張發奎黃琪翔對於革命委員會完全取了敵對的態度，所以本來革命委員會委員中有他們的名字，而且張發奎還是主席團的主席，依然是第二方面總指揮，黃琪翔是前敵總指揮。他們既對革命委員會取了敵對態度，革命委員會自然也把他們除名了，於是主席只剩了六人——宋鄧譚賀譚郭——第二方面總指揮由賀龍擔任了；前敵總指揮則因葉挺擔任了——那時葉挺已升任第十一軍軍長；第九軍副軍長朱德，升任第九軍軍長，但他的第九軍實際上只有兩連人。

革命委員會決定回廣東去，路線是由贛東經福建入潮梅，經海陸豐直取廣州。

葉挺率領第十一軍(轄二十四二十五兩師,二十四師師長由團長顧某升任,二十五師師長由周士第升任)於八月四日向撫州出發,我們總政治部是與革命委員會在一起,跟了總指揮部走的,比十一軍遲一天,於八月五日出發。

八月四日那天,我們都搬進了督軍公署,預備明早出發。

晚上九點鐘的時候,郭沫若突然到督軍公署來了,這是出乎我們意外的,我們總以為他是不會來了。他的樣子是非常狼狽的。

和郭沫若同來的,是梅電龍,李民治,歐陽繼修,一共四個人。原來他們是今天早上,由張發奎派一輛專車,把他們押送到南昌來的。但是他們的火車剛到德安,就遇見了第三軍的潰兵,把他們的火車扣留了,他們四個人所帶的錢,也全都被劫去了,郭沫若自己而且被毆傷了,他的勤務兵也被擄了去。後來還是向德安車站交涉,纔弄到了一輛搖車,把他們送到南昌,時間已經是很晚了,幸而我們還沒有出發。

電龍看了我,對我嘆嘆氣。本來我在漢口回九江那天,邀他翌日同上廬山,後來我倉卒出亡,連通知他也來不及,如今他來了,比我還更狼狽。他嘆了一口之後,彼此而相視而笑,無言可說了。

郭沫若是總政治部的主任,我要與他同事,這使我覺得很

不愉快，所以我又有點後悔，爲什麼不到第十師去？

和郭沫若同來的三個人的工作分配如下：歐陽繼修任二十四師政治部秘書，李民治任總政治部總務處長，梅電龍任七十一團政治指導員。

在督軍公署過了一個不安適的夜。第二天——八月五日的早上，就離開南昌，向撫州大道出發了。這次在南昌，僅僅住了四天，而在九江，前後也不是一星期。來去匆匆，所爲何事？自己想想，也覺好笑。但回廣東去，也是一件愉快的事。小別一年的廣東，不知現在是怎麼樣了？東山街頭的不知姓氏的小姐，不知現在還健在否？

別了，南昌！再會！我兩次到南昌來，有兩種不同的感覺，但說起來，還是一樣的煩悶而已，在這臨別南昌的時候，我熱心地希望着在第三次到南昌來的時候，給我一個愉快的印象！

別了，南昌，再會！

別了，南昌的朋友，再會！

南 征 途 中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飲琵琶馬上催；
醉臥沙場君莫笑，
古來征戰幾人回？

在南昌出發的時候，某君殷殷相送，在一張我和他合攝的相片上，他要我題詞以留紀念，我就爲他寫了王翰的涼州詞。

他伴我們走了六七路里，纔珍重道別而返。

八月初的天氣，還是熱得在華氏九十五度以上，在房子裏很安定的坐着，尚且汗出如漿，如今萬里長征，穿了草鞋，背了手槍，在火傘一般的烈日之下邁進，這種生活，真說不出是酸是苦。想起沈雁冰宋雲彬他們此刻在廬山上坐享清福的情形，起初覺得有點惆悵，但繼而一想，在這年頭，別人在牢裏受苦，我能夠保持我身體的自由，已經是很幸福的了，何敢再望上廬山去享那種清福？

譚平山，賀龍，郭沫若，譚代英，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高語罕，吳玉章，林祖涵，這些人全和我們在一起走。

李立三這傢伙真討厭！我一向沒有和他在一起生活過，所以不知他的詳細情形。現在和他在一起走，他那種態度，真夠人惡心！

他是革命委員會政治保衛處的處長，居然也穿起軍服，掛了斜皮帶，儼然是一個軍官了，當我們出了城門，走了一段路，在一個地方休息的時候，譚平山從後面來了。

“敬禮！”李立三看見平山走來，立刻站起來大聲的喝禮，並舉起手來行了一個不像樣的軍禮。一種諂諛的神氣，使人見了作三日嘔！我實在看不慣那種情形，禁不住罵了一聲“狗！”

中午在一個地方吃午飯，許多人都在一起。還沒有吃飽，

飯已經沒有了，等了半天，飯依然沒有來。於是大家有點騷動了。

“喂！副官處是怎麼樣的？第一天行軍沒有飯吃，幹什麼的？”我第一個忍不住了，立起來發了一回牢騷。譚平山在座上望了望我，似乎嫌我太不安分了。李立三偷看了平山的神色，似乎是秉承他的意旨似的站起來，專對我而發的喊：

“不要鬧，飯總是會給你們吃飽，鬧什麼？”

他簡直像用上司對下屬的口吻來教訓我。

“飯是誰給我們吃的？你來教訓誰？”我立刻對他提出了強硬的抗議，飯室裏的人都集中注意力於我們兩個人的爭執。

“你是誰？搗蛋！”他睜着一雙巨大的眼睛，樣子簡直是要把我吞下肚去。

“搗蛋？搗你的蛋！你不要神氣！你是處長，我也是處長，你這官倨！你的架子擺給誰看？”我禁不住罵他了。

譚平山、林祖涵、吳玉章、韓麟符等，以及在座的人都勸住了我們。

李立三原來是這樣一個傢伙！我認識了。

今天是第一天行軍，路程雖只有六十里，但因為天氣太熱，又是第一天行軍，大家覺得很辛苦，我們年青人倒還好，那

幾年老的人是更其苦痛了。

中央海外部部長彭澤民，年紀雖還沒有滿六十(?)，而頭髮已全都白了，他的瘦長的身材，走起路來似乎特別辛苦，只見他在喘氣。他還帶了一位年紀和他相仿的夫人，這對老夫婦實在是我們軍隊裏最可憐的人物，他們生長海外，怕有生以來，還沒有吃過這種苦吧。在路上既沒有馬，也沒有轎，也要跟了我們翻山越嶺。

其次是江西省政府主席姜濟寰，他的年齡也和彭澤民差不多，雖然他的體質似乎比彭澤民好些，但他的身體很胖，胖子在熱天，本已是特別痛苦，何況又是在烈日之下翻山越嶺？所以這位胖子主席的痛苦，也是不待說了。

財政委員會主席林祖涵的年齡也很大了，他的頭髮也完全白了，但他的精神比較還好。

農工委員會主席張國燾，簡直像個鴉片鬼，精神始終是萎靡不振的。他總是和彭湃在一起走，彭湃的精神就和他完全不同。他是我們這一隊伍中最活潑的一個，一路上都是唱唱跳跳，完全像一個天真的小孩。唱了一下國際歌，又唱唱廣東戲，“頑皮的孩子！”高語罕這樣笑他。

代英的精神也很好，他穿着一套粗夏布的短衫褲，這條褲子簡直短得可以望見他的生殖器。

周恩來像一個江湖醫生，肩上背了一隻文書袋，彷彿是江湖醫生的藥囊。

徐特立這老頭子的精神特別好，他看見那些青年同伴在路上休息，總是帶笑的招呼：

“喂！同志：精神振作起來；前進！”

參謀團主任劉伯承，他瞎了一隻眼，樣子簡直像一個強盜，精神是非常飽滿的。據說他是四川的一員老將了，他的眼睛就是在戰場上打瞎的。

秘書長吳玉章，因為他有痔病，而且他的身體特別的瘦弱，所以例外的坐了一乘轎子。他像諸葛亮坐四輪車一樣很舒服的坐着，兩個健壯的轎夫抬着他走。

主席譚平山穿着一身中山裝，戴一頂平頂的草帽，騎了一匹黑色的馬。他的面孔也黑得和他乘坐的馬一樣。這傢伙正和李立三一樣的討厭！

郭沫若因為上天在南津路上被第三軍的潰兵毆了一頓，受了一點微傷，但精神還是很好。他一面走，一面吟着他新做的詩。

韓麟符年紀還不大，一種北方人特有的強健的體格，爬起山來滿不在乎的，他帶了一位年輕漂亮的太太，這位太太的皮膚白得很，說着一口道地的北京話。

高語罕視着他高大的身子，嘴裏有時唱着歌，有時在吟詩。

在我週圍的，就是這麼一羣。

二

大約因為在路上休息得太久的緣故，趕到宿營地，已經是黃昏時候了。因為已經夜了，連這地方的地名也沒有知道清楚，彷彿是萬壽宮吧。

前站不知道是幹什麼的，沒有為我們找好宿營地方，第一天出發，就要我們露營。幸而沒有下雨，天上繁星密佈，我們在一個河邊的草地上躺着，草地上被露水濕透了，我們的薄薄的毯子鋪在上面，一下子就連毯子也濕了，上面的露水還是繼續下來，這味兒真難受！

“不好好兒在家裏享清福，到這裏來受罪，傻瓜！”有人在這樣自言自語。

在露水裏睡了一夜，第二天起來時，衣服行裝完全是濕的。在晨光熹微中，又開始第二天的行軍了。

譚平山這老傢伙真討厭！大家都叫他譚主席——這是以前對譚延闓的稱呼，但現在的譚主席是譚平山了。雖然主席團的主席在軍中的共有四人（譚平山，郭沫若，恽代英，賀龍），但平山儼然成了我們這一羣中的唯一的領袖。

“這是一隻大飯桶！”我這樣想。由這種飯桶去領導我們，將領導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這是不可知的事，我感到一種悲哀。

第一天的山路並不多，第二天可糟了，幾乎走了一天的山路。天氣是這樣熱，山路是這樣難走，溽暑行軍，真是苦事！好在現在不比在河南，在河南的時候，每日的工作總是很忙，而現在除了走路以外，簡直不做一點事。我的宣傳處長簡直是不宣不傳，一無所事。也不僅是我，我們這一羣，全都是一無所事。農工委員會的人在路上貼了幾張標語——也僅僅是幾張。這些標語上寫着“沒收二百畝以上的土地”，“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政權”。

沒收二百畝以上的土地，這就叫做“土地革命”，好一個“土地革命”！這是譚平山的傑作，他根據了三民主義裏面平均地權的方法，想出“沒有二百畝以上的土地”的“土地革命”的奇妙神方，這也就是革命委員會的唯一的政治任務了。原來如此！可是怎樣去沒收二百畝以上的土地呢？怎樣去建立農村政

呢？革命委員會的袞袞諸公，似乎做夢也沒有想到過，但標語還是一路貼去。總政治部簡直連標語也沒有一張。

晚上，我們在一個什麼祠堂裏宿營，雖然祠堂裏很荒涼很骯髒，而且停有幾具棺材，但在這裏，比昨天在河邊露營要好得多了，至少在這裏沒有露水打到我們身上來。我們五六個人都在地上鋪着毯子躺着，睡眠的時間還早，大家躺在地上閒話。勤務兵也沒有睡，在房子裏四處搜索，結果搜得了五隻雞。這個發現，在我們是非常之有價值的，這兩天的行軍，辛苦已極，而伙食是壞到了極點，如今搜到了五隻雞，也不管這幾隻雞是誰所有的，就命勤務兵連夜宰殺來煮吃，大家飽餐了一頓，覺得這種強盜一般的生活，也別有風味。在河南的時候，我們對於奉軍之強取民物，深惡痛絕，而現在自己也要來強取民物了。

八月八日的下午到了臨川縣城——就是撫州。撫州地方本來很熱鬧，但我們到時，商店幾乎全都閉了門，街道上非常冷落，民衆對於我們的態度，顯然是很懷疑的，我們豎起了爲民衆謀利益的大旗，但民衆却給我們一個不睬不理。

我們住在一個小學校裏。因爲是暑假期內，此地的學校全都放了假，於是撫州城裏更其寂寞了。

撫州的西瓜，與山東滄州的西瓜同樣有名，我們在這裏吃

了很多。西瓜是我最歡喜吃的，我們浙江的西瓜也很好，廣東與武漢的西瓜簡直不行，所以我這兩年來，沒有痛痛快快的吃過一頓西瓜。撫州的西瓜的確很好，又大又甜，比滄州西瓜，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到撫州第二天，發現了一件重大的事變，蔡廷鍇的第十師不知去向了。八一事變發動的時候，蔡廷鍇表示很同情，他甚至對葉挺說“你們幹得真好！丟那媽，我早想這樣幹的。”所以革命委員會很信任他，但是現在他的部隊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周恩來還不相信蔡廷鍇會有變化，他還以為恐怕是被張發奎的追擊部隊包圍去了。但蔡廷鍇的部隊是在中間——前面是葉挺的軍隊，後面是賀龍的軍隊；如果張發奎的部隊追來，當然首先要遇到賀龍的後衛部隊；如果前面發現敵人，當然是葉挺的部隊首當其衝，為什麼會包圍到中間的蔡廷鍇呢？譚平山的意思，以為一定是失了路。但這是呆想，在數萬大軍進行的時候，一師人怎麼會失路呢？

六個鐘頭以後，事情完全明白了，從十師逃出來的人報告，第十師自南昌出發的第二天，蔡廷鍇就把三十團團長范蓋及其他OP官長統統拘捕起來，而他的軍隊也向東開到福建，預備去找他的故主陳銘樞去了。

我們這隊伍中又損失了一師人。這個不幸的消息給了我

了很多。西瓜是我最歡喜吃的，我們浙江的西瓜也很好，廣東與武漢的西瓜簡直不行，所以我這兩年來，沒有痛痛快快的吃過一頓西瓜。撫州的西瓜的確很好，又大又甜，比滄州西瓜，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到撫州第二天，發現了一件重大的事變，蔡廷鍇的第十師不知去向了。八一事變發動的時候，蔡廷鍇表示很同情，他甚至對葉挺說“你們幹得真好！丟那媽，我早想這樣幹的。”所以革命委員會很信任他，但是現在他的部隊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周恩來還不相信蔡廷鍇會有變化，他還以為恐怕是被張發奎的追擊部隊包圍去了。但蔡廷鍇的部隊是在中間——前面是葉挺的軍隊，後面是賀龍的軍隊；如果張發奎的部隊追來，當然首先要遇到賀龍的後衛部隊；如果前面發現敵人，當然是葉挺的部隊首當其衝，為什麼會包圍到中間的蔡廷鍇呢？譚平山的意思，以為一定是失了路。但這是呆想，在數萬大軍進行的時候，一師人怎麼會失路呢？

六個鐘頭以後，事情完全明白了，從十師逃出來的人報告，第十師自南昌出發的第二天，蔡廷鍇就把三十團團長范蓋，及其他CP官長統統拘捕起來，而他的軍隊也向東開到福建，預備去找他的故主陳銘樞去了。

我們這隊伍中又損失了一師人。這個不幸的消息給了我

們一個很深的刺激。我想，我幸而沒有去做十師政治部的主任，否則也難免被蔡廷鍇拘捕起來，送到福建去了。

在撫州停着沒有出發，爲的是希望南潯路方面還有同情於此間的軍隊跑過來，例如張發奎總指揮部的警衛團，團長盧德銘與此間事前有約定的；二十六師許繼慎的七十七團也是一樣；此外還有總指揮部的憲兵營，砲兵營；十二師的三十五團；總政治部的教導營；這些隊伍都可以希望他們跑過來。但事實上，我們是失望了。我們希望跑過來的隊伍全都沒有過來。許繼慎的七十七團，在開到九江的時候就被改編了；盧德銘的警衛團，一到九江就被解散。

十一軍政治部的宣傳科長羅懋其，帶了十一軍方面的幾十個人從九江越廬山來追我們，終於被他們追到了撫州。我們在對於大部隊歸來的希望失敗以後，這一部分人歸來，也覺得聊勝於無。這次十一軍的同志來撫州，是非常艱苦的，他們不是由南潯路到南昌，而是由九江翻廬山抄小路追來的，因爲他們僅有二十餘枝駁殼，而一路上敵人的部隊又很多，冒險來歸，這種精神是可以欽佩的。可是我們四軍政治部的人，現在已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在南昌事變以前，我和廖主任倉促出逃，無暇顧及，一切交由歐陽繼修負責，但繼修自己於八月四日跟了郭沫若到南昌，而政治部的人他就不管了。看了十一軍

政治部冒險來撫，想到四軍政治部現在只剩了乾吾繼修和我三個人，覺得有點慚愧！但乾吾和我，實在也是沒有辦法，因為我們在南昌事變以前，就很匆忙地離開了九江，那時的情形，當然還不明瞭，無法預為指示。

隨了十一軍政治部同來的，還有許多女同志，她們都是武漢分校的學生，在我們到九江的時候，她們因為沒有出路，就到四軍十一軍的軍醫處來充看護，但是隨四軍十一軍開到九江不久，就發生了南昌事變，她們又不願意跟了張發奎跑，所以隨十一軍政治部追到撫州來。她們本來都是中上之家的小姐出身，而竟能如此不辭艱辛，不怕危險，隨軍工作，這種勇氣，這種精神，足使我們敬佩，也足使我們自愧。

在撫州一連住了三天，沒有一點工作，不過我的官銜又增加了一個，因為我由宣傳處長而兼任了組織處長，但實在說來，我們的總政治部是等於沒有的。

十一日的下午，那時我們還留在撫州沒有出發。我站在這學校的空院子裏和別人談話，譚平山的衛兵在擦他的駁壳：一不小心，駁壳槍走了火，子彈由槍口飛出來，就打在我的身邊，地上打穿了一個洞。相差不過二尺，如果再近二尺，我的一條腿就要被他打斷了。我罵了這衛兵一頓。想起來覺得真是危險！

四

八月十二日的早上，細雨濛濛中離開了撫州城，向宜黃進發。行軍而遇到天雨，是最不愉快的事！不過天下了雨，溫度就減低了，雖然身上被雨打得很濕，而汗却少出了許多。

一路上，我們完全像土匪一樣，見了瓜田中的瓜，就任意採來吃一個痛快。見了老百姓的雞，就捉來養食。吃雞成了我們行軍中的常課，一天沒有雞吃，就覺得乏味。在河南，我們也同樣的吃雞，但在河南吃的雞，是出錢向老百姓買來的。現在，我們每到一個地方，老百姓早已跑了，就是有了錢，也買不到雞，何況我們又都是窮得只有幾張江西銀行和武漢的鈔票，這些鈔票在城裏就等於廢紙，何況是在鄉間？既沒有錢買，於是就用劫掠的手段去掠奪，好在老百姓已經跑了，我們儘可自動手拿來吃。

農工委員會依然在貼那“沒收二百畝以上的土地”，“實行土地革命”的標語。把老百姓的米拿來吃——我們一路上所吃的米，大多是不出一文錢向老百姓徵發來的——把老百

姓的鷄拿來殺，這就是土地革命！想起來，覺得有點好笑。

李立三這討厭的傢伙，他是政治保衛處長；這政治保衛處的確比我們總政治部熱鬧得多。政治保衛處的任務，是懲辦土豪劣紳反革命派，徵發糧食等，換一句話說，是一個專門敲竹槓的機關。以李立三來主持這一機關，是非常適宜的，譚平山不愧有知人之明。

到宜黃城是八月十日的下午，在將近宜黃的時候，土色是黃的，河裏流着的水，也是黃的。

“此所謂宜黃也”代英很滑稽的用八股先生的調子吟着。

總政治部駐在宜黃城外的一個茅屋裏。宜黃城外的風景很好，一座很清秀的鳳凰山，鳳凰山上一座鳳凰廟。因為時間的關係，不能上山去玩一下，真是一件憾事！

宜黃完全成了一個“死城”，全城的人民幾乎全都跑了，所剩下的，僅僅是幾個半生不死的老年人，大概這些老百姓完全把我們的軍隊看成土匪。我們揭着為人民謀利益的旗幟，而人民對於我們却這樣冷酷，這不能不使人灰心。但這也是汪××之所賜，因為在南昌事變以後，汪××通電各處，說我們這枝軍隊是土匪，無怪人民要逃避一空了。

人民這樣仇視我們，這樣下去，究竟有一個什麼前途？我不能不懷疑了。

這天晚上，恩來又請我去，要我以總政治部的名義，發一個“土地革命宣傳大綱”，這真使我頭痛！自出發以來，沒有寫過一個字，沒有做過一點工作，如今要我來做這篇大文章，真要命！

恩來告訴了我一個大綱，無非是明說沒收二百畝以上土地的意義。其實照我看來，這全是廢話！沒收二百畝以上的土地，如果他有三百畝，而只報一百九十畝，又怎樣辦呢？這樣的辦法，只有自己騙騙自己而已。

我終於寫成了一個宣傳大綱，而且付了油印。但這有什麼意義呢？我們現在根本就沒有宣傳工作。

在宜黃並沒有停留，因為這“死城”是沒有停留的價值的。據政治保衛處調查，宜黃城內，一共只剩二十一個人，而且都是老弱不堪的。

十五日由宜黃出發。天氣反前幾天更熱了，而這些地方的山，也是愈走愈高。因為天氣過於炎熱，所以我們的行軍也改變了方法，每天半夜十二點鐘就起身，早餐後即出發，未到正午十二點以前，即宿營休息。這樣，午後最熱的時候可以不走路。但半夜行軍，尤其是黑夜裏爬山，真是苦事！

這天走到上午十一點半就休息了，這是一座不知名的偉大的山的腳下一個小村落。過度的勞苦與酷熱，使我腳酸，使

頭痛。我們唯一的奢望，是勤務兵捉幾隻肥胖的雞殺來吃，可是非常使我們失望的，許多勤務兵找了很久，終於連小雞也沒有找到一隻，甚至連雞蛋也沒有一枚。在別的地方還有南瓜可以煮來吃，此地甚至連南瓜也沒有。白飯，我們實在吃不下。後來勤務兵發現了兩隻小豬——不過生後幾個月的乳豬。在無可奈何中，只得將這兩隻小豬煮來吃了。在廣州，時常上館子去吃“乳豬”，味兒是非常好的，可是我們今天吃的“乳豬”，簡直沒有一點味。

不知道是怎樣傳來的，我們久不知武漢南昌的事情了，但是今天知道了一些由後方傳來的消息：

(一)張發奎也率部回廣東去了，他送他的妻子到李濟深那裏去爲質，表示服從李之指揮。不過他回廣東的路線，與我們不同，我們是走贛東，他們是走贛南。

(二)施存統在武漢中央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悲痛中的自白”的文章，不僅表示退出CP，而且對CP大下攻擊。

(三)汪精衛預備到南京去了。

這些消息最使我們感覺趣味的，是施存統的文章。施存統平時講起話來，咬緊了牙齒表示非馬克思主義不足以言革命，非CP不足以言社會主義，爲什麼現在自己先反對CP呢？

五

八月十七日到了廣昌，住在一個教堂裏。廣昌城裏的情形，比宜黃稍爲好一點，大約這城裏總不只二十一個人吧，商店也有開門營業的，可是這裏的商業，本來很衰落，在這軍事騷動時期，自然是更加了。

我們都窮得很。現在我們也像在河南的雜牌軍隊一樣，不知道什麼叫做餉，財政委員會根本就沒有錢。

自從南昌出發以來，已將近半月了，還沒有遇到過敵人，沒有發生過一點戰事，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廣東一天天近起來了，到廣東去！這就是我們的唯一的生路，在江西，總是沒有辦法的。“到廣東去吃中秋月餅”，這個口號，印在每一個人的腦筋中。

在廣昌停留了一天，十九日早上從廣昌出發。

天氣依然是很炎熱，此地四面都是山，我們每天都過着爬山的生活。

我們這隊伍中，在南昌出發的時候，原本帶有許多馬，但是這些生長北方的馬，因爲不慣爬山，死去的很多。在廣昌出

發的時候，馬幾乎已死去百分之八〇；伕子也有不少逃跑了，於是運輸很成問題。此地一帶沒有河道可以坐船，又不通車輛，唯一的運輸工具，就是馬匹與挑担的伕子；馬匹既死去了很多，伕子又大多逃跑了，結果就不得不拉夫。儘管貼着“不拉夫”的標語，而伕子還是要拉。

物質方面困難到了極點，天氣又那樣熱，每天至少要走六十里路，而且完全是崎嶇的山路。這種生活可以消磨戰士的勇氣，所以隊伍裏的士氣漸漸萎頓起來。想了許多的辦法來鼓勵士氣，唯一的就是說到廣東後，一切問題可以解決。葉挺的十一軍，所部都是百粵健兒，自從去年出師北伐以來，已經一年多沒有回故鄉去了，所以回廣東去的口號，在他們都是異常熱烈的擁護。賀龍的二十軍，都來自三湘七楚，對於回廣東去，並沒有如十一軍弟兄之感有熱烈的興味，但廣東是一個有名的富庶之區，所以到廣東去，在他們也是不表示反對的，好在他們在湘西的時候，也還是不能按月拿餉，這種等於流寇的生活，在他們也並不覺這樣痛苦。可是二十軍的軍紀實在很壞，抽大烟的很多，佔民房，搜民物，拉夫，這是普遍的現象。但這也是無法禁止，我們尚且如此，何況他們？革命委員會為要維繫軍心起見，對於他們只能取放縱的態度。

在廣昌，賀龍郭沫若彭澤民同時解決了加入了 CP 的問

題，賀龍在南昌事變的時候，並沒有加入 CP，張發奎那時通電說他是 CP，其實不是事實。郭沫若去年在南昌總政治部駐贛辦事處時代就要求加入 CP，但直到此次到廣昌以後，纔正式通過。彭澤民自從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一直就跟了 CP 的路線走，但正式的加入，也是在廣昌。這樣，革命委員會的高級職員中，沒有加入 CP 的就很少了，黨務委員會主席張曙時，江西省政府主席姜濟寰，這兩個還是道地的國民黨。可是中下級職員之最大多數，都是沒有加入 CP 的。

恩來病了。他是參謀團的參謀，但他的權力很大，簡直超過平山；一切都是由他發號施令。在他左右，最使人討厭的是聶榮臻，這飯桶除了拍恩來馬屁以外，是一無所長，他對於恩來，真像兒子見了老子一樣的恭敬，但對於比他低一點的人，那種傲慢的態度，真使人髮指！有幾次，我簡直想打他一頓。在武漢時代，他是很有權力的，在軍隊工作的人，尤其是政治工作，許多是由他指派的。他派工作的標準，完全是以他私人的恩怨為進退的。和他感情好一點的人，那怕是天字第一號的飯桶，他會派他去做政治部主任，或做其他很負責的工作。如果與他沒有什麼深的關係，那麼即使這人有最大的才能，也不過派他去幹一點小差使。所以在武漢時代，有才幹的人大多只委屈擔任一點小工作，階級很高，地位很重要的人，大多是些飯

桶，我覺得在CP黨內，如果像聶榮臻這種混蛋不肅清出去 CP 的前途是很悲觀的。

代英的眼鏡，在廣昌打斷了一隻腳。他的眼睛 是和我程度一樣很深的近視眼，沒有眼鏡是不行的，但在廣昌又找不到配眼鏡的地方。他用細的麻線來做了一隻腳，縛在耳朵上，樣子是很滑稽的。他這人本來富有滑稽的意味，戴了麻線做腳的眼鏡，光景是更其滑稽了。

沫若自從加入CP以後，精神似乎比前更好了。他在路上軋了一個妍頭。高語罕在南昌出發的時候，帶了一個姓彭的情婦。他²在廣東工作，後來在武漢分校工作，是CP裏面著名的浪漫人物。在路上，她看中了沫若，因為沫若不僅比語罕年輕，而且這時候的地位也比語罕高，這騷東西所崇拜的，就是地位與虛名，沫若在這方面是可以滿足她的慾望的。在沫若呢？本來自命為風流才子，何況在這枯澀的行軍中，有一個騷東西玩玩，當然是不會拒絕的。這樣，他們兩個人的好事就成功了。

在撫州的時候，他們已經發生了肉體關係，不過最初還是祕祕密密的，後來就公開了，不僅是白晝宣淫，甚至當衆性交。這些女將的勇氣是可以佩服，不怕別人在喝采，她還是很起勁的抬起了屁股和老郭兩個如此如此。這種情形我實在看

不慣，語罕尤其氣得把所有的鬍子根根都豎了起來。

六

“漸入佳境”——這是將到石城時在路上所看到的一座石牌樓。這四個字對於我們的誘惑力是很大的，我們這半個多月來的生活，真像諸葛亮征南蠻那樣入了不毛之地。精神與物質上，同時感到了極度的痛苦，如今能夠“漸入佳境”，這是多麼可喜的事！

在走過“漸入佳境”的石牌樓以後，又走過了一個“閩粵通道”的石牌樓；不久，我們就到了石城縣了，那是八月二十日的下午。

石城的情形的確是比廣昌好得多了，居民全都沒有跑，商店也是照常營業，可惜我們都很窮，沒有錢來買東西吃。

石城的南門是在江邊，街道與城頭是並行的，這在別的城市是沒有見過。

今天是廖仲愷先生的殉難兩週紀念日，但因為在匆忙的行軍期中，所以連紀念的形式也沒有舉行。

在石城只休息了一天。二十二日即繼續前進，但是在這天，我們知道前面已有敵人了。自離南昌以來，一路上如入無人之境，現在發覺前面有了敵人，精神驟然緊張起來。

這天下午三點鐘，就是在一個小村莊上宿營。敵人就在離此七十八里路的壬田市。

二十四日上午，我們的先頭部隊已與敵人在壬田市接觸了。這是我們出發以來的第一次戰事。

在很短的期間內，就把敵人擊退了，我們到壬田市上的時候，還只下午一點鐘。雖然在壬田市附近發生了戰事，但壬田市的人民並沒有逃，我們到壬田市時，店舖還是照常開門。

壬田市是屬於瑞金縣管轄的，此地到瑞金已只有幾十里了。下午三點鐘，葉挺就率了第十一軍出發到瑞金去了，因為敵人已退到瑞金。

在壬田市附近的戰事，雖然時間很短，也還相當的劇烈。參加作戰的部隊有葉挺的十一軍，朱德的第九軍（只有一連人！），秦光遠（賀龍部）的第二師，對方是在廣東被壓迫出來的錢大鈞。第九軍軍長朱德只有一連人，但作戰很勇敢。葉挺的十一軍，原是有名的鐵軍的精銳，作戰本是很勇敢的。秦光遠的第二師作戰也還勇敢，第二師的副師長，兼第四團團長賀某，在這次陣亡了。他是賀龍的族弟，也不愧是一員勇將，在每

次戰爭的時候，他總是站在前鋒指揮。但他有阿芙蓉癮，那天他在壬田市指揮，把敵人打退以後，自以爲是勝利了，所以一面命部下追擊，一面命勤務兵在地上鋪了一張蓆子，就在陣地上抽起大煙來。那時我也正在火線上觀望，看他在地上很得意抽煙，覺得有點好笑。就在這一剎那間，從敵人方面飛了一枚砲彈，正好打在這位在地上抽大煙的副師長頭上，把他的腦袋打得粉碎。砲彈離開我站的地方，不到三十步。

大部軍隊在壬田市並沒有停留，即繼續向瑞金出發。我們在壬田市過了一夜。這初次的勝利使我們歡喜，使我們鼓舞。我們已到了廣東邊境了，廣東就在我們眼前了。這天晚上，在壬田市喝了許多酒。

在瑞金城外僅有小小的接觸，敵人就退了。我們的先頭部隊在二十四日的下午就到了瑞金，我們於二十五日的下午進瑞金城。

瑞金是靠近福建的贛東的重地，在這裏僅僅是小小的接觸，安然被我們佔據了，這是出乎我們的意外。敵人退到會昌去了，我們這裏派了葉挺和朱德去追擊，在很短期內，就把敵人消滅，完全佔據了會昌。

我們在瑞金住在綿江中學。瑞金這地方很不壞，在我們自南昌出發以來，所經過的地方。瑞金實在是最好的了。在綿江

中學的樓上遙望城外，風景是非常雄麗的。綿江就在城外，綿江的對岸都是高山，在山峯起伏之間，還有許多古塔相間擺列着。城裏的人民全都沒有走，城外也有很熱鬧的街道，所有的商店全都照常營業。

革命委員會在瑞金開了一個祝捷大會，晚上還舉行提燈會，這是我們出發以來的第一次接近羣衆。祝捷會上的羣衆並不多，不足一千人。平山在大會上作了演說，大會還通過了決議案與通電，這些都是我起草的。但我覺得有點滑稽，這些通電用什麼方法拍出去呢？

我們在瑞金停留了好幾天，我對於地方有相當的留戀。據地方上人告訴我，中山先生北伐時候，在這裏也駐過一個多月。

朱德與葉挺在會昌打了勝仗，我們一批人代表革命委員會到會昌去勞軍。從瑞金到會昌只有八十里路，但這地方不如瑞金。

從會昌回到瑞金時，瑞金二十軍方面發生了一種謠言，說葉挺在打會昌的時候，搶了敵人七十萬現款，但葉挺沒有把這筆錢交出來，所以二十軍方面，頗有不平之感。這顯然是奸細造的謠言，實際上並沒有這麼一回事；二十軍的高級將領，如賀龍等也均能深信葉挺決不如此。爲了這種謠言，譚平山周恩來賀龍都向二十軍作了詳細的解釋，事情也就過去了。

七

九月一日的早上從瑞金出發，這是我們逗留江西境內的最後一天了，因為這天晚上預定的宿營地是福建長汀縣屬的古城。

天氣漸漸涼爽起來，早上起來已頗有秋意了。從瑞金出發，一路上的風景很好，因為快要到廣東了，我們的精神都很興奮，已不如先前之頹喪了。

江西與福建交界地方的山嶺很高——比粵贛交界的大庾嶺還高出數倍。我們整天是爬山越嶺。嶺上有個小村落，那就是江西與福建交界的地方了。這個村落一半是屬於江西省的，一半又是屬於福建省的，村落上的人民時時刻刻在往來於江西福建兩省之間。

三日到了汀州，這地方真不壞！居然有幾條土敏土的小馬路，也有廣東式的小洋房。此地因為接近廣東，頗有點廣東風味，廣東特有的洋桃，此地也有出賣。將近一年沒有吃洋桃了，這是最歡喜的東西，如今見了洋桃，頗有他鄉逢故知之慨，

俺嘆了一頓。

我們住在一個藥店裏，但依然是沒有一點工作，過着放浪的生活。第二天的早晨，恩來把我找去，他說要我到二十軍去，因為那邊的工作很重要，但現在弄得很糟糕，必須派幾個幹練的人過去。乾吾做二十軍政治部主任是已經決定了，恩來就要我去擔任軍政治部的秘書。二十軍的情形和各軍不同，政治部主任終日跟了軍長走的，事實上成了軍長的政治顧問，政治部的事是不過問的，於是秘書就成了責任內閣，負政治部的全部責任，所以二十軍政治部的秘書，比任何一軍政治部秘書所負的責任更為重大。二十軍又是一個比較雜亂的軍隊，沒有受過嚴格的訓練，所以政治部所負的責任更為重要。恩來要我必須過那邊去，負起這一任務來。

做了一個月的吊兒郎當的雙料處長，沒有做一點事，實在太沒有意義了，到二十軍去做實際工作也好。只要自己能力能夠負得起的責任，我總是願意負的。

二十軍軍長，就是總指揮賀龍象的。政治部主任原為周逸羣，現在周逸羣調任了第三師師長（二十軍原有兩師一教導團，即第一師賀錦齋，第二師秦光遠，教導團周逸羣，後來教導團擴充成第三師，周逸羣就做了師長），軍政治部主任就決定廖乾吾繼任。乾吾自從南昌出發以來，即天天與賀龍在一起，

他去當軍政治部主任原是沒有問題，但他一定要我去做他的秘書，恩來也主張我去，所以我到二十軍的問題，就成了決定，連我自己也不能拒絕了。

爲了二十軍的內部問題，以及雙料處長的繼任問題，我到二十軍去雖已成決定，但在汀州還沒有到二十軍去到差，這問題要到上杭去解決了。

九月六日從汀州出發。

天氣已經很涼快了，在白天行軍，已沒有汗流夾背的苦痛，而晚上是覺得太冷了。我們身上只是從南昌出發時穿的單布軍服，晚上也只是一條簿簿的線毯，實在不夠禦寒。汀州本有賣毯子衣服的舖子，但我們都沒有錢買。以前白天熱得難受，現在是晚上冷得難受，同樣是痛苦。

在汀州出發的第二天，是陰歷的中秋佳節了。晚上在一個荒村裏宿營。這荒村是在四面高山包圍之中，像是一個深谷，又像是一口井。“月到中秋分分明”，月姊並沒有因爲我們在軍中的顛沛困苦而減少了她的光輝。在這深山之中的荒村裏度中秋，這是多麼有詩意的際遇！明月之下的山景，本已夠詩人騷客吟詠了，何況今天是一年中最有詩意的佳節？四面是偉麗的高峯，當空是一輪皓月；此情此景，人生那得幾回逢？

勤務兵在老百姓家裏找到了一壺酒，這是中秋佳節的最

好的禮品，可惜有酒無菜，不禁使我們望酒興嘆，命令勤務兵全體動員去搜索一點下酒物，但是用盡了一切力量，連南瓜青菜也找不到一點，不用說鷄與鴨了。怎麼辦呢？喝白酒未免太掃興了。

我的那個年輕的勤務兵很聰明，他捉到了老百姓家裏一隻黃狗，來徵求我的同意，是否可以將狗烹食。這當然是再好沒有了，鷄肉與豬肉也吃得厭了，可是狗肉却是生平以來沒有嘗過，不待說，這是最好的下酒品了。煮熟以後，其香之烈，其味之佳，就是在廣州南園西園吃三百元一碗的龍虎鬥，也遠不及此，這天晚上，真吃得痛快！這樣過了一個佳節，總算也不辜負了。但今年會到這福建的荒山裏來過一個中秋，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的。頻年漂泊，過中秋的地方，也各不相同，一九二六年的中秋是在廣州過的，和許多朋友在南園赤雅廳吃了一席代價很高貴的酒菜，打了一夜牌。一九二五年的中秋是在黃埔軍官學校過的，那天陽歷是十月二日，正是汪精衛在軍校就黨代表職的一天，晚餐是在軍校的大飯廳上站着吃的；晚飯以後，舉行汪精衛的就職典禮，他與蔣介石都作了很長的演說。一九二四年中秋是在上海過的；一九二三年的中秋是在杭州西湖裏過的。明年的中秋不知將在什麼地方度過？誦“此生此夜不常好，明月明年何處看？”句，不禁為之慨然！

治部宣傳處長的繼任問題，討論了很久。周恩來指定了賀昌，賀昌推辭了一回，但結果還是決定了他。組織處長是決定了羅懋其。

會議開過以後，大家就在九軍軍部晚餐，由朱德作主人。席間我們談到黨國大計，據恩來說，我們軍隊的番號名稱，到潮汕以後，都要改變。軍隊的名稱，將不再稱國命革命軍，而改為“中華革命軍”。中華革命軍的總指揮，仍由賀龍擔任，暫將編為四軍：原有之第二十軍改編為中華革命軍第一軍，賀龍兼軍長；十一軍改為第二軍，葉挺任軍長；第九軍再由二十軍中撥一部分，改為第三軍，朱德任軍長；將福建民軍及到廣東去收編一部分軍隊，編為第四軍，以劉伯承任軍長。代英談起到廣州以後，就要着手籌備國民黨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十日早晨，二十軍政治部原任秘書陳恭來邀我到二十軍去接事。先到總指揮部去和賀龍乾吾見了面，我和賀龍正式會見，這還是第一次，他給我的印象並不壞。他表示歡迎我到二十軍來工作，說了一些客氣話。他本是土匪出身，但我看他的樣子，很溫和文雅，有書生氣味；年齡也不大——還只有三十一歲，面孔白白的，身材矮胖，頗有點日本人風度。他請我吃牛奶，但我生平不吃此物，只吃了幾塊餅乾，就告辭出來，到政治部去到差去了。

陳恭召集政治部的職員，與我介紹見了面，就把他的秘書職務交给了我，而自已到第二師去任政治部主任去了。從此以後，我就成了二十軍政治部的實際負責者了。

廖乾吾依然做我的主任，但他一天到晚跟着總指揮走，始終沒有到政治部來過一次，所以一切的工作，須得我來負責。我覺得二十軍政治部的內容，精到了極點，比起我們從前在四軍政治部，相差得很遠了。

政治部的工作，可以說是完全沒有，一切都要從頭做起。但在這行軍期中，時間與人材的限制，一時也無法把政治部弄好來。我在總政治部清閑了一個月，如今負起繁劇的責任，頗以為苦。

在上杭，我們政治口號也有點改變，“沒收二百畝以上的土地”，改為“沒收五十畝以上的土地”，其實還是一樣的滑稽。

關於軍事行動方面，俄顧問提供了一個意見：他主張我們全部的軍隊，暫駐閩西汀州上杭永定一帶，因為這裏是富庶之區，在經濟方面，可以自給。我們一個多月的辛苦行軍，應該在這裏有一個相當時期的休養，而軍隊的補充，尤為必要。據俄顧問的預算，我們在這裏可以補充五師新軍，其方法是收編閩西的民軍，並極力發展民衆的武裝。等實力增加以後，再長驅

入粵，猶未爲晚。但是他的計劃並沒有得到大多數的同情。回廣東去，原是在南昌就決定的方針，賀龍、譚平山、周恩來，葉挺，劉伯承，朱德等，全都主張立刻到廣東去。在參謀團的預計，以爲打下廣州是不成問題的。

因爲認爲打廣州有把握，所以否決了俄顧問的意見，在上杭只留了三天，十二日的早上就向廣東方面出發了。

到廣東大埔縣是九月十四日。我們終於到了廣東境內了。一別經年的廣東，如今重履此土，頗覺愉快！

在大埔沒有停留，當天即繼續西進。不過一向是步行的，而自大埔出發，是坐船的，比起翻山越嶺，當然是好得多了。而且因爲是在船中，對於政治部的工作，也可以詳爲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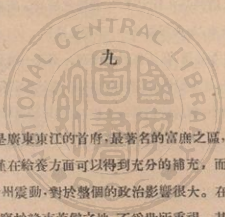
從大埔上去，韓江上游就有敵人，所以一路是跟着大軍前進的。

在三河壩，松口，韶陰等處，僅僅有一點小的接觸，敵人一見我們軍隊就走，所以我們毫不費力的佔據了以上這些軍事要地。

在江西所看到的民衆，對於我們是全無好感的，他們甚至把我們看做土匪。可是一入廣東境，情形就不同了。在廣東，可以看到民衆是完全站到我們這方面來了。我們還在福建廣東交界的崇市的時候，大埔的民衆就派代表來歡迎我們。我們到

了大埔，民衆就來爲我們擔任間諜，報告敵人情形。三河壩一個中學裏的學生，在我們還沒有開到以前，就起來繳了駐軍的械。我們一路來，都得到民衆的慰勞。江西與廣東的民衆，對我們的態度，真有天淵之別了。

由於民衆的援助，使我們很順利的於九月十九日就進了潮州城。



潮州是廣東東江的首府，最著名的富庶之區，我們佔領了潮州，不僅在給養方面可以得到充分的補充，而且潮州的佔領，足使廣州震動，對於整個的政治影響很大。在未到潮州以前，我們流竄於嶺東荒僻之地，不爲世所重視，甚至不爲人所知道。如今佔據了東江的首府潮州，一鳴驚人，其影響之大，非可言喻。

在我個人而言，能夠到潮州來，是非常愉快的事。潮州是一個多麼美的內地城市呀！土敏土的馬路是這樣的整潔，街道兩旁的廣東式的洋房，建築是多麼整齊。潮州，這是多可愛的地

方！沒有到潮州以前，做夢也沒有想到是這樣一個好的去處。

總指揮部設在西湖裏的一座洋房裏，二十軍政治部設在開元寺。開元寺地方很大，潮州商民協會也設在開元寺內，還有許多的民衆團體也在這裏；但我們來時，商民協會早已跑得人影全無了。

我們佔據了大部分的房屋，房屋都還不壞。

在此地，我要以大部分的力量，來整頓政治部的工作，所以非常之忙。

潮州有一隻西湖，這是潮州風景最好的地方，闢有公園。我們就在公園裏開了一個羣衆大會，由我起草了案議決和通電，和瑞金祝捷大會上的，大同小異而已。

潮州西湖的風景很不壞，“處女泉”，是西湖風景最好的地方，但可惜我現在簡直忙得沒有遊玩的時間了。

二十四師政治部主任陳興霖，做了潮州縣縣長。

在這裏，我會到了我們四軍政治部的總務科長葉古衣，談起四軍政治部在九江解散的情形。他是潮州人，在政治部解散以後，就回到潮州來了。他會到了乾吾，乾吾派他們到汕頭去幹一件事。

潮州民衆對於我們很擁護。潮州之所以能夠不戰而下，也是得力於民衆的幫助。在我們還沒有到潮州之前，敵人本要

從汕頭運兵到潮州來，轉運到三河壩去，但潮汕鐵路的工人自動罷起工來，民衆自動的將潮汕鐵路掘斷了好些地方，以致敵人不能從鐵路上調兵，而我們也就得兵不血刃而下了潮州。

工人掘斷了潮汕鐵路，固然是給了敵人一個打擊，但我們到了潮州以後，鐵路不通，也是很很不方便的。那時汕頭的敵人已經退出，如果鐵路能夠通達，則我們幾小時之內就可以到汕頭了。潮汕鐵路的工友知道了敵人已經退出汕頭，我們已到了潮州，於是立刻全體復工，並且全體動員開夜工修理鐵路。十二小時內，鐵路就全部修好了，而我們的軍隊也得很快的到了汕頭。民衆給以我們的幫助是多麼偉大呀！

總指揮請我去晚餐。自從出發以來，沒有好好兒吃過一頓飯，魚翅席還是自南昌出發以來的第一次吃。賀龍平時對於吃是很考究的，他的副官長幾乎成了他的廚房的頭目，兩個副官的任務是專爲他辦菜。他說他有一個怪病，如果飯菜不好，就喫不下飯，頭上就要出汗，腦筋也要糊塗起來，所以喫，在他生活上是最重要的一樁事。郭沫若說起老蔣平時對於吃，並不十分注意，普通的菜也能夠吃。高語罕說到列甯平時對於飯食的態度。

恩來找我去，要我着手組織二十軍的國民黨特別黨部，因爲我們一到廣州，就要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本來革命委

員會設有一個專門辦理黨務的黨務委員會，由張曙時韓麟符彭澤民一批人負責。黨務委員會包括有各省黨部的代表，當然有些僅僅是名義的。我們浙江的代表並沒有，韓麟符曾與我談起過，將來要我充浙江代表，其實我離開浙江已有三年了。事情是這樣滑稽！

在附近西湖的一個茶樓上，與彭湃暢談了兩小時。他是海陸豐的“農民大王”，他把海陸豐的情形詳細告訴了我，他對於這一前途是非常樂觀的。

到潮州以後，一般人都是非常樂觀，以為佔領廣州已經不成問題，但我實在很懷疑。我們一起只有三萬人，難道廣州李濟深連這樣的抵抗力量也沒有嗎？這是不能使人相信的。張發奎軍隊已經到達廣州的消消息，我們到潮州那天就證實了。如果張發奎不能為我們的內應，我想，我們要打廣州是非常困難的。我們的子彈很缺乏，在未到廣州以前，是很不容易補充的。砲兵與飛機根本就沒有，但李濟深有兩團很厲害的砲兵，還有海軍。李濟深與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黃紹雄是完全一致的。兩廣的兵力，他們至少可以在短期間內集中十萬，還有砲兵與海軍；糧食的補充與給養的接濟，又比我們優越百倍；而且，他們還可以取得香港帝國主義的幫助，要我們來戰勝他們，實在是很困難的事。

我們的先頭部隊在二十日就到達汕頭。在汕頭已經引起了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英，日，美，法各國的軍艦，紛紛開到汕頭海面來，英國軍艦的陸戰隊甚至已經公然登陸，形勢是非常嚴重的。

軍隊一向在內地開動，沒有發生對外關係，所以也沒有顧慮到外交問題，甚至連做夢也沒有想到過。汕頭的警報傳來以後，革命委員會幹部方面頗覺得狼狽。人材的缺乏，是革命委員會一個普遍的現象，尤其是外交人材，簡直沒有。但事實上，問題既已經提到面前，就不能不派人去應付。派誰呢？這差使落得出身是學醫科，後來又從事文藝，現在參加政治活動的郭沫若。革命委員會在潮州發表了一道帶有滑稽意味的命令：“任命郭沫若為汕頭交涉員兼汕頭海關監督”。

郭沫若立刻到汕頭去辦交涉去了。其實郭沫若並不是外交人材，不過可憐革命委員會實在是沒有人，郭沫若至少還能識英日兩國的文字，僅僅是這樣一個條件，郭沫若就成了革命委員會的唯一的 外交人才了。

汕頭外國水兵登陸的事情並沒有擴大起來。在郭沫若到汕頭的時候，這些登陸的水兵已經回船上去了。其實如果外國水兵的態度強硬起來，革命委員會也是沒有辦法的，因為革命委員會現在沒有力量和帝國主義武裝衝突，郭沫若到汕頭去，

原是帶着妥協的使命去的。

在我們政治部駐紮的開元寺內，原有一個潮州青年社所附設的圖書館。這青年社在廣東清黨以前，大約是CY辦的，圖書館的書籍，關於CP方面的特別多，新青年，嚮導，中國青年，都是完全的。我在國民黨中央軍人部主編的軍人週報，此地也是完全的。讀了從前自己做的文章，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在潮州因為有幾天的停留，會到了許多朋友。

李紹唐現在也是在二十軍，這是我到潮州後纔知道。他是廣州政治講習班的學生；他在政治講習班時，我在中央宣傳部，我們同在大東路中央黨部內，幾乎是天天見面的，那時政治講習班的學生，時常和我在一起的，是張天一，韓陽初，徐德，段德昌，李紹唐。中央黨部傳達處的左側，有一個小咖啡店，是專供中央黨部職員及附設在中央黨部的政治講習班，中央婦女運動講習所的學生消費的。在華燈初上的時候，這小咖啡店內時常有我們這一批青年的蹤跡。因為婦女運動講習所的小姐們時常到這咖啡店來，所以更覺得這滿室生春的咖啡店內之可愛了。我們在這咖啡店內，無顧忌地肆談革命與戀愛的種種問題。後來他們都出發了，我也離開了中央宣傳部，從此風流雲散，雖然我不久仍回中央黨部來（由宣傳部轉到了軍人部）而小咖啡店已經停歇了。

紹唐他們出發的前一晚，我們在東山醫院話別出來，初夏的晚上，月光把東川馬路照得更其可愛。我們一面走，一面談話，覺得清景難逢，何況又是離別之前，所以大家都不忍走開，在東川馬路及百子路上來回閒步，直至深夜始散。那時紹唐送給我的相片上寫着“到北京去再見！”，北京終於我們大家都沒有到，想不到又在廣東境內敘首了。

“不僅不能到北京，現在連廣州也不是我們的了。”我握着他的手說，彼此都不勝今昔之感。

張秋荻也會到了，他本是黃埔同學會的編纂股長，春天在南昌就分別了。他現在第二十軍當了一名小排長。他也不想仍舊做政治工作，我決意請他到二十軍政治部來任編纂股長，但這計劃後來沒有實現。

從前四軍政治部的訓練股長范德烈，現在二十四師做了副營長。他還只有十八歲，身材也特別小，完全像一個小孩子，但他騎了一匹比他大幾倍的馬，在街上很得意的奔馳。這小孩子爬在這匹巨大的馬的背上，活像一隻騎在羊背上耍把戲的猴子。

在黃埔時候的老朋友曹素民，在二十軍任連長，我有半年多不見他了，面孔黑得像印度人，一口紹興土音還是沒有改。

最出我意外的是在此地會到了羅菲烈。在廣州的時候，我

們來往得很密切，是我生平知己朋友之一。我到江西的時候，他還留在廣州，在武漢的時候彷彿聽說他已經死了，我曾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爲這位朋友流過同情之淚，想不到他還在人間，而且在此地會晤了。他也以爲我已經死了，因爲在河南北伐的時候，汝南城下炸死了一個姓朱的科長，外間有許多人以爲是我。其實彼此都沒有死，這是何等可喜的事！我們在酒樓上去痛痛快快的喫了一頓，可惜我明天就要出發汕頭，而他又不能離開潮州，僅是這樣匆匆一晤，卽別東西，未免使人難堪！我送了他一幀在潮州纜攝的照片，并爲他題了溫庭筠的七絕：

江海相逢客恨多，
秋風落葉洞庭波；
酒酣夜別淮陰市，
月照高樓一曲歌。

十

在潮州祇停留了五天，又要匆匆地向汕頭進發了。我對於這優美的潮州是很留戀的，但向前進，在我總是很高興的，因

爲現在一步步的走近廣州了，在廣州期待着我到來的小姐呀，在最近的將來，我們可以在東山街頭並肩開步了。

總指揮比我們先一天已經出發到汕頭去了，我們政治部佔據了一輛專車，於二十四日的上午，開向汕頭。

潮汕鐵路上沒有重要的車站，也沒有可以嘗玩的景物，這，使我稍爲感覺到一點失望。

到汕頭還只下午一點鐘，政治部駐在市立女子中學，這是一所很好的建築，我佔據了一個光綫很好的房間。這學校秋季開學不久，學校裏已有學生住着，我爲使她們不致荒廢學業起見，命總務科劃出許多房間來讓她們照常上課，我們只佔據了小部分。

自南昌出發以來，可說沒有和異性接觸過，現在住在一個女學校裏，這些年輕的小姐時常在我的眼前出沒，頗使我感到一種壓迫。更加使人難堪的，我在我的房間裏發現了一部西廂記，翻到“春至人間花弄色……”，“輕玉溫香抱滿懷……”，“呀！劉阮到天台……”，“柳腰輕折……”等句，那種味道，真使人難受！我由衷地承認，我是非常需要一位異性的同伴。廣州的小姐呀，你趕快飛到汕頭來陪我呀！

做了一點工作以後，走到海邊去散步，在這裏，我看到了許多將要開到廣州，或由廣州開來的輪船。從汕頭到廣州，坐

輪船只要三十小時就可以到了，如果我能夠離開了我的職務，搭輪船到廣州去，那末兩天之內，我就可以把我的那位廣州小姐擁在我的懷抱中了。這樣想時，我恨不能立刻脫去了我的軍服，跳上開往廣州的輪船，這是多麼愉快的事呀！但我不能。

到總指揮部去看總指揮。總指揮部設在大埔會館。這是一幢很好的洋房。總指揮，廖主任，還有一位俄顧問，三個人同在樓上一個精緻的房間裏，這房間裏鋪着三張行軍床，就是他們三個人睡的。

我到總指揮部不久，陸續來了許多客：高語罕，郭沫若，吳玉章，林祖涵，周恩來。我們同在總指揮部吃了一頓精美的晚餐。我很歡喜到總指揮部來吃飯，因為這裏的飯菜，比起我們政治部來，真有天淵之別了。

因為到了潮汕，彼此都有一種喜悅的情調。

在席間，總指揮談到前方的軍情，張發奎和我們還有合作的可能，所以打廣州是沒有問題的。只要我們一打到惠州，張發奎就可以在廣州響應。至少，他的一部分是不成問題的。他的參謀長葉劍英，是絕對同情我們的，他加入CP的消息，我們在潮州已經證實，他現在兼任了教導團團長。梁秉樞升了警衛團團長，這也是絕對同情我們的。所以打廣州是沒有多大問題的。

爲要和張發奎黃琪翔有一種密切的聯絡，革命委員會秘密派高語罕到香港去做代表接洽。

晚餐後，總指揮給了我一萬元的現鈔票，這是政治部的餉銀與公費，但他又告訴我在汕頭不必關餉，我把這筆錢完全交給了財務股長。

汕頭這地方很好，比起內地一般的商埠如九江，蕪湖，重慶等處，要熱鬧得多。

新任汕頭交涉員兼海關監都的郭沫若，又新增加了一種任務，他被任命爲革命日報的主筆了。革命日報是革命委員會在汕頭新刊行的機關報。在革命委員會之下，郭沫若竟成了這樣紅的一位人物，這實在是不可解的事，究竟他有什麼才能？

汕頭民衆並不能給我們以興奮。學生幾乎全都是睡着的，工人也沒有起來，商民是更不用說了。他們對於我們投出驚異的目光，我們不能從他們身上找到絲毫的同情。此地的情形，比起潮州來，實在有點不如。可是我們也沒有心思來發動民衆，因爲我們的目的地是廣州，此地不過是一個路過的地方。

革命委員會在總商會 始辦起公來，但事實上，除了財政委員會忙於籌款以外，其餘也沒有什麼公可辦。財政委員會主席林祖涵，拿了十萬塊不能兌現的江西紙幣與武漢紙幣，要總商會換成現款，總商會的負責人都躲起來了。但後來還是換到

了十萬現款，資本家見了軍隊也是沒有辦法的。

乾吾到政治部來——這是他就任政治部主任以後第一次到政治部來，談起參謀團有改組為軍事委員會的消息，而且人選大致已經決定了，軍事委員會的委員是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周恩來，周士第，譚代英，周逸羣；主席委員將於劉伯承周恩來兩人中決定一人；而聶榮臻將任軍事委員會的秘書廳長——這飽桶又要做官了。像這樣無用的人，總是站在很高的地位，而許多很有天才很有能力的人，則屈在下僚，這種現象不肅清，革命委員會的前途是很悲觀的。

乾吾又談到政治部將要改變組織，政治部主任改為黨代表，秘書將改稱秘書長。為要養成軍事政治人材起見，革命委員會到廣州後，仍將辦軍事政治學校。革命委員會的本身，到廣州後也將有很大的變動，甚至有改稱×××政府的消息。

乾吾去後，我一個人坐在房間裏默然想到我們的前途，覺得眼前起了一重黑影。雖然已經到了潮汕，但能不能到廣州實在是一個疑問。不能到廣州，我們又將怎樣辦呢？這樣想時，我覺得這兩個月來的辛苦行軍，所得到的代價，不過是如此而已——在潮州的時候，還很積極，到汕頭以後，我反而消極起來了。

在汕頭也僅僅停留了五天，又要向揭陽出發了。

逃亡雜記

九月廿九日下午從汕頭出發，一艘專輪把我們拖到揭陽，已經是在深夜了。這艘很小的專輪，沒有漂亮的大艙間，許多人擠在一間很小的艙裏。機器轉動的聲音震得腦子發暈，煙煤的氣息使人難受！在船裏幾次像要嘔，但結果直到揭陽，還是沒有嘔出來。在揭陽上岸的時候，完全像已經失了知覺一樣。

因為是夜裏，又沒有電燈，揭陽城裏的情形是一點也看不見了。政治部找到了揭陽縣商會作駐紮的地方。總指揮部比我們先來，他們駐紮在縣公署，我本想到縣公署去看看廖主任，詢問今後行軍的方向，因為這次出發到揭陽來，時間匆促

得很，事前我幾乎是完全不知道的，離開汕頭的時候，完全是像逃難一樣的急促。但我實在頭暈得很，很需要睡，當夜沒有到縣公署去，祇派人去報告了廖主任。

揭陽縣商會的房子很糟，不像是資本家來往的地方。商會裏的人全都跑了，連僕役也不留一個。有兩個房間鎖着。我爲要想找一個比較舒服的地方睡眠，所以命勤務兵去把鎖着的房間打開來，但地方還是一樣的糟。我只得把兩張方桌並起來睡在桌上。

剛才睡着，乾吾派人來找我，囑我今晚一定要到總指揮部去談談，因爲明天早上就要出發。不得已，硬着頭皮起來，我感到了一種悲哀：負了責任的人，是有一種不負責任的人所不能瞭解的痛苦的。如果是在家裏，這個時候不是很安逸的睡覺嗎？他媽的，頭暈得很，還要我起來。

我懷着不愉快的心緒到總指揮部，總指揮還沒有睡，正在和乾吾閒談。這次我們出發到前方來，革命委員會只有參謀團的人跟了來，譚平山郭沫若恽代英吳玉章林祖涵他們全都沒有來，他們都還留在汕頭。

乾吾告訴我，我們明天早上就要出發，宿營地是湯坑。他又告訴了我關於軍隊的佈置與前進的方向：第三師師長周逸羣，被任爲潮州衛戍司令，他的第三師，就在潮汕留守。二十五

師師長周士第，與第九軍軍長朱德，率領所部，留守松口隴陞三河壩一帶。我們的全部軍隊，除了實際不足兩連的第九軍，及參謀團的手槍營（營長李鳴珂）外，實際上只有五師人——賀錦齋的第一師，秦光遠的第二師，周逸羣的第三師（以上三師屬二十軍），顧某的第二十四師，周士第的第二十五師（以上兩師屬十一軍）。如今把第三師與二十五師留守三河壩松口潮汕以外，在前方的只有三師人了。現在我們第一步是到豐順，第一個目的是佔領梅縣，再進一步的西進佔領海陸豐，再進而佔據惠州。最後進攻廣州。

本來只有五師人，現在把他分割成了三部分。要以三師人的力量去打廣州，這未免把敵人的力量估計得太輕了，而且第一師與第二師的作戰力量如何，還是一個疑問。我雖然不好說，但我對於這樣的佈置，實在很懷疑。潮汕之不費力的佔領，顯然是敵人有計畫的放棄，如果我們以為取廣州和取潮汕一樣的容易，我覺得無論如何是一種錯誤。

“我們三師人去打廣州，能有把握嗎？”我忍不住這樣問。

“當然是有把握的。”總指揮很得意的說。我也不好再說下去了。

因為精神不好，從總指揮部告辭出來，就回到商會裏來睡。三師人打到廣州，我總覺得事情未免有點近於妄想。

三十日很早就起來了，吃了早飯就出發。據說到湯坑只有五十里；五十里路，當然不算多，我只希望能夠早點到宿營地去睡覺。

很平坦廣寬的大路，比起在江西福建那種山路來，是好走得多了。到廣東以後，一向是坐船，徒步行軍，這還是第一次。究竟廣東和江西福建不同，在鄉間，也似乎富庶得多。

到下午二點半鐘，已經走了四十里路，到湯坑只有十里了。在行軍的時候，快要到達宿營地，是一件最愉快的事，這是每個人的心理都是一樣的。自到廣東以來，一向是坐船，在潮州汕頭又休息了幾天，今天第一天行軍，覺得格外辛苦。只有十里了，這是一個好消息；十里路，只要一個鐘頭就可以走到了。

但意外的事情發生了。前面發現了敵人，已經和我們先頭部隊二十四師打起來了。本來還遇戰在行軍的時候原是常有的，一點了不奇怪，所以我們也毫不介意的就在附近村莊上停留下來，靜待戰事的結果。不能立刻趕到宿營地，固然是一件憾事；但久不聞槍聲了，如今火線就在三四里路前面，槍聲很清晰地傳到我們耳朵裏來，足使我們精神興奮起來。

前面有許多山，敵人就在山頭上。

最先發現敵人的是二十四師，起初還以為是小部的敵人，

一下子可以打退的；但開始接觸以後，情形顯然是很嚴重，兩面山頭上都發現了敵人。單是二十四師的力量似乎不能夠把敵人打退下去，於是第一師也增加上去了，第二師也增加上去了。兩方面很劇烈的打起來。

總指揮部在離火線三里路的地方駐紮起來，我們政治部也在民房裏住了，開始救護傷兵的工作。傷兵絡繹從火線上抬下來，人數很不少。經過敵人的反宣傳，此地的老百姓很多已經跑了，所以救護工作非常困難。武漢分校女生隊出身的女同志，她們很勇敢的在火線上把受傷的官兵拖下來，那一種堅決的勇敢的精神，使最懦弱無用的人也要感動起來。

我帶了我的勤務兵跑到火線上去看，子彈紛紛從耳邊飛過，這樣多的子彈，像下雨一樣的打來，爲什麼沒有打到我的腦袋，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奇怪。伏在地上像一條蛇，爬到了我們的戰壕裏。十一軍軍長葉挺親自在火線上指揮。對面的子彈像蝗蟲一樣飛過來，但我們的弟兄都很沉着地應戰，葉挺平時有點像軍閥，此刻反而很溫和地像一個處女。

前面的敵人憑藉有很好的地勢，兩旁山上又都是敵人，所以我們的軍隊實在是很難進攻。

第二師的參謀處長帶了花，由担架隊抬到後方去了。連排長帶花的也很多。

總指揮同了參謀團主任劉伯承，政治部主任廖乾吾，親到火線上來觀察。

天將黑下來了，戰事還是毫無進展的劇烈地繼續着。如果不發生遭遇戰，此刻該在湯坑吃過晚飯了。可咒咀的敵人！

最感痛苦是我們沒有飯吃了。因為我們絕對料不到湯坑會有敵人，所以伙食担早已先到湯坑去了。伙食担既被敵人截留，於是我們只能挨餓了。老百姓又都跑了，雖然在老百姓家裏找到了一點米，但這點米少得煮粥吃也不夠。

天已經全黑了，我們的吃飯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從火線上抬下來的傷兵更其多起來了，可見戰事一時還不能見個分曉。一方面盡力救護傷兵，管理傷兵交下來的槍械，一面不能不找一點東西吃。好在是秋天，田裏的蕃薯已經熟了，我命總務科派勤務兵去掘些蕃薯來權當糧食，把從老百姓家搜得來的米，全都煮了稀飯給傷兵吃，我們自己雖然是餓得很，但只吃蕃薯，把所有的稀飯都給傷兵喫。

夜已經深了，前方的情形還是一樣的緊張。

我到了總指揮部。總指揮，周恩來，俄顧問，劉伯承，廖乾吾，他們在開談。

十一軍軍部的參謀到總指揮部來報告，說敵人有大隊在湯坑，而且李濟深親自在指揮（其實李濟深還在廣州）。瞎了一

隻眼睛的劉伯承，在查閱鋪在桌上的軍用地圖。總指揮的神氣似乎有點焦急。

“丟那媽！打我們的子彈，還是俄國造的呢！”十一軍一位參謀，在報告以後，尖銳地叫起來，他把在火線上拾來的子彈壳拿出來給大家看。

“想不到無產階級國家的子彈，造出來打自己的弟兄。”恩來感慨地說。俄顧問的翻譯把這事對顧問說了，俄顧問立刻拿起子彈壳來看。

“的確是俄國造的，從前原來運到廣東幫助你們‘革命軍’的，想不到反幫助了敵人。”他也嘆了一口氣。

葉挺從火線上下來，向總指揮報告前方的情形，但他很樂觀，據他的估計，至多再是三四小時，就可把敵人解決了。由於他的樂觀的報告，總指揮部裏充滿了喜悅的空氣。

我又跟葉挺到火線上去。在無意中，一顆子彈打中了我，我跌在路旁的田溝裏了。但我意識到我並沒有死，而且，簡直沒有傷。僅僅是一顆子彈從我身邊擦過，擦破了我的衣，也擦破了我的左臂的皮膚。我不是受傷而跌倒的，而是受了意外的驚震，纔會跌到田溝裏去，幸而田溝裏沒有水。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我滑稽地笑起來。

立刻爬了來，再向前進。機關槍彈的威力是不能阻止我前

進的。

在戰溝裏會到了宋鳴皋，他是一個營長。

“怕不怕，老朱？”他拍拍我的黏有泥土的肩膀。

“你侮辱我！”我“乎怪聲的叫了起來。但我和他很親熱地握了握手。就在這個時候，一顆從敵人那邊飛來的子彈，把他打在地上了。他不像我剛才那樣只擦傷一點，他的胸膛口已經打穿了一個洞，紫色的血從傷口流出來的時候，他的生命已經解決了。

“朋友：很好，你去罷！”我像是一個沒有情感的人，很鎮靜地向着他的可怕的屍骸默祝，雖然我們是很好的朋友，但他死，在我心頭引不起一點衝動。我的心像水一樣的靜止。的確，死，在我們看來，實在是太平常了。剛才我們不是在握着手嗎？兩人的手都還沒收回，他已經結束了他的一生。這事是值得奇怪嗎？當然不！值得悼惜嗎？也不必。“光明是用血去煊染的”，誰能夠保證我自己不在三分鐘之內流血？

一夜很快的過去了，並沒有如葉挺預料那樣順利，敵人還是沒有退。這一夜，我們全都沒有闔眼。

又是十月一日了，南昌事變以來，已經整整的兩個月了。

早上八點鐘的時候，第一師第二團的團長從火線上扛下來。已經完了，他的頭打得粉碎。傷兵反而比先前少起來，但死

的人是更其多了。

在飢餓與疲勞中，度過一個上午，戰事全然沒有新的展開。我們的隊伍全都調到火線上去了，連總指揮的衛隊也增加上去作戰去了。

下午，事情還是一樣。第三團團長也帶花了。

到十月一日的深夜，情形還是沒有一點新的展開。政治部收容的傷兵的槍械，已經可以堆成一個山。

總指揮到火線上去視察了幾次，但我們軍隊沒有一點進展。葉挺的軍隊，一向是無堅不克的鐵軍，但這次也沒有辦法，敵人太多了，他們又佔據了很好的地勢。

將近天亮的時候，我又到了總指揮部。他們在吃牛奶與餅乾——總指揮帶來的——總指揮因為兩夜沒有睡（我們全都兩夜沒有睡了），而且因為沒有很好的飯菜吃，所以面皮漲得很紅，看他樣子是很痛苦的。恩來還是像一個走江湖的醫生。瞎了一隻眼睛的劉伯承，很焦急的在室內來往走着。

我吃了一點餅乾，這在我是非常需要的，我們已因為經兩天沒有吃飯了。

前方的形勢驟然緊張起來，山頭上的敵人有衝下來的趨勢。總指揮在接各方面的緊急報告以後，同了我們到室外去視察，子彈紛紛飛來，我們又回到了房子裏。

在短期商酌之下，決定退却了。總指揮部先退，其次是我們政治部，再其次是各師的部隊。依然是退回揭陽城去。

退却，在政治部方面是最感難的，因為政治部不僅收容了許多傷兵，而且還堆着許多槍。於是我們只能拋棄了行李和一切不甚重要的文件，集中所有的伙子來挑槍。每個伙子都挑了許多槍，已不能再增加一枝了，而槍還是剩下許多。乾吾不在，我在政治部裏是一個頭目，不能不以身作則，自己首先背了兩枝槍。政治部的官長見我自己背了兩枝長槍，他們當然也不好不背了。我們都成了水滸傳裏面的雙槍將了。

開始退却的時候，東方已經發白。本來已經兩夜沒有睡眠，而且餓了兩天的我們，已經有點頭暈腳軟，況且又背上了兩枝笨重的長槍——除了這兩枝長槍以外，我身上原有自衛的手槍，乾糧袋，水壺，漱口杯，公文袋等許多東西，狼狽的情形是無法形容，但敵人已在後面追來，自然不能不拚命的跑。

到揭陽城於有四十里路。兩夜沒有睡眠，又餓了兩天的我們，背上背着這麼多的東西，又要走這麼多路。

總指揮部的兩面大旗在前而幌着，顯出一種失敗後的悽慘的意味。

“丟那媽！老子自從吃糧以來，向後退還第一次！”二十四師的一個兵士在路上這樣罵。

“爲什麼要退呢！拚一拚不好嗎？我們革命軍的名譽！”另一個兵士接着說。

能夠有這樣的士氣，事情總還是有辦法的，我這樣想。

因爲後面有三軍人掩護着我們退却，而敵人又似乎不急急的追來，所以我們也不必急急的跑。

走了約摸二十里路，在前面的樹蔭下，總指揮在那裏休息。我們也暫時休息了一下。我卸下了左右肩上的兩枝長槍，覺得身體輕爽得多。

向總指揮行了一個禮。總指揮的臉漲得像圖畫裏的關雲長一樣的紅。

“休息一下再走。”他對我們說。我在他們這一羣中間坐了下去。

彭湃也在這裏，他不曉得是什麼時候來的。他看見我們政治部官長每人肩上都背了兩枝槍，表示熱烈的慰勞的意思。

“我們到海陸豐去，到了那邊，一切問題都沒有了，那邊的農民全都熱烈的擁護我們。”他對我說。我很了解他的意思是安慰我，減少我的失望的情緒。

休息了二十分鐘，總指揮部又繼續向揭陽城前進。

前天從揭陽來的時候，走了一段，問問離揭陽城已經幾里路了？還只五里，七里，十里，覺得離開揭陽還是這樣近，是一

件恨事。現在又相反，覺得揭陽城離開我們太遠了。

在上午十點左右，終於到了揭陽城。我們仍住在縣商會。剛到不久，總指揮部就來了一個通報，着立刻煮飯食後，全部退潮州。

兩天沒有吃飯，當然很需要吃飯了。但伙食擔還在湯坑，只得由勤務兵糊亂弄些飯來吃。但飯還沒有弄好，總指揮部的通報又來了，說敵人已經追到揭陽城外，必須立刻退出揭陽，如果還沒有吃飯，只能不吃。

真是沒有辦法的事。飯既沒有煮好，只得每個人把半生不熟的飯，裝點到乾糧袋裏，拔起腳來就走。

出城後就要渡過一條河，河面很闊，而舊式的渡船只有五六隻，要以五六隻船來裝我們一二萬人，真是難事。

總指揮命副官長率領衛隊先走，其次就我們政治部，後面是總指揮部和大軍。

向後退的時候跑在前面，總是不吃虧，況且我們肩上的槍已經交給了總指揮部，走起來爽快得多。雖然兩夜沒有睡，兩天沒得吃，但在生死關頭，也不能不拼一拚。

等了很久，纔渡過了河。天又下着雨，上岸的地方濡滑難走，許多人都跌下水去，再爬起來時，已像一隻落湯雞。兩個伙子與兩個勤務兵扶着我，我總算沒有跌到河裏，但爬到岸上的

時候，已經濺了一身爛泥。

總指揮部的嚴令：全體不准中途休息，星夜抄小路趕到潮州城去。

“此地到潮州有多少路？”我問了問帶路的人。

“大路是一百二十里，小路是一百五十里，而且這一百五十里比二百里大路還難走！”帶路的這樣告訴我。

天哪！我們已經兩夜沒有睡眠，兩天沒有吃飯了，還要我們走一百五十里小路，天又下着雨，而且又不准中途休息……

今天是十月二日了。在我們江南，已經是橙黃橘綠的深秋時節了，南國的氣候雖然比較熱一點，但天下了雨，所以頗有涼意了，何況我們又是幾夜沒有進食沒有睡眠，所以更覺得寒冷了，因為我們身上還是穿着盛暑天氣自南昌出發時的單衣。在感覺寒冷的痛苦的時候，纔深悔在汕頭的時候為什麼不買一件衛生衣。

天彷彿是故意和我們作對，仍然是下着雨，溫度愈加降低了。

完成渡河的任務，已經是十二點半了，雖然腳軟得幾乎不能舉步，但還是不能不向前進——不！我們現在是向後退。

我和宣傳科長陳章甫君一邊走，一邊談話。本來在潮州的時候有這樣一個計劃：把陳科長調任第六團政治指導員，而由

我自己來兼任宣傳科長。但這一計劃始終沒有實現。

“如果那時決定我到了第六團，這一回的苦頭到可以不吃了”。陳科長苦笑着說。第六團是隸屬第三師的，現在還駐在潮汕。

“如果我還在總政治部，則此刻安安逸逸坐在汕頭呢。”我也無聊地說。

陳科長是長沙人，曾在三十五軍第一師任過政治部主任，是一個很好的演說家，雖然他的口音帶有很重的長沙土音，但他說話的聲音很響亮，比起毛澤東的帶有婦女腔調的演說，好得多了。他和潤之（毛澤東名）是同學，潤之的事，他知道得特別清楚，他為我講了許多。潤之被趙恆惕通緝以後，曾在他家裏躲過兩個月。

這樣無系統地談着，也可以稍為減少一點痛苦。但我們的頭和腳，都不知道有好重，一雙腳很不容易搬動，所以走路走得很慢。

下午二點鐘的時候，雨停止了。我們實在餓很難受。在一個村莊上，老百姓為我們燒了一點稀飯。我素來不歡喜吃稀飯，但在今天，這不清潔的稀飯比魚翅還要好喫。我很快的吞完了三碗。

吃了一點稀飯。精神稍為振作一下，而且天也晴了，我們

依舊向前進。

在江西的時候，我時常看到乾吾一面扶着手杖慢慢兒走，一面閉着眼睡，覺得有點奇怪，睡着了爲什麼能走？走的時候爲什麼會睡着？現在這種病態輪到我身上來了。我們雖然一面還是在走路，一面完全陷於睡眠的狀態。因爲是人多，到也不致跌在地上。

在天已經黑下來時候，我們又在一個村莊上討稀飯吃。問問到潮州還有多少路，“整整的一百里！”一個老百姓很誠懇的告訴我們。原來我們已經走了五十里了——如果把今天早上自湯坑回來的路程計算在內，我們已經走了四十里大路，五十里小路，一共九十里了。

還有一百里！雖然是一個嚇人的數目，但我們總算已經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了。

休息完全是不可能的，因爲不僅總指揮有不准中途休息的命令，而且如果一休息，大家就會死一樣的睡去，所以我們自己也堅決的抱不休息主義。一種理想追求的力——更明白點說，一種宗教的力，驅使着我們的精神，所以我們雖然都是疲勞到了極點，但精神上是沒有痛苦，始終是硬着頭皮在走。這些挑担的快子就不同，他們沒有思想上的目的，所以他們是比我們更其痛苦了。他們時時鬧着要休息，甚至有時把担子擡

自歇下來不走了。怎麼辦呢？在好言勸告之後，還不能使他們動腳的時候，只能提起鞭子來打了。不是我們殘忍，但不如此打有什麼辦法呢？

在我們皮鞭子的鞭撻之下，快子們很痛苦的挑着担子走，我們精神也感覺一層痛苦。

雖然是在墨黑的夜裏，我們還是不止息地向前走。今天我們第三夜沒有睡眠了，也是第三天沒有喫飯了，但一般說來，我們前進的勇氣並沒有完全喪失。楊書記官提起喉嚨唱大軍進行曲。陳章甫唱少年先鋒歌，他似乎用盡平生力氣，拚命的喊“走上前去呀！曙光在前，同志們奮鬥！”

悲壯的歌聲衝破了沉悶的空氣，我們的精神稍為振作了一下。

“蘇武，留胡節不辱；雪地又冰天，窮愁十九年……”忽然起了一陣尖銳的女子的歌聲，是唱蘇武牧羊。

“是那一位女同志唱蘇武牧羊？”我們隊伍中有人問。因為在我們這一羣中是沒有女同志的。

“……轉眼北風起，雁從漠關來……白髮娘，望兒歸，紅粧守空閨；三更同入夢，兩地誰夢誰？……”蘇武牧羊的歌聲依舊繼續着。

“原來是你，密司洪。”

“同志朱雅林，你好。”我們很親熱地握手——握手。密言洪是武漢分校女生隊的健將，自從南昌出發以來，一直是跟了我們走的。今天她本是跟了軍部副官長在前面走，因為在這村莊上睡了一刻——她和我們一樣的三夜沒有睡覺了——所以落了伍，幸而我們的隊伍來了，她加入了我們的隊伍。

我們這一羣中多了一位年輕活潑的女同志——她還祇十九歲——頓然有了生氣。

“正月裏來是新春，家家戶戶點紅燈；別人家丈夫團圓敘，孟姜女丈夫葬長城。”她又很天真地唱起來。

“你的丈夫呢？”初佛有誰在低這裏聲的說。洪只做沒有聽到，依然在唱：

“二月裏來暖洋洋，燕子雙雙到南方……”

女人可以使我們精神興奮起來，這比鴉片煙還靈。自從洪加入我們的隊伍以來，我們行軍的速度也增加起來。

“雜種！有五個月沒有玩女人了，這次到湖州去，總要弄個花姑娘來痛痛快快幹她一下。”是一個四川口音的兵士在說，他是從指揮部的衛隊，也是跟了副官長去落伍下來的。這些話頗有點刺耳，尤其是女同志面前。但洪還是毫不介意的，她很天真地一路唱唱跳跳。

“毛毛雨，下個不停……”她用着很有刺激性的調子唱着，

其實天並沒下雨，而且稍爲有點月光。

“再來一個！”她停了口的時候，就有人在喊。

“歡迎，再來一個！”有人附和着喊。

“再來一個！”還有鼓掌的聲音。

“那位同志唱京調我聽，等息我再來唱。”洪答覆他們。

“在月下，驚碎了，英雄虎胆……”不知是誰在唱，但沒有下文了。

“聯下去呀！”有誰在喊，但依然沒有下文，另一個唱起空城計來了：

“我正在城樓觀山景，耳聽得城外亂紛紛。打聽得何人來攻城，原來是司馬發來的兵……”

“媽媽的，要什麼時候纔能到潮州呀！老子一雙腳拖不動了。”

“快要到了，同志：你不要性急，潮州就在面前，但總要走過去纔能到呀。”

“……一樁樁，一件件，樁樁件件，對小妹細說端詳……”是誰裝作女子的腔調在唱。

“工農兵，聯合起來，向前進，萬衆一心，我們前進，我們奮鬥，我們暴動，我們犧牲，殺向那，國際帝國主義的大本營！”

“啊唷！我的娘呀！老子肚子餓得刮刮叫了。”

大家一面在黑暗中走，一面在亂唱着各種腔調。也只有這樣，纔能夠向前走，否則我們的腳真會重得搬不動了。

“啊啊！潮州到了，同志們。”有誰在尖銳地喊。

“你在做夢！到潮州至少還有幾十里。”

“那末，同志：你看來爲什麼有這樣好的馬路呢？”先前喊潮州到了的那人說。的確，我們是走在很平坦光滑的馬路上了。

“唉！我們走錯了路，這不是潮州，而是汕頭呀，你看，前面不是汕頭的洋房子嗎？”

“不會的，汕頭是在那邊呢。”

“恐怕我們走到了省城了？這邊不是黃沙車站嗎？”

“見你娘的大頭鬼！”

“帶路的，這是什麼地方？”我問。我以為前面一定是個城市，但一時又想不起是那一縣。

“帶路的！”

“帶路的！”

許多人喊帶路的，但沒有回答，纔知道帶路的已經不知在什麼時候跑掉了。

糟糕！我們走到虎口裏來了，前面就是豐順，李濟深就在

那裏等我們，天哪！爲什麼我們會走錯了路來送死呀！”有人這樣喊。

“都是你們不好，不好好兒走路，要唱什麼歌？”有人這樣責問。

“同志們：鎮靜些，不要胡說。”我喝住了他們：“豐順是在那邊，前面決不是豐順，我們決沒有走錯路，副官長剛才在這裏走過。”

我們沿着平坦的馬路走去。鄉村裏有這樣好的馬路，這是出人意料的事。

在微弱的月光之下，我們望見前面不是一個城，而是一所大的宅第。

“喂！這麼大的房子！”

“這是一個丞相府！”

房子的確是很大，裏面總有幾百間，還有幾處廣大的花園，這是在微弱的月光之下，隱約可以看出來。我們終於走到這所大宅第的門外來了。正中是兩扇很大的鐵門，比上海黃浦灘路匯豐銀行的鐵門還要壯麗，兩旁是許多小門和牆垣，地方很寬大，繞這房子走一轉，怕有好幾里路。巨廈面前橫着一條整潔的馬路，對面就是一條河。兩座用土敏土建築得很好的橋，蹲在這座巨廈的兩旁，像上海匯豐銀行前的那兩座石獅。

巨廈兩邊還有許多高桿的煤油路燈，通夜的點着，使我門可以對於這座巨廈看得更真確些。

“天哪！這是什麼地方呀，這樣大的房子，簡直是皇宮！”

“你看，同志：還裝有電燈呢。”的確，鐵門的兩旁都裝有電燈，不過現在沒有電，所以路燈也是點煤油的。

“怕是陳炯明的將軍府罷。”

“見你的鬼，將軍府是在海豐城裏。”

“鄉村裏為什麼有這樣好的馬路，這樣大的巨廈呢？”我也覺得有點奇怪。

這巨廈裏面靜悄悄沒有一點聲息，似乎裏面沒有人住的。

“糟糕！我們遇到狐狸精了，老王：你看過聊齋嗎？這是狐狸精化出來迷我們的。”

“同志：你不要胡說。”

“報告秘書：我們進這房子裏去看看好嗎？”宣傳科一位同志向我提議。我對於這提議是同意的，但鐵門緊閉着，想了許多的方法，總是敲不開。

“我們想法從牆上爬進去吧。”有人這樣提議。

“不必，”我說：“我們還是趕快走，潮州不遠了，到了潮州可以舒舒服服的休息。”

到潮州去舒舒服服的休息，誰都有這樣強烈的要求的，所

以對於這座迷一樣的巨廈也不去理牠了。

過了那條建築得很精美的橋，時間已經將近四點鐘了。過了橋，四面都是田，但中間還是很好的馬路。

我們向前走，儘走儘走，但是走來去走，還是在這座巨廈的左右。走了將近一個鐘頭，還是沒有走出這個圈子。換了好幾條路，把附近所有的路都走完了，但是走來走去，還是在這裏。

“這纔怪呀，爲什麼走來走去老是在這裏？”

“真的碰到了鬼，這是什麼路呀？斷頭路！”

“雜種的，這是什麼地方，糊裏糊塗，走到鄧都城去了。”

“我說的，我們碰到了聊齋裏面的狐仙，你們不信？現在走來走去，還不是在狐仙的掌裏，走到明年，也是一樣。”那個無智識的兵士很得意的說，彷彿證明了他的遇見狐仙的理論。

大家議論紛紛，一面仍舊在走，可是總走不出這巨廈的附近。我們全都是三天三夜沒有吃飯，沒有睡眠了，真的像是中了狐仙的迷一樣，有點疑惑起來。

“同志們：我們就在這巨廈門前休息一下，到天亮再走，好在天快亮了，總指揮還在後面呢。”我這樣說，我們這一羣就在這巨廈前的光潔的馬路上息了下來。大家在馬路上躺著。三夜不曾睡眠的結果，一躺到地上，全都像死去一樣的睡熟了。

平常，在睡眠狀態中，我是一個感覺最敏捷的人。在我睡

着的時候，只要週圍稍微有一點聲息，我就會醒來。而且我還有這樣一個特點，無論睡得怎樣遲。但我要預定什麼時候起牀來，到了時候自然會醒。在我們休息的時候，本打算等天一亮就走，但我一躺下去，也完全像死一樣的睡熟了。不過比一般人的感覺還敏捷些，在我正睡得很好的時候，一陣尖銳的槍聲把我驚醒了。我連忙起來一看，週圍的人全都睡着，太陽已經照在我們身上，已九點一刻了。四周的環境很沉靜，在日光之下，那座巨廈更顯得宏偉了。

什麼地方來的槍聲，我這樣想。一面喊他們起來，但喊醒了這個，那個又着睡了，費了很大的力量，纔把大家喊起來了。

我向他們說明槍聲的事。

“不會有槍聲的，怕是寢室聽錯了。”陳科長說。但我決不會聽錯。

正在疑慮間，尖銳的槍聲又響了幾聲，但又沉靜了。

經過了四小時的睡眠，我們的精神比較充實一點，就來研究是槍的由來。

“首先我們要明白這究竟是什麼地方？到潮州有幾多路？怎樣走法？該去找個老百姓來問問。”我一面說，一面就派了幾位同志去找老百姓。

去了半個鐘頭，老百姓找來了兩個。我們知道了這是潮

州縣屬的一個鄉村，到潮州城還有四十八里，顯然我們沒走有錯，總指揮部副官長昨夜就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過夜，今天天亮後纔走。這所巨廈是潮州一個大地主的家裏，這大地主同時是南洋的大資本家，他在潮州，汕頭，廣州，香港，澳門，廣州灣，新加坡，都有很大的別墅，這也是老百姓告訴我們的。此地附近的田地幾乎全都是他的，至於我們昨夜走不出去的原因，因為環繞這座巨廈的馬路，是循環式的，我們昨夜昏昏沉沉，又是在黑夜，只知道沿馬路走，忘記了小路，所以找不到出路。這老百姓並且願意為我們帶路到潮州。至於槍聲，據老百姓說，是很平常的事，此地老百姓幾乎全都有槍。

這一切的報告，都使我們安心，只有四十八里路了，當然不算遠，不過們我實在餓得很，我就命總務科拿錢給老百姓去煮一點飯稀來吃。

老百姓煮飯去了，我們都在巨廈前等着。有幾位同志作爬進巨廈去的嘗試，但是失敗，因為牆垣上面置有極多的碎玻璃。

太陽晒到身上，感覺到很舒服。洪坐在我的旁邊，她的身體和我的身體緊緊靠着。一陣陣異性的肉香，引起了我的性的衝動。我想，為果邊邊沒有人。我一空要把她掀在地上，痛痛快快弄她一下。……這樣想時，覺得臉上有點發燒。

吃過了粥，老百姓帶我們動身，後面的總指揮部還是沒有消息。

又走了二十多里路，接到了一個意外的警報：據地上的老百姓告訴我們，潮州城裏早已被我們敵人佔據了。這些老百姓從前都是辦農民協會的，是絕對同情我們的，他們把敵人包圍潮州城，以及我們軍隊從潮州逃出來的情形，詳細報告我們。

這不啻是一個晴天的霹靂！我們三天三夜沒有吃飯與沒有睡眠，唯一的希望是到潮州城去安息一下，如果潮州真的已經失守，不僅我們無處安息，簡直走頭無路。我們不敢相信這個惡消息，也有點不能相信，潮州駐有我們的一師人——周逸羣的第三師，即使被敵人進攻，一定也要有劇烈的戰爭發生，第三師決不會不戰而退的，但我們為什麼連一點消息也不知道呢？再說，即使第三師退出了潮州，退到什麼地方去呢？當然是退到揭陽來與我們大部隊匯合，為什麼我們一路來連一個敗兵也沒有遇到呢？這些都是使人難以相信的。

但是另一方面，老百姓的話又不能完全不信，因為我們知道這些農民是非常可靠的站在我們這一方面的。

潮州如果被敵人佔領，則我們怎樣辦呢？當然又只有向原路上退回去。但潮州失守的消息，我們不能完全相信，也不敢

相信，如果真的潮州失守了，汕頭當然也是陷落，在松口隘壘三河壩的那一師人，當然也糟了，這樣，我們根本就完了。這樣想時，像一盆冷水澆到頭上。我們全都為失望的悲哀包圍着。洪緊緊地拉着我的左手。

“怎麼辦呢？雅林。”她問我。

“我們還是再向前上去打聽一下看，我想潮州不致失守吧，否則我們一路來縱然不能遇到第三師的同志，那副官長帶去的人也應該退回了，為什麼連他們也沒有消息呢？”我這樣說，用左手來把洪抱了一抱，這十九歲的女孩子的臉也紅起來了。

還是決定照着我的意見做，我們還是向前走去。這時候我們這隊伍人數漸漸增加起來了，因為十一軍一部分士兵也從後面趕上來了，我們這一羣已有四百多人。

爲着想到潮州去安睡一天，飽吃一頓，所以存着萬一的希望，向着到潮州的大道前進。

又走了六七里路，這萬一希望終於是幻滅了。副官長帶去的衛隊逃回來了。潮州汕頭同時陷落的消息已經證實，現在潮州城裏，是桂軍黃旭初的部隊。副官長已經逃跑得不知下落——或許是已經被俘虜了，因為再前進五六里，就有黃旭初的哨兵。

聽到了這個不幸的消息，四百多人全都呆了。

“唉！完了！洪絕望似地叫多來，她差不起是哭了。

“怎麼辦呢？”大家嘆着氣。

“那也沒有什麼，勝敗是兵家常有，我們退出潮汕，當然是一種策略，也不必失望。不過現在我們既不能前進，那只有向路原上回去。”我這樣說。

“但是，”我又說“現在潮州城裏既有敵人，離開我們不過二十里路，如果我們退回原路去，他們追出來，事情就很麻煩，所以一面趕快走，一面不能不有所準備。”

協議的結果，把十一軍的弟兄臨時編成一隊，掩護我們退却，我們自己也都全副武裝，準備敵人追來時，作最後的一戰。

我們沿着原路回去，起初還以為總指揮部就是前面——總指揮部本來在我們後面——但是又走了十幾里路，又發現了新的變化，總指揮派了一員參謀來通知我們，要我們到砲台地方去集合。原來我們在揭陽出發時，總指揮部並沒有在後面跟來，因為總指揮正要出發，忽然遇到從潮汕退出來的隊伍。革命委員會各部分與第三師的人全都到了揭陽，所以總指揮又臨時改變計劃，把部隊開到砲台，預備直接到海陸豐。但我們已經在前面出發了，所以特派了一員參謀來傳達命令，要我們開到砲台。

“到砲台有多少路呀？”洪問，她始終是跟在我身邊。

“大路是八十里，但我們現在不能走大路，抄小路是一百路。”那員參謀說。

“要命，還要我們走一百里。”有人很失望地說。

潮州城裏的敵人已經在後面追來了，而且現在揭陽早已被敵人佔領，據那員參謀說，前面不遠二三十里路地方，就有敵人。我們這三天三夜沒有睡眠沒有吃飯的狼狽的一羣，處於腹背受敵的危境了。

“同志們：我們拿出革命的精神來，趕快到砲台去！”十一軍一個弟兄喊。

原來為我們帶路的人，也認識到砲台的小路，仍舊由他帶着我們走。因為大路有遇見敵人的危險，所以不得不多走一點路。

天氣很好，我們一羣人抄小路走。時候已經兩點鐘了，還是早上吃過一點稀飯，胆子已經餓得很了。但又恐怕敵人追來，不敢在大路上停留。離開了大路有十多里路，纔在一個鄉村上休息一下，討了一點稀飯來吃。洪在一個農民家裏討到了兩個雞蛋，分了一個給我，我平常絕對不吃雞蛋，但今天洪給我的雞蛋，吃了一口覺得特別好吃。

“今天是幾號？”在農民家裏，洪突然問我。

“十月三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滿足十八歲的生日。”洪很嫵媚地說。

“那麼送一個雞蛋給你，就算替你过生日。”我把已經吃了一口的雞蛋，塞入洪的嘴裏，她並沒有拒絕，很有意義地向我笑了一笑。

“謝謝！”她的聲音低得幾乎聽不出來。我們用勁地握了一握手。

還要趕八九十里路呢，不能不走快一點。

又是整整地走了一夜，到天明的時候，纔走到了砲台，會到了總指揮。滿想在砲台休息一下，但我們一到砲台，總指揮又要出發了，是到關埠，不能不跟着走，幸而只有四十里。總指揮是坐了一艘輪船由水路出路的，他邀我也搭了他們輪船，可以在船裏舒舒服服休息一下，但我們政治部不能上輪船，因為輪船上的地位，僅僅只能再容一二個人了。在我自己，四天四夜沒有睡眠，沒有吃飯的結果，已經憔悴得像一個死人，能夠舒舒服服的坐了輪船出發，當然是求之不得，但我們政治部怎麼辦呢？乾吾一向是不在政治部的，我負着政治部的全部責任，爲着個人的安舒，丟開了羣衆，拋棄了責任，這在我是無論如何不願意的，所以雖然是總指揮的好意，但我願意跟了大家吃苦，決不願意獨自享樂，所以我還是跟着隊伍步行。不過我

的意思是想把洪送到總指揮的船上，因為我覺得這位天真的小姐太可憐了。總指揮對於這一要求是絕對沒有問題的，我以為洪對於我的好意一定是很感謝的，但當我把這意思告訴洪，請她到輪船上去的時候，她並沒有表示感謝的意思。

“你不坐了輪船去嗎？”她問我。

“我不坐輪船走，你這幾天辛苦了，坐輪船走吧。”

“那我也不坐輪船，我們還是在一起走吧，”她很堅決地說。我心裏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愉快。我實在也不願意洪離開我走。

洪還是和我在一起走。對於她，我覺得沒有什麼野心，但我倆之間的一種同志的愛，的確是超過了平常的友誼。在分校許多女同志中，洪是我最欽佩的一個，這次自從南昌出發以來，我們接觸的機會很多，我對於她更增加了一層了解。但是年輕的異性朋友在一起，總會聯想到兩性關係上，所以我和洪在一起，也時常感到性的衝動的壓迫，但我又不願意她離開我。女人總有一種魔力，會使男人沉醉，我現在漸漸地為洪所屈服了，雖然我一心牽掛着廣州的小姐，而對於洪，總是不願離開一步。我們同在一起走，同在一起休息，不停止的談話，這種過分親暱的態度，引起了同事間的議論，他們都以為我和洪的戀愛已經成功了，其實在我們，自己覺得是很坦白的。我

牽掛着廣州的小姐，洪也很知道。我和洪之間，雖然談了許多的話——談到各人的身世，談到大局的前途，談到種種學問上的問題，但絕對沒有談到愛情。每當我們的談鋒轉到戀愛問題的時候，彼此都極力的避免談到自身的問題。

到關埠的時候，還只有兩點鐘。找到了宿營地，立刻像死一樣的睡去了。

十月五日早上就從關埠出發。經過了一夜的睡眠，我的精神好得多了。但今天感覺得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洪離開了我，她被派到革命委員會工作去了。我一個人走在路上，覺得失去了什麼寶貝似的，深深感到一種悲哀。

今天走了六十多里路。

我們在湯坑打了一個敗仗，實力損失了三分之一，加以第三師在潮州的失敗，損失了一部分，二十五師在三河壩又失了聯絡，所以我們現在名義上雖然還有四師（第一，二，三，二十四各師），而實際只有兩師了。要以這樣單薄的兵力取廣州，顯然是不可能的事了。我們現在的目的是到海陸豐，因為海陸豐農民運動有很好的基礎，到海陸豐後，可以取得民衆的擁護，將來再等機會進攻廣州。

十月六日早上出發，預備到雲落宿營。

下午二點鐘到了流沙，離雲落只有十多里路了。

流沙農民煮了稀飯招待我們。革命委員會與總指揮部都在流沙農民協會裏休息喫稀飯。

恩來病了，他連稀飯也不能吃。

農民協會的鐮刀旗扯得高高的，還是我們這次到廣東後第一次看到。

休息到了三點鐘，正在準備出發，忽然前面右首的山上發現了槍聲。右首發現了敵人，總指揮立刻派隊伍去抵抗。敵人佔據了山頭，我們隊伍在山下，雙方開始接觸了。

因為發生了遭遇戰，總指揮暫駐流沙，以便指揮。自從湯坑打了一場敗仗以後，聽見了鎗聲，不免有點胆寒。

右翼的戰事剛在展開，左首山頭又發現了敵人。葉軍長自己帶了二十四師在右翼抵抗，第一師師長賀錫齋在左翼應戰。接戰了一個多鐘頭，我方漸漸不能支持起來，所有的部隊都增加上去了，連參謀團的手槍營，也由李鳴珂帶着衝上去了，但戰事還是不能樂觀。

在四點半鐘的時候，總指揮決意把左右翼的兵調回來，向前面衝，還是預備到了雲落再說。

我們跟着總指揮部前進。走不到二里路，前面又發現了敵人，槍聲一響，我們的部隊就向後轉了。大行李擔完全把行李丟下了，向後面拚命的逃，於是像潮湧一樣，不可遏止的全體

向後逃了。

在湯坑雖然打了敗仗，但是退得很從容，可是這次不同了。敵人不僅在後面追來，而且右在部有敵人衝出。我們亡命的飛奔，敵人的子彈在我們左右飛舞。槍聲已不是噼啪噼啪，而是嘶嘶嘶的尖銳的怪叫。我雖然在拚命的跑，但我的神志還很清楚。我很明白，我的身邊有那些人是被打死了，這簡直是非常之多。我的兩個勤務兵，一步也不離的跟了我跑，但是不久，一個年紀大一點的勤務兵被打死在地上了。當然顧不得他，我還是向前的飛跑。

本來因為這幾天過度的辛勞的緣故，兩條腿酸痛得有點走不動。但這時候，我像飛一樣的跑，自己也不知道兩條腿為什麼有這樣好的力氣。

我很清楚，與我在一起逃的，有譚平山，葉挺，周恩來，譚代英，郭沫若等，但總指揮與乾吾不知去向了，我真有點替他們擔憂。

我只是跟了人多的地方跑。後面敵人的子彈還是在不斷的飛來，“殺！殺！殺！”的敵人的怪叫，像狼嗥一樣的鑽進我的耳朵。

突然，我意識到那邊一個很面熟的女子被敵人的子彈打中了，這女子像一匹被宰的綿羊一樣，躺在地上不動了。

“這不是洪嗎？”我連忙不顧一切的跑過去。天哪！不是洪還是誰？傷口是在頭上，所以我趕去時，她已經完結了她的一生了。

在一剎那間，我完全失了知覺，倒在她的屍旁了。

像是做夢一樣，似乎有人拿棒來在我腿上擊了一下，我從昏迷中醒了轉來，我的左腿上染了一腿的血。我們那一羣向東邊逃去了，這裏只有我一個人還沒有死，我的週圍都是屍首，洪像是很安適的躺在我的身邊。

“親愛的同志……”我禁不住抱了洪的屍首吻了一下。由於這樣擁抱一下，我的身上都染滿了血。這時候，我纔明白我自己的左腿上也中了一槍，褲子打穿了一個洞，血還在流出來，不過傷並不重，僅僅是擦傷皮膚的輕傷。

洪的遺骸軟得像一條棉被，我抱着她在地上坐了一刻，一種遏止不住的悲哀，在我心頭衝突着，我止不是流了幾點熱淚在她的臉上。我是素來不流淚，“沒有淚，只有血！”這是我的口號，但我今天也流淚了。在這一剎那間，我感覺到我自己的懦弱。

“我還沒有死！”我站立起來，這時候，在我心頭只有憤怒，沒有悲哀。

敵人跟到那邊去了。我把洪的遺骸抱起來。但我怎樣處

置她呢？我望望前面有所民房，我把她拖到了這屋子裏來。屋子裏沒有一個人。怎樣辦呢？我不能在此守着，因為敵人一定就要過來，我守在這裏，只有束手待斃，這樣的犧牲是沒有價值的。洪死而有知，一定也不願意我這樣做。我尋思無計，只得找一張紙來用自己身上帶着的自來水筆寫着：

“此洪××女士遺體，望代收斂安埋 感激無量！一九二七年十月六日。”

我吻了吻她的冰冷的額骨，悄然離開了這間屋子。但我實在有點捨不得。我重又回到這屋子裏，最後看了她一眼，止不住的熱淚又流出來了。

“再會，洪！”我很堅決的說，悄然走了出來。

槍聲已經聽不見了，我向東邊跑，因為我要去追我們的隊伍；在這裏，離開了隊伍是萬無生理的。

雖然腿上受了一點傷，但還是能夠走路，終於找到了我們的隊伍。平山，恩來，國燾，沫若，玉章，葉挺，代英，全都在。

天色已經漸漸黑下來了。我們在一個土坵上休息了一下。怎麼辦呢？大家悄然無語。

正在這個時候，槍聲又起了。像霹靂一樣，一個炮彈打到這土坵上來，在我們這一羣中，又不知有多少人被犧牲了。

我們由土坵上滾下來，滾在一個水溝裏，但立刻又爬起來

跑。

子彈不斷的從後面飛來，我只是跟着一大羣人向前飛跑。洪的死，腿上的傷，自己的生命，這一切我全都沒有想到，我只是拚命的跑。

跑了二三小時，跑過了幾個山頭，離開敵人漸漸的遠起來了。我們在一個山上休息了一下。已經是深夜了，天上繁星密佈，羣山寂然無聲，淒慘的境況使我想起了洪。這樣年輕的姑娘，就這樣完結了，人生如此，如此人生！

像洪這樣的結局，在一般人看來，當然是很淒慘的；一個聰明活潑的孩子，僅僅活了十八足歲，死在離家數千里外的荒涼異鄉，而且連屍骸也沒有人來收斂安埋。但在我們看來，一個革命黨員這樣結局，一點也不是奇怪的，這不是她的不幸，正是她的光榮！她已經盡了她的最後的責任了。

在山上休息了一刻，我纔覺得左腿上的傷口有點疼痛。這時候，我纔發覺向日所佩的那枝手槍不知去向了。這支手槍原是在河南華坡鎮上警察所長馮國壁那裏得來的，我非常寶愛牠，這是我的武具！

“用我們的刺刀和槍砲，
開自己的路！”

我很歡喜唱這歌。可惜，這支槍現在不遺落在誰的手裏

了。今天——一九二七年十月六日，將成爲我生命史中最可紀念的日子：流沙會議，打敗仗，革命委員會消滅，我的最敬愛同志——洪死了，我的武器失去了，我自己的生命像一葉扁舟，在狂風巨浪的大海裏飄。我將怎樣的結局呀？誰知道！

我們一羣人在山頭上休息了一下，又開始走。

我漸漸的感覺到恐慌，我發覺我跟隨着的那一羣人，似乎沒有一個熟人。本來我是跟了平山，代英，沫若，玉章，恩來這些人來的，但此刻在我們這一羣中，似乎全都沒有他們。怎麼辦呢？在這被人包圍之中，舉目無親的異鄉，逃亡生活中沒有自己熟識的人是很危險的。

我摸摸我的身邊，還好，手槍雖然失掉了，而我身邊的一大束鈔票，依然無恙。本來我們政治部有二三萬現款（都是票面很大的外國紙幣，例如二千元一張的美金票，一百鎊一張的金鎊票），一萬元多不能兌現的漢口紙幣。這些錢，原都是總務科保管的，由伙子挑着。在關埠出發的那天，我感覺得這幾個伙子有逃亡的危險，所以把錢完全取了出來，二三萬外國現鈔由自己帶着，把一萬多元的漢鈔交給了一位姓周的科員帶着。自從流沙失敗以後，在忙亂中，彼此逃散，政治部的人全都不知到那裏去了。

二三萬的現鈔還在身邊，我稍爲安心了一點。並不是我要

吞沒這筆公款，因為有了錢，不僅我自己可以走脫，而且我還可以救濟許多落難的朋友。而且，我還有一個妄想：明天如果是可能的話，我還想回到洪停屍的那地方去，把洪的屍體設法安葬了，將來有機會，還可以隨時來墓前憑吊——但立刻，我又覺得這種妄想是沒有意義的，第一，我當然不能再到那村子裏去。第二，作算能夠回去，但安葬她屍骸，也全然是沒有意義的事。洪是一個澈底的革命戰士，如果她泉下有知，也決不贊我成去掩埋她。人死了，一切都完了，像皇帝死後的隆重的“奉安”，與棄在郊外被野狗吃乞丐的骨頭，對於死人全是一樣的。我紀念着洪，但也不必做這無意識的事，我要踏着她的血跡前進！

翻過了幾個山頭，走到一個村裏的時候，天已大明了。現在完全明白了，同走的這一羣人中，我是一個也不認識。最大部分是二十四師的兵士，領帶的是二十四師的顧師長，但我不認識他。還有兩個是農工委員會的人，雖然時常見面，但我不道他們的名字。這兩人的相貌，完全是像是傳奇小說中的“奸臣”，我很不願意看見那種臉嘴。那姓顧的傢伙，是葉挺的部下，但我知道他不是CP，是一個非常可惡的人。兩個“奸臣”陪着這可惡的人，我似乎是被他們遺去了，我有點憤怒。

肚子餓得怪可憐的，我們在這村莊上弄飯來吃，姓顧的傢

伙，由他的馬弁在老百姓家裏弄兩隻雞來殺了煮食。兩個奸臣式的人很諂諛地陪着他吃，但沒有來請我。我以非常憤慨的情緒跑過去自動拿他們的雞來吃，姓顧的傢伙倒還沒有什麼，而那兩個奸臣向我擲出一種非常憎惡的眼光。“你們這兩個狗頭！”我心裏這樣想，CP裏面像這樣的好細不肅清出去，CP是會滅亡的，這些傢伙真是太可惡了。

我不管他們的憎惡，只顧在那裏揀最肥的雞來吃，飽餐了一頓。

跟了這些狗頭走有什麼意思呢？一共只有三十多支槍，要想做點事業是不可能的，與其跟了他們受氣，還不如走開。於是我決定開小車（軍隊裏逃跑的意思）了。可是事實上很困難，我雖然身邊還有錢，但我穿着一身軍服，此地又是我全不熟識的廣東的農村。一個外江佬在廣東農村中，要想走路是很困難的，何況我是被注意緝捕的敗軍之將？

正在躊躇間，在我們來的原路上又來了一羣人。男男女女是六個，向着這村子走來，我雖然還沒有看清楚來者的面貌，但我已經知道這是我們的人，而決不是敵人。我很盼望這裏我熟識的人。

終於實現了我的希望，來的六個人中，有我認識的吳明，還有七十團的指導員李任子；其中的一個男子，是第二師師長

秦光遠，我也是認識的。三個女子我全都不認識，但我想這一定洪的同學。由於她們，使我聯想到洪，覺得有點淒慘。如果洪還在——不，如果來者之中的一個是洪，那我將如何的狂喜呀！在遭了大難以後，還能夠見面，我們一定要緊緊的握一握手，但是，使我很悲哀，不僅這來者之中沒有洪，而且在這一生，我是永遠不能再見我的洪了，除非是在夢中。

吳明和我握了握手，我們覺到有點淒然，彼此相對無語了片刻。

我和吳明平時的關係雖然不深，但我不討厭他，我覺得這人很可以親近。在這危難中遇見了他，心裏感到一種愉快，要不是我爲想起了洪的悲哀，我真會叫起來了。

姓顧的混蛋傢伙帶着隊伍走了，我沒有去。我現在和吳明他們在一起了，我們這新的一羣是七個人，三個女的，四個男的。

他們在這村子裏吃飯，我和吳明商量目前的出路。隊伍已經完全潰散了，除了散夥，各人找自己的出路以外，沒有辦法，所以我們決定了到汕頭去，只要到了汕頭，無論到上海與香港都是可以的。

他們還沒有吃好，又陸陸續續來了幾十個人，都是兵士。我們設法避開了他們，在一座高山上等了一下。因爲怕被我

們的兵士或敵人看見的緣故，大家在亂山的樹木叢中躺着，連坐也不敢坐起來。

躺在這亂山中間，幾頭大得嚇人的螞蟻爬到我的身上來。我又想起了在斃了氣的洪的遺體上，現在不知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不知可有什麼東西爬到她身上？……我簡直不敢再下去了。

在山上躲了兩個鐘頭，看看路上已經沒有行人了，纔走了出來。

汕頭在那裏，我們全然不知道，但往南走總是對的，所以我們就往南走。

這天晚上，在一個村莊上的農民家裏過了一夜。因為吳明身邊帶有現大洋，向農民買兩隻鷄來吃了。

要到汕頭去，非化裝不可，我們都買便服來穿了。但在這窮僻的鄉村裏，要買便服是很不方便的，我們所買到的，只是一些最簡陋相俗的農民的衣服。我脫下了我的軍裝，穿上一件黃色粗夏布的農民的上衣，一條深藍色的粗夏布的褲子。這身衣服是最窮苦的農民穿的，穿到我身上，是不合式的。因為先天近視的緣故，我的高價的近視眼鏡，一刻也不能離開我的鼻樑。頭髮是往後梳的，雖然沒有燙得灣灣曲曲，也沒有司丹康塗得亮晶晶的，但無論如何，我總不像農民的腦袋——我的

頭部與我身上的衣服絕對不相稱的，腳上依舊穿着草鞋，這也與頭上的長頭髮與眼鏡是不配的。但有什麼辦法呢？這樣的化裝，總比原來穿軍服好些。

看了自己的化裝，覺得好笑起來。

我很留心我身邊所帶的鈔票。我把那幾張票面數目最大的金鎊票與美金票，用手帕包了繫在袴帶上，幾張香港鈔票另外包成一包，拿在手裏。

第二天——今天是十月八日了。一早起來就走。今天我們找到了一個帶路的老農，他本是辦農民協會的，態度很誠懇，對於我們是很同情的。他告訴我們不必到汕頭，因為路遠而且汕頭的偵探也很多，去是很危險的。離開此地不遠，有一個名叫甲子港的地方，有輪船可以開到香港。我們完全信賴他，由他帶我們到甲子港去。

十月九日的上午，就到了甲子港。此地有很熱鬧的市場，我們到飯館去吃了一頓飯。

我們這七個異鄉人的裝束太奇怪了，而且七個人中有三個是年輕的女人，這在少見多怪的廣東鄉下人看來，是非常奇怪的，所以我們每到一個什麼地方，就有許多人圍攔來看，這種現象對於我們是非常危險的。在甲子，我們更是把全鎮的人都鬧動了，男男女女都集攔來看我們。在荒涼的鄉村裏，倒還

沒有什麼，這裏可不行。這裏有保衛團，如果保衛團一注意我們，那我們就糟了。帶路的老農很明白這一點。他和我們商量，今天又沒有開香港的輪船，要在這裏過一夜是很危險的。他說此地有帆船可以直航香港，如果我們能夠包定一隻帆船，立刻就可以出口了，不過代價很貴。我們身邊都帶有很多錢，吳明，秦光遠，李任予，他們的袋裏都是塞滿了鈔票。只要沒有危險，代價高一點，在我們是滿不在乎的。由這老農去接洽，講定八百元的代價，包定了一隻船。

很大的木帆船，停泊在海港中間，我們坐了小艇子上了帆船，以為就可以一帆風順，安抵香港了。但因為潮沒有來，船不能開。這幾天來的極度的辛苦，疲勞得只想安安逸逸睡覺。船雖不能開，但我們一上船，以為沒有事，大家倒在船裏睡着了。也不知是經過了好多時間，我們正睡着的時候，那個帶路的老農，急急慌慌的把我們喊醒了。天已經黑了，船還是沒有開。帶路的人把我們喊醒以後，就低低的告訴我們：

“快點逃命，有人來捉了。”

我們都跟了他逃下了一隻小艇子，由他與另一個船夫划着，向海港的那邊逃去。問他是什麼一回事，他沒有說，只是搖手禁止我們張聲。

雲堆裏隱隱約約有月光出現，照在這冷靜的海港裏，使我

可以看到後面的確有一隻船追來了。

帶路的人祇是催着船夫快點划。這小艇子在海港裏急急的前進。我們大家不敢有一點聲息，靜悄悄地躲藏在船裏。我們的生命將怎樣一個結束，全都不知道，也管不得這麼多，“聽天由命”，在這時候，我們都成了運命論者了。

是上弦前後，月本沒有圓滿，而且天空又堆滿了雲，所以海港上的景色是不能十分清晰的，但也可以望見遠遠的山峯，可以望見峯上的樹林，以及港面上的閃爍的螢光。我們七個亡命者潛伏在小艇裏，也不知小艇將載我們到什麼地方。這是一個富有詩意的環境，但可惜我們這個時候已沒有心緒去吟詠了。

小的艇子，總比大船走得快一點，所以我們終於逃出了追捕者的視線。在這小艇子急急航了二三小時以後，我們在一地方上岸了。這已經是內地而不是海港了。

因為逃得太匆忙，我來不及穿草鞋，坐在艇子裏的時候簡直忘了，但一上岸，真要叫苦連天了。赤着腳在鄉間的路上走，這痛苦是不能形容的。雖說這個時候已經逃出了追捕者的視線，但他們顯然還是要從後面追來，所以還是不能不亡命的逃。

第二師師長秦光遠在奔逃的時候，忽然立定了怪聲喊起來，原來他的一包數量甚多的鈔票，丟在大航船上忘記帶來。

這小軍閥大約把他師把部裏的餉完全帶在身上，數目一定是不少，至少有十萬八萬罷。他發覺遺失了一包鈔票，急得痛哭流淚，但也是枉然的。

這沒用的傢伙！——我這樣想，僅僅失掉了一點錢就要流淚，虧他也是一個師長呢。

赤着腳，跟了帶路的人在模糊的月光下急行，又走約摸二小時，纔到了一個荒涼的鄉村，在一間茅屋裏歇了下來。天哪！我這一雙腳已經滿是血污了。

這人家是帶路的人的親戚，所以我們安心住了下來。

“這是什麼地方呀？”我問。

“惠來東門外面。”帶路的人說。

“呀！我們已經到了惠來嗎？”

休息了一刻之後，商量今後的辦法。吳明提出一個意見，以為像這樣男女一起走，很引起人家注意，一定要發生意外，所以今後非分開走不可。商量的結果，將三位女同志交給了帶路的老農，請他於時局稍為安定一點，再設法送他們到香港，我們四個男子也分成了兩起，吳明和李任予在一起，我和秦光遠在一起。

秦光遠和我商量走法，我們決定到汕頭去，因為從此地到汕頭只要兩天路程就夠了。我化了一塊錢買了一雙布鞋來穿

了。

今天是雙十節。老百姓替我們僱了兩乘轎子，抬我們回汕頭去。轎子穿過了惠來縣城，但我們把轎簾放下，以免再惹出什麼意外。

這天在一個不知地名的小市鎮上的小客棧裏住了一夜，客棧費是每人每天一角五分，飲食在外。十一日早上步行出發，到了一個不知地名的鎮上坐輕便火車，很快地把我們載到了潮陽縣城。潮陽縣城與汕頭遙遙相對，只隔一條海峽，過了海峽，就是汕頭了。我們都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喜悅，因為我們立刻可以到汕頭了。

從潮陽到汕頭的電船，每小時行一次。我們便輕從火車上下來，就去搭電船。四十五枚銅元一張票，就可以到汕頭，我買了票坐在電船裏，想起一小時後就可以到汕頭，明天早上就可以到香港，心裏很高興。但就在我高興的時候，禍變就發生了。一隊背着毛瑟槍的遊擊隊來電船裏檢查旅客，我這不倫不類的裝束，成了他們第一個目標。

三個本是土匪出身的遊擊隊兵士我們包圍起來，檢查的結果，我這三萬元鈔票被查出了。

“這裏一個敗將！”這土匪看見了一大束外國鈔票，歡喜得怪叫起來。

我立刻被拖上岸去，我的一雙手也被反綁起來了。

“爲什麼事把我捉起來呀？”我自己也知道我的抗議是沒有效力的，果然我所得到的回答是更無理的辱罵。

“你這壞東西，敗將！要打你的靶！（槍斃）”一個土匪用他的毛瑟槍托在我背上猛擊了一下。

我被拖到電船售票處的旁邊的一個小屋裏，一個隊長模樣的土匪頭坐在那裏。

“拿出起打了靶吧。”一個兵士徵求隊長的同意。

“唔！”隊長的下吧動了一動，我的運命就被他這一“唔”決定了。兩個兵士就動手來拖我出去。

天哪！想不到要到這地方來！——死的威脅使我的眼前一切突然黑暗起來，在這一剎那間，我簡直失了知覺。但時間很短，立刻就恢復了原狀。

“慢一點，我還有話說。”一種求生的本能使我這樣的喊起來，其實有什麼要說？我全沒有準備。

隊長叫兵士又把我拖回來，於是我的生命又有了轉機。

“官長：我們都是在外面混事的，出外靠朋友，你殺了我也是沒用，我願意完全把鈔票送給你，你放了我出去，我們還可以做個朋友。”我這樣說。

“……”他沉吟了一下；“你是不是當團長的？”他問。

“不！我是當司書的。”

“不！你一定不是司書，怕還是司令官呢。”

“出外靠朋友，我們都是在外邊混飯吃的。朋友，幫幫忙吧。”

“……”他又沉吟了片刻，終於我被釋放了，他很爽快的說出“那末你去吧！”

在三分鐘內，我把我的生命從死神手中奪了回來，這意外的勝利便我有點迷惑，不是在夢中嗎？我這樣想。

雖然他已經釋放了我，但我身邊已經沒有一個錢，怎麼能到香港去呢？於是我不能不對他作進一步的要求了：

“謝謝你，但是你能不能幫助我一點盤纏？”

他把我的鈔票大略看了一眼，問我：

“你這裏大約有多少？”

“大約有三萬多大洋罷。”

你檢了每張十元的三張香港渣打銀行的鈔票給我，很客氣的說：

“拿去吧，大家漂亮點。”

我拿了三十塊錢，重新又走回電船碼頭，買了票走上電船，下午三四點鐘，到了汕頭了。

在汕頭會到了梅電龍與七十一團團長劉鳴震，我們一同

上了開香港的輪船，在輪船上，還會到了賀昌與黃日葵，另外幾個不認識的而是我們一夥的人。

十月十一日的下午，終於到了香港。





香港與上海

到香港是十月十一日下午三點鐘。與香港分別，僅僅十三個月，香港的海水雖然還是和從前一樣的綠得可怕，而香港的情形，已經大不相同，香港罷工是早已解決了，所以香港依然恢復了昔時的繁榮。而這十三個月內，國內政治更是經過了鉅大的變動，回憶去年九月裏到香港來時，是何等光景？而今呢？唉！風月依然，而江山安在？

我們上了岸，就到粵南旅店去開了兩個房間。我出去找朋友借了一點錢，買一套洋服來穿了，跑到永安公司裏的大鏡前

照照，覺得自己還像一位公子少爺，比起在東江逃難時的情景，大不相同了。

晚上到南唐酒家去喫了一頓夜飯。明月從窗口裏照進來，使我想起了去年九月間的一個月明之夜，和廣州某小姐到這酒樓上來喝酒的情形，趙嘏的“江樓書懷”的七絕，不啻是代我而作了。

獨上高樓思悄然，

月光如水水如天；

同來玩月人何在？

風景依稀似去年。

由某小姐而聯想到洪。為革命而犧牲的洪，此刻怕連肉已經腐爛了。在洪的生前，我知道有不少的青年為她傾倒，但如今她已經變成腐屍，不知從前傾倒於她的人，現在還能再有幾人掛念着她？洪之死，是我所目睹的，分校女同志中除洪以外，我想一定有許多人也和洪一樣的遭了不幸的犧牲。革命，革命，這就是受革命之賜呀！不知這些犧牲者的家人，知道了他們的骨肉慘死異鄉的消息，作何感想？我如今還能夠在這繁華的香港海濱，南唐酒家的樓上，對月獨酌，總算已經是萬幸了。如果我也在流沙死在沙場上，則此刻我的骨頭，怕已經被野狗咬去吃了。我眼看洪死了是這樣子的，如果洪沒有死，而看我

死了，不知她作何感想？或許她比我現在還更悲哀。

在粵南旅店祇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搬到油蔴地偉晴街朋友家裏去住。因為這兩星期來過度辛苦的緣故，在油蔴朋友家裏，整整睡了三天沒有起來

+ x x x

本想在到香港以後，就上省城（廣州）去，但到香港後所看到形勢，又覺到上省城去有點不妥，因為無論如何，我現在已經成了他們的反叛者了：成則為王，敗則為寇，他們現在是王，在他們看來。我們已經成為寇了。因為如此，雖然很想去看看廣州的那位小姐，但事實上是不能去了。我把不能去廣州的原因寫信去告訴了這位小姐，並且希望她能夠到香港來看看我。

香港的面積很小，所以差不多天天可以在馬路上遇見熟人。自從流沙失敗以後，我雖然僥倖成了漏網之魚，但其餘的人的消息，我完全不知。年老體弱的乾吾，正在抱病的恩來，這兩個人，我尤其替他們擔憂。我想，在我所熟的朋友中間，怕有

不少像洪一樣的已經了結了吧。但到香港的第四天，我知道這些負責的人幾乎全都無恙，代英已經到了香港，我在銅鑼灣路上遇見他，他在潮陽電船上也被捕了，那正是我損失三萬元的地方；他被捕後就押在一間小房子，後來給他爬牆逃脫了。沫若與恩來，從汕頭直接到上海去了，他們沒有走香港轉。平山是和賀龍乾吾一起來的；他們是在汕頭雇了一隻大航船來，據進說××口的時候，海關檢查員把他們扣留起來，後來出了三千元的賄賂，纔放了他們，平山一到香港就到上海去了。林祖涵與張國燾，都沒有來香港，他們都是直接到上海。李立三到了香港，但立刻就到上海去了。葉挺也到了香港，比較重要一點的人，全都沒有死——大約文官科長以上，武官團長以上，都沒有犧牲，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電龍到香港只住了兩天，就往上海去了。

我在香港全沒有和這批人往來，所以覺得非常寂寞。住在偉晴街的朋友的樓上，我打算寫一部東西來紀念安存齋與洪，這兩個都是我敬愛的朋友，而現在都已經犧牲了。

廣州的小姐來了一封很熱烈的信，她說她知道我們打敗仗的消息，如何爲我着急，幾次想到潮汕來找我，均被家人勸阻，知道我平安到了香港，又如何歡喜，本想立刻要來看我，但因為病倒了，所以不能就來。信內並且附了一百元的匯票來，

因為她恐怕我現在很窮。

的確，我現在非常之窮，很需要借一點錢來用用，我很感激她寄錢給我，更感激她對我這樣真摯熱烈的同情。所以我在接到這封信以後，很想到廣州去看看她，但她的來信中是不贊成我到廣州去的。在我，原覺得是正大光明，毫無不法的地方，但在這種年頭，冤枉殺個把人，是不算得什麼一回事，在廣州，我知道幾乎天天在紅花崗與東校場槍斃許多人，自己幸而成了漏網之魚，何苦再效飛蛾之撲燈呢？所以我雖然一心想到廣州，而終於沒有去。

想起紅花崗，那是一個可紀念的地方。我在中央宣傳部（省議會）的時候，辦公室正對着紅花崗，四烈士的石碑樓巍峙其上。這一條路，本已是廣州的郊外了，因為是通黃花崗白雲山燕塘的大道，所以行人來往不絕。一個人推的獨輪的小車，每天總在這條路上經過幾十百部，在車輪轉動的時候，發出一種不和諧的聲音，直傳到我們的辦公室裏來，在整個的辦公時間，這種聲浪幾乎是不斷的。那是桃紅柳綠的暮春時節，春天本是最容易引起性的煩惱的季節，南國的春天，尤其富於誘惑的作用。年齡已經成熟了的我，在這時候是非常之感受到性的苦悶。而我週圍的環境，對於我是更其充滿了示威挑釁的意義。婦女部的一批女同志，她們不絕地在我們辦公室前來來往

往，每一位女同志走過，總有一種使人沉醉的女人身上特有的香氣吹進我的鼻官。而且這些女同志總是毫無顧地說說笑笑，甚至扭扭扯扯，更足以挑撥別人的心弦。而在我們的辦公室中也正在演着戀愛的滑稽劇。我們這辦公室中，共有三人，除我以外，就是蕭楚女和葛季膺。葛季膺是代英的弟媳，雖然她的最可驕傲的妙齡時期已經過去了，但二十多歲女人，在年逾三十，而猶無妻的楚女看來，簡直是一塊天鵝肉，所以他對於她是極力的進攻。季膺對於楚女的尊容是表示十分遺憾，所以她錫了這大麻子一個“醜女”的佳名。但醜女可以為她寫幾篇文章，可以給她一種虛榮的安慰，所以在利用的形式之下，演了滑稽的戀愛劇。我看不慣他們那種情話綵綵的肉麻狀態，特意把辦公桌掉了一個頭，面對着紅花崗的窗口，他們在我背後演什麼戲，我都看不見了。但是紅花崗前的郊外的道路，除了發出不和諧的聲音的獨輪車外，一對對攜手並行的青年男女，也頗不少。因為這是郊外，所以他們甚至在路上擁抱接吻。這種放肆的行為，給了我極大的厭迫，使我不能不找性的出路。

和孔令俊同住在大東路七十號的樓上，樓下是一個織襪店，兩個很年輕貌美的女工，成了我和令俊追逐的目標。但其後我發現了我們房東的那位豔若天人的小姐時。我又傾全力來向此進攻了。房東就住在我們後面一個衙內，我時常借了繳

房租等等的機會，想去親近這位小姐。有一次，我甚至異想天開的寫了一個條子，在沒有別人在旁的時候，塞入了這位小姐的衣袋裏。這條子上寫着：

“某日某時在紅花崗等你，乞來一談。”

但我在紅花崗等了半天，仍不見這位小姐芳踪的降臨。時間相隔不過一年多，而我曾利用來約意中人叙情的地方，現在成了恐怖的刑場了，這豈若天人的小姐，不知現在已經作了新嫁娘未？在那個時候，我是何等志高氣揚，彷彿天下已經是我的了，而現在呢？我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遺客了。世事的幻變，是多麼離奇呀！曾經做過我的居停主人的小姐：我誠意的祝你幸福無量！假定在天涯海角，我們還有再會的日子，你也不要責我上次約你到紅花崗叙情的唐突的舉動了；但你如果願意，現在我很希望你到紅花崗去看看，從前曾有一位傾倒你的青年約你去談情的地方，現在究竟殺了多少人頭？紅花崗本來是灰色的，現在恐怕真的被血染成紅色了。可愛而又可怕的紅花崗呀！

× × × ×

我住的地方是油蔴地偉晴街十三號四樓右首的統樓，在左首的房子，住有一位很年輕的女郎。現在我深信從前乾吾時常罵女人是怪東西，是很有充分理由的。女人真是怪東西，見了女人，總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情緒。從前做工作的時候，因為把全副精力集中於工作，所以倒也不覺什麼；現在閒空無事，反而覺得需要女人了。對面房裏的小姐，年紀大約十七八歲，怪漂亮的，不禁使人生愛慕之心。因為同住四層樓上，所以接觸的機會很多。這四層樓的高房子，並沒有電梯，從樓下上樓來，要爬三乘很長的梯子，有一次，我從外面進來，却好這位小姐也在外面回來，我們一同上樓，我趁此撥會，和她攀談。從此以後，我就時常借機會和她談話，有時約她到我房間裏來。她家裏除她以外，只有父母兩人，父親似乎不常回家來，母親又時常出去，所以家裏時常只有這位小姐守着。如果我真要進攻這位小姐，那是一個極好的機會。但正因為是一個好機會，所以給了我一種說不出的痛苦。進攻嗎？一種封建的意識壓迫着我，覺得有點對不起正在臥病的廣州的小姐；停止嗎？人非太上，孰能無情？

自己處在這樣狼狽的境地，而偏偏又有這樣的豔遇；造物弄人，往往如此。

在這矛盾的網裏，我自己也不知怎樣纔好。這位小姐對於

我的同情，似乎一天天深刻起來。有一天，她在我房裏閒談。

“你父親是幹什麼事的，爲什麼時常不在家？”我無意中這樣問起。

“做偵探的。”她泰然地回答我。

“偵探？”

“是的，省城公安局駐香港的政治偵探，因爲近來聽說汕頭方面來了大批的反動份子，所以父親天天在外面捉人。”

這次的談話，給了我一個極大的刺激。我現在雖然什麼也不幹，但也難免被他們加上反動份子的罪名送上紅花崗去。而且她是知道我從汕頭來的，萬一她告訴了她父親，那末我的安全就很成問題了。由於這一個刺激，我決心立刻離開香港到上海去，橫豎我在香港不僅沒有事，而且眼見陷於沒有辦法的景況中。我之所以沒有就到上海去，是想在香港唔廣州那位小姐，因爲她說病稍爲好一點，就可以到香港來看我。現在既然如此，也不必在這裏再等了，到紅花崗去，無論如何是一件沒味的事，還是回到上海再說吧。

× × × ×

十月十九日晚上上了開往上海的太古公司的新甯輪。深夜十二點鐘，船就啓碇出口，我是和楊君同行的。這次回上海去，實在淒慘得很。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浪子，上海可說就是我的故鄉。我雖然沒有存着錦衣還鄉，榮歸故里的妄念，但前年由上海來廣東時，希望何等重大；去年從廣東出發時，更是志高氣揚，以為將來可以帶着革命的勝利回故鄉去，而現在呢？一切都失敗了。

廣州小姐給我的一百塊錢，早已在這幾天中化用盡了。這次到上海，連船費也是朋友幫助的，但在這年頭，朋友都沒有官做，所以都不是有錢，與我不過大貧小貧之別而已，所以他們的幫助，當然也是很微薄的。而我這位同行者楊君，又正是和我一樣的窮。我們只得在船上買了兩張統艙票，兩個人所剩的，總共只有四塊多錢了。

雖然是小鴉三一樣的窮，却還是大少爺的脾氣，擠在統艙間裏，感覺到非常的不舒服，而船員與茶房，又是生成的欺窮諂富的賤種。住在大菜間裏的人，彷彿個個都是他們的老子，而住在統艙間裏的人，在他們看來，簡直不是一個人。一方面感覺到擠在這充滿臭氣的統艙間裏的不舒服，另一方面又感受到船員茶房的侮辱，痛苦與憤怒，無處發洩。船上有人打牌消遣的，我們也知道僅僅只有四塊多錢，實在沒有打牌的資

格，但因為在船上苦悶無聊，所以楊君終於冒險坐了下去，參加他們的雀戰，結果把這四塊多錢完全輸光，還欠了別人幾角錢。

在船裏本原沒有什麼別的用處，不過茶房的酒錢是不能不給的。照例統艙客人每人須得給茶房六角酒錢，兩個人至少是一塊，但我們兩個人連一角錢也拿不出來，這難關頗使我們焦慮。結果不能不用無賴的手段，我們拿出宣傳科長的煽動的本事來，藉口茶房侮辱統艙客人，一致拒絕，不給酒錢，我們的煽動居然生了效果，一百幾十個統艙客人全都擁護我們的主張。輪船將近吳淞口的時候，茶房來收酒錢，我們全都無理，弄得茶房也沒有辦法。

船到上海，停靠在浦東太古碼頭，這對於我們實在是一個不利的處置，我們連到浦西去的擺渡錢也沒有了。幸而輪船有不少接客的旅館招待，我們把行李交給了平安旅社的招待，跟他到了二洋涇橋的平安旅社，在三層樓開了一個六十八號的房間。

我的行李，只是一條不值錢的棉被，裝在一隻網籃內，楊的行李有三四件，照旅館的規定，有行李的可以不必先付房金，五天一結；我們就是這樣的住下來了。

和上海分別，已經兩年多了，黃浦江的水依然是這樣混濁，而政治的情形，已經有點不同。前年離開上海的時候，正是

五卅運動的高潮低落，那士廉開始殺革命黨的時候。現在呢？那士廉早已被趕跑了，孫傳芳也打倒了。在上海，已不能再看到五色國旗了。兩年來的變化，就是如此！

一到上海。就去找幾位老朋友，但全都搬了家，十幾個朋友，竟找不到一個。這意外的打擊，給了我很大的刺激。我這次回上海來，對於生活方面是沒有一點準備的，原是想來找這些朋友設法，但結果是一個朋友也沒有找到。雖說上海是我的第二故鄉，但這兩年來，隨着政治關係的劇變，一切舊有的社會關係幾乎全都沒有了。

旅館裏供給了我們的膳宿，在這五天之內，吃飯與住宿是可以沒有問題的。但我們到上海的時候，窮得連一個錢也沒有，出去找朋友，車費不能不要。我的一身除了比較值錢的洋服以外，只有旅館裏的一條被，和帶在身邊的一支自來水筆。被根本是不值錢的，而且放在旅館裏，也不能拿出來，只有一支自來水筆，還可以換幾個錢。在到上海的那天，我就打算拿自來水筆去當幾個錢用，但是跑了幾家當舖，都碰了釘子，一支價值十八元的康克令，竟當不到一文錢。後來還是跑到吳淞路，在一個舊洋服鋪裏賣了三元五角錢，分了一元給楊君，自己所剩的只有二元五角了。奔走了四天的結果，二元五角錢只剩了兩角小洋和十一個銅板。四天的奔走是毫無結果，不僅

對於今後的生活沒有一點把握，而且連目前對付旅館，也是毫無辦法。旅館照例是五天一結賬，明天非付錢不可了。這四天來房租飯錢小賬總算起來，至少要一二十元纔得過門。在做官的時候，這一二十元當然是不算什麼，但此刻要我拿一塊錢也拿不出來。楊君和我一樣的沒有辦法，在第三天夜裏，他就急得哭了一夜。我因為自己不會哭，所以對於一受刺激就流淚的男子，總表示鄙視，但另一方面，楊君的窮途末路的悲哀，也引起我的同情。在第四天，眼見我們一切的希望都斷絕了，明天如果沒有錢，是不能過門的。我和楊君來商量無辦法中的辦法。我本來可以一走了之，因為我這條破被，充其量，也不過值兩塊錢而已，丟了是不足惜的。問題全在乎楊君。楊君找到了一個在高昌廟當下級軍官的同鄉，這同鄉可以接他去住，但沒有力量代付旅館錢，而楊君自己，又不能纔往在旅館裏的行李，因為他沒有這些行李，就不能回湖南益陽的故鄉去。但不付錢，要把這些行李帶出去，旅館是決不答應的。

商量的結果，還是我替他想出了一個辦法，要他今天晚上，約那個當下級軍官的同鄉來，帶了他先走，他的行李，把值錢的統統帶去，僅留下一隻空的不值錢的本箱子，和我那一隻網籃，留在旅館裏，由我來對付。

這天晚上，他的同鄉來了，約了他同走，但茶房看見他帶

了行李要走，就阻止了他。

“客人：請你算清了賬再走。”

楊君急得漲紅了臉，幾乎無詞以對了，我很鎮靜的出來喊住了茶房：

“忙什麼？我沒有走，行李也在這裏，明天早上問我來算賬，早一點喊一聲，我一早就要走。”

我雖然窮得只剩了兩毛錢，但我的洋服還是穿得很整齊的，因為這是在香港新縫的。在旅館裏吃飯，也總是代價最高的伙食。這種大少爺式的闊綽的舉止，就是最狡猾的茶房也為我們所騙倒了，他們還以為我是一位豪華公子呢，他們看見我沒有走，而且還有箱子網籃放着，所以經我一喝，也就不再作聲了。

楊走了以後，我覺得我減輕了一種責任。但我自己明天怎麼辦呢？旅館裏的賬至少要二十元，再加茶房的酒錢，我拿什麼來給他們？這裏所有的，就只有一隻完全沒有東西的空箱子，和一隻裝了一條不值錢的棉被的網籃。不給錢，旅館要怎麼能放你走？要想潛逃嗎？我沒有學會飛簷走壁的本事，而出房門到扶梯口，必須要經過茶房坐的地方，這些狡猾的茶房，知道你沒有付錢，無論如何是決不放你走脫的。怎樣辦法呢？

我一個人關了房門睡在床上，翻來覆去，總是想不出妥當的辦法。在這時候，很清楚的聽見茶房在竊竊私語：

“怎麼？六十八號走了？”

“走了一個，還有一個沒有走，他們還沒算賬，行李已經帶去了一部分，你們留心，明天不要被他走了。”

因為茶房坐的桌子，就在六十八號的外面，所以雖然是他們竊竊私語，而我可以很明白的聽到。糟糕！我已經在茶房們的嚴重的監視之下了。明天怎麼能夠脫身呢？

他媽的，老子沒有錢，咬出老子的鳥！至多也不過到巡捕房去坐幾天，也沒有什麼了不起，——自己這樣想時，也不覺得什麼怖恐了。

正要睡着的時候，隔壁房間裏傳來了一陣淫蕩的笑語，加以床鋪格格搖動的聲音，同時傳到我耳邊，引起了我的強烈的性的衝動。我本能爬起床來，從板縫裏偷看隔壁的情形，但帳子下着，除了富於誘惑力的帳子的顫動以外，什麼也看不見。

別人是飽暖思淫慾，我則雖然在飢寒交迫之中，依然有強烈的性的要求。於是我很後悔這次不該到上海來受苦，在香港，那個政治偵探的女兒——這美麗的姑娘，不是已經可以到手嗎？爲什麼一塊已經到嘴邊的肥肉不飽餐一頓呢？我真是傻瓜！——我要用手來打自己的額角了。

隔壁房裏的淫聲浪音，依然不斷的傳來，外面的茶房依然在不斷的談話。

女人，偵探姑娘，生殖器，性交，房錢，小眼，茶房，明天怎麼辦？……這些此去思潮彼來的在我腦筋中轉着，這一夜幾乎沒有好好兒睡眠一刻。

第二天一早起來，先喊茶房去弄了一碗火雞麵來吃了，就要他去開賬來。雖然我身邊只有兩毛錢，但我的神氣，好像荷包裏裝滿了鈔票。

茶房去開了賬來，二十四元八角六分！這茶房因為要想我多賜他幾個酒錢，所以態度特別恭敬，我裝出滿不在乎的神氣，摸了一摸包鏡，但又停止了，因為我實在也拿不出錢來。

“底下的理髮司務起來了嗎？讓我理了髮走。”我問茶房，因為這旅館內二層樓有理髮的。

“起來了。”茶房很恭敬的回答我。

“你把門關上，我去理了髮來。”我為怕他懷疑起見，帽子也不戴，棄在房裏，就住樓下跑。一溜煙就走出了旅館的大門。我是理什麼髮呀，這狡猾的茶房也上了我的當了。

× × × ×

走出了旅館的大門，怕茶房從後面追來，急忙跳上了一部街車，不講地點，也不講價錢，用手一揮，車夫就拉着很快的向市面跑。

愛多亞路上的汽車總是來往不絕，尤其是在上寫字間的時候。我還怕茶房迫來，故意指揮車夫轉了幾個灣。

“先生：拖到什麼地方呀？”車夫問我，我始恍然大悟，我已經成了失林之鳥，到什麼地方去纔好呀。

“往前面走就是。”我命令式的告訴了他以後，纔集中腦力來想究竟到什麼地方去？車子已經由法大馬路過八仙橋到霞飛路上來了，我始想起我身邊只有二角十一個板，再這樣無目的走去，連黃包車錢也無法開銷了。

“法國花園！”我終於想出了一個地方。

到了法國公園，給了車夫兩毛錢，自己身邊還剩十一個板，茫然地踏進了法國公園的大門。這個時候的法國公園，還不需要門票，只要是穿西裝的，就可以進去。我的一身財物，雖只剩了十個子，但總還是穿西裝階級，可以在公園裏昂首直行。

在公園走了一回，覺得也沒有意義，又出來在霞飛路上間步，“家徒四壁”。是形容窮困的狀況，而我現在則窮得連這四

壁也沒有了。在這廣大的上海，我竟想一個坐一坐的地方也沒有了。在路上儘是走來走去，也覺得有點腳酸了。化了八個子買了一份申報，只剩三個子；在路上走，又不便看報。

已經是初冬時候了，我看別人頭上都穿着呢帽，而我自己却沒有帽子，覺得有點異樣。但我看看自己的洋服與外套還很整齊，覺得自己總還不失為一位上流人物。——身邊只剩了三個子的連歸宿的地方也沒有的上流人物，自己想想，也覺得好笑起來了。

早上在平安旅社吃的火雞麵，早已消化得乾乾淨淨，肚子餓起來了，看了路上店鋪裏的夥計在圓桌子吃飯的情形，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羨慕。

從霞飛路轉入一條靜僻的馬路，經過一個大餅攤，一種富有誘惑力的香氣，把我吸引到這大餅攤來。我本能地把身邊僅有的三個子掏了出來，買一條大餅。大餅攤上的主人，出乎意外的來了一位洋裝大衣的闊綽的顧客，竟把他弄昏了頭，他投出驚奇的目光望望我的貴族化的服裝以後，竟遞給了我兩條大餅。三個子只能買一條，而我却得到了兩條，這意外的獲得，使我異常喜悅，因為我的食慾，一條大餅實在是不夠的，而我又只有三個子。

在馬路上吃大餅，究未免有點不雅相，而且我也走得累

了，很想找個地方坐坐。可是有什麼地方可以坐呢？還是到法國公園去吧！

我用申報紙包好了大餅，又踏進了法國公園，找了一個靜僻的地方，坐下來很精細地一面看報，一面吃大餅，連芝麻也不使牠落掉一粒。連餅屑也吃光了，而肚子裏還沒有塞滿。

在做官的時候，天天上館子去吃，而現在連大餅也吃不起，僅僅是三個月的時間，生活的懸殊就到了如此地步！

在初從平安旅社出來的時候，我很慶幸能夠脫身，但現在我反而後悔起來。如果早上沒有跑出來，也許此刻已被旅館主人送到巡捕房去了，今夜可以在巡捕裏安安逸逸過夜，而現在呢？當然不能在公園裏過夜。現在還有兩個大餅吃，此後連大餅也沒有吃了。究竟應該怎樣辦呢？——我用盡了我的腦力來搜索解決生活問題的辦法，引起了種種奇怪的想頭。

記得從前在報紙上讀到過這樣的新聞：流寓於哈爾濱的白俄，時常在馬路上公然小便，因違犯警章而被捉將官裏去。問他們為什麼要在馬路上小便？他們的答覆是：因為沒有飯吃，所以故意犯法，想藉此到警察局去吃幾頓飯。在上海，也曾有白俄因同樣的情形，故意擊破了一家洗衣店的大玻璃，被捉到巡捕裏去，吃了幾天飽飯。我現在也是到了這樣的絕路，大約我也只有來這麼一套了。

因為昨夜沒有好好兒睡，今天又走了一個上午，疲倦很想睡眠，好在公園裏遊人不多，我竟在一張靠椅睡着了。

醒來的時候，大約已有下午三四點鐘了。我瞥見了對面坐着一位很面熟的艷麗的少婦，彷彿是在什麼地方會過，而一時又想不起來。

“哦！是朱先生，好久沒有看見你了。”

“哦！是×太太。“我斗然想起了。還是在未到廣東以前，在一位朋友家會到過這位年輕的太太。那時我也曾為這位年輕的太太生過不深切的相思病。大約在朋友家裏會到過四五次，而且還打過兩次牌。她知道我的姓名，但我僅知道她是姓×的姨太太，她其餘的一切，我全都不知。她的年齡比我大二三歲，的確非常美麗，對我作過許多很有意義的表示，但因為我那時還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胆子較小，不敢對她作露骨的表示。她究竟是有夫之婦，而且年齡又比我大，所以我到廣東以後，早已根本忘記了她，想不到又在此地重逢。

“一向在上海嗎？”她用很溫柔的音調問我。

“不，一向在北京讀書。”

異鄉逢故友，這是一件可喜的事，我就走過去坐在她的那條椅上，開始談話。

為了昨夜隔壁房淫蕩的刺激，使我整天的不舒服，恨不能

飛回香港油蔴地去追逐那位政治偵探的姑娘，如今見了這位曾經一度無表示的默戀過的艷麗少婦，使我全身的血液緊張起來。偵探姑娘已經錯過了機會，這意外的艷遇，決不能再放過了。從前就彷彿聽朋友說她的浪漫，而現在正是需要的時候，我必須緊緊的抓住她纔好。

我們像是久別重逢的知己朋友，談得很投機，我也是用了全副本領，想把這位坐在對面的少婦，奪到我的懷抱裏來。我覺得我有一種把握，可以使對方為我沉醉，為我俘虜過來。

兩個大餅早已在肚子裏消化完了，肚子餓得咕嚕咕嚕叫起來，而我看對方的情形，已似乎為我一種青年男子的熱力把她屈服了，我就很冒失的邀她出去吃點心。

我們兩個人回走出了公園。她緊緊的靠着我走。在雲飛公司喊了一部汽車，開到鄧脫摩去吃了代價很高的西菜。早上連大餅也吃不起，現在靠了她的福，居然成了這貴族化的飯店的上賓了，慚愧！

葡萄酒兩個人都喝了一點，藉着酒的力量，我終於把她拖到了東亞旅館，開了六〇四號的房間。

我必須坦白的承認：我是多麼無聊，多麼下流呀！在東亞旅館過了荒唐淫樂的一夜，我不僅從她身上滿足了性的要求，而且解決目前的經濟危機；經過了一夜了鞠躬盡瘁的效勞，我

取得了她八十元的代價。自己想想，覺得完全成了一個拆白黨了。但是，上帝！主！拆白黨還不就是你造來的嗎？你造出了我，不能原諒我的罪惡嗎？

× × × ×

繁華的上海，真是無奇不有。我像做夢一般的過了荒唐一夜，而她的身世，我始終還不能知道，甚至連她的住址，也不肯告訴我一點，倒是我詳詳細細地告訴了她在廣東武漢河南江西的種種經過，說明了未到北京讀書的一切。這肉麻的故事，寫出來不能使人深信，而我自己是身歷其境的。這是多麼可紀念的一夜呀！一九二七年的十月二十七日，南京路東亞旅館六〇四號房間！

由於這八十元的幫助，使我能夠在法租界南陽橋茄勒路租了一個前樓來住下，而我在平安旅社損失的帽子，也得另買了一頂。

搬到茄勒路以後，就在街頭會到從前軍人部的同事羅伯翰君。他本在武漢中央組織部做事，在武漢政府瓦解以後，就

到了上海。他和組織部同事曾華的戀愛，就在上海流浪生活中完成了。他現在也住在茄勒路，所以我們能夠在路上不期而遇。

我現在變成一個運命論者了，如果我早點知道羅君住在此間，那末從平安旅社出來，也不必再到法國公園去休息，因此也不會遇到兩年前想思過的×太太了，當然更不會再有東亞六〇四號的浪漫的一夜。一切都似乎是註定的一般。

如果上帝是真有的話（當然是笑話），我要感謝上帝了。我終於九死一生的險惡的環境中掙扎出來，現在能夠很平靜的住在上海租界上。雖說現在沒有官做，但這裏明窗淨几，大可供我讀書著作。在這幾年的工作經驗中，更體驗到自己學問的淺膚，能力的薄弱，極力企求增加自己的學問與能力，這是我的迫切的要求。雖說現在是失敗了，但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在人才缺乏的中國，我們自己要留挺起胸脯來負責任，努力學習，以爲將來之用。這時候，我定下了一種計劃，分三部進行：（一）補習外國文；（二）研究經濟學及哲學；（三）開始寫“一九二七年底回憶”。

× × × ×

在先施公司買東西會到了乾吾，他住在新大沽壑，到他寓所去了一回。他不久就北上了，因為我在×太太那裏拿來的八十元早已用完了，乾吾臨行時給了我一百元，這對於我的經濟危機是一個極大的幫助。

廣州的小姐來信，而且又給我匯了一百元來。她說她那天抱病到香港去找我，一直跑到偉晴街十三號四層樓去，會到了那位偵探姑娘，纔知道我已經走了。

我非常感激她——我的遠在廣州西關的小姐！她抱病到香港去找我，空跑一趟，那種失望的情緒，是可想而知的，我該怎樣去安慰她纔好呀！

自己有一個很壞的毛病，身邊癡了幾張鈔票，似乎總得想方法去把牠用完纔好；把錢藏在身邊過夜，就會患眠症，倒不是怕隔壁阿二來偷我，我自己想出種種消化鈔票的方法，明天該上什麼地方，該去買些什麼東西？

本來想打算寫一九二七年底回憶，但因為身邊有了幾個錢，就不願再在房子裏悶住了。我不歡喜跳舞看電影，也不歡喜逛遊戲場，倒是逛馬路與逛三大公司，是我所歡喜的。

自從到上海以後，雖然感覺得很寂寞，但一般有政治關係

的朋友，我又不願意去會他們，因為我現在抱了“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的逃避主義。所以我只想找些沒有政治關係的朋友來往談談。

聽伯翰說起，鄭峻生現在也在上海，住在馬浪路西成里。這是一位沒有政治關係的朋友，所以我去拜訪了他。

他現在已經改名為鄭戎子，落魄在西成里三十八號的亭子間裏。我們見面時很熱烈地握了握手以後，就相對無語，小別數月，而恍如隔世，誠令人不勝今昔之感！

在軍人部時，有一個時期會和他同住在廣州大東路東興里二號。我們到南昌時，他也來了南昌。因為他是黃埔同學會的社會股長，那時黃埔同學會也遷在南昌。我還記得很清楚，在一個嚴寒的冬夜，在南昌三眼井一號毛杜的寓所，有鄭峻生，段子中，張濟傳，田汝勤，毛杜和我，我們六個人在這小房子裏無聊地談着。外面雖然下着很大的雪，而因為我們這小房子燒着一盆很旺的炭火，所以也不覺得冷。我們由個人問題談到政治問題。對於政治上的煩惱，我們幾乎是一致的。後來由鄭峻生與段子中發起，組織一種祕密的左派體團，就由我們六個人作幹部，成立了一個“再進社”。當時我對於這種主張並不熱烈，因為那時我的立場又和他們有點不同。但當然，我不參加他們是不行的，因為他們緊緊的拉着我，我被推為幹部的常

務委員兼宣傳部長。雖然這所謂再進社以後就沒有下文了，但這天晚上，我們通夜沒有睡，起草綱領及組織章程，煞費苦心，現在回想起來，真有點滑稽。

鄭峻生，這傢伙現在改名鄭戎子了，雖然是偏促西成里三十八號的矮小的亭子間中，但他的戀愛也就在這流浪生活中完成了。他的愛人洪劍霞，也是在南昌找來的——在南昌時，許多朋友都找到了愛人，鄭峻生與毛杜的愛人，都是葆靈女學的學生。



十一月六日，今天是洪在流沙殉難的週年紀念日，我很早就起來了，出去買了一點黑紗，縛在左臂上。對於洪之死，我的確非常悲悼，這不僅是由於我們的過深的友誼，而且我覺得她是一位婦女界中最有天才的活動分子，她之死，實在是革命的損失。

廣州小姐與乾吾給我的錢，又漸漸用完了。我寫了一封信給邵力子君。向他借五十塊錢來用。他的回信沒有提到錢的問題，只約我早上去談談。

邵先生還住在太平橋三益里五號的原址。衙堂內依然和從前一樣的醜惡，去的時候也不湊巧，正是倒馬桶的時候，一種難聞的臭味，幾乎使我作嘔。

敲開了後門，在客堂裏會見了邵先生，僅僅是一年多不見，我覺得他蒼老了許多。——人是這樣容易老呀！我感到一種淒慘。

我們談了許多別後的情形。他去年代表國民黨到莫斯科去參加第三國際的會議，所以談了許多關此莫斯科的事情。在談話中，邵君說到一個很痛心的事：

“在莫斯科準備回國的前幾天，我因為知道平山也要回國了，所以約他一同走，路上有了同伴，也可以免得些寂寞。平山一口答應，說同走很好，而且還說他動身的時候，會來通知我的，所以我很放心的等着他來通知。但是等了兩個星期，還不見他來通知，後來我自己跑到他住的地方，纔知道他已經走

了。他不願意和我一起走，也不要緊，爲什麼走時連通知也不來通知，累得我等着，難道我邵力子要出賣你譚平山嗎？”

我自從認識邵先生以來，還是第一次聽到他發牢騷；但他的牢騷還不止於此：

“我從莫斯科回到上海的時候，四一二事變已經發生了，南京國民政府已經成立，寧漢已經公然對峙。那時候我覺得我的處境非常困難：到武漢去嗎？共產黨的行爲我實在有點不贊成，且我和介石的私人感情上，也覺得對不起他，所以我不願意到武漢去；到南京去嗎？我又覺得有點對不起武漢的朋友。所以我決定兩個地方都不去。但南京我又不能不去跑一趟，雖然我不願做官，但不到南京去一趟，在上海就不能立足，而且我到莫斯科去時，還受有介石的私人的委託，所以我決意以私人的資格，去會會介石。介石要我做總部的祕書長，我不做；介石要我做總政治部的主任，我不做；介石給我錢，我也不受，在南京祇住了兩天，就回上海來了。但是不久，我的兒子從莫斯科寫信來罵我是反革命，和我脫離父子關係……”

我深深的體會到邵先生這時候是非常痛苦的。

“在上海，我祇有時出去看看戲，打打牌，連書也少看。”他很淒然地說。

這客堂裏，我從前是常來的，覺得現在有點異樣了。從前

左首壁上掛的孫洪伊寫的“青年導師”的鏡框，以及譚延闓寫的四幅屏條，現在都沒有了，而換上了于右任寫的一副對。

看不見孫洪伊寫的“青年導師”的鏡框，我不禁有一種感觸。在民國日報覺悟時代，邵先生以領導青年自任，所以孫洪伊稱他“青年導師”，他是樂於接受的，這“青年導師”的鏡架，他一向懸掛在客堂裏。現在為什麼把牠取消了？難道邵先生自己放棄了他的領導青年的責任嗎？

談到中國共產黨，邵先生表示了很多的不滿。

“他們反對介石，實在是一種錯誤，尤其是利用唐××來反對介石，更是一種錯誤……CP有些地方，實在是很沒有意義的。我在莫斯科的時候，克復上海的消息傳來，他們開慶祝會，總是說工人佔了上海，我去演說，說是工人幫助革命軍佔領上海，他們就說我不革命……”

“那末，在邵先生看來，CP失敗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我這樣問。

“根本原因，還是由於組織上太嚴密。”

“組織上太嚴密會造成失敗？”我覺得這樣說法有點奇怪。

“是的，CP之失敗，是由於組織上太嚴密了，這似乎有點矛盾，而實在是這樣的。他們上面對於下面，在工作上督促得

很嚴，下級機關時常要對上級機關工作報告，而這些工作報告上，每次總比上一次要有更好的成績纔好，比方說關於工人運動，這個工廠支部所能領導的羣衆，本來只有三十個，但工作報告上不能不說四十或五十個。區委對縣委的報告，又增加了一些。這報告每經過一級，就增加一些，直至中央報告到國際時，本來只有一萬羣衆，到國際時已成了五萬八萬了。像這樣，國際所定的計劃，就不適於實際情形。但上面的指示，下級必須給對服從。所以共產黨就不能不走上了錯誤的路線。PC 各級的報告上必須要增加一點的原因，也是因為上級的督促太嚴，不加一點，自己覺得不好意思。爲要免上級的責備，只有實際力量以上，再虛加一點，如此轉輾增加，結果是鑄成了大錯。……’

談了差不多有兩個鐘頭，纔向他告辭，他送我出來的時候，遞給了我三張十元的鈔票。

× × × ×

十二月二十八日，今天是我滿足二十歲的生日。去年今

日，我抵南昌，而今年却落魄在上海租界上，廣州小姐寫信來賀我的生日，但我自己覺得非常慚愧，二十年的光陰已經過去了，而我有了些什麼成就？慚愧，慚愧！我把丹徒趙伯先（聲）的“二十五初度寄友人詩”改了一個字——把第一句“百年已過四分一”的四字改成五字，寄給了廣州的小姐，作為我二十初度的紀念：

百年已過五分一，

事業茫茫未可知；

差幸頭腦猶我載，

敢持肝膽與君期！





中華民國捌拾貳年玖月貳叁日

贈



書名 九二七年底回憶
著作者 朱其華
發行者 上海新新出版社
價目 實價每冊一元六角
出版時期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初版
出版數目 1—3000部
版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玖拾玖年伍月廿伍日 贈送



脊
目